

《江津往事》

第二卷

庞国翔 著

空 页
标题页
版权页
采 页

（共 6 页）

目 录

前言.....

第一章：山水旧影

江津有个“四牌坊”

江津有条“清平巷”

江津有座“艾坪山”

江津有个“百岁坊”

江津有个“曾公祠”

江津有条“长寿溪”

江津有个“五举沱”

江津有个“邻母洞”

江津有个“保家楼”

江津多个“七孔子”

江津有座“万寿桥”

江津古莲池与遗爱祠.....

江津文风塔和奎星阁.....

江津古县城及其城门.....

津城古井今何在.....

笋溪河又叫“张孝溪”

横看成“骆”侧成“駮”

古韵之美真武场·····	·····
川渝边前要观“清源宫”·····	·····
万里长江第一大佛与名联·····	·····
綦江长江有妙联·····	·····
古河綦江探幽·····	·····
“一场两县”大垭口·····	·····
百里笋溪·····	·····
清溪河边奇特的“蛮子洞”·····	·····
江津太公古刹藏妙联·····	·····
巴渝地名三对“奇联”·····	·····
石树相依的“树包石”·····	·····
江津王爷庙 庇佑两江口·····	·····
寻踪江津古代前后八景·····	·····

第二章：故事留痕

古代江津地域最早城县·····	·····
此江州非彼江州·····	·····
江津曾置鼎山县·····	·····
江津古时寿官寿星·····	·····
刁化神屯兵骆駮山对峙三方·····	·····
镌刻在綦江岸壁上的琐碎记忆·····	·····

佛学大师欧阳渐与江津支那内学院·····	
掩映在密林中的精神文化大讲堂·····	
一副楹联与一个场镇的故事·····	
江津一桥三名显沧桑·····	
“杨荷花”与江津·····	
江津的辛亥反正·····	
江津同志军与綦江反正·····	
江津酒与历史文化名人·····	
两岸共同的记忆·····	
江津笋溪河上“圣旨碑”·····	
江津旧时过年“五拜”·····	
江津“元宵节”民俗·····	
江津消失了的传统节庆与民俗·····	
江津高寨坪刘氏祠堂及族约家训·····	
宗祠建筑廷重祠·····	
石达开兵败江津奔溪口·····	
一份抗日杀敌《光荣证》的前尘后事·····	
寻找“江州天书”·····	
张家藏古匾·····	
过年真好·····	
杀牛过年·····	
和尚·秀才·樵夫·····	

打油诗差点惹大祸·····

四面山的飞龙巨蛋·····

巴渝姓氏中的隐语·····

第三章：人物古踪

黄庭坚作客江津品荔枝·····

陈子昂过江津留五言诗·····

范成大船过江津梦正酣·····

王士禛江津停船写诗寄友·····

张船山与江津“长江水文诗”·····

敢于捆绑巡抚使臣的江津知县余甸·····

抗灾堵变的江津知县周学铭·····

在聂帅家做客·····

江津地下党张西洛力挺王洛宾·····

用诗歌来抵制日货的诗坛奇人吴芳吉·····

苏校长与“津綦边区特支”·····

钟云舫傲骨直肠为民呼·····

钟云舫游五福宫·····

曾国藩向朝廷举荐旌表江津妇·····

陈独秀与江津农民交往二三事·····

丘巫师 PK 陈独秀·····

陈独秀与“江津老白干”·····

陈独秀与鹤山坪邓家的故事·····	
梁漱溟在江津种地·····	
江津青年的“法兰西岁月”·····	
钟云舫一副长联让“蒋介石”父子唏嘘不已·····	
周氏兄弟与聚奎中学·····	
同盟会元老凌昭在江津·····	
民革先贤夏仲实·····	
看破红尘三次“弃官”的刘丹五·····	
抗日烽火中的江津老乡聂荣臻将军·····	

第四章：口述历史

回忆表叔聂荣臻·····	
回忆大哥王利器·····	
我的村庄我的家·····	
写在后面哆嗦的话·····	

《江津往事》第二卷序

胡 林

江津，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文化底蕴厚重；江津，大山大水、山川俊秀、物华天宝；江津，人杰地灵、钟灵毓秀，聂帅生于此，独秀逝于斯。联圣钟云舫在《拟题江津县临江城楼联》中说：“地当扼泸渝、控涪合之冲，接滇黔、通藏卫之隘，四顾葱葱郁郁，俱转入画江城……”

江津古为巴国地，南北朝齐武帝永明五年(公元 487 年)建县，为江州县。北朝西魏（553—557 年）江州县改为江阳县，县治在今天江津顺江口；北周孝文帝元年(557 年)县治迁至今几江，隋开皇 18 年(598 年)因县城地处长江之要津而改江阳县为江津县。江津有着 1500 多年的建制历史，是一座优秀的历史文化名城。重庆市 18 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中江津占 3 个。2003 年重庆市评出的从先秦开始到近代的 100 名本籍历史文化名人中，江津占 10 个，名列当年 40 个区县前二名。

江津不但有独特的历史地位，而且有广阔的幅员面积。江津南接黔北，西邻川东，北抵渝城，因而是黔北文化、夜郎文化、巴蜀文化和巴渝文化的交合地之一。其境内不但有

许多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而且还有深厚的民俗文化积淀。

为了对江津地域境内的民俗文化进行抢救和整理，江津区文化委、区文联和区作家协会组织部分熟悉江津文化、江津历史、江津民俗的作家，进行收集、挖掘和整理江津的这些人文和历史故事，已经取得了较好成绩。本书作者庞国翔同志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之一。他经过认真采访、仔细查寻资料、深入挖掘内涵，才使《江津往事》第二卷杀青付梓。他约请我为其作序，我以为抢救民俗文化，搜集整理民俗文化资料，挖掘历史人文富矿是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我们文化工作者义不容辞之责。几水沙滩留浪迹，鼎山桔林传鸟音。讲好这些即将被人们所忘却的江津故事，这是一件颇有意义的事，我便欣然应允。

展读此书，使我感到江津地方文化的积淀是相当深厚的。我从中读到江津历史上一些鲜为人知的文人故事、历史掌故以及轶闻传说，也领悟到江津人民古今的生活习俗、礼俗、风俗等民俗文化丰富的内涵，它是我国珍贵的民族文化、民间文化、民俗文化财富之一，是巴蜀文化、巴渝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江津的地域文化与民俗同其它地区的地域文化与民俗相比，既有独特的个性，又有相同的共性。

中华民族是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伟大民族，我们的文化建设不能割断历史，对民族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结合时代特点加以发展，推陈出新，使之发扬光大。文化是国家软实力最重要的方面，政治、外交、意识

形态、价值体系是文化，文学、语言、宗教、艺术、哲学也是文化，风俗、服饰、饮食、丧葬等同样是文化。文化无所不包，渗透在人类行为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所有这些所产生的综合影响力，就构成了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所以，搜集、整理和研究江津的民俗文化资料，是符合党中央重视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神和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要求的。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让我们望得见山，看得到水，记得住乡愁……

搜集和整理地域文化、民间文化、民俗文化资料，挖掘地方人文是对民俗传统文化的挖掘和发展，它好比开采金矿提炼金子，也混有大量的杂物。许多民间民俗、习俗风俗以及民间故事、民间传说等主流是健康向上的，但有时也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夹杂着一些消极、落后观念和低级趣味，有的甚至还夹杂着封建迷信色彩。作者如何梳理取舍，当取决于自己的审美个性。读完这部《江津往事》第二卷，不难看出庞国翔同志对相关地域文化、民俗文化资料的取舍，正是按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推陈出新”、“发扬光大”的要求做的。

这部书可以说是展示江津地域文化、民俗文化和江津人文掌故的精品之一，是研究江津历史、江津人文、江津民俗的丰硕成果。翻开此书，江津风土人情、人文历史、市井掌故尽览其中。期待着庞国翔先生还有第三卷、第四卷、第五卷的问世。

是为序。

（作者胡林系重庆市江津区文化委主任）

第一章：山水留影

江津有个“四牌坊”

在江津区，四牌坊知名度最高，可谓妇孺皆知。这是一个古老的地名。江津城区仍有小学、街巷乃至社区假此“牌坊”之名，曰四牌坊小学、四牌坊街、四牌坊社区。

所谓牌坊，是封建社会为表彰功勋德政、科第忠孝、节义善举之人所立的建筑物。四牌坊是彰表功德类。

四牌坊之名从何而来？原江津县城十字路口东西南北有四个牌坊呈“口”字状排列，故名四牌坊。四牌坊所记功德之人，则是江津曹氏中的两对父子。

曹文海于元末入川，属江津曹氏入川始祖。繁衍至明代中期，家族昌盛，人丁兴旺，成为江津十大姓之一。传至七八代，江津曹氏更是科甲叠起，族名大振。

明万历十九年（1591年），江津曹英中举后，被任命为朝廷工部主事，他勤务国内建设之事，深受朝廷好评。曹英还是一位诗人，写过一首家乡诗《石门》，在士子中受到好评。其诗曰：“鬼斧工成石门奇，亭亭对峙两江涯，乾坤万古存真迹，开阖宁教俗眼窥。”这石门并非江津长江边的石门，而是指现蔡家镇笋溪河石膏滩下的一段峡谷，是曹的家

业之地。由于曹英在任工部主事期间对朝廷贡献大，其父亲曹永吉“以子英贵，封为承德郎”。其实，曹英父亲曹永吉也是举人，曾任大兴县知县。按明清旧制，北京城区分别划归宛平县和大兴县管辖，知县官阶比其他知县高出一等。这在故里江津曹氏族人中，算是引以为荣的事。

另外一对江津曹氏父子是津南笋里人曹邦化、曹进可。曹邦化以“明经”身份最初被朝廷授予吉安府通判，他刚正不阿，后迁任宁州知州。儿子曹进可于 1567 年在江津中举后，他辞官回到江津。教授乡梓，堪称乡贤。儿子曹进可历任苏州府通判、黄平州知州、莱州府同知等。后自请回江津休养。此间奢崇明叛兵据重庆，逼成都，自成大梁国。奢三次进攻江津，巡抚朱燮元调集官兵剿御，曹进可以乡绅身份辅佐赞助进剿，平叛后朱燮元多次造访，并保荐曹进可复出，升任按察司。在一次平叛中曹进可为箭所伤，后突围。他再次辞官回到江津。

万历三十五年(1608 年)，曹氏家族决计修建四个牌坊，以昭显曹永吉、曹英父子和曹邦化、曹进可父子卓越功勋。此项工程由健在的曹进可主持，地点选在县城核心的儒林街十字路口（今四牌坊中医馆）处。十字路口四边皆立石质牌坊，高 8 米，四柱见方各两尺，每坊宽 5 米，中下可通行轿马。石柱、额枋上均浮雕人物、禽兽、花卉等。

此时曹氏在江津兴旺发达，有曹半县之称。四牌坊的建

成，对于江津低矮的县城建筑来说，可算高大雄伟，气势恢弘。很快成为江津城池里的标志性建筑。不久，曹氏又在此建立曹氏总祠，祠内兴办曹家私学，后改为兴仁学堂，四牌坊成为江津最热闹最有名的地方。

1929年，四川军阀刘文辉所属24师副师长兼混成旅旅长张清平（名志和）驻防江津，他出动工兵对低矮的江津县城棚街进行大规模改造。这是江津历史上第一提档升级的城市改造。为拓展硬化街面，打通塞口，工兵拆除了四牌坊。而曹氏总祠则在后来的抗日战争期间，被族人卖掉。

四牌坊的建筑虽被拆除，但物去名留，且名声远播，直至今日。



（载《重庆日报农村版》2014年11月13日）

江津有条“清平巷”

在江津主城区，有一条与天香街平行、与石狮子街呈“丁”字形的小街叫清平巷。清平巷约 200 米长，南头是清平幼儿园，现改名几江幼儿园，但许多市民仍叫它清平幼儿园。这里为什么至今都还叫清平巷？为什么有个当年的清平幼儿园？想必现在大多数人都不知来龙去脉。其实，这和 80 多年前一个叫张清平的中共地下党员有关。

张清平，字志和，所以人们又叫他张志和。1894 年出生于四川邛崃县。1914 年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在川军刘文辉部任职。北伐时，刘派他为全权代表赴武汉表示响应革命。此时，他就与吴玉章、郭沫若等川籍人士暗中往来，并由他们介绍结识了董必武、林伯渠等人。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经中共川西特委批准，张清平被秘密吸纳为中共党员。

1929 年，张清平任驻屯江津的国民党 24 军第一师副师长兼第二混成旅旅长。他在部队里，秘密建立了中共军支（国军中的中共地下党秘密支部的简称），此时他任地下党四川省军委委员。他借用江津文庙，创办进步图书馆，这是江津的第一个正式图书馆，他暗中购进了一批马列主义书籍，这

些书籍在江津军民中影响很大。他还（利用部队驻屯的机会）对江津城区进行改造。当时江津县城全是窄街陋巷，低檐旧屋。他统一规划城内的街道，截弯取直，撤除梯坎。发动军民拓宽街面，由 3-4 米扩为 7-8 米，长度约三公里，形成了现在江津城街道格局。他派出工兵修建第一和第二公园，改造修建了大同路。还统一将沿街铺面改为西式，修建了体育场。在大十字路口修建了标准钟楼，为江津增添了一处景观。他还创办了大明电灯公司，江津县城终于用上了电灯，开始有些现代城市的气派。

张清平对江津地方的教育事业十分重视。他初来江津时，县城里的幼儿教育还是一片空白。江津堪称文化大县，但县城连一所幼儿园也没有，他非常的焦虑，他会同地方各界人士，多次召开军地会议商讨办法。最后他克服种种困难，在第一公园附近（今中药二厂）建起了一所幼儿园，专门修建西式楼房一幢，四周栽植花木，环境优美，成为幼儿教育好场所。为了表达感激之情，江津各界人士通过商议，就用张清平的名字来为此命名，取名为清平幼儿园。

由于清平幼儿园大门与城内主要的街道还有近 200 米的距离，而且这段路坑洼不平，雨天满路泥泞，很不便于幼儿行走，这给上幼儿园的小朋友带来了困难。张清平就组织军民在这里修建了一条小街道，使清平幼儿园与城区主要街道相连接。全城的小朋友上幼儿园就更为便捷和安全。人们有

感于张清平，也将这条长约 200 米的小街巷取名为清平巷。这条小街巷至今都还叫这个名字。只是原来的木质穿逗结构的街铺店面现在全变成了预制结构的高楼。

1930 年 9 月 3 日，中共地下党四川省行动委员会趁张清平外出之机，在张部盲目组织起义。起义失败后张清平只得赶回江津相机处理善后事宜。因这事，最后他不得不离开江津回到邛崃。以后投入抗日战争和继续从事革命工作，曾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1975 年 10 月，张清平在北京因车祸逝世，1981 年 2 月其骨灰被安放到已以故共和国领导们的长眠之地——八宝山。

(原载《重庆晚报》2013 年 3 月 3 日)

江津有座“艾坪山”

A：艾坪山的来历

艾坪山是江津城区西南郊外的一条最要山脉。《江津乡土志·地理篇》（光绪本）说：艾坪山，即艾青坪，在县西一两里。山顶平正，长约十里，宽五六里，北临大江。水源发出西南，分流南汇鼎山诸水，西流至五子沱汇大江。早年艾坪山属江津城厢外琅山乡，《琅山乡志》则说：艾坪村位于琅山中心区之西，辖七个村民组。系坪状高丘，前有鼎山，后有官斗山、猴子山。朗日横空，山巅一瞥，东望太公，南观鹤坪，西观华盖，北观几水，更有一番佳景。原名艾村坪，现名艾坪村。用现在的地理位置来说，就在的江津城区背后的原化肥厂正门对面的猴子山至官斗山、凉风岗（韩氏酱园背山）一带。

艾坪山的来历，民国版本《江津县记》记载这样一段话：艾青坪山，县西两里，山顶平正，下瞰全城如指掌。有艾尚书名发明墓，碑残时次莫考。此话前说艾坪山方位和形状，后说艾坪山来历：艾坪山有一个叫艾发明的人，官做至朝廷尚书，人称艾尚书。他死后葬于这个山上，时有艾尚书墓。但由于年代久远或其他原因碑残石断，详细墓址现已无法查

找和考究。现在考查江津历史文献，还没发现有官拜尚书的艾姓人家。所以这也许是说，山上有一个姓艾，名尚书，字发明的人，逝后墓茔称为艾发明墓等等。不管怎说，艾坪山是因人得名。

B：名人眼里的艾坪山

被今人尊称为联圣的钟云舫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在成都监狱里写下“天下第一长联”《拟题江津县临江城楼联》，联中介绍“临江城楼”的方位：南倚艾村，北褰莲盖，西撑鹤岭，东敞牛栏……此“艾村”即艾坪山也，这也是钟先生常去之地。吴芳吉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爱国诗人。其代表作之一的《几水歌》共五首。第二首是这样写的——

几水真真好，津城处处情。

大西门外路，长忆艾卿坪。

树树枝枝香桔子，村村舍舍涌滩声。

风光四季明，归兴一舟轻。

诗中的艾卿坪即是艾坪山，这里桔林满山，一片翠绿。时诗人正执掌江津中学，学校有小道直通艾坪山，课余诗人常登艾坪山，眺望坪下，城廓之外，全为桔林，林中点缀村舍，直延致江畔。1938年著名学人、曾叱咤风云的陈独秀先生流落江津，乡贤邓蟾秋邀其在艾坪山北坡所建康庄小住。这里青山满目，江水长流。陈叹“人生得此福地足也”。四

年后陈在石墙院仙逝，因无葬地，丧事难办。蟾秋突记当年先生曾说“人生得此福地足也”，于是让出康庄下一畦宝地。所以艾坪山北坡才有“独秀陈先生之墓”。著名抗日将领张芝尧在一篇回忆录中介绍他在江津城南郊艾坪山的一段往事。1941年，第六战区与日军在湖北三斗坪对峙，为确保“陪都”重庆安全，他率兵在江津长江南岸艾坪山修筑炮兵工事。若日军水上进行重庆，艾坪山与对岸高家坪的重炮可进行拦截。艾坪山男女老少积极支持，放下农活，送茶送饭。山上砍伐所有林木，村民不计一分钱，都作无偿捐助。在村民的帮助下很快完成了任务。在张将军的军旅生涯中，他认为艾坪山人是最为深明大义的。现在艾坪山上有一个市级抗战文物遗址保护点——防空洞，就是当年所修。

C：艾坪山不是鼎山

现在一些江津人误将艾坪山认作鼎山。其原因一是因为现在大家找不到鼎山了，不知鼎山在何处，二是前些年几个摄影家在长江对岸浒溪山或高家坪处拍照江津城区即几江半岛，其照片显示：耸立于几江半岛（江津城区）背后面的艾坪山山高顶平，故叫其鼎山。其照片曾作江津形象宣传，因而广为流传。其实此“平顶”与“鼎”不一致，此“平顶”为梯形上端而非鼎状。那么鼎山在那里？国民版《江津县志·山脉》篇云：鼎山，南县一里，形如鼎。光绪版《江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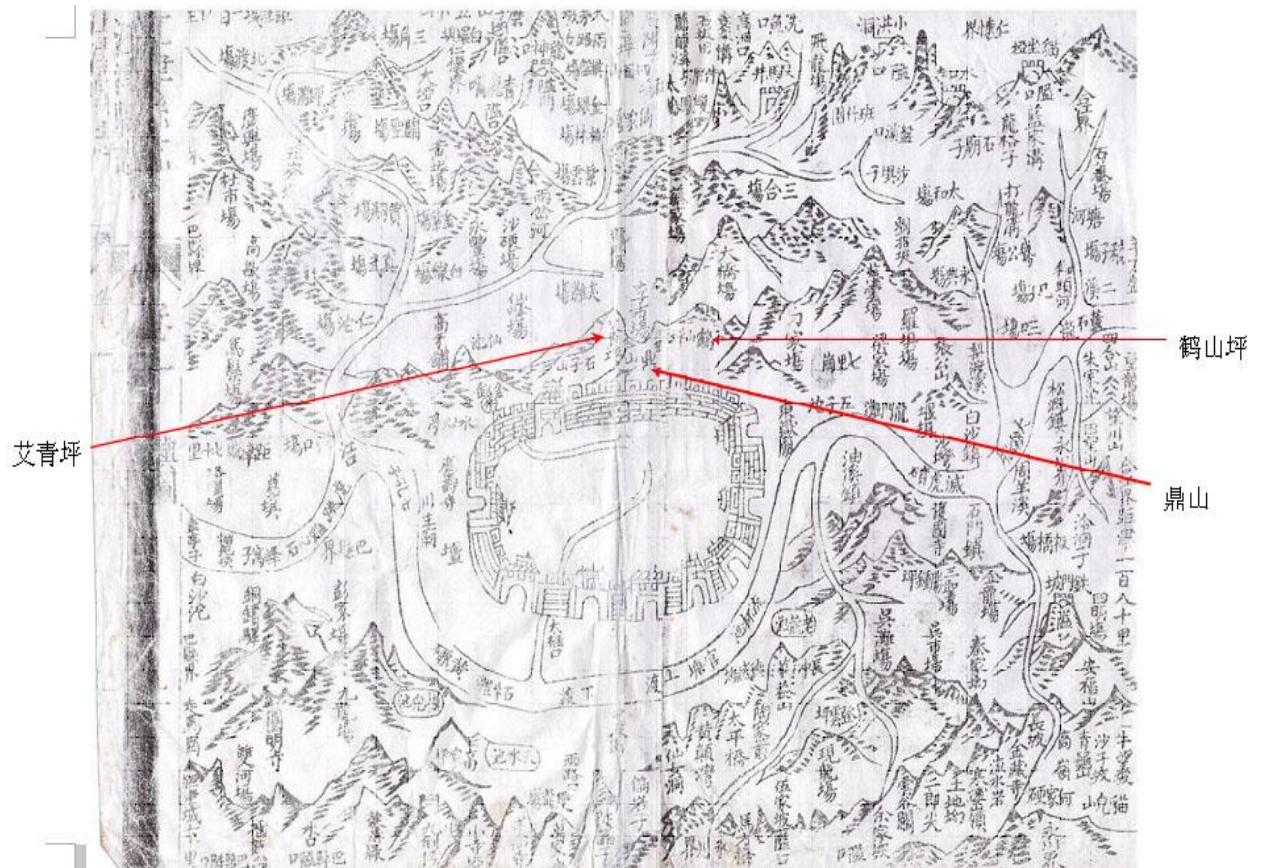
乡土志》卷四·地理篇又云：鼎山，县南一里。其形如鼎……北瞰大江，岩溪之水至此发源，北流半里许入城，环带学宫注泮池。经大中大通太平三桥至太极口入大江。《琅山乡志》原文说：“鼎山（艾坪七队）形如鼎，山下岗峦重叠。前有长江三面围绕，形成几字，江岸成弧形平原，面积约两平方公里，正中为县城所在地，地形如渔翁撒网。为邑中八景之一。事实上鼎山就在现在的齐齐火锅城、云辉丽都、沿江花园这一带，时属琅山公社艾坪村七队（见清末江津城乡地形图）。旧时江津城房屋低矮，又有城墙。鼎山就是城南出城第一山，其次才是艾坪山。艾坪山因人而名，鼎山因状而名。实际上鼎山是艾坪山北坡一子山，它与武城山（长风厂石子山）相连，现已被栉次鳞比的高楼淹没，鼎山已不复存在，只留下人们的记忆和想象。江津县城东西北三面临水，南门是出城的陆上通道，出南门就是形如鼎状的鼎山，它才成为江津八景之一，才有工部尚书江渊的《鼎山叠翠》诗——

几江形势甲川东，山势崔巍类鼎钟。

岚静天空青嶂耸，雨余烟敛翠华重。

钩帘对酒情偏逸，拄笏吟诗兴颇浓。

安得辞荣归故里，巢云直卧最高峰。



(艾坪山、鼎山和鹤山坪方位图)

(原载《重庆晚报》2013年12月30日)

江津有个“百岁坊”



“贞寿之门”是江津目前尚存唯一“百岁坊”。

江津区油溪镇桥头村三社有一条由西南向东北流入长江的小溪叫滩子河。明代中叶，一支杨氏族入由江西省南昌府桂花园迁来此插占为业。杨氏族入分住在滩子河的北岸杨家坝和南岸万家坝等地。

杨氏乃耕读世家，勤耕苦读，很快族系发达，成为津北地区的望族大姓。到此支杨氏入蜀十六代杨钦承时，其五子杨治约更是家业显赫。

杨治约，字化拣，生长在万家坝。先在璧山衙门为官，娶璧山大户人家之女左氏为妻。生二子：荣万、荣载。后来，杨治约官至布政司理问。布政司也称藩台，是清代管理一省民政、户籍、赋税的衙门，全称是承宣布政使司，与提刑按

察使司(主管刑狱诉讼和监察)和都指挥使司(主管军队卫所)并称一省的三个主要机构。理问是布政司理问所的主官，杨治约官阶六品，不久他又被朝廷敕封为承德郎。

杨治约夫人杨左氏，活了 104 岁，这在当时可谓凤毛麟角，全国少见，而且杨家五世同堂。朝廷为此特颁旨旌表。同意杨家建百岁坊。皇帝还御赐绸绶和银两，并赐“贞寿之门”四字。敕封杨左氏为“安人”。

光绪本《江津县志》“卷十一·寿妇”曰：“杨左氏，附贡生荣载、荣万之母。年百有一岁。五世同堂。”此说明，光绪本《江津县志》编印时杨左氏还健在。101 岁，三年后即杨左氏 104 岁时过世。

杨家在滩子河南岸万家坝奉旨修建豪华而又气派的百岁坊“贞寿之门”。建成之日，与江津县毗连的永川、璧山两县轰动一时。

不久，杨治约夫妇去世。杨葬于璧山县城北十五里的老鸦滩三星坝。杨左氏葬于杨家沟。两人虽逝，名声依然大振。杨治约长子杨万荣，字象函，附贡生，乾隆五十一年（1786）后，敕赠武略骑尉，享年 84 岁。长孙杨灿晟，字旭斋，官至懋功营千总（六品武官），保举补缺后以守备升用，并赏蓝翎，敕授武略骑尉。

遗憾的是杨治约长孙、住宅在杨家坝的杨灿晟虽娶了刘氏、何氏、韩氏、张氏四房，但没有生育。旧时常讲：不孝

有三，无后为大。杨灿晟即向住宅在万家坝的族兄提出要求：抱族兄之子为已立嗣。族兄家人经过商议，认为杨家坝乃本族之地，抱子过房立嗣可以，但杨灿晟应将万家坝“贞寿之门”原样迁建到杨家坝。

过继给杨灿晟为嗣的杨增午，字子运。任考腾录后，经议叙，又任监课大使职。

杨家坝建成的“贞寿之门”座北向南，四合院布局，建筑面积 80.04 平方米（仅百岁坊），砖木结构，硬山顶饰封火墙，抬梁式梁架，六架椽屋六椽袱用二柱，大门最上方竖书“口口百岁”四字，下面横书“贞寿之门”。门框用整条石做成，面阔 13.8 米，进深 8 米。

此百岁坊系“坊院连体”建筑。“贞寿之门”里面是一个戏楼。与戏楼相对的是院坝与石阶相连的杨家大院，可谓庭院深深，长达六重堂。民国时这里属江津县七星镇，其镇长就是此处杨氏充光，当年曾有许多戏班前来演出，“贞寿之门”真是风光一时。



解放后，此处杨氏后人分散各地。这里作为地主庄园，被分给当地群众，也分了一部分给没有住房的杨氏后人。

“贞寿之门”后面的杨氏大院开始被拆除。在“文革”中，由于受“破四旧”影响，戏楼和“大门”上的一些石刻、徽雕遭到人为破坏，但整体架构尚存，正面墙面粉饰、彩图等受风雨侵蚀严重，有大块面积剥落。

“贞寿之门”是长寿之乡江津区目前发现的第一个“百岁坊”。由于“坊院相连”的特殊建造结构，因而它对研究清代巴蜀民居建筑具有重要意义。

(原载《中国文物报》2015年10月23日)

江津有个“曾公祠”

在江津老县城大土地街城隍庙左侧（现几江粮站），原有一个庙宇式古建筑叫曾公祠。这是封建社会江津历史上唯一百姓所建祭祀县官的祠庙。这曾公祠还有一名叫清廉祠，遗憾的是在解放初期因城市扩张建设被毁。但是上了年纪的老江津对这“一祠两名”的建筑，都会有依稀的记忆。

曾公祠为何又叫清廉祠？这得从七品县官曾公说起。

曾公者，曾受一也。乾隆《江津县志》卷三曰：“曾受一，广东东安县人，由举人授珙县，三十年调任（江津知县）”他任江津知县时此志书正在编纂，所以对他的政绩没多写。但嘉庆、光绪乃至民国时的县志，对其政绩是大收特书，评价他是“名儒循吏合二为一”——这是对封建社会官员很高的评价用语。

曾受一生于 1710 年，字正万，号静庵，自幼家境清贫，靠母亲一人耕山垦荒种地为生，少时就读河漕乡私塾。雍正七年（1729）参加县举行的院试，名列榜首，为邑庠生。雍正十五年（1735）为乙卯科拔贡，1738 年成为戊午科乡试举人，榜列第二。后赴京参加会试，列为大挑一等，敕授文林郎。他博览群书，研学经史，著述甚多，是当时著名的理学名人。

曾受一初任珙县知县，乾隆三十年（1765 年）初任江津

县知县时，正值三年大荒。民国版《江津县志》载：“公来篆吾津，值骄阳三载，民苦流离，公捐俸，购谷千石，立义仓，倡救命令，以贷不足，民赖以存。”他创建“救命会”，带头捐奉禄、赈灾民，激励百姓生产自救，建立义仓赈灾。每当他看到瘦骨如柴和饥肠辘辘百姓他都会暗中流泪。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与夫人商量，毅然将老家祖传盐田与旧宅变卖，得款用于赈灾，江津灾民受恩动感。

要解决百姓饥荒，必须种植粮食。江津连续三年干旱，需得种植旱粮作物，曾受一然想到家乡广东的旱粮作物红苕。他立即派人到广东运回红苕种进行种植，红苕终于成江津百姓的“半年粮”，这事在后来成为美谈。

红苕又叫红薯或白薯，也叫蕃薯，江津习惯叫红苕。它适应性强，不论浅丘平坝或深丘槽谷、中低山区都能生产；可以夏栽，也可以秋植；既可以单种，又可以间套种。它源于美洲中部的墨西哥和哥伦比亚一带，公元 1492 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后，才将红苕传到欧亚一些国家。明朝万历初年(1573)，福建长乐华侨陈振龙到菲律宾吕宋岛经商，以重价买得几尺苕藤，带回福州城外试种，开始引进到我国。万历二十二年(1595)福建大旱，陈振龙的儿子陈经伦向福建巡抚金学曾推荐在福建省推广，红苕才传遍福建全省和邻省广东。

曾受一派人买回苕种后，亲偕夫人到农村教农民种红苕，这样红苕才由广东传到江津。红苕一身都是宝，用途很

广。民国版《江津县志》记载：“富于淀粉与糖份，赤者尤优，可代米食，又可为造酒、醋及酱油之原料，藤与叶可饲豚”。清末《江津乡土志》载：“性同粳米，最能养人，过荒年民无菜色”，江津百姓非常喜爱红苕这旱粮作物，其种植在江津发展很快，产量不断增多，并成了江津百姓的主食之一，被百姓称为“半年粮”、“红苕菩萨”。特别在荒年，“没有红苕就活不了”。

红苕很快由江津传到四川及西南各省，江津是四川省红苕的发源地。民国版《江津县志》载：“是时番域之苕，川中无种，公遣人市诸蕃舶，导民种法，由津延及外省，利赖至今。”清朝乾隆五十一年(1768)清王朝正式颁布诏令，在全国推广红苕。江津红苕除供本县食用外，还向外销售。清末《江津乡土志》载：“蕃苕除自食外，还向重庆、长寿、涪州等地输出，每岁约计千万斤。”

随后曾受一又派人到江、浙购回桑苗蚕种，力倡栽桑养蚕，并劝民储粟备荒。这位县太爷还仿民歌俚调，写成通俗易懂、琅琅上口的《劝农歌》、《慰农歌》、《悯农歌》12首，鼓励农业生产。两年后，使江津县起死回生，百姓安居乐业。使江津逐渐形成热心农事的风气。此外，他还变卖家产，资助修建江津城门，扩建几江书院，为江津培育人才。仅一两年光景，江津物阜人丰，面貌大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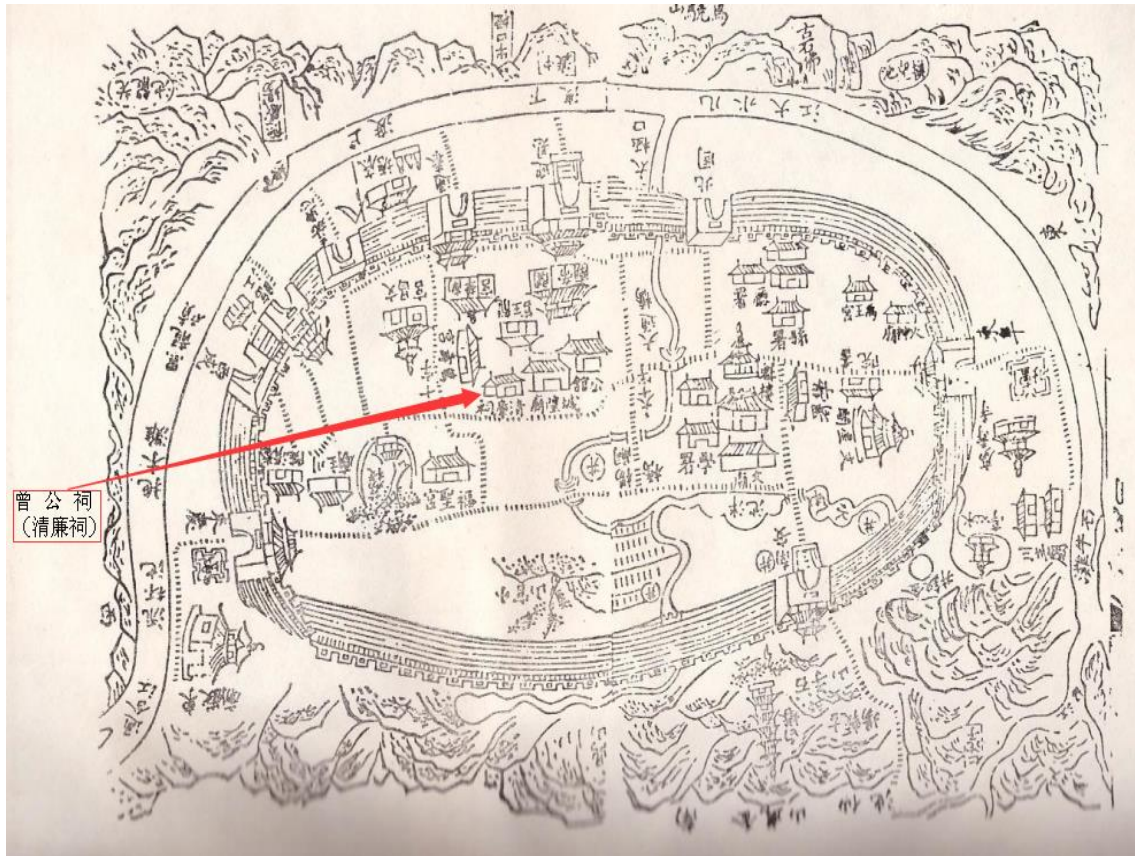
后来曾受一调任合州（今重庆合川区）知县，因为犯人暴狱逃跑，上司震怒，将其停职待处。在这潦倒之际，江津

百姓得知曾公落难，集议救助，派出代表赶往合川，将曾受一全家老幼七口用轿子抬回江津，一路上燃放鞭炮，吹吹打打，好不热闹。过江登岸之时，江津百姓云集通泰门码头，箪食壶浆以迎。此时他闲居几城，百姓对其依然优礼有嘉，关怀备致，倾心仰慕。地方各界倘有重大宴会，均执礼甚恭邀其上座，奉为尊师，并以此为荣。不久，合州案结，他得到平反昭雪。其间，他主持修建了奎星阁和江津长江南北两岸的文塔，祈求江津文风长盛。

数年后，曾受一年老思归，百姓苦留不住，江津百姓自发集银两三千相送，但他铁心谢绝。江津百姓只好汇去他老家，为他赎回当年为救江津灾民而变卖的盐田老宅。离别之际，送者上千，泣不忍别。曾受一尚在途中，津民汇款已到至老家，并回购宅第。此若他再次谢绝，恐伤百姓之心，但购宅有余额，曾受一将余额退回江津。

曾受一在老家虽年事已高，仍潜心著述。著有《尊闻录》、《学古录》、《四书解义》行世。1786年72岁曾公在家中无疾而终。噩耗传至江津，全城百姓悲恸不已，纷纷设坛悼念。后经县民商议，动用退款，先在通泰门右顺城街原曾受一住宅处立祠。后改大土地街区城隍庙侧，建造一座永久祭祀的“曾公祠”。

因曾受一清明行事、廉洁为民，属“名儒循吏合二为一”之人物，江津百姓又将这“曾公祠”称为“清廉祠”。



(古江津县城曾公祠位置)

(原载《重庆政协报》2006 年 4 月 8 日“春秋”副刊 (三版) ，原名《江津曾公祠为何又叫清廉祠》)

江津有条“长寿溪”

巴渝名邑江津真神奇，百岁寿星特别多。

到 2015 年 12 月截止，在江津全区 150 万人口中，百岁以上寿星就有 129 位，占全重庆市 10% 以上。江津是重庆唯一的中国长寿之乡，而且是全国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百岁寿星分布最均衡的中国长寿之乡。

其实，古代江津就是长寿之乡。在战祸连绵的古代，偏于西南一隅的江津，环境安定，少有战争，历为避乱之境；江津历史上五次移民，来自五湖四海的人群之间的通婚，使得后代具有“远缘杂交”的遗传优势。江津自古以来多寿星，清道光《重庆府志·耆寿》记载各县长寿老人及百岁寿星人数。巴县 5 人，其中百岁 3 人；江津县 10 人，10 人均为百岁以上；长寿县 4 人，其中百岁 1 人；荣昌县 3 人，其中百岁 1 人；綦江县 3 人，其中百岁 1 人；铜梁县 8 人，其中百岁 1 人；安居县 6 人，其中百岁 1 人；璧山县 9 人，其中百岁 6 人；定远县 5 人，其中百岁 3 人；江北厅 2 人，其中百岁 1 人……清代三部《江津县志》以及《江津县乡士志》和民国版《江津县志》均对江津长寿老人进行记载。在封建社会里，长寿老人入史入志除了本身要长寿外，还要有其他的标准。光绪版《江津县志》的《耆寿》、《续·耆寿》篇，记载了当时江津“耆寿”者 30 人。这是当时最多的县之一。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江津真有些与众不同。江津人的寿命普遍较长。

江津有一条河流，溪以寿名，明清时期就叫长寿溪。

长寿溪这名很响亮，远近闻名，直至民国时期都还叫这么叫，可惜后来不知什么人们原因忘却了它叫“长寿溪”的真名，而用其他名代替了真名。

江津长寿溪在那里？清光绪版《江津县志》“卷一·水道”中介绍了江津县的两条溪河。一曰：“长寿溪：源自感应坪唐家沟，会高洞。”二曰：“高洞：源自骆駉一碗水，经十丈岩至汪家沟，会长寿溪，入焚溪。长三十馀里。”

江津县志上提到的长寿河流域的地名感应坪、唐家沟、高洞、骆来山、一碗水、十丈岩、汪家沟等均在现在的江津区西湖镇，古长寿溪就是今天的西湖镇境内。

长寿溪发源于巴渝著名风景名胜区江津骆来山，流经感应坪、唐家沟、汪家沟后，在石马堰与高洞溪汇合，长约四十余里。长寿溪从源头骆来山开始，一直向北方流淌，直流到现江津区西湖场镇北端西湖大桥附近，汇入古称焚溪的綦江，汇入口当地人称为溪门口。

这条古名长寿溪的河流，现在的人们不叫它长寿溪了，如不是地方史志的记载，现在人根本不会知道它原有这个美好的名字。现在人有叫它高洞溪的，有叫它溪门口的，也有叫它汪家沟的，其实，这都叫对了一半。

这条溪河古时为何叫长寿溪？探究原因，想必一个重要

因素就是这里生态环境特好、农副产品环保而且丰富。长寿河流域土地肥沃，特产丰富，浇灌方便。熏风吹绿野，桑荫满阡陌。

这里自然风景美丽如画，所以就成了一块神秘的风水宝地。在长寿溪下段即现在叫溪门口段，正与焚溪汇合。焚溪又名南江、綦江。此处两河遥合，波宽水浩，景色秀逸。明代翰林学士、太子太师、工部尚书江渊曾有诗赞曰：“焚溪遥合大江流，浩荡烟波送白鸥。暮雨半衰移浦内，夕阳一线挂滩头。鱼穿柳絮好沽酒，竿拨桃花懒系船。圣代只今召隐逸，何须频下饵文钩？”此青山绿水，翠竹成行，“鱼穿柳絮好沽酒，竿拨桃花懒系船”，是一个富庶之地。其中段和上段，便是“涓涓澎湃，百折滩回”。长寿溪畔盛产水稻、小麦、红苕、高粱等。由于溪水常年不断，且呈梯次，浇灌方便，因而所产稻米、小麦、玉米等产量高、品质好。两岸还盛产柑橘、桃、李、梨等水果，其品质仍为上乘。百姓能在此安居乐业，犹如生活在一个康乐祥、与世无争的世外养生桃园之中。传说，常吃这里生产的粮食和水果，就能长命富贵，而且康宁有德。还传说这些粮食和水果都是神饴仙果。其实，是因当时科学不发达才有这么一说，现代科学研究发现，是因这里生产的食品与水果中含有一种叫硒的抗老微量元素，正是所谓的富硒农产品，才使人长寿。

长寿溪发源地骆来山感应坪更是一个充满神秘和神奇的地方。这里古属四川重庆府江津县杜里四都一甲。感应坪又

叫感应峰，当地更多人则叫它为赶一峰，它是风景名胜区骆来山的核心景点之一。相传很久以前，天上的玉皇大帝命令二郎神在天亮之前赶拢 100 座大山在此建造龙王宫殿，若龙王宫殿建成，此处将是汪洋大海，此处百姓将变成为水中鱼甲。二郎神用赶山鞭拼命抽赶，当赶拢 99 座时，自己已筋疲力尽，他便打了一个盹。这时的土地爷为了拯救山下的百姓，便装鸡叫，二郎神以为天已亮，便把最后一座山丢下，自己便变成了后来的感一峰。这事被玉皇大帝知道了，便把土地爷罚立在骆来山上。千万年后，土地爷又变成两尊巨大的石壁。又过千百年，两尊巨大石壁又变成了长命万岁的石老妈、石老爹。这虽是一个传说，但也反映了当地人对长寿的向往。

到后来，此溪河除名儿发生了变化外，其水文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革期间，由于大办钢铁等，造成乱砍滥伐，其源头感印坪和两岸植被遭到严重破坏，水土流失严重，造成水流减少。因而时常断流，被当地人称为了“干河沟”。农业学大赛时，又在上面开发建设小电站、小堤坝和人造梯田等，大量采石开山，后来这些又多被废弃。从源头感应坪到溪门口，原有四处过溪跳登，现也变成四座石桥。

不过，这里的生态现在又开始好转。人们已经认识到保护生态的意义，对这些地方实行退耕还林。人们开始自觉保护溪河，这里又开始变得山青水秀。这里的人们又开始康乐长寿起来。近些年来，这里曾出过多位百岁老人，前不久才

去世的就有两位，他们分别是 102 岁的刘应芳和 101 岁的郑扈氏。现在还健在的 90 岁以上的老人更多。比如郑刘守，94 高龄了，身体仍很硬朗。熊明昆老人 93 高龄，身体好，还能干活。这些长寿老人都笑着开玩笑说：他们是沾了这河流的光。

古代江津还出多位长寿官。这也是一个很特殊的现象。

明清两代朝廷钦赐长寿官本来就少之又少，江津不但多，出了五名，更令人拍案惊奇的是这五人中，有四人出自郑氏一门。郑氏父子四人皆被朝廷钦赐为长寿官，当时天下皆惊。长寿官是明清时代的一种官名或官衔，常简称为“寿官”。是在明清时代的养老制度中，由地方推选并经皇帝恩诏颁旨，授予长寿老人冠带的一种名誉头衔。按照明清时代的制度，这是个虚职，是一种荣誉。主要是为奖励长寿并“德行著闻，为乡里所敬服者”。

寿官有官帽和官服，主要是八品或九品，也有七品、六品和五品的，但为之极少。寿官虽有官帽和官服，但没有爵位。受赐年龄最初为百岁，到明万历以后降为七十岁。不同时期，对年龄、选择条件、奖励物品都有所不同。由于寿官称号只在皇帝恩诏颁布时才得以下旨恩赐，所以整个明朝三百多年里仅授过 19 次。寿官的条件主要是年龄，其次是“德行著闻，为乡里所敬服者。”明朝在很长时间里，人们平均年龄只有三十多岁，要活到八九十岁，很难，也很少。当时一个县，七十岁以上的人多只几十人；而八十岁以上的就更

少。寿官通常每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评一次，加上要求特严，评选流程很复杂，并且常常涉及很多因素。首先要经过乡里、同宗之人、士大夫推举，再由官府衙门推荐，再参报朝廷评审。

明朝三百年，全国累计只有几百人被钦赐为寿官。所以，被评为寿官是一个县都很荣耀的事，对被赐者来说，殊属难能可贵。江津有五人被明代朝廷钦赐为寿官，而五人中，郑氏一门四寿官，可谓全国罕见。

光绪本《江津县志》“卷六·明”记载：“郑永宽，字大亮，宏治（弘治）戊申大旱，宽出粟壹千石赈贫乏。奉恩授七品服。十七年，复旱，子越宗、泰宗、兴宗各出粟柒百石助赈，三人俱恩例冠带。邑令王仪匾其堂曰世义堂。进士邹双山有诗赞。”

清末《江津乡土志》“卷三·地理”篇曰：“郑氏世义祠，在县东南一百里黄泥场，内供明五品寿官郑永宽父子。奉勅建祠。”郑永宽是江津县骆来山黄泥场人。他及三个儿子郑越宗、郑泰宗、郑兴宗都被明朝恩授为寿官。

弘治为明朝第九个皇帝明孝宗朱佑樘的年号。明宏治（弘治）年间皇帝有两次恩诏颁布：一是弘治五年，一是弘治十八年，郑永宽是弘治五年被朝廷恩授这长寿之官的。

《孝宗实录》六十一卷载“弘治五年三月戊寅册立皇太子诏”曰：“民年七十以上者，与免一丁侍养。八十以上者，有司给与绵布二匹、绵花二斤；九十以上者，给与冠带荣身；

仍一体优免一丁侍养。”显然，江津骆来山人郑永宽属“九十以上，给与冠带荣身；仍一体优免一丁侍养”者。

郑永宽的三个儿子郑越宗、郑泰宗、郑兴宗中是弘治十八年被恩赐为长寿之官的，此时，其父郑永宽已驾鹤仙游。《武宗实录》卷四载：“弘治十八年八月丙辰上两宫尊号诏”曰“军民之家，有年七十以上者，许一丁侍养，免其杂泛差役。八十以上者，仍给绢一匹、绵一斤、米一石、肉十斤；九十以上者，倍之。其男子八十以上，为乡里所敬服者，加与冠带，以荣其身。”显然，骆来山人郑永宽之子郑越宗、郑泰宗、郑兴宗属“其男子八十以上，为乡里所敬服者，加与冠带，以荣其身”者。

清代著名诗人，进士邹双山曾题诗赠赞郑氏父子四人。诗曰：“熙攘尘情计利真，君家尚义许谁伦。父曾红粟举邻火，子更奇资拯世沉。簪笏当年承眷宠，箕裘奕叶必峥嵘。恩膏此际民难缓，漫联与情颂德音。”

郑氏家族在西湖镇的骆来山黄泥场一带是大姓宗族。黄泥场花蛇凶有一宗祠，曰松竹祠，是元末由江南徙蜀的郑氏族人的祠堂，故又称郑松竹祠。祠后有诰命夫人墓。郑氏族人来此已700余年。郑氏族人的先祖曾同居十世，奉旌义门。迁蜀的郑氏族人于黄泥场所建祠堂，则称世义祠。綦河岸，郑氏家族共有五座祠堂，世义祠为总祠，松竹祠为分祠。难怪明代的江津知县王仪对郑氏赠匾曰“世义堂”。

江津县另外一个被明朝恩授为长寿之官的是王朝佑。光

绪本《江津县志》“卷六·明”记载曰：“王朝佑，字廷杰，太学生，邑大旱，输米二百石，赈济。奉恩赐寿官。”对此王寿官，还没有发现其他新的文字材料。

江津山之魂、江津水之韵、江津风之淳、江津物之珍，孕育了江津这个长寿之乡。大山大水美江津，历史悠久孕江津，人文荟萃育江津。江津能成为长寿之乡，有多种因素，通常说江津是生态之乡、是富硒之地、是实力之区、是和善之城、是养生之域，另外医疗卫生助长寿，体育运动助长寿，文化活动助长寿……总之，江津大山大水，气候宜人，水土养人；得山水之利，物产丰富，犹以山川山水为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江津地域特殊的历史、地理、人文条件，造就了这和谐包容的社会环境，淳朴厚善、尊老倡孝的民风民俗，豁达乐观、宽以为怀的人文心态……所有这一切，成就了长寿江津的源远流长。

（原载《红岩春秋》杂志，2016年1期，原名《长寿溪，长寿官》）

江津有个“五举沱”

江津一个很有名的地方叫五举沱，沱内分为上中下三个码头，形成一个集市。解放前后均设置过五举沱乡。五举沱的来历，有一个神奇而又动人的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这里叫石夹沱，指的是江中乱石很多。其实，这里是一方宝地，鹤山坪余脉如一枝巨笔，笔尖直插沱内，沱底犹如一方巨砚。西侧是“燕飞不进”的凤凰岩和“聚宝盆”。虽这是一块风水宝地，但当时只有一两户人家。

明末清初，从湖广省麻城县孝感乡迁来一杨姓人家在此“插占为业”，杨家艰苦创业，传到第六代，才开始稳定。杨家所生杨双宝，30岁娶仙峰场周氏。他上有70老父，下有5个幼子。他白天开荒，夜间纺织：晴天种植，雨天捕鱼……

杨双宝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孝子和好施之人。父亲生病，卧床8年，虚弱如风。郎中说，用雪天鲫鱼熬汤饮服，体质可增。于是，在每年寒冬腊月，他都会下江捕鱼为父熬汤。每次他都会被寒冷刺骨的江水冻得全身僵硬麻木。他还行善，每有饿得面黄肌瘦的乞讨之人，哪怕自己只有一碗饭，也要施舍半碗。有一天，他在江边救起一个落水之人，这人也是奄奄一息。杨双宝将他背回破旧的家中，烧生姜开水灌服，两天后醒来。落水人在杨家住了七七四十九天，身体全

部康复才离去。

天有不测风云，父亲在 79 岁这年，病情加重，虽访遍了七里八乡的郎中，但最后还是去世。一贫如洗的杨双宝家里连葬父的费用都没有了。他暗自落泪。经过一番思索，他决定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将老父安葬在马骢嘴后山。家里无法置棺木，只好用松树毛纺织成灵柩，深夜他背着灵柩出门，刚到马骢嘴半坡，突然一阵闪电雷鸣，接着就是一阵狂风暴雨，杨双宝几次跌倒，但他紧扶灵柩不松。突然，一高坡土坎垮塌而来……半个时辰后，风停雨住，杨双宝终于在坡地上醒来，他发现父亲的灵柩被刚才暴雨冲来的泥沙垒成一小坟，于是，他跪在地上哭道：“儿子不孝，父亲你就在此入土为安吧。”

据说第三天有一个外号李半仙的“阴阳先生”路过时发现这一新坟，感叹道：“此为砚穴，砚中墨汁为水所研，笔尖为松毛所缀。丧家必出文宿星也……”

杨双宝除继续勤于种植和渔业外，在渡口处开么家店子，家境慢慢好起来。长子 18 岁年中秀才，28 岁中举人。又过 20 年，真出现奇迹，杨家五子，全都高中举人。这简直了不得，皇帝御赐大匾：一门五举子。

杨家大发后，仍然乐善好施。在好几个地方办起了书院，传经习文，教授乡梓。

杨氏五个儿子高中举人，在外为官。当地人则称大老爷、

二老爷……么老爷。他们的远亲近戚仍在这里，也跟着发达和兴旺起来。人们扩码头，修街坊，形成了一个商贾云集的大集市。轿来船往，很是热闹，成了江津县的大码头。当时有民谣说：周家码头杨家街，七家八家将袍哥嗨，没有一家是蔫栽苞胎……

从此，有人就将这里叫为“五举沱”，意思就是这里出了五个举子，这叫法是越传越远。原来的名儿全然不被人们所知。当时流传了一首很有名的歌谣——

五举沱，马骢坡，大笔如山砚上搁。

砚中长盈江中水，杨氏五子全登科。

光绪二十一年，全国各地举人到京应试，杨家五举人也在其中。7月的一天深夜，五举人突然乘船回老家，急急卖去所有家产田产后，全都改名换姓，乘下水船离去。有人说他们回到了祖籍麻城县，有的说他们到了武昌府，有的说到了上海崇明岛。后来人们才知道，京城发生“公车上书”事件。杨家五举子埋名远走他乡，为的是不使乡邻和亲友遭到株连。大家都说这五举人有骨气。

很奇巧的是1938年至1942年，一代人杰陈独秀避难来五举沱上的鹤山坪蛰居，在五举沱上船下船四年，在这里编纂文字学专著《小学识字教本》。他的灵柩也在这里装船，运到下三里的康庄安葬。不知他生前想过没有：这曾出过五举子的地方，也是他这个饱读诗书的人最后归宿之地。

虽时过境迁，但如今的五举沱仍然很美。五举沱村民们正在建设农民新村。这里还即将建成长江上有四个千吨级泊位的重要运输码头。

（原载《巴渝文化》杂志 2012 年夏季期，原名《一方宝志五举沱》）

江津有个“邻母洞”

江津有一个古洞叫邻母洞，洞里有一古寺叫邻母寺。这里出了一个姓李的大孝子，人称“真孝子”。

邻母洞位于白沙镇三口垭昆家石坝外沿半岩壁上，这里是个天然石洞。清代和民国时的《江津县志》对此都有记载。说的是在北宋年间，当地寡妇王氏，含辛茹苦养育儿子，其子孝顺有加，人称李孝子。但因境贫困，以找柴为生，居无定所。李孝子找柴时发现一洞，洞深 32 米，高 6 米，面积约 400 平方米，呈弧形，洞口大，内壁小。洞口左侧有一泉水，终年不断，清澈可口，洞内冬暖夏凉。于是母子二人迁洞内居住。

李母历尽艰辛募集资金，在洞内修建一庙宇，在洞口即庙宇沙门下的碓溪（塘河古名）设渡开船，供来往行人之便，颇受山民赞扬。李母去逝后，李孝子将其葬于洞门右侧约 300 米处，李孝子则凭洞为庐，永居洞中，以守母亲之墓。李孝子天天与母墓为邻，后人感于此行，将此洞取名邻母洞，此庙取名邻母寺。

200 多年后，到了明代第二个皇帝朱允炆时代，宫内发生了一件被后来史书上称为“靖难之变”的大事。建文帝叔父燕王朱棣为抢夺皇位率军攻入南京应天府大开杀戒，朱允炆随后下落不明。有史书称他化装为僧人逃出皇城，叛军穷

追猛杀不止。他历尽艰辛，逃到国境边陲西蜀发现了邻母洞。他感到此地真为绝景佳色，决定在此暂避。一年后在他离去时，他仍不忘国君身份，写下一副楹联。后人将此联镌刻于洞门两柱上。现在邻母洞大门两侧石柱上的这副楹联，字迹清晰可见。其联曰——

天下无双福地；

大明第一仙山。

此联横批：西蜀胜境。

门额从右至左分两边镌刻有“天然·若兰”各两字。读此联颇感气势恢雄，有帝王将相胸装万里江山之豪气，绝非凡夫俗子和平庸文士之笔。民国版《江津县志》“卷一·名胜篇”曰：“（楹联）相传明建文帝逊国游此题”。如此推算，此楹联应有 600 以上历史。

在邻母洞寺庙内，有一副楹联，联曰——

石径旧寻真孝子；

岩扉长护古先生。

该联以纪实的手法，向世人讲述邻母洞里发生的动人故事，不仅对仗工稳，而且文字贴切，落落大方，耐人寻味。该联不知何人所题，但有一种民间传说，说该联是清末著名巴蜀才子、里人钟云舫所撰。他曾到此一游，见大门两侧石柱上有朱允炆之帝联，不敢轻意署名。这只是一种传闻，地方文献上没有只言片语的记载。

建文帝避居邻母洞并题写这大气豪迈楹联后，此寺香火

更加旺盛，信众络绎不绝。后来邻母洞及其邻母寺又多次进行修缮。

清代嘉清年间，僧心月和尚将李母坟莹包砌，并立石碑于坟头前，碑文曰：前代李孝子母亲之墓。同时撰有墓联，墓联将邻母洞前后发生的故事再次作了记述。联曰——

代培王氏千年墓；

应感沙弥一片心。

现在的邻母洞除洞门旁的庙宇亭阁遭到损毁外，各路神仙菩萨和各路天兵天将的塑像均立洞内石壁，栩栩如生，惟妙惟肖。在洞壁上镌刻的 13 块石碑更显特色，全为长方形阴刻，最早为北宋宣和辛丑年，最晚为嘉庆三年。碑文多以风化，字迹难辨。深究其内容，多为记载邻母洞起源、得名、建庙、修缮及田林地界等等，此碑群现已成为江津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下为北宋宣和五年奉议郎刘干所洞壁碑记——

孝为百行先。孔氏之门教徒三千，以孝称者曾闵而已。十八篇之作，曲尽情文。后世学者，诵说贯通，曾不足以髣髴，而躬行论笃则又渺焉。故史官所记，虽闾 概纪，为卓行以夸耀时习，岂夫子设科，故以人之所本无者，而矫强拂之哉？孟子曰：“仁之实，事亲是也。”夫仁根诸性，天非外立其德者，顾所行何如耳。渭阳之念，陟岵之思，诗人咏焉。而左丘明论，掘地及泉隧而相见，为颖考叔之纯孝，施及莊公者，盖霜露之感既切，而爱亲之心

有在也。余顷尝承乏恭南教官闻士人，颇道李氏孝友行。及识千里，每见语及其永感，则蹙额涕欲下。尝为予言，其少失父，赖母兄之教。及籍大学，而兄丧母亡，号踊露哭，废寝忘食，每每在念。乃知学孔孟者，孝爱出于所性，非矫揉以为异也。既卜宅兆居庐于侧。庵名永慕，亭名怀慈，聊见其志。且有赤兔巨蟒之异，蜿蜒跳踞于庵亭间，既久兔隐去，惟蟒蟠踞，■户千里。且曰：“是将待春化而超腾于天衢者，且卫吾母氏之墓，使樵牧不敢犯，其山神地灵出为此者，其庵亭不可砌也。既乃四顾于邱陇上，偶于数百步之外观异趣焉。”于是披荆棘，锄丛翳，则严崖竦然，洞穴开豁，其高广可容千百人。上拔秀岭，下冽清泉，四周修行，东垂瀑布，萧瑟潺湲之声，洞以虚容冷然善也。千里抚掌，喜见眉间，咤曰：“天造地设，吾以毋故得之，名曰：‘邻母’以为岁时享祭憩息所。”洞之阴，北顾茔域如指掌，有乡人为之序，且属予记之。于是为书其本末，以见千里之行，发于至诚，特取诸孔孟之教而无愧于邱明之所谓者。因系以歌云：重崖千古闷灵踪，虚室萧然掩霭中。快异开__正丰炽，只应孝爱与天通。云埋苏掩岳神封，__凿应须费鬼工。留与山间纯孝者，时来瞻怅乐融融。五丁擘破鸿荒后，夸父移来灑渤东。锡类贻昆流后远，洞傍飞派兴无穷。

附记：干，字砥平，宋奉议郎，通判黔州军管局神宵玉清万寿宫，兼劝农事。其篆节，则迪功郎新授云安军曹赵知常

书石。则酉阳别乘，梅轩刘行之也。



(邻母洞外观 张新旗 摄)

(原载《重庆日报》农村版 2014年6月5日)

江津有个“保家楼”

江津有个保家楼，很有名气，它在江津綦河流域可谓家喻户晓。30年前，我曾在綦河畔的一所中学读书，一个星期天我曾到保家楼去玩过，当时只感觉这保家楼好气派。乡亲说，保家楼原是朝廷一个大官的官邸，后卖给了钟家。以后我在附近一个镇上工作，后来又调到区里史志部门任职，其间读了一些地方文献，我才知道这保家楼与明末东阁大学士、兵部尚书程源有关，联圣钟云舫也曾为此写过楹联。

今年大年初四，我开车返乡，到綦河畔五福场乡下去寻访保家楼。到了现场，当年古巷深深、气宇轩昂的保家楼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当地百姓在原地基上建起的高低不一的砖瓦房，可看出的仅只原地基上的堡坎。我有些失望。

要了解保家楼，先要知道五福场程氏大家族中的程源。

五福场的程氏先人原住湖北麻城县孝感乡。在明代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湖广填四川”时迁来江津“插占为业”，其中一支落脚在綦江河畔五福场（五岔乡），程氏耕读为本，但不断发迹，约200年后生程源。

程源，字精一，号天目，他从小聪明伶俐，他一边苦读，力争仕途，同时又喜欢舞枪弄棍。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

考中进士。明末时期各种社会矛盾激化，匪患四起，程源预测天下即将大乱，于是教授族人勉习武艺，操练兵丁。他还聚合家财，仿照六角碉楼形状，在程氏大院内修筑牢固的六角大楼，将程氏家人迁入院内，若有匪徒来侵，族人凭据楼势抗击，于是程氏族人和当地人都将此楼叫名保家楼。保家楼后靠狮子山，视野开阔，楼下四周围绕一条深渠水道，可谓固若金汤。有几次乱匪来犯，程氏所练兵丁数百人，据楼力保村庄，乱匪屡攻不拔，程氏族人和村民得保。

程源中进士后不久，李自成义军攻进潼关，他给朝廷上书提出《防御十策》，但未被采用。后来清军入关，唐王朱聿键在福建称帝，程源闻讯前往投奔，任太常卿，他奉命使粤，唐王战败死去，他便在广东拥立永明王，后晋升东阁大学士、兵部尚书。朝廷派他治理滇、黔、蜀、楚诸省，扩大力量，以此对抗清廷，谋略复明。程督战克捷有功，在黔蜀名声大振。辛卯年（1651年），程源屯兵家乡江津，卜居津南四面山，当地人称程督师。

明永历甲午年(1654)，其弟程之英扶母亲灵柩从贵州回江津安葬，行致江津县城南石子岗时，与窜入津境的遵义叛兵相遇，发生激战，叛军乱杀无辜百姓，程之英一行与之搏击，喝令住手，称兄为兵部尚书。叛兵不信，将程之英和随从杀戮后逃散。程源闻讯即从四面山率兵追击至五举沱。只见大部分叛军已渡江而逃，杀程之英的首领殿后，被程源射

杀。

在一次战役中，程源被叛将王祥俘获，他七日不食，反说服王祥复归顺了明朝。后来明室既亡，程源悲愤万分，隐居乡下，或置田建寺，或垒石莳花。时因清廷文字狱兴风，他暗中著《孤臣纪哭》十二卷，又整理日记，辑录为《孤忠集》百余卷。书卷不用刻版，全为手笔抄录，并分藏于包括保家楼在内的程氏各家。程源作为前明朝遗臣，其家族难以博得功名，逐渐衰败，族人四处迁徙，保家楼开始腐蚀。不久，无限伤感的程源因背上患毒疽不治而歿。

保家楼后来的故事，却又与钟氏有关。

清康熙五十九年（1721年）福建客家移民钟拔英来江津綦江畔五福场一带“插占为业”，钟氏发家后，买下程氏保家楼居住，钟氏称保家楼为钟氏七房。从钟拔英的第三代钟名器开始，对保家楼进行新的规划和改造，后代历经十年，终于修建成钟氏保家楼祠堂。

程氏保家楼易主改造建成钟氏保家楼祠堂后，面积扩大和格局发生了一些变化。虽仍背靠狮子山，楼在山脚因形就势，但钟氏保家楼祠堂占地扩大到数十亩，呈三重堂格局。上重堂正中一间，陈列钟氏先祖灵牌，悬挂鎏金横匾：祥开百世。中重堂是祠堂，后来办成学校。下重堂中门左右有钟楼和鼓楼。中门上额有嘉庆皇帝御赐金匾：皇恩宠赐。中门的两侧筑有风火围墙，墙内有大小房屋数十间，钟氏七大房

人在此四世同堂。中门前有半月池，池右一石楼高二层，条石砌成，称“凌云阁”，池左六角亭，属全木结构，高二层，飞檐翘角，画栋雕。角悬铜铃，随风摇曳。

清宣统三年（1911）钟氏又对保家楼祠堂从新进行修缮，楼堂焕然一新，钟氏举行隆的祭祀典礼。这庆典可谓热闹非凡，居住有江津县城的钟氏同宗会名人、著名的巴蜀才子、被今人誉为联圣的钟云舫撰写楹联一副并带病专程前往祝贺。该楹联为鎏金匾对，联内嵌入县内有名的五福、七龙星等五个地名，并巧妙运用数据，该联不仅对仗工稳，而且妙趣横生。联云：

地形撑五福之场，五岭迁来，溯祖宗五百年根本一家，谊属五伦昭祀典；

天池漾七星之函，七房竞爽，汇长江七千里文澜四起，光分七曲耀人文。

钟氏保家楼祠堂不仅是钟氏七大房人的居所，而且是钟氏族人的塾馆，并且还成为钟氏族人的避难场所。国民初年，巴蜀地区土匪横行，匪帮常常打家劫寨，钟氏族人多来此躲避，这些土匪也只望楼兴叹。

解放后，钟氏保家楼祠堂一部分划作为村队办公场所，一部划分给了包括钟氏族在内的部分村民居住，直到后来倾圮或拆除，现在已建上高低不平的砖房。

我来寻找保家楼，看到的只是保家楼一些原有地基或檐

坎，我有些失望，当年这气宇轩昂保家楼不见了，可惜矣！其中我发现有的将“保家楼”写成“保驾楼”，这应该是各有意，不足为奇也。

（原载《中华楹联报》2013年5月5日，标题原为《江津保家楼及楹联》）

江津多个“七孔子”

江津是个历史文化悠久的古县，大山大水，历史遗迹众多。在江津叫“七孔子”的地名主要有三处，它们虽都在悬崖峭壁之上，却湮灭不了过去的一段历史。地名正是一个地方历史的“活化石”，是这里的文化符号。

旧版《江津县志·名胜》云：“七孔子洞，县东十五里观音岩侧，面临大江，岩半有七孔，各深丈余，错处一壁……”此处是在联圣钟云舫的故里江津区鼎山街道办事处高牙村青草背手爬岩长江畔边。

江津县古为江州县，《舆地广记》云：西魏改（江州）曰江阳，县治在綦江与长江交处的樊溪口。北周孝闵帝元年（557年）县治迁到今天的几江大津，析置七门郡，郡治在樊溪口上游南岸，此处有陡立石壁如墙，当地人又称此地为手爬岩，又叫燕子坪。此处石壁上有七个方形石孔，方约1米，望之如门。故以“七孔子”称之，其“七孔子”壁岩下为长江，水流有声，形成大滩，滩以孔名，名曰七门滩，郡以地名，曰七门郡，时七门郡只“领江阳一县”，隋开皇三年（589年），撤七门郡后，江阳县改名江津县，古江津境内析置七门郡时间很短，只26年，历史长河一滴，但至今已

有 1456 年。

现在此处崖壁上已不只七孔。清末当地百姓为躲避兵匪，在此处悬崖上扒开掩饰森严的丛林，发现四个由砖石填堵着石洞之门的大孔。七孔子之名虽名不相实，但称谓未变。

江津区珞璜镇河坪场西北侧约 5 里处的原桐福村处，有一座山岗叫七孔子山，其得名是因此山陡峭的岩壁上有七个大孔。这七孔子的特点是非常的隐蔽，远看只见一孔，近处细看才知是七孔。洞孔在悬崖峭壁上，需云梯搭桥攀援才能进入。

传说在明末清初和清同治年间，四川社会动荡不安，天下大乱，各路兵匪除在江津打家劫舍外，还到处屠杀百姓。涂姓本是江津县河坪场的大家族，当地称为“土老肥”，为躲避兵匪，他们占据了这七个山洞，这七孔子内室相连，里面宽敞如厅堂，有水井，石桌、石椅、石凳等。还有暗洞与外相通。由天此处远看一孔，近看七孔，加上全在悬崖峭壁上，又有林木掩蔽，所以不易发现，发现了也是易守难攻。有好几次兵匪来侵，烧村掀寨，遍杀百姓，而隐藏在七孔子里的涂氏 200 多人得以全保。

直到后来社会安定了，人们都还说：这七孔子救了涂家，七孔子山是涂氏的恩山，涂氏家族在附近建起了涂家祠堂。后来这里还设过七孔子大队，管辖马骆湾、墙院、垭口、七孔共四个生产队。

江津区蔡家镇紫云场古时叫鲁家桥，这里亦有“七孔子”之称，但它并非只有“七孔”，而是近二十个。它在筭溪河流域，在今天的紫云场附近的跃进桥林家嘴对面的岩壁及“狮子桥”等处。自远望去，均有孔穴。林家嘴对面山上的洞穴有上下三层，跃进桥山上的洞穴排列成横行，离地不高。1981年冬，江津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邓少琴登山入洞视察，洞中空无一物，他拙开农民的积土，寻得灰色夹沙残破陶片二只，一为圆形陶柄，一为瓦棺方角，说明是汉代崖墓地。此处“崖洞”之多，说明古时这里绝不是荒原之地而是繁荣之地。

离此处很近的中咀是筭溪河与头道河的交汇之处，其中心点为狮子坝，清康熙时期，吴三桂据昆明称帝，国号大周，改元昭武，大封百官诸将，这里析置清溪县并为县治。

江津的三个“七孔子”，其实先均为汉代崖墓洞穴，至今有1800多年历史。后多被拆开，少许部落人群搭栈居住洞中，故又有蛮子洞之称。明清时又多用于躲避兵匪。清光绪《江津乡土志·地理篇》云：“津治七孔子有三，盖即古莹窟之，风诗所谓陶复陶穴也。”其实江津叫七孔子的地名在李市、蔡家、嘉平等镇都还有，只是名气不大或有的改建为电站等罢了

（原载《重庆晚报》2013年10月21日）



（江津青草背“七孔子”现已改成了滨江路 庞国翔 摄）

江津有座“万寿桥”

在江津区中山古镇，有一山中小桥很有名，这不仅是因为他建于清代，是文保单位，还因为它有一个非常动人的建桥故事，这桥就是万寿桥。

中山镇南部的一个大山深处，有一条发源于贵州省边界的河流叫飞龙河。飞龙河右面有一条支流叫高滩，这里又叫斑竹园。这地方虽边远，但仍住有一些山民居住，他们以农耕为主，平时要到附近的一些场镇进行交易。可这高滩支流却阻隔了山民。隔河犹千里，大山深处的山民赶场上街很不方便。

斑竹园刘氏，中年死了丈夫，留下十来岁的儿子。虽孤儿寡母，但她下死心要帮助山民解决过河难问题。她要为儿子多积善德。她每逢场期都要背“晚柴”到常乐场买。慢慢地她有点积蓄，但她从不乱花一文。她的积蓄只用于两个方面：一是请石匠在这高滩河上修跳蹬，一是送儿子到族人祠堂读“人之初”。刘氏含辛茹苦，坚持12年，终于将这跳蹬石修成，大大方便的群众过河。这年刘氏的儿子考取了秀才，真是双喜临门。

刘氏活了90岁，90大寿这年，山里的百姓都为他治筵庆贺，江津县谕还送匾祝寿。他的秀才儿子已成为当地有名的班竹书院的堂长。

不想在乾隆五十五年，一场洪水将高滩河的跳蹬石冲垮。当地百姓过河又成了一大问题。

刘氏虽过世，但他的秀才儿子却继承了老母的慈善之德。他用了五年时间，节衣缩食，同时募集了一些银两，终于在清嘉庆元年（公元 1796 年）在河上建起了一座石桥。该桥坐东向西，面积 13 平方米。整座桥梁用条石砌成，桥面用三逗 6 块大形长条石铺成，桥面宽 0.6 米，桥长 13 米，桥宽 1 米，高 1.8 米，桥板厚 0.6 米。完工通桥这天，山民们举行了“踩活”活动。大家都说：该给这个桥取个名儿。但不知取什么名为好。他的一个门人问他：先生，为什么您与师太都爱做立蹬修桥这样的善事好事？刘秀才回答得文绉绉的，他说：“诗曰：乐只君子，万寿无期。”这门生一听，突然来了灵感，就对大家说：这桥就叫万寿桥好了。于是，这桥终于有了名。

秀才也是高寿，他在 92 岁这年无疾而终。当地百姓都说：刘氏母子做好事、做善事，长寿了。

万寿桥现在仍然存在。现已有 219 年了，风风雨雨二百多年，桥面已有多年的磨损痕迹。它成了江津区中山古镇有名的古桥。由于它的建造使用年代较久，因而具有一定历史、文化价值，为研究清代桥梁建筑提供实物资料。



(原载《巴渝水文化》杂志，2015年第二期，总4期)

江津古莲池与遗爱祠

莲花池在江津原县城东门外的石子山下，石子山即是今天的琅山，因山上多琳琅鹅卵石而得名。莲花池中建有一楼，就是后来的江津行署和江津县委机关驻地。在莲池岸边，有一个遗爱祠，也有百姓称为遗爱寺。古莲池与遗爱祠是津城最重要的历史遗迹之一，曾被地方文人们津津乐道。著名“白屋诗人”吴方吉曾写过有名诗篇《几水歌》，歌分五阙，其中第三阙这样写到——

几水真真好，津城处处宜。

国公遗爱寺，中有古莲池。

池上小亭留我住，波间花影映依衣。

隔岸转黄鹂，明日是星期……

这《几水歌》写了执掌津中的吴芳吉与朋友星期天在“波间花影”和“岸转黄鹂”的古莲池里游览和在岸边的遗爱寺（祠）里参观的快乐情景。这里是旧时江津后八景之一。莲池在城郭之郊，是县人郊游的首选。每到春夏，岸上梅花和塘中荷花竞相开放，色艳香浓，津城人纷纭出城，成群结队，到莲池和石子山踏青赏荷。明工部尚书江渊有《江津前后八景诗》之一《莲塘月夜》——

方塘弥漫侵江城，云影天光滉漾生。

影湛碧波千顷浪，光涵孤月半轮明。

菱荷香泛琴樽润，杨柳风微泮壁清。

安得坡仙同载酒，细听一曲洞箫声。

时光的流世和历史的浪花总爱模糊一些人与事，形成隐隐约约的记忆流沙。津城的人们对古莲池与遗爱祠就有些混淆。

旧版《江津县志》、《江津乡土志》记载：古莲池，在县东二里许。广三十余亩。早在元朝，津人凿渠引水入池。再通过大通桥，将池水疏导入长江。到明宣德初年（公元 1426 年），知县袁旭主持将扩建，筑堤捍水，并引水东泄。40 年后的成化年间，知县宋潜主持，在池边修筑一亭，后来池水外泄常被壅塞。后又 60 年，到嘉靖乙酉年（1525）知县王贡主持对池水进行疏浚。后知县杨元吉来了个大动作，将岸边的亭子修葺，取名君子亭，挂出朱红“君子亭”大匾，对池堤坝等也进行了改造，并在池水中央别建一亭，取名“水心亭”。杨知县对这里的景色非常上心，作过一首《莲池水心亭》诗，诗曰——

清浅主塘曲径通，水心亭倚菱荷丛。

欲从溟渤观吾道，试向灵台醒主翁。

风月珊珊尘世远，鸢鱼泼泼海天空。

百年知己真是谁？好把行藏寄此中。

到清乾隆三年（1738），知县官殿对又建一亭，18 年后

的乾隆二十一年（1756），知县郎嘉卿主持又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疏浚和修缮，使之池水深广。数十年后，津城一堪舆师说，金钗井挖的一条水流进莲池的沟渠，将“龙脉”破坏，造成江津科考不兴，应立即修培，重树文风……事隔 117 年，清同治十二年即 1873 年，国璋知江津县，他对此进行大手笔式改扩建，光绪六年（1880）又架桥于池中，并遍植杨柳，在池西南立一碑，刻“泮源”二字。在池岸建一排数间庙堂式建筑，命名遗爱祠。其意是将江津历代功德知县等人之名位，列入祠中，以传芳名，“遗爱”后人……国璋还令津人在池中广种莲花。开时色艳香浓，游人甚众。后来的知县张继等又主持培修，并在池畔环植桃柳。

说起莲池和遗爱祠，清末著名巴蜀才子、楹联圣手钟云舫的故事不得不讲。钟氏喜笑怒骂皆成文章，特爱戏谑和讥骂县衙之人。他感到从清同治年间开始，这些县衙之人，多受津城少数豪绅的阿谀和谄媚，挪用公局百万两花银，在此撤房扩建不伦不类的“遗爱祠”，并将“政绩”尽留祠中，以欲“遗爱”千古。而此举使膏田荒芜，民众多敢怒不敢言。官以为遗爱，民以为遗害。钟氏怒笔写《有见》、《题莲塘一》《题莲塘二》等诗进行讽刺——

去年官似佛，敲破木鱼身扑扑。

今年官若神，视之不见听不闻。

六月衙门苦水冷，县主犹夸清慎勤。

君不见莲塘三月采莲舟，人间织女笑牵牛。

又不见官仓坝里小池塘，千里条条花石纲。

不信此官清似水，请问佛图关下阿房宫何日起？

在《题莲塘一》中，钟氏将占塘扩祠的“大作”称之为“胡行”、“胡闹”、“胡思”等等——

此是吾家壁上画，是谁偷样作祠堂？

……

料得荷花多怨藕，膏田不复几分收。

……

滔天功德祠遗爱？父老痴聋耳不闻！

钟氏还撰有“遗爱祠”楹联一副，联曰——

此去到莲塘，问遗爱诸公，清操到底谁千古；

其行光梓里，看褒恩两姓，宸翰飘然下九天。

正因为钟氏这淋漓尽致的讪骂，得罪当局，终被网罗罪名，羈押成都三年。

新中国成立后，人们将莲池四周进行了改造，在池中“水心亭”处修建一栋楼房，作为机关办公所用。将遗爱祠也作改造，已成办公房。特别是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扩展，津城东门一片早就成为热闹喧嚣的主城区，古莲池和遗爱祠只成为人们的记忆。又因时间的流逝，加上这莲池与遗爱祠相毗连，读音相谐，有人就将这莲花池说成“遗爱池”，虽详细有误，但也成习惯，所指地域几乎一致。



（清末江津东门外古莲池与遗爱祠，图中人物为清末知县国璋一家庭。庞国翔 提供）

（原载《重庆晚报》2013年6月3日）

江津文风塔和奎星阁

著名的白屋诗人吴芳吉先生在《几水歌》的第五首中写道——

几水真真好，
津城处处娇，
云山四面起，
井屋一湾遥。
顶塔端于弦上箭，
风帆密似鸟处巢。
清趣无尘器，
来往杂渔樵。

《几水歌》是诗人的代表作之一。诗中“顶塔端于弦上箭”，是指的江津县城和北岸的文风塔。

旧时，全国各地的文风塔很多。文风塔又叫文塔，也称“文峰塔”、“文笔塔”等，是 14 世纪以来道教风水学说与封建科考制度双重作用下的产物。修建文风塔，意在“补山水之形胜，助文风之盛兴”。旧时民俗认为：文风塔关系一地文风，科举时代，功名出自考试，各地方尤多以山川形式，论文风之盛衰。山川若有缺陷，则建文风塔以相补益。因而各州府县邑，兴起建或大或小文风塔之风。

到民国时，江津有名的文风塔有三：一踞城南鼎山，其形较小，中实，俗名小塔。一屹立江津北岸高家坪，势极峥嵘。俗名中塔。一峙武城山（今长风厂医院塔坪路处），中有阶道盘旋而上，如入云霄，俗称大塔。天日晴朗时，三塔之影，倒映入江津县城内的菱塘中，自塘岸观之，一一可见，形成“菱塘塔影”。这正是《几水歌》中的“顶塔端于弦上箭”的描述，此为县中胜景之一。

小文风塔在城南的鼎山下，乾隆甲寅年（1794年）修建，光绪八年（1882）曾被蠹绅霸毁，后进行复修。此塔虽低小，但与文庙中的奎星阁遥相对望，形成一景，受人仰视。民国时此塔圯塌。

江津北岸高家坪处的文风塔最为雄壮。该文风塔兴建于清代乾隆年间，其兴建经过，江津县进士蹇滋善有记，记云：“风水之说，儒者弗道，而山川形胜，或有缺陷。古人陟巘降原，相度之祭，未尝不继之以人力。邑侯正万曾公，粹然儒者也。三莅津邑，造福于我津者至矣。而培植文风，尤三致意焉。乾隆丁酉岁，于圣庙落成之后，环视地脉，谓东南北三方稍陷，必大为培补，始足以崇礼势而壮黉宫。先于东门内建奎星阁，立著成效。侯曰未已也：鼎山之南，大江之北，当建两文塔。侯亲为卜地，諏吉兴工。曾侯以致仕回籍，未获竣事。后复致书于邑人，期在必成。然屡兴屡废，讫无成功。岁甲寅，余言于邑侯涂公，请公项若干，复募费重修，

南塔先成。惟江北之塔，厥功甚巨，费尤不貲，历数寒暑，而功始竣。制军孙补山先生，题其额曰：标建奎躔，自是而文风亦蒸蒸日上矣。是役也，曾公倡之，涂公继之，趋事者明经程诗钟、张光组，太学生何绣裳三君之力居多。捐貲以建碑亭者，则司马戴君登霄也。”

江津县人建文风塔，意在培补文风。但正如上记所云：“风水之说，儒者弗道。”而这三座文风塔，却在县人心目中有其重要地位，它不仅是江津当时的标志建筑，更是百姓心中重要的人文景观。

人生长在大自然环境中，山水风物，自然会使我们有心旷神怡之美感。高塔雄峙江岸，有如一个人挺然卓立。使我们极目所及，有若高举出的巨手。又凡从县中各场镇入城，或由长江上下游来城，人们首先看到这座高塔，油然生出“如归”的心情。尤其是远客的游子，当到他看见高塔时，他那心里的喜悦，是不可以言语形容的，不由自主地产生“几水真真好，津城处处娇”的感觉。

中塔和大塔，也有着坎坷的遭遇。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国民政府西迁重庆，重庆成为“陪都”。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自1939年起，日机即开始轰炸重庆，企图动摇我抗战意志。江津居上游，是“陪都”的近郊县，空中离“陪都”的距离很近。初期日机是绕道江津轰炸主城重庆，后来日机以江津的文风塔为航标，往东飞向重庆

主城上空实施轰炸。“陪都”防空司令部终于发现日机此条飞行路线，遂下令先将江津北岸的文风塔撤除。那时江津百姓是很不情愿的，但为了重庆主城的安全，不得不忍痛割爱，于是这有着 200 多年历史的文风塔，便在日机威胁下被拆除了。据说拆除前几天，很多百姓前往游览，一些人还烧香跪拜。不久，武城山上的大塔也相继拆毁。

抗战胜利后，中国政府开始调查全国军民损失的情形，以便提请日本赔偿。国民政府颁布纲要，规定了调查范围。江津县百姓主张将两座拆毁的文风塔作为调查赔偿物之一。旨在希望得到应有的赔款，重建文风塔，以恢复这代表江津卓然挺立英姿的人文景观。但是，由于国民政府的腐败，加上他们急于打内战，调查后就是“泥牛入海无消息”了。



好在进士蹇滋善记中所说的“奎星阁”还在。奎星阁，又称魁星楼，是江津文庙建筑群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乾隆四

十二年（1777年）由县令曾受一和部分乡绅主持修建。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进行了培修。它在科举时代是士子们“夺魁”的象征，很富时望。“奎星阁”与城南鼎山上的小塔相对望。传闻修奎星阁后，县邑内教育昌盛，人才辈出。国民时城南鼎山侧的小塔圯塌后，奎星阁成了“孤立一人”。

在“文革”中，奎星阁也险遭厄运，幸当地党政和群众极力保护，才留了下来。不过由于城市的拓展和变迁，这个当年也属于众人瞩目的“奎星阁”被一片高楼大厦所掩藏起来……

2010年，江津区开始“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江津北岸的高家坪文风塔遗址被列为“抗战遗址”，现在正在申报文保单位。

（原载《团结报》2012年7月5日，原名《江津文风塔》）

江津古县城及其城门

江津县城座落在长江南岸。滔滔江水流经其西北东三面，河段犹如几字，县城就在几字中间，所以这小城又有几城之称。县城在沿江的低谷之中，城区地势平坦开阔，东西两面有较为开阔的郊区，人们习惯称为上坝和下坝。

北周孝闵帝元年（557年）县治从樊溪口移迁到今几江后，虽县名一度曾叫江州、江阳，但仍建有较小城郭。到开皇十八年（598年）正式改名江津。不想三百多年后即北宋时乾德五年（967）县治迁出几江，但在元贞年间又迁回，此时县城城郭大多荒废，房屋倾圮。事隔200年到明成化八年（1472），大兴土木，重建县城。北面临江以石砌城墙，其于三面以土筑城墙，但管83年，遭曹甫举兵从南门攻城，城破墙落，这是津城第一次受战争的重创。14年后进行重修，并扩大面积，城池初县规模。后来的格局基本上在此基础上改建。

江津县城呈椭圆形，东西南北四面皆有城墙环绕。城墙高约6米，厚约3米，用条石砌墙，中填泥土。城墙外有一条濠沟，与城墙平行而走，宽约4米、深约3米，引上坝和下坝溪水灌而入濠，这实际上起护城河作用。沿濠大植柳树，濠中之水由东南两处入城，汇入城南小官山一大水塘中，再

经大小杨嗣桥、板桥，从北固门注入长江。城中濠水相通，使江津县城既无被围时的断水之虞，也少有大江涨水被淹之患。

古代县城，一般而言大多只有城门四座，多的 6 座，而江津县城，除按一般规律开有东西南北四座城门外，还以县城地势之形态，沿江又增开五座城门。县城有九座城门，这在县城中很是罕有，京城也不过是九座城门。在清末民初巴蜀中有句民谣：綦江县城烟多，江津县城门多。说的就是綦江县与贵北高原毗连，贩烟的多。江津县在长江要津之处，城门多。九座城门分别是：东埠门、南安门、大西门、北固门（又名癸水门）、小西门、临江门、嘉惠门，通泰门、迎恩门。九座城门上都建有城楼，特别是东西南三处城楼最为雄伟壮观（注：江津古城门可参阅下文《津城古水井今何在》插图）。四周城墙上设大炮台 8 座，小炮台 10 座。每个炮台上都有两米长的被称为“铁牛儿”的红衣大炮。

江津县城建这多座城门，这可犯了上。有地方文献说，京师和上级州府曾追究此事，好在有明代重相江渊的斡旋，此事才了勉强过关。又有一种版本说，之所以江津小县城能修这么多城门，超过了州府，比肩京师，是因为有辅相江渊，得到皇上的恩准才建的。

当时县城城墙外的街道，有通泰门外的一条短街和附近的一条老新街。靠近长东边还有一条好吃街，涨水拆去，水

消搭建。在临江门、嘉惠门外，也有一条矮街。除此之外，城墙外都没有成街的建筑，多是长江边冲击而成的沙丘小平原，南安门外则是山坳。

江津县城城门虽多，但老百姓进城出城仍不方便，不论抬夫挑担者还是骑马座轿者，都要经过城门岗哨的检查才放行。衙署图省事，选几处交通要道的城门，白天打开，傍晚关门，只通泰门在天黑后约二小时才关。至于小西门、临江门、嘉惠门、迎恩门、南安门等城门，则常年紧闭不开，只遇有大事才开放。临江的城门不开，在没有自来水的时候，城里人吃水就成了问题，百姓就想了一个办法：挑水夫从江中挑水到外城墙根，将水倒入穿过城墙的镔铁尖嘴撮箕，水就流入内城墙根下接水人的桶中，用水人则递出挑水夫的工钱……至于迎恩门，据说是专门为迎接皇上圣旨或钦差大臣、州府大员而设的，只有他们到时才开放。他们乘船来时，县衙中文武百官在此门排队迎驾，场面很是热闹。

城南南安门直通石子山，非常奇怪的是这里地表为较厚的泥沙积层，下面就是厚度不等、大小不一的鹅卵石，有的已露出沙土外，在晴日的阳光下是琅琅生光，所以这里又叫琅山，山上有一平坝，明嘉靖初年，知县王贡在此修筑演武厅，操练兵丁，故老百姓称之为武城或武城山，因年久倾圮。清咸丰三年，知县陈祖润主持在此墙基上建成石城，作县城之拱卫。倚山和临江显示出古老江津县城的面貌。

明天启元年（1621），永宁宣抚司奢崇明举兵，占据重庆后，三次从南安门处攻城，城内民兵和“武城”兵丁顽强抵御，但终不敌炮火，楼毁墙破，断壁残垣到处可见，此是江津县城遭受的第二次战争重创，但后来多次进行补缺修缮。南城南门成了津城两次战争中被最先撕开的伤口。著名“白屋诗人”吴芳吉对此曾作过一首《江津南门》诗，追忆南门硝烟战火和战后惨状：城下蹄痕树莽苍，城头血迹日昏黄。许多过客新缙服，道是川黔古战场。驿路堆尸高马鬣，柴门流弹簇蜂房，贤奸何处浮云尽，万点寒鸦啄食忙。

国民 18 年，张清平任驻屯江津的国民 24 军第一师副师长兼第二混成旅旅长，他是地下党员。他对城区进行改造，当时县城全是窄街陋巷，低檐旧屋。他统一规划城内的街道，截弯取直，撤除梯坎。发动军民拓宽街面，由三四米扩为七八米，长度约三公里，形成现在江津城街道总体格局。派出工兵修建第一和第二公园，改造修建了大同路。还统一将沿街铺面改为西式，修建了体育场。在大十字修建标准钟楼，晨钟暮鼓，为县城增添一处景观。创办了大明电灯公司，江津县城终于用上了电灯。

民国 31 年 5 月 27 日，迎恩门外顺城街发生火灾，延烧至城门口。以后市民要求拆除通泰门至迎恩门之间这段靠长江的城墙，建成公路，后又建成通泰门码头。

江津县城清属“三里”（思善、杜里、笋里）之笋里。

城厢为“中正团”，分为“仁、义、礼、智、信”五坊。民国时名中区，后改城守镇。新中国成立后城墙逐渐拆除，名城关镇、几江镇、几江街道。后又分设鼎山和几江街道，面貌大为改观，面积大为扩展。

(原载《重庆晚报》2013年6月24日)

津城古井今何在？

井，乃象形字，甲骨文“井”像两纵两横构成的框架，本义为人工开凿的、有方形护栏的、提取地下水的水坑，后引申为人口聚集的自然村邑。《说文解字》白话版井，古制“八家共汲一井”，《易·井》有云：“改邑不改井”，《管子·小管》也说：“处商必就市井”。足见井对人类聚居、发展繁荣的意义。那么，处在长江之滨的江津凿井有何意义，这些古井是否还存在呢？

江津古城东西北三面是长江，故此段长江又叫几江或叫几水。江津县城不缺水，但凡遇事关闭城门，城中百姓用水就靠城外挑夫从江中担水，住城墙上安有的筛皮漏斗里一倒，城内人边用木桶接水，边将一文钱往小孔递出。若遇战事，挑夫没了，城门久闭，城中人饮水全靠城中水井。

江津古城是半岛，地下水源丰富。

民国版《江津县志》所载《城图》表明：城中四井，集中在离江边稍远的城南。一是城内小官山西侧今几江幼儿园旁的小溪边，有一水井，无名；二是南门东侧城墙根下菱角塘处，有一水井，无名；三是在太阳嗣桥处有一水井，即是今菜市小学对面，名叫吊井坎。原井台呈梯坎状，井很深，打水提水要用吊桶，故名吊井坎。

以上三井都在城内小溪边，水质较差。特别吊井坎，旁有一纸筋作坊，污染甚重。以上三井早无，但吊井坎这地名现仍在用，此处有一小区叫吊井坎小区。

南井：唯一在井存的老井

江津古城内有名的是南井，南井在南门处。乾隆版《江津县志》（卷二·泉水）篇云：“南井，南安门内。”光绪版《江津县志》（卷二·古迹）篇、清末《江津乡土志》（卷三·地理篇）也是同样记述。

古井呈四方井状，旁有株老黄葛树，井边原有井坝。后来拆除城墙和南门，修绕城公路，路面抬高，因而形成井旁高坎。早前此井之水汲源于鼎山和石子山之麓，质好盈满。现在井水渐少，打水也得提绳吊桶，成津城吊坎井第二。

南井又名火井坎。何为此名？一是此处正对县衙旁的火神庙。二是古时城内百姓迷信，家有婚丧嫁娶或生疮害病之事，就沿此出城，在南门边的水井边烧香点烛“扑水饭”，深夜此处常是烛火闪烁，故名。

南井开凿于何时？有人臆想说此井建于北宋，是江津最古老之井。此说实无依据，清三本《江津县志》（含《江津乡土志》）和国民《江津县志》都记有此井，但未写凿建时间。而史志对另外两井金钗井和白龙井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开凿时间交待，所以不能臆造此井凿建于北宋。

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登记表》中有这样的表述：“南安街古井始建清初，井口用条石砌成，井口长 1.6 米，整石打成，宽 1.8 米，深 2 米……井旁有一黄葛树，井水永不干涸，冬暖夏凉，味醇甘甜，可供居民饮用。现居民用井水淘菜洗衣。”由此可见，南门古井凿建于清初。南门古井是津城目前唯一的名在井存之老井，它仍在发挥惠及百姓的作用。

金钗井：江渊眼中江津后八景之一

津城最有名的古井算金钗古井，此井位于江津城东门原广场民工纪念堂背后长风厂石子山脚公路下面的一小开阔地带。乾隆本《江津县志》（卷二·附井泉）篇曰：“金钗井位于县东一里，清甘可饮，甚旱不竭。”光绪版和国民版本《江津县志》以及《江津乡土志》也是同样记载。

早时井旁有一小庙叫圣母庙，庙虽不大，香火却旺，这地方成了江津的名胜。从民国初年起，人们开始叫此庙为金钗庙，庙从井名，这井的名气大。

金钗古井的出名和两个文人有关，算是借诗出名。明工部尚书、大学士江渊将此金钗井举列为江津后八景之一，并著《金井寒泉》一诗：“传闻孝女购灵湫，拨落金钗影未收。三尺冷涵平地雪，一泓香湛半山秋。濯缨顿觉尘器净，入口方知病疾疗。好酿黄流供大脯，未应专美在西州。”

李监是明代常德府同知，江津人，也算当时名气很大的诗人，他作《金钗井》诗，诗曰：“谁罄灵湫石子岗，迢迢一派接银黄，金钗尚见当年影，玉碗曾分九夏凉，自可和羹苏病体，还堪煮茗沃诗肠，此中神物潜依久，好起为霖润四方。”江李二人的诗，深得当时士子追捧。特别是将此列为津邑后八景之一，更是推助了此井的出名。

金钗井较深，久旱不竭。井口冬升热雾，夏冒寒气。井坎属整石而凿，下井壁为条石错次而砌，可撑石而下。

金钗古井先与圣母庙相伴，应是先有庙，后凿井。江渊、李监的诗，说明此井凿建于明代。因而它是江津地方史志中记载中的最古老井。金钗庙最后的一位和尚叫程定超，江津五举沱人氏。他在念佛坐禅之闲也清扫井坎或做淘井之事。

抗日战争时期，金钗庙殿内安置了许多从战区下来的伤兵，清冽井泉煮汤熬药，治伤效果尤好。后来井泉开始枯竭，长风厂迁来石子山，山脚修了公路，此井开始废弃，井内填了荒石，随着建设的扩展，庙毁井圯，此处被辟成一洼专种藤菜的田园。庙僧程定超在三年自然灾害时归寂。他是江津区前作协主席邓新华之舅父。

金钗井虽毁，但这名还在使用。津城内有金钗井街，有金钗井农贸市场，城内 203 路公交车的起始站也叫金钗站。津城市民对此名耳熟能详。虽位置不在原址，但距离不远。

白龙井：白塔倒影如游龙故得名

津邑古城南门外还有一井名白龙井。乾隆版《江津县志》（卷二·附井泉）篇云：“白龙井，石子山演武厅侧，嘉靖己亥年（1537年）主簿宋秀清凿。”

照此计算，此井凿于470多年前。石子山就是今天南安门外的琅山，山上演武厅就即指武城校场，具体位置在江津原党校与长风厂医院一带。

清光绪版《江津县志》（卷二·地理志）篇云：“白龙井，石子山演武厅侧，嘉靖己亥主簿宋秀清凿。”国民版《江津县志》（卷一·名胜篇）也是同样的记载。只有光绪版《江津乡土志》（卷四·地理篇）的记载较为全面：“聚宝山在县南安门（一都）即石子山，多圆子，自播发脉迤邐千里，风气凝萃，古今卜葬都多发祥。其上有武城，明为主簿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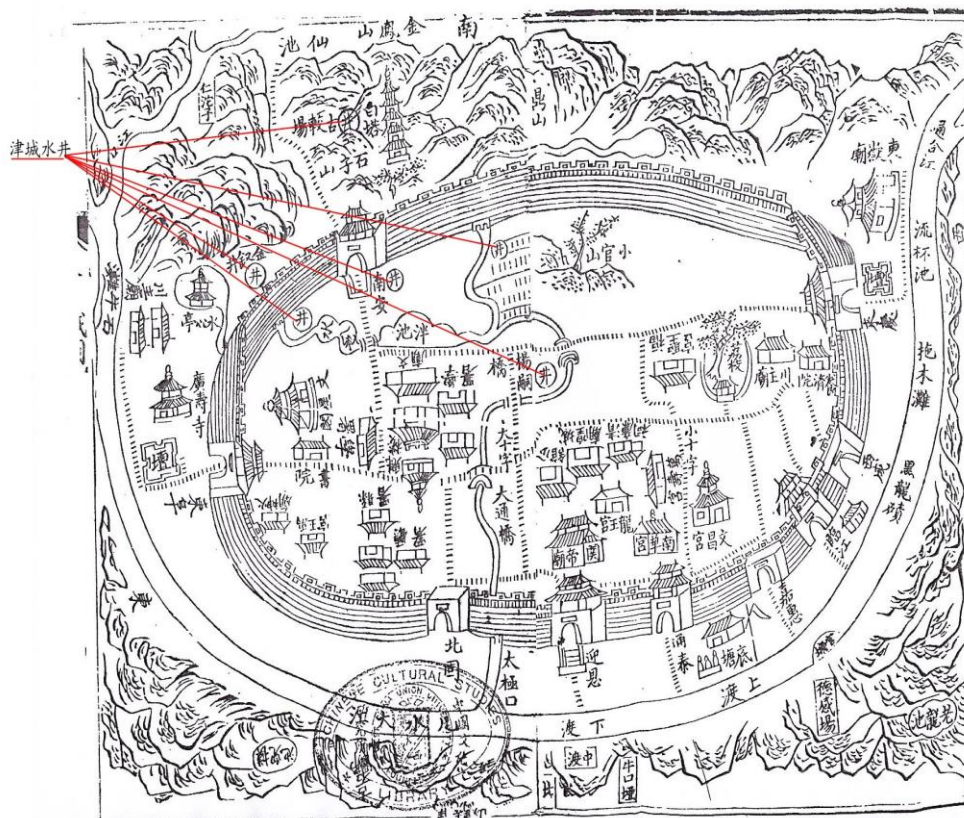
江津古城东西北三面围绕着波宽浪急的长江，是天然护城河。城南靠陆地，出南门是石子山，山上可居高临下，俯瞰全城。明时开始，津人在山上建武城、演武厅，屯兵设堡，以拱卫津城，有人居便有井。

何为白龙井，志书上没有记载，想必是石子山演武厅旁边有一高大白塔，塔影倒映在清澈满盈的古井中，水中犹如游动一条白龙。此井早被填毁，知者甚少。

津城六井，井、名皆存者仅一，此为南门古井；名存井毁有二，金钗井与吊井坎。其于三者只能在地方史志故纸堆

中才能翻到。六井之变，也算是津邑地方历史变迁的一个缩影。

(原载郑州市《群文视野》2014年冬季号总20期)



笋溪河又叫“张孝溪”

江津人不知张孝溪，不知卧牛滩，更不知这里的故事。

这故事然发生于元末明初，但在清代乾隆、道光、光绪以及民国时的《江津县志》均有记载，简直是大书特书。我是从这些史志上读到这故事的。因为发生了这故事，所以才有张孝溪，才有卧牛滩。

张孝溪在哪？卧牛滩在哪？回答说在重庆市江津区笋河上。但笋河流长 200 多公里，源于贵州，纵流习水、江津两区县，注入长江。笋河上张孝溪在那？人们不知道！百度里也没有。至于卧牛滩也是无人知晓。

因为张孝溪这故事很感人，所以我决定觅迹寻踪。

向江津境内高人打听，他们摇头，说没有听过这名。向地方史志专家咨询，他们查读了江津地方史志后说有这事有这名，但不知何何境处。向民政局地名办的同志打听，他们翻阅了地名手册后，回复仍没有。

这流传了四五百年的故事怎就断了？我郁闷。我想利用某个节假日，徒步从笋河的尽头走到源头，寻找张孝溪，寻找卧牛滩，寻踪这个故事的“原产地”。

一个偶然的的机会，我读到清末刊行珍本《江津乡土志》，书中同样记载了这个故事，重要的是书中说明了这个故事发

生于“县南一百五里李市场侧近笋里八都”。这下有些眉目，我多方向李市场老街坊、老村民打听，但他们仍不知。

我又翻旧书，查到明清时江津县划分为笋、杜、思“三里”，下辖十二都，李市场侧“笋里八都”在今李市镇沙埂乡和两岔乡之间的笋河一段。

于是，我托李市镇文友候兄向笋河沿岸的沙埂乡和两岔乡打听。终于，候兄传来话，说虽然没有查到张孝溪，但查到在沙埂乡笋河上游一个叫大地坝的对岸，古有一渡口，名叫石牛滩，又名卧牛滩，不过早废弃，现名也不存。

我决定去寻找。

上周日，我与候兄等一行来到沙埂场。在这里搭上一条机动小船，船上有十来人赶场回家的村民，都在60岁上下，座在我身边的可能有70多岁。在驾驶室专心开船的叫幸亨祥，也是50多岁的汉子。见我们这些陌生人，他们就问我们去那？我们没直说，问大家知道不知道哪是张孝溪？大家摇头，一会儿你看我，我看你。再问大家知不知道卧牛滩？大家都说不知。

候兄有办法，他启发式地问开船的老幸：上游大地坝对面的小渡口很早前叫什么？老幸是个老艄公，对笋河的水名滩名很熟悉。他说，具体叫什么不能肯定，好象听上辈船人说过，几十年前叫卧牛滩。不过现在早没这个叫法，这里也不像个渡口了，只是一片荒滩野竹……

几个年纪大点的才恍然大悟，记起早前哪里叫卧牛滩。一老村民说：这里河边原有一尊巨石，很像一头半身淹在水里洗澡的大水牛，“牛角”露在水面。当时这里是一个很热闹的渡口。在解放后不久，下游沙埂乡筑堤修电站，水位上涨，将这“牛”淹入河底，这名也没了。

原来如此。

我们在船上观赏着两岸的风光。茂密的绿竹簇拥着这蜿蜒的河流。新长出的长长的尖尖的竹笋一排排挺立，犹如立正的哨兵。船过上河嘴，左弯右拐，沿山脚而行，近一个半小时，终到一开阔溪岸。老村民蔡佑华说：这里是大地坝，地平肥沃，解放前多住大户人家。大地坝对岸就是你们要找的卧牛滩，现在全无了。至于张孝溪，就真的不知了。

船开了过去。这里只是一片凄凄荒草，有几簇高低不一的水黄竹，没一点渡口影儿。原来卧牛滩就在这里，石牛被溪水淹没于下，现在只见静静的河水。

我凝视着这被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地方史志大书特书的地方，联想着当年这里的热闹和神秘。于是，给大家讲述了这里的故事……

元末时期，江津县天灾兵祸，连年不断，哀鸿遍地，民不聊生。当地一个 40 岁的张姓村民，为躲避兵祸，为糊口，背着 80 多岁的老母，含辛茹苦，外出逃难。十五年后他得知明兵平蜀，天下初定，就欲将已九十高龄的老母亲背回老

家颐养天年。背至笋河，突遇溪水大涨，难以过河。老母说：我老了，连累儿子至此。今隔河一水，是天意不让我回家。她叫儿子自个想法过河回家。儿说：生养我者母也，我怎不将老母背回？而隔岸丢弃老母行大逆不道之事！于是他用肩膀托着老母躺水。水越涨越高，快淹至肩背。他用尽全力将老母托举。水要淹至他颈项时，突然感到水中脚下隐隐有石包垫载着他慢慢移动。他终于过河，母子二人无恙。但回头看一看，河中有一石牛斜卧水中。原是水中石牛助他们过河。

此事越传越广。于是县里的举人秀才们将此处取名为卧牛滩，修船立渡。又因张姓村民孝感于天，大家就叫他张孝子，真名反被人所忘却。这段河流又被人们叫为张孝溪——这个故在巴蜀地区流传了几百年。

大家听得津津有味。一乘船村民说，难怪这里姓张的很多，是大姓呀。一老太婆则问：你是不是瞎编的哟？我说，这不是我编的，这么多个朝代的史志上都有记载，以书为证嘛。我还举证说，清代江津县城学宫外右侧建有忠义孝弟祠，乾隆时，有 15 人之灵牌位入祠受县人祀奉，张孝子灵位排列 13，此祠民国在还在。

我还告诉大家，明代永乐年间江津举人、后来作应山县（现湖北广水市）训导的王珙，当时就是闻名巴蜀的诗人，他为此曾作《卧牛滩·张孝子故续》一诗。后来诗被收入清道光年间的《江津县志》。诗曰——

母子临流殒命时，此时只有老天知。
牛郎不化江中石，鱼腹应尝水底尸。
盛事一场遗旧志，清风千载有新诗。
笋溪万古流不尽，大节高名应共之。

找到了张孝溪、卧牛滩，我兴奋不已，大家听了张孝子的故事，也很激动，纷纷在此拍照。一个村民说：这故事感人，现在的娃子应好好学学。

候兄是个文化人。他说：应该在此处立一块碑，刻上这故事。这故事传了几百年，但今鲜为人知，应申请“非遗”保护，将这个故事传下去。

立碑、传承——这建议很好。

（原载《重庆晚报》2015年2月25日，原名《寻踪卧牛滩》，此文获首届重庆晚报文学奖）

横看成“骆” 侧成“駱”

巴渝名山骆来山是有名的风景区，位于重庆市江津区西湖镇境内。它雄踞于一丘陵平坝之上，山势崔巍，耸峙云端，海拔 1000 米左右。四周峭壁悬岩，东西南北方的悬崖峭壁上筑有四座寨门。骆来山气候温和、雨量充沛、秀木如云，茶垞如织。站在最高峰上俯瞰山下，远处的太公山、云篆山，近处的綦江河、笋溪河等远山近水，全收眼底。

骆来山是一座古老的名山，是江津继四面山、黑石山之后的第三名山大山。骆来山上曾析置黄泥乡，后改镇，镇以山名，曰骆岷山镇，今并入西湖镇辖。最为有趣的是此山山名文字变化颇遭周遭：先名骆駱山，后叫骆来山，再后改骆岷山，今又曰骆来山。“駱”、“岷”、“来”之反复变化。

清代和国民版《江津县志》，清末《江津乡土志》均将此山记载为“骆駱山”。乾隆本《江津县志》“卷二·名山·东之山”篇曰：“骆駱山，县七十二里，形如骆驼”。光绪本《江津县志》卷二曰：“骆駱山，县七十二里，形如骆驼”。国民版本《江津县志》记载多 5 个字。“卷一·山脉·名山”条曰：“骆駱山，县南进十里，形如骆驼，绵亘数十里。”《黄泥乡志》第三篇第二节“山脉”篇中介绍较详细。“骆駱山：为大娄山余脉川东平行岭谷的一支脉，横亘乡境之南，有大

小山峰 99 个，南北走向，逶迤十余里，山峦连绵起伏，纵横交错，其主峰形似骆驼，故名。主峰最高海拔 1032 米，四周岩高壁陡，山势险峻。山之巅，地势平坦。古人曾在此修有庙宇。”

也许是因为文字简化的原因，后来就将“骆駝山”改为了“骆来山”。1987 年 10 月出版的“四川省地名录丛书”之 113《四川省江津县地名录》曰：“骆来大队，原名东胜大队。后以境内骆来山（此山起伏似如骆驼）更名，耕地 1, 008 亩，1, 170 人。”1995 年 6 月出版的《江津县志》“自然地理志·地貌·山脉”中，也将“骆駝山”改写成“骆来山”。

再后来，“骆来山”又变成了“骆崃山”。此山本为巴蜀名山，不仅风光秀丽，而且有更多的历史遗址和遗迹，旅游业发展看好。2000 年，江津市旅游局编印了《江津导游解说词》一书，将“骆来山”改为了“骆崃山”。这段时间，宣传资料等包括导游图、客车起始站名，均叫“骆崃山”。改“来”为“崃”，想必是为突出大山名山之意，增加游客之奇趣等。

但是不等几年，为了统一称谓和地名，有关方面又将“骆崃山”名回归到“骆来山”，“崃”又简化成“来”，这一称谓直到今天，官方和民间书写也是如此。山上新设有骆来村，有骆来山学校。骆来山之名得到了社会的认可。

骆駝（来、崃）山之名又从何而来？回答都说是因此山

形状酷似骆驼而得名。果真如此？笔者认为不尽其然。

众所周知，骆驼最显著的标志是背上有前后两个驼峰。假若我们行走在此山北坡和东坡下的綦江边上，不论是在青泊滩，还是在凉沙坝、小河坝，绕此山山脚行走半圈，抬头环看此山，此山形如骆驼，骆头和前后骆峰明显。惟妙惟肖，形象逼真。但是，若我们花费半天时间，翻过北坡和东坡，站在与嘉平镇相邻西坡或南坡的康庄山、阳照山、紫荆山垭等处，仰视环看此山，情况就大变，此山没有前后骆峰，不象骆驼。细一看，此山更象一头高大勇猛、威武雄壮，飞奔而来的高头大马。这正是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罢了。

《辞海》对“駮”的解释：駮，马七尺以上曰駮。《周礼·夏官·庾人》曰：“駮，马八尺以上为龙，七尺以上为駮，六尺以上为马”。駮，就是比龙稍小的高头大马。

由此可见，此山山名是因它既象双峰骆驼，又象七尺高头駮马而得名。既象双峰骆驼，又象高头大马（駮马），观者方位不同而言之不同。

有趣的是清代诗人郑梅嵩写有一首《题骆山》诗，也为此种说法提供了证明。全诗共 22 句。前四句诗曰——

父领经修寨费财，吾游如岫意含哀。

何其似凤忘称凤，竟尔名駮不类駮。

郑梅嵩，又名郑侨，号惠东，清例授修职郎候选县丞。

江津县人。郑氏父祖上辈从明末开始经营此山，率山民在此修城筑寨，抵御外侵，对北坡东坡、西坡南坡了如指掌，所以他才写出此山“竟尔名駮不类駮”的特点……

将“骆駮山”改为“骆崮山”，实为突出名山古山之意。《辞海》曰：“崮，山名，邛崮山。”“崮”字除组“邛崮”词外，其他地方几乎没用，属与“邛”字的“专配”，至少是生僻字。

现在，通叫骆来山，虽强化了其山状若双峰耸立的骆驼的一面，但在不同的方位观看，它又象飞奔而来的七尺高头大马（駮马）之意，却容易会被人们所全忘……

（原载《重庆政协报》2016年2月16日）

古韵之美真武场



“湖广填四川”时，江津真武场是客家移民中心之一，笋河在此注入綦江，綦江在此注入长江，客家人不断来这里“插筴为业”，这里因客家人而起，因客家人而兴。这里的古渡口、古建筑、古黄葛、古楹联，淋漓尽致地展示出它的古风古韵之美。

古渡口——见证了当年的辉煌。

真武场是个水码头，下场口的真武渡口是当年客家人登岸之处。长长的石阶向上延伸入街，船夫轿夫们的脚跟把石梯磨得光滑锃亮。明末客家人初到这荒滩野渡时，只有简陋的敞篷船和竹筏，乐善好施的客家人戴登霄于此设立义渡。戴公渡曾兴盛一时，这里是川盐入黔四大口岸之一的“綦岸”

第一码头，贵州的杠炭、棕片等由綦河航运到这里后，转入长江运往重庆等地。往来货船，多在此靠岸，形成“白天桅杆似千人拱手，夜晚船火如万盏明灯”胜景。

古建筑——布局精巧风格多样。

客家人定居下来了，修建了不少同乡会馆。来自闽籍的客家人修建了祀奉妈祖的天上宫，来自赣籍的客家人修建了祀奉许真君的万寿宫，来自粤籍的客家人修建了祀奉南华老祖的南华宫，而来自湖广省的客家人则修建湖广会馆等。清代中期，先富起来的客家人吴泽俊修建了欧式风格住宅。这些建筑气势雄阔、结构宏伟，特别是民国初年客家大族马氏修建的马家洋楼，更是布局精巧，组合奇特。2005年重庆公布第一批优秀近现代建筑152个，江津7个建筑榜上有名，而这7个中，真武场占5个。

古黄葛——客家人的风水树和风景树。

整个真武场都在绿荫掩映之下，古意盎然，百年黄葛古树就有40多株。它们长得千奇百怪，老街坊给它们取名为“猫钻树”、“夫妻树”、“拱桥树”等。为何真武场有这么多黄葛树？一是真武场在綦河畔，栽树可护堤护岸，护街护道；二是这里客家人来自五湖四海，商船客舟在此登陆，船只靠岸抛锚，缆绳可系在干粗根深的黄葛树上。

古楹联——记录真武场的历史和人文。

真武场的许多古建筑上都刻有古楹联，很多出自联圣钟

云舫之手。天上宫有一副楹联：“崇封溯宋元以始，钟灵在闽蜀之间。”在庄重肃然的万寿宫，大门两侧石柱上的楹联堪称书法精品：“玉诏颁来万古长留忠孝，金册渡出一家都是神仙。”真武场古楹联，记录了客家移民的人文和历史。

（原载《重庆日报》农村版 2014 年 9 月 2 日）

川渝边前要观 “清源宫”

石蟆场是个古老的乡场。因在下场口三角坝处有一尊巨石耸立，形似蛤蟆，人们称之为蛤蟆石而得名。但后来真正使这石蟆场在江津和合江两地名声大振的不是蛤蟆石，而是场上的清源宫。蛤蟆石早已不复存在，而清源宫却越显传奇。日前，我与几个从事文史工作的朋友到石蟆镇公干，参观了清源宫。

石蟆镇是重庆市江津区西部最为边远的一个镇，离江津城区 80 多公里，与四川省合江县榕山镇相毗邻。有 8 万多人口，虽行政区划不同，但两地群众交往甚多。到处弥漫着古风古韵味儿的石蟆镇也是重庆市小城镇建设试点镇

这里的清源宫令当地人津津乐道。它香客众多，“每当会事，来者千千，去者万万，江津一半，合江一半，人声鼎沸，香火不断……”

清源宫在场镇西北侧，宫门前是宽 5 米、长 17 米的垂带式 42 步阶梯的踏道。山门正面是由一石牌坊镶嵌，门两边各有笑面石狮俯卧在石鼓上，笑迎香客。石牌坊上方刻有庄严的“圣旨”二字，两边各有丞官，寓为本宫乃依旨而建。山门上有一楹联：“清源盛衰关乎天关乎地关乎天和地；宫观兴废在于神在于人在于神与人。”

清源宫占地 1700 多平方米，由戏楼、书楼、川主殿、灵官殿、后殿组成。从山门往里走，一眼望见的便是灯杆和在它左右两边重达 1 吨的两个焚香钱炉，两侧就是书楼。每逢庙会，灯杆上的 64 盏清油灯就要被点燃。与灯杆相望的是石木结构的戏楼，由 14 根大圆石柱支撑，石柱对称。戏楼是地厅式舞台结构，飞檐翘角，气势轩昂。戏楼顶端刻有“灵囊大包”四字大匾，两侧四柱上有两副对联，第一副是：“本是戏场若演奸诈邪淫各宜自反；岂尽假事试看忠良节义孰非人为”。第二副是：“演绎往事迪思迪想；粉墨古人寓教于乐”。

川主殿与戏楼遥相对望。它是由 12 根大圆石柱支撑，对称式排列，抬梁穿架式结构，硬山式屋顶。石柱的对联云：“都江堰治水丰功伟绩叹为观止；清源宫造像鬼斧神工志以殊荣”。对联的作者估计是今人，该联简明扼要，说的是郡守李冰都江堰治水造福子孙、人们修筑清源宫供奉川主祭祀之事。川主殿后便是灵官殿。

清源宫里香樟树很多，一株株巨大的香樟和黄葛树，将这个晨钟暮鼓的寺院掩映得有几分的神秘。其中有一香樟高达 35 米，胸围达 8.2 米，要五六人才能合抱。据记载它与清源宫同龄，有 500 年历史，被称为重庆市的“香樟之王”。“文革”中这棵树曾被当做练兵射击的靶子，饱经了沧桑，但今天它又焕发出青春。

清源宫是津、合两县最大的宗教场所，香客遍及两地。每年的庙会，声势浩大，两地的人都说：“清源宫的大老爷菩萨灵验得很哟……”

清源宫有着许多传奇故事。在民国版《江津县志》上，有一篇清同治 10 年（1872 年）江津进士周文权的文章《石蟆清源宫记》。其文说：四川省合江县木广场大山下有一古刹，古刹旁边有一既深又大的水塘叫龙王潭。在明正德五年（1510 年）五月一日，潭中突然浮起一根光怪陆离的巨木，古刹中僧人非常奇怪，认为这是不凡之木，于是将巨木锯截为大中小成三段，雕刻成了三尊川主神像，这最大的一尊取名为“大老爷菩萨”，其次分别叫“二老爷菩萨”、“三老爷菩萨”。后来这“大老爷菩萨”被迎送到江津县石蟆场的“昊天观”内供奉，这“昊天观”就是“清源宫”的前身。这“昊天观”的川主菩萨“大老爷”非常灵验，每当遇到干旱年景，当地百姓就抬着它到合江的木广场古刹旁的龙王潭求雨。据说正是有川主“老大爷菩萨”的庇佑，石蟆场这个地方总是风调雨顺。周进士的文章没有交待“二老爷”和“三老爷”被迎送到何县何乡何庙供奉的事。

清源宫的“川主大老爷”在津、合两县百姓中，被视为了神灵，不仅成为津、合两地信男善女祭祀和求神拜佛、抽签问卦的地方，而且还成为当地开展川剧演出、爬杆表演、堂口议事、赈物发放、调停息诉的地方。每年上九会、川主

会、清醮会等庙会更是热闹非凡。津、合等地各家戏班齐聚清源宫，十天半月鼓乐不断。每个年头岁尾，前来祭祀的人群不断，清源宫名声远播。

解放后，清源宫曾一度作为区、镇政府机关的办公之地。因而这里的一些设施没有遭到多大的破坏。对江津地方民俗很有研究的成福荣先生告诉我：解放后有几次天旱，少数人也准备抬出川主菩萨“大老爷”到合江求雨，但都被政府和相关部门有效制止。区乡镇政府进行了宣传，同时积极组织群众兴修水利设施，每遇天旱都组织群众进行抗旱救灾，收到了效果，群众提高了认识。“请水求雨”之事再也没有发生过，但作为庙会和与之相伴的川剧坐唱、舞狮表演、爬杆表演（灯杆会）等等却保存并流传下来……

石蟆的群众都认为清源宫内的“川主大老爷菩萨”指的是李冰。其实，历史上被敕封为“川主”的不只李冰父子二人，还有一个为民斩蛟除妖、治水浚河的四川嘉州郡守赵昱。宋代又被封为“川主清源妙道真君”，而李冰是没有这个封号的。《川主考》说：“石蟆场川主庙自昔相沿皆名清源宫，庙中旧碑称‘川主清源妙道真君’可知系从宋封也……”可见，早年这里供奉的川主神“大老爷”可能是赵昱，只因“时人不知李、赵二川主各别，故误”。后来，清源宫内又供奉上了玉皇、李老君、观音、灵官、孔子、鲁班、关羽、岳飞等神像，各路神仙都有一席之地，因而各路的信男善男

均可择其信仰者祭拜之。

石蟆镇已被命名为重庆市的第一批历史文化名镇，清源宫现已被政府批准为合法的宗教场所，又成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这里每年都要举办庙会和民间文艺演出，仍吸引着津、合等县数以万计的群众。央视《九州戏苑》专门到此摄制了二期节目，在全国播放后引起强烈反响。清源宫已成为渝川交界处民俗文化的最佳看点之一。

（载《对联·民间对联故事》2009年9期）

万里长江第一大佛与名联

石门大佛寺位于江津区石门镇长江边的高崖上，距江津城区 48 公里。寺内主供一尊脚踏莲花观音造像，是全国同类观音造像中最大的一座，被誉为“长江第一大佛”。

大佛寺有许多优美的传说，相传为鲁班的徒弟所建，并由鲁班为其补脚。据有关方面考证，其始建年代为明洪武年间，解放初期被定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大佛寺岩壁上的两块碑记因年久风化，已模糊不清。另一块重建大佛寺碑题是清代同治八年（公元 1869 年）所立，杜价禄撰。碑文说：“大佛寺建于先朝。神工鬼斧，难稽其开辟之年；石栈天梯，大有勾连之势，峥嵘突兀，崛峭嵌奇。七层楼阁荡云霞，十丈壁薄回日月。”碑文将大佛寺的景色描写得淋漓尽致。

大佛寺内的这尊观音菩萨，靠后岩摩崖镌成。高约 13.5 米，金光闪耀，色彩斑斓，粗犷浑厚。观音菩萨所戴帽子，花纹全是镂雕而起，玲珑精致，花团锦簇，令人眼花缭乱。这观音菩萨体态雍容，脸上似笑非笑，显得端庄、娴静。微闭的嘴角上露出丝丝慈祥之意，把佛教经典中观音大慈大悲、普度众生的善良心性，表现得惟妙惟肖。袈裟在胸前敞开，佛珠历历可数。金轮耀眼夺目，纱布搭在手肘，肌肤似

隐约可见。两脚踏着莲花，左脚屈起，手随放在膝盖上。显得栩栩如生，舒展大方。



钟云舫（1847—1911年），重庆江津人，清代秀才，学识渊博，遍览经史百家之书，工诗文、词曲，尤善对联。清同治年间复修大佛寺，此时他既为功名所累，又年少气壮，这是他楹联创作高峰期的开始。但仕途不畅、功名无望，多有折磨，他感到无限的失望和茫然。在这种背景下他应邀为

石门大佛寺的重修撰联。就有感而发——

自在观，观自在，无人，无我在，问此时自家安
在，
知所在自然自在；
如来佛，佛如来，有将来，有未来，究这生如何得
来，
已过来如见如来。

此联一出，旋即传遍全邑，引起轰动，好评如潮，无不

拍手称快。

观自在是观音的别称，上句指在自在观里看观音的像，可达到无人无我的境界时，问你自己在哪？如果能知道自己在哪，你就回归自然，身心自在；下句以如来佛对观世音，说有将来有未来，但你自己究竟这生怎么来的？那么已经过去的岁月就像见过如来佛一样，清楚明白。联中“自在观、观自在”，“如来佛、佛如来”部分文字的回文巧妙自如，令人回味。钟云舫题《江津石门大佛寺观音联》不愧为全国寺院中题写观世音楹联的经典作品。

(原载《**对联·民间对联故事·上半月**》2012年 第8期)

綦江长江有妙联

波宽急的万里长江流过江津，左奔右夺的綦江流入江津。江津可谓是大江大河，景色壮观。綦江是是长江的一级支流綦江，发源于贵州，在江津的顺江口汇入长江。

綦江上又有三条重要支流分别叫猴子溪、狗脚溪、马桑溪。江津一秀才将綦江上的三条溪河联成半联后征对（也有民间故事说此为钟云舫）。此上联曰——

猴子爬马桑，吊起一支狗脚

不想江津一渔翁对长江江津段的支流和水名异常熟悉，他把长江江津段上的三个很有名的水名猫儿沱、铜罐驿、鸡冠石（鸡冠石镇）联缀成下联，使全联成为——

猴子爬马桑，吊起一支狗脚；

猫儿钻铜罐，露出两只鸡冠。

猫儿沱、铜罐驿、鸡冠石均是长江重庆段上的重要地名。猫儿沱在江津，铜罐驿在九龙坡（原属巴县），鸡冠石在南岸区。三地名可说在重庆是人人皆知。

1997年，笔者在重庆市巴南区渔洞镇参加一个群众文化工作会议，傍晚在长江边散步，偶然记起水联，顿生灵感，将下联中的“铜罐”改为“渔洞”，使之成为——

猴子爬马桑，吊起一支狗脚；

猫儿钻渔洞，露出两只鸡冠。

愚以为“猫儿钻渔洞”比“猫儿钻铜罐”更为准确有趣，因“猫儿”和“渔洞”的关系更为微妙。

这綦江和长江上的水联，构思奇巧，对仗工稳，荒诞精妙，令人玩味无穷，实为民间文学的精品，堪称“绝对”。

（原载《龙门阵》2001年第一期）

古河綦江探幽

綦江河，古名夜郎溪、樊溪、南江，为长江右岸一级支流，全长 231.3 公里。发源于贵州省桐梓县花坝火盆洞，流经贵州桐梓县和重庆南川、綦江、江津等区。它由南向北，左奔右突，最后在江津顺江口汇入长江。

綦江上游流经渝黔相交的崇山峻岭，沿途更有无数岁月的大风大雨留下的沧桑痕迹。在河岸两侧的广兴、北渡等地一些低矮山峦处，有成堆成堆的鹅卵石，其中可找到海生贝壳类动物化石。下游贾祠场对岸一千多米高的龙蹬山，相传在古代曾停泊过舟船，至今山岩上还留存着竹纤藤勒出的痕迹和篙杆戳出的凹印。这里有人仍会唱那首“风吹灯笼团团转，火烧灯笼满天旋，洪水潮天我不怕，变个麻雀飞上天”古老的歌谣。正因为綦江流域曾是巴人的居住之地，为纪念诞生于巴楚的爱国诗人屈原，綦河沿岸的人民保留了每到农历五月初五吃粽子粑、喝雄黄酒、挂艾叶草，到江中赛龙舟的风俗。端午节是綦江两岸百姓非常看重的节日，当地人要为过节做很多的准备工作。

1980 年冬，重庆市博物馆会在綦江与长江交汇处的王爷

庙发现了新石器时期的遗址，出土石器 146 件和各类文物若干，这证明了綦江流域文明渊源之外久远。綦河对岸即著名的冬笋坝巴人遗址，从 1954 年开始，经重庆市文博单位四次发掘，在这里共清理出古代巴人墓葬 81 座，出土了船棺及大量器物，为綦江流域是巴人生活故地，提供了有力的实物佐证。

綦江上广兴、夏坝、五岔、贾嗣、西湖、清泊、真武、仁沱、顺江等集镇，犹如一颗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綦江河上。这些集镇的小城镇建设各具特色，或红墙碧瓦，或白墙青瓦，点缀在綦河河畔。使这山，这水，这城，相交相映，煞是好看。綦江两岸特别有名的是红橘，每到秋季橘红之时，两岸一树树的橘树挂满了火一般鲜艳的橘子，将这原本的青山装点成橘红的彩带。綦江上的绿水和白帆，加上岸上的被成片成片的红橘林染成红色的山峦，就更是一道迷人的风景。真可谓“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幽幽綦河，碧波潋滟。泛舟其上，神怡心旷。今天的綦江流域，渝黔高速公路、渝黔铁路等贯穿全境，沿岸集镇高楼大厦鳞次栉比，整个流域的经济、文化发生了巨大变化。那相对不变的淳朴民俗，总会唤起人悠悠的綦河情，它散出千古巴渝风，将永驻我们心中。

（原载《重庆晚报》2013 年 1 月 14 日）

“一场两县”大垭口

这是大山里的一个小小的边界乡场，虽说是“场”，其实就是一条小小的街巷。但它很特殊，一是它处于在地势较高的大山，具体位置是被夹在两座巍峨的大山相交的狭窄的山垭口上；一是这个小小的乡场，一半年属于江津，一半属于綦江，就是所说的“一场两县”。它的名字叫大垭口，当地百姓称它为“大垭口场”。江津、綦江两县（区）共管，前半截属于江津区嘉平镇，后半截属于綦江区中峰镇。

在中国特殊的地理行政区划中，有“鸡鸣三省”或“一脚踏三县”的地方，但是，在大山上有一条狭长的乡场属于两县管辖，还不多见。而且这乡场是在一个长长的山垭口上，这就显得更为奇特。

大垭口场的街坊呈东西走向，场头离场尾仅 500 米左右，场宽已只有 10 米左右，街坊的两边全是些不规则的铺面，结构全由原来老式的土木改为了砖预，因而少了些原始气息。经营的多是些农资农产和百姓的日杂用品。场上居住的多是在这大山上种地的农民，现在只有 300 多人。

站在大垭口场上，往西一抬眼，山下曲里拐弯的江津笋

溪河在一路翠竹的掩映下尽收眼底，绵连起伏的小山岗中，点缀着月沱、悦来等村庄。转身东看，则是一条九曲连环，时而瀑布挂岩、时而流水潺潺的綦江县所属的清溪河。这“大垭”实际就是笋溪河与清溪河的分水岭，“大垭口”就是綦江与江津两县（区）的交界口。綦江通往江津，如走陆路，只有翻越大垭口最为近捷，所以江津的老百姓常说：翻过大垭口就是綦江县，而綦江的人则说：翻过大垭口就是江津县。由于这样的地理位置，早在清初，这里就成了綦江县通往江津县中大路上的一个重要客栈。地方文献上记载：最初这里只是抬夫走卒歇脚添水的么店子，后来店铺越来越多，就发展成山垭口的一个边界乡场。

大垭口的南面是中峰山，北面是紫荆山，两山相夹，形成一个垭口和关隘，因而这里的位置非常重要。险峻两山，面相对峙，中呈垭口，如守住这个大垭口，就是千军万马难以攻陷的屏障。清同治年间，太平军石达开欲攻袭江津，在綦河和长江水路难克的情况下，第三次就是攻破大垭口，直取江津鹤山坪。正因为这里两县交界，位置特殊，大山交错，易守难攻，1949年解放后，以龚治国为首的国民党残兵在此立棚为匪，成立反动武装，对抗新生的人民政府。他们凭借大垭口特殊的地理位置负隅顽抗，这支顽匪终在1953年被我地方人民武装歼灭。

解放后，江津、綦江两县的蔡家、嘉平和永兴、中峰

等毗连镇街非常重视大垭口这个边界小场的建设，办起的学校、医院等。但由于各属两县，一些地方政策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如当时的生育政策、林业政策、用电政策等，因而在管理上曾闹出过许多笑话。大垭口场上的人都曾开玩笑说：一场两头住，政策各管各。

现在的大垭口场，仍然属江津和綦江两地各管一截，但许多事都实行了统一的管理。场上住的人，除了户籍本上有綦江和江津的区别外，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綦江人或江津人。只要是一场人，不管那家有红白喜事，大家都会自动站拢来帮忙。原来的“一场两头住，政策各管各”，变成了“一场两头住，融融其共乐。”邻里街坊，亲如一家。

大垭口场东侧的一个姓吴的中年妇女，住了一间新街房，她说是她女儿买的，女儿在外打工，她帮女儿守着。这房更有特色，门前的小坝上立了一块水泥铸成的界碑。界碑右边是江津，左边是綦江，界碑上“江津”、“綦江”的文字非常的醒目，界碑的中轴线正对这家的堂屋。诙谐幽默的大姐对我说：你说我这住房属江津还是綦江？真是一房跨两县哟……

（原载《重庆日报》农村版 2014 年 4 月 22 日）

百里笋溪

江津是一个有山有水，山水美丽的地方。四面山、黑石山、骆峡山和长江、綦江、笋溪等在江津境内山水相间，山缠水绕。清时江津分为杜里、思里、笋里，笋里就涵盖了整个笋溪流域。笋溪从南到北约一百多公里，东西宽约二、三十公里，面积约占江津三分之二。其东面是綦江流域，西面是塘河流域，綦江和塘河虽然分别发源于贵州桐县和四川的合江县，但他们从江津境内进入长江，他们是姐妹河。

笋溪发源于贵州省习水县大坡乡。江津南部与贵州习水县北境相邻。《水经注·江水》云：“又东过符县（今合江）北邪东面之习部水，从符关东北注之。”此于黔北地区，早有习水之记载，而为川黔自古通道。由江津南境通达贵州之习水之路，就有由南向北的笋溪。

笋溪流域的形状就像一个长长的撮箕，箕口在北面的长江，背在南面的四面山，两个边分别是笋溪与綦江和塘河的分水岭。四面山是黔北高原上大娄山的余脉，山高林密，峰奇水秀，四时有不谢之花，八节常青之树，就像一位盛装的仙女，是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两边的分水岭则是她伸出的

双臂，轻轻地捧着笋溪。笋溪流域地形属川东丘陵，地势南高北低，从海拔 1700 多米一路下降到 180 多米，逐渐从低山变成浅丘。

笋溪是江津的三大河流之一，也是江津的一条重要河流。最重要的河。其发源地大坡乡蜈蚣坝，海拔 1704 米。山北的水汇成溪流，在锣鼓洞形成一个小瀑布后进左奔右突，入小洪海、大洪海，涉响水滩，出林海湖，在宏伟的丹霞绝壁上形成名闻遐迩的华夏第一高瀑——一望乡台瀑布和土地岩瀑布，到龙潭湖小憩后，离开四面山镇，再过凤场古镇、中山古镇，穿青桐峡，入月沱场、嘉平镇、两岔场，越石龙峡后到达浅丘地带，从此水缓岸弯，九曲回肠，悠闲地淌过沙埂场、夹滩场，于仁沱镇洋满嘴携手綦江（梵溪），到顺江场就和长江会合去。

笋溪两岸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盛产稻米、小麦、高粱和茶叶、水果等农产品。著名的江津柑橘、江津米花糖和江津高粱酒都是笋溪水土所孕育。流域内人烟稠密，人文荟萃，著名古镇比比皆是，除上述干流边上的古镇外，还有先锋镇、李市镇、龙吟场、蔡家镇、紫云场、傅家场、柏林镇、东胜场、嘉乐场、清溪沟场等集镇。连接这些古镇的道路在明清时是川黔通衢，商旅不绝于途。笋溪傅家场以下可以通航，在公路未通时是沿河物资的重要通道。虽现在渝黔公路、渝黔铁路修通，但贵州很多物资仍由这通衢运到江津港后外

运。笋溪河流域还蕴藏有丰富的天然气，1958年发现了气田，在蔡家镇打出的气井至今仍在供气。

笋溪虽然流域不广，水量不大，在江河中名不见经传，但她却美得令人艳羡。两岸竹木郁郁葱葱，植被良好，河水清冽，纤尘不染。密密匝匝的竹林，竹梢掩映着清清的河水，水从竹根下流过，除了山洪暴发的几天，河水总是清澈见底，游鱼可数。春秋时节，竹林抽出嫩嫩的竹笋，长成新竹后高踞于林梢之上，显得格外挺拔。傍晚和清晨，河上会漂浮着淡淡的烟霭，站在高处一望，笋溪就像一条长长的纱带，从远处飘来，又向远处飘去。特别是夹滩段笋河，因地貌特殊，山丘不高而河流的弯曲度却特别大，由此形成了一种罕见的九曲回环地貌，演化出若干三面临水、相对高差仅数十米的美丽笋溪河风光。

笋溪流域除四面山外，还有紫荆山、清溪沟、中山、凤场、黄连坝、水口寺、飞龙庙等著名风景区，可谓移步换景，美不胜收。笋溪河流域雨量充沛，光热充足，气候四季分明，因而植被茂盛，到处山花烂漫，飞禽走兽随处可见。笋溪沿河乡镇，在有一定落差的地方筑坝截流蓄水，形成常年通航的湖泊，湖上碧波粼粼，两岸山花烂漫。

其实，笋溪也是一条古老的河。石龙峡峡谷幽深，传说迷人，“安安送米”、“二郎神赶山镇海”等神话故事扑朔迷离。据民国版《江津县志》记载：笋溪流经鲁家桥（紫云），

此处有七孔子。七孔子正在笋溪畔跃进桥及林家嘴对山和狮子桥一线。七孔实为崖墓之遗存，林家嘴对山有上下三层，跨进桥山上有十三个洞穴排成横行，离表干不高。这些均是汉代崖墓。它们是巴渝地区汉代崖墓的代表之一。在笋溪流过的一个较为平缓的地方，叫中咀，清初吴三桂之孙吴世璠在弘化三年（公元 1681 年即清康熙二十年）在此设立清溪县。统笋溪流域包括现在的江津等区域。可见当时这里是一片繁华之地。

笋溪是一条古老的河，也是一条年轻的河。更是一条即将焕发青春的河。江津区的有关部门，正在规划对笋溪的整体保护和开发。笋溪，又成了我们梦中的河。

（原载《重庆晚报》2013 年 1 月 28 日）

清溪河边奇特的“蛮子洞”

“蛮子洞”在巴渝地区的山溪江河谷并不罕见。所谓的“蛮子洞”其实是“崖墓”，它多是一千多年前四川盆地内土著“蛮夷”的悬棺、船棺墓葬习俗与汉人的土坑、砖石等椁墓葬俗形式相结合演变而成的一种新型的“岩椁”墓葬形式。东汉时这种墓葬形式最为流行，所以我们有时又将它称为“汉墓”。墓洞内多置有木棺或石棺或就在原生岩上打造有棺函，随葬的冥器多少不一，这是主人身份的象征。冥器是供墓主人“享用”的，因而在墓室里，大多营造出“琳琅满目、应有尽有”的氛围。

现在的绝大多数“蛮子洞”只是一个较规则的洞穴而已，它被改作它用已达上百年或近千年。它多并排成列开凿在临江、临河、临溪的陡峭岩壁上，或者在一片斜坡高坎上。形状犹如一个个“方口袋”。这样的石室墓洞作为古人终身后的“享堂”之所，其开凿是很是费工费的。按当时使用的工具来估算，一个“享堂”少则要费三五年，多则要花十多年。

在重庆市江津区蔡家镇与綦江区中峰镇交界处，有一条溪流叫清溪沟，当地人又叫清溪河，它从江津的清溪大堰流

出后，直奔下面一个叫三角塘的地方，与另一条叫蟠龙溪的小溪汇合，下流约半里就到板桥，在此溪河右面斜坡土壁上，兀立一尊巨大的石包，这石包对称断裂，断裂面平整如刀切，“蛮子洞”就在这巨石平整的断裂面上开凿而成。

一般的“蛮子洞”群都是开凿在连体岩石陡壁或整体的高坎斜坡上，而这里的“蛮子洞”群则是凿建在一尊巨大的石包的断裂面上，实属稀罕。巨石断裂面平整如刀削一般，显然不是人工而为，分析应是因雷电所击或山体泥石流滑坡相互冲撞造成的断裂。不过因雷雷电击断裂的可能性要大些，在江津等地就有人就将这类被雷电所击而断裂的巨石称为“雷打石”。

这巨大石包的断裂面呈三角形，顶高约 12 米，断裂面上开凿了 8 个“蛮子洞”，其中左边的 5 个已经成型，右边的 3 个洞还很浅，算是没有完工。想必是因为其他原因如山体滑坡不便以后安葬等而停止开凿。这 8 个“蛮子洞”每个宽一般在 1·5 米左右，深有的 3 至 5 米。外有虎、鸟、鱼等图案，墓顶规则分布首各种刻纹。

此外，在此附近约 300 米的一处悬崖峭壁上，另有四个“蛮子洞”，它与其它地方的“蛮子洞”没有什么两样。

在清溪河左岸公路边除草的 70 多岁的当地农民吴长禄说，他是江津县清溪沟乡叶家村人，从小就听过许多关于“蛮子洞”的说法，他小时读书“逃学”，常爬进“蛮子洞”里

“藏猫猫”。常听家里老人说这蛮子洞是躲“蛮子”的地方，“蛮子”是一种野蛮不化、残暴无比的吃人的人的，他们全身长毛，怪眼，见人就杀，所以当地人就开凿这样的洞穴躲“蛮子”——其实，我们知道这是众多当地人的误传。

这些在当地人中叫“蛮子洞”的汉代（后直至宋代）崖墓洞穴，经过上千年上百年的历史变迁，早已发生变化。这些洞穴在后来的历史中，曾被初始迁徙来此地的部落群体打开，或穴居或藏物。穴居在此冬暖夏凉，防水防兽。特别是到了清代，社会动荡，匪贼为患，一些山民打开这样的崖墓洞穴，举家住入，以防“长毛贼”。江津民间的《族谱》中，就有许多关于本族入川始祖率家眷躲进“蛮子洞”防“长毛贼”或“张贼”的记载。“长毛贼”其实就是清代入川石达开部的太平军。当地也有将“长毛贼”称为“蛮子”的，其实，这虽也是一种误传。



(原载《重庆日报》农村版 2014 年 4 月 24 日)

(庞国翔 摄)

江津太公古刹藏妙联

谈到江津的寺庙和楹联，人们很容易想到被称为万里长江第一大佛的江津石门大佛，和江津人钟云舫所撰的被称为天下第一长联的《拟题江津县临江城楼联》。至于太公山大佛寺和寺内的楹联，恐怕就鲜为人知了。

10 月的一个星期天，我们来到了江津、綦江、巴南三县交界处的太公山大佛寺。寺庙建在一个叫“半天云”的山垭里，这里一脚踏三县，海拔 900 多米，重峦叠嶂，山势陡峭，古木参天，绿荫覆盖，若是雨天，则云雾缭绕、难辨东西。乡志记载，该寺已有 180 多年历史，香火很旺。

寺院分上中下三厅，内有石佛 30 尊，有的高达 3 米。大大小小的石佛全部披红挂绿，色彩斑斓，其状或体态雍容、端庄娴静，或阔斧扛肩、青面獠牙，栩栩如生，惟妙惟肖。

太公古刹虽名不见经传，但这里的门联却妙趣横生。

初进寺庙，两幅对联恰到好处地描写了这里的风景。其一是——

修竹万竿朝圣地；

劲松一树参云天。

在上厅主堂大门上，一副对联使游人低头沉思：“诫尔恶棍歹徒革恶习除恶性恶有恶报知恶宜改，原我善男善女为善人行善事善始善终从善如流。”

在一尊叫“阎王判官”的神佛两侧，一副对联令游人扪心自问——

善者来临何须拱手？

恶人到此枉自叩头！

寺院中厅正堂上，一副对联向来此朝拜的善男信女乃至站立在寺内的菩萨们开了个玩笑——

佛应无私自开世界以来几许苍生谁苦海？

我该有幸质问菩萨在上谁乘紫气谒灵山？

最奇妙的是横额为“四面云山”的联子，该联用津、蓟、巴三县 16 个地名串为一体，对仗工稳，一气呵成——

圣灯照天台，香炉拱大佛，太公最悠闲，头戴顶子，
背靠双山，临蓟河以垂钓；

古剑斩龙头，薄刀削牛尾，老君真雅性，怀抱七星，
足濯九井，望瀛山而遐思。

这些楹联作者，许是山夫俗子，虽比不上钟氏长联，但仍不乏构思巧妙，用字精奇，富有哲理。

寺不在大，联好则灵。

（原载《环境保护导报》1997 年 11 月 22 日）

巴渝地名三对“奇联”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5月，巴蜀才子、江津秀才钟云舫因受“粮章案”牵连，被当局解押到成都府科甲巷提刑按察使待质所关押。他有冤无处伸，蒙冤受屈。三年被羁押，他悲怆无限，苦夜难眠，“苟以诗联自娱”，他在狱中冥思苦想，搜索枯肠，对出了当时有名的几副巴渝“残联”。他说：“藉以消遣，虽无甚意义，然可以志一时之痛……”

望江楼

成都望江楼在东门外薛涛井上。同治初，两广总督刘长佑入蜀“追剿”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刘登楼后出了上联——

望江楼上望江流，江楼千古，江流千古；

拔贡出生的刘总督（刘制军）出联是想为难巴蜀文人。果然，十多年无人应对此联。钟云舫在狱中想出了几副对句，如“寻春院里寻春怨，春院一层，春怨一层”、“朝天阙下朝天子，天阙万年，天子万年”等，但终感不贴切。突然，他想到早年成都府治（府衙门）有一小段时间不在成都城，而在城外的简阳县，于是，他对出“成都府外成都会，都府重

开，都会重开”的对句，此句相对，很是贴切。

望江楼上望江流，江楼千古，江流千古；
成都府外成都会，都府重开，都会重开。

“五行”对

据说，“烟锁池塘柳”一偶是三百年前南明文人陈子升《中洲草堂遗集》中的出句。属于特别限制的对联，五字的偏旁包括了金、木、水、火、土“五行”，因此下联也应有“五行”才能算对上。有“天下第一才子”之称的纪晓岚曾用“炮镇海城楼”应对。虽是以武对文，以豪放对婉约，且与上联的五行顺序一模一样，且楹联讲究平仄相对，第二字“锁”、“镇”同为仄声，第四字“塘”、“城”同为平声，犯了大忌，所以此对不值称道。正当钟云舫苦苦求索时，重庆城铁板街因煤油失火引发火灾，钟云舫顿生灵感，写出了“油烧铁板街”对句。

烟锁池塘柳；
油烧铁板街。

以后，钟云舫还想出了“檐挂煤油灯”、“霜堆炭洞银”等对句，但感觉都不如前句爽朗。

天然居

嘉定府乐山县凌云山顶有凌云寺，寺上有一名亭名曰天然居，上有一出联“客上天然居，居然天上客”，很是难对。曾有一个文人用“人过大佛寺，寺佛大过人”相对，但此对非常勉强，不是璧合之对。“上”、“过”、“然”、“佛”的平仄过不了关。“佛寺”和“居然”也无法相对，“大过”更无法与“天上”相对。

钟云舫是重庆近郊江津县人，他熟知重庆城里城外的大小地名。重庆的地名“弹子石”非常有名。钟云舫就用“花开弹子石，石子弹开花”应对，非常巧妙——

客上天然居，居然天上客；
花开弹子石，石子弹开花。

（原载《重庆政协报》2016年4月26日“春秋”副刊版）

石树相依的“树包石”



在江津南部山区蔡家镇，有一条小河叫清溪沟，它从清溪大堰流出后，向东直奔天马山脚下的叶家坪，在这里汇合一条由綦江县中峰镇谢家山流出的蟠龙溪。两条山溪在此交汇，形成一潭不大不小的三角状河塘，当地人叫它三角塘，这里就成了江津和綦江两地交界的水域。塘东綦江，塘西江津。同时，还有一条大路在此分岔，往东走綦江，往西走江津……

因这里是两地交界之处，又有水路和大路在此汇合，所以，在很早以前这里就是这个热闹的么店子，当时也又叫三角场，有上排街和下排街。江津和綦江边界上的山民都在这里赶场进行交易。也因为这里边远，又处于谢家山和天马山之间，所以解放前，这里曾是江津、綦江两县地下党活动的据点和联络站。

大约在 70 多年前的一天，这一带普降大雨，造成清溪沟和蟠龙溪山洪暴发，猛涨有溪水汇合到这里，将上排街和下排街冲垮。这里成了一大沼泽，两天后水才消退，从此这里不兴赶场了。当地老人回忆起这场洪水至今都感到害怕。

大水消退后，露出了一尊半圆状的巨石。原来这巨石是埋在溪边的泥土里的，现在洪水冲走了泥土，所以巨大的圆石才显露峥嵘。光秃秃的巨石上有一株很大的歪歪斜斜的黄葛树，让人感到差点就要被洪水冲走似的。人们都说，这树活不了多久，一是石上没有土，或者刮风下雨，它就会倒塌……

几十年过去了，这清溪沟和蟠龙溪也发过无数次的山洪，刮风下雨更是时常发生，但这巨石上的黄葛树依然如故，而且越长越旺盛，树干越长越粗。黄葛树裸露的根须呈网状的将半个巨石紧紧包裹，然后窜到石下的土壤里吸取水分和营养。根须如藤，紧缠石包，难分难解，这巨石因布满藤

根，如显有生命一般，真是树依石而生，石托树而立，石树互为一体，共同抵御风雨的洗礼和山洪的冲击。

“场”不复存在了，但“塘”还在。三角塘明显的标志就是这被当地人称为“石树相依”的“树包石”——黄葛树根须所包裹着的圆状巨石。

这尊圆状巨石的下端被埋进土里，露出的部分高约 11 米，直径 12 米。当地老百姓说，要 30 多人牵手才能将这圆状巨石合围。巨石上的黄葛树状如张伞，树叶有些黄，可能是营养和水分不足的原因，但仍显枝繁叶茂。树高 15 米左右，舒展开的树冠比这下面巨石还大，树干也要二人才能合围。

当地镇政府在树根上挂了《古树名木保护牌》，“保护牌”上的内容显示，保护类别：二级；树龄：250 年。原来这是有 250 年树龄的古树。我们相信，有了这“保护牌”，这圆状巨石上的黄葛古树将更会是风雨不拔。

（原载《重庆日报》农村版 2014 年 5 月 8 日）

江津王爷庙 庇佑两江口

波宽浪急的长江与左奔右突的綦江交汇于江津区支坪镇涂家村村北，这里就落得一个江口的古名。又因綦江古名樊溪，这里古名又叫樊溪口。这里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证明我们的祖先早在四五千年就在此居住。

“江口”和“樊溪口”这两个古名，现已不为多人所知，现在人管这两江交汇的地方为“王爷庙”，就连这的渡口也叫王爷庙渡口，渡口东对岸和北对岸分别是顺江和铜罐驿古镇。此地因此庙而得名，这里的“大王爷”香火旺，远闻名，其庙宇现在有断垣残壁。

长江与綦江在此汇合，形成一个约 200 米高的三角形台地，台下两江交汇，水流湍急，波涛滚滚。远去白帆，尽收眼底。《江津县志》记载：南齐永明 5 年（487 年），江州县移治樊溪口。又载：北周孝闵帝元年（557 年）置七门郡，领江阳（江津）一县，县治从樊溪口移。可见在 1500 多年前，这带是个古老的县城郡城。古人在此建庙，祀奉镇江王爷，祈望保佑渔子舟人平安，算是最好的地理上的选择。此有“一王镇两江，六岸共平安”和“脚踏两江口，眼观六岸

山”之说，是一处绝境佳地。

王爷庙上游附近长江南岸，是一有名的渡口青草碛，这里正是清代著名巴蜀才子、历史文化名人、被今人誉为联圣的钟云舫居所。清光绪八年（1882），35岁的钟氏乘船去省城乡试，船到王爷庙（上江口），舷头远眺，两江交汇，江宽水阔，纵观六岸，峦峰起伏。但见十二山峦，倒映江中，形成半边山，钟氏即作《舟过上江口见二十四个半边山作》一诗，诗云：平生最有看山癖，到此四顾空徘徊。

王爷庙是一座很古老的庙宇，据当地老人说始建于明末清初。国民8年（1919）当地绅士黄森之领头募捐进行培修。这里是个大码头，1944年以前，没有铁路公路，是水运长江进入贵州的必经地，船舶在此转入綦江进入贵州。四川运去的盐、布、纱、锅等物资和贵州运出的山货，途中都停靠在这两江交汇处的王爷庙岸边。王爷庙兴盛之时，每日往来木船和渡江递漂小船可达数百只，有旅馆、茶园、饭店、酒楼等店铺30余家，为过往商贾和香客提供服务，每天可销售肥猪三头。傍晚，船家上岸，南腔北调，热闹异常。远看帆樯云集，灯火耀眼，山环水绕，江雾茫茫。正是“白天千人拱手，夜晚万盏灯明”的江城江景奇观。

王爷庙正殿塑有王爷、川主、杜康三尊石刻神像，唯王爷最为威武，人称大王爷。山门殿塑有金刚力士像，前楼有万年台，供演戏之用。两边是书楼，供香客或绅士看戏。解

放后，正殿和戏楼被毁，现仅存山门殿一角和部分围墙（如图），庙门残存，门额依稀可见“中流砥柱”大字，两边是石刻门联——

当前列万仞苍尖滴翠流舟为是庙别开生面；

此地际两河交汇波汹浪诡仗吾神力挽狂澜。

钟云舫是一个非常爱看戏的塾馆先生，当年他常去江口王爷庙品茗听戏。受王爷庙僧人之邀，他曾为这里写过两副楹联，此两联后收入他的《振振堂联稿》中。

其一：

与斯人同在剧中，万变风云，居然海蜃岑楼现；

听大声发于水上，两江潏潏，勾起神龙妙乐来。

其二：

靖逆斩蛟头，奇功合奏钱塘舞；

驱风回鹧首，高唱还宜铁板声。

钟氏在联后的题注中特别说明：“为邑江口王爷庙戏台作，台有两江夹出。”

现留在断垣残壁上的的楹联写出了这里两江夹出，波汹浪诡，浪遏飞舟的壮观和渴求“镇江王爷”用神力挽狂澜、保民平安的心绪，此联不知是否钟云舫所撰，如若不是，想必也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才子所撰。而钟氏的两副楹联则寓意深远。第一联写王爷庙戏台上演出的剧中人多变的人生，恰是变幻莫测的海市蜃楼，与两江交汇后波浪冲撞发出的巨

响涛声相合，犹如龙神之妙乐。第二联称赞其“大王爷”斩恶蛟之奇功和驱风之德，献之以歌，献之以舞。既显雄浑豪壮，又寓有舟子船人、纤夫走卒的殷殷祈盼。



（王爷庙遗址 庞国翔 摄）

解放后，这里修通了公路和铁路，船只减少，王爷庙，静悄悄，多改为涂氏村民的住房，失去了当年的热闹与辉煌。但两江急流依旧，山头怪石如故，摆渡的小船泊在岸边几乎一动不动，很少有人来乘渡。大庙倒塌了，捣毁了，只有残留在大门石柱上的门联，好象还在述说着当年“大王爷”借仗神威力挽狂澜的威严。

（原载《对联·民间对联故事》2013 年第九期）

寻踪江津古代前后八景

江津，万里长江一要津，巴蜀大地一名城。钟云舫在“天下第一长联”《拟题江津县临江城楼联》中开宗明义，介绍其险关要塞和江城江景：“地当扼泸渝，控涪合之冲，接滇黔.通藏卫之隘。四顾葱葱郁郁.俱围入画江城……”江津不仅是历史文化名城，而且地灵人杰，钟灵毓秀。有一首由著名歌词作家石顺义作词，著名作曲家王锡仁作曲，著名歌手李丹阳主唱歌曲叫《拥抱江津》，在江津可谓家喻户晓。唱出了江津人的心声——

水几弯绕/流过我家门//这就是生我养我的家乡江津/山川织锦绣/沃土育甘醇/造就了豪爽的百代子孙//千古风流地/人文荟萃城/出了个顶天立地开国元勋//江津是个好地方（喽）/山好水美人更亲//一头扎进了母亲怀/深情拥抱拥抱我江津//深情拥抱拥抱我江津//

巍巍鼎山立/护卫江城人/这就是我思我恋的家乡江津//霓虹映晚霞/长路接彩云/焕发了古城的灿烂青//你也洒汗水/我也勤耕耘/都为了更加美好山水新城/江津是个好地方（喽）/山好水美人更亲//一头扎进了母亲怀/深情拥抱拥抱我江津/

深情拥抱拥抱我江津//

美不过千古风流地，看不够人文荟萃城。江津名山圣水，古有著名的江津八景诗，由乡贤江渊所所作。江渊，明重庆府江津县双龙乡人，进士。官至刑部左侍郎、工部尚书等。明宪宗成化元年，返津居石狮子街“江公享堂”府第，时 65 岁。宪宗钦书“北极勋臣府，西川相国家”对联赐予。江渊乐山乐水，车驴轿马，走遍三里山水。扶杖而歌，写出脍炙人口的江津前后八景诗，为本土士大夫和骚客推崇，也为喜山好水的草根津津乐道。江渊逝时 73 岁，是重庆市评出的先秦以来 100 名历史文化名人之一和江津 10 大历史文化名人之一。江津唯一上二十四史的历史人物。

江津前后八景诗流传 500 余年。每诗写一景，合 16 首。然笔者最近在文史资料的征集和整理中，发现前八景诗另存 8 首，即前八景每景著有 2 首，合为 24 首。此算一个新发现。前后八景现多为遗址遗迹，少数只留其名，踪迹难寻。

一：江津前八景（16 首）

（一） 鼎山叠翠

其一：

层峦叠嶂摩晴空，堆螺染黛谁为工。

苍松为远嶂暮烟，紫碧浅映春霞红。

见说嵩高降申甫，孔硕之章振今古。

愧我宦游空白头，归来与世曾无补。

其二：

几江形势甲川东，山势崔巍类鼎钟，

岚静天空青嶂耸，雨余烟敛翠华重。

钩帘对酒情偏逸，拄笏吟诗兴颇浓。

安得辞荣归故里，巢云直卧最高峰。

鼎山：江津前八景之首，时川东名山，位于城南一里许上，现江津中学至云辉丽都等一带，为江津出城第一山。海拔 200 米，形状如巨鼎高踞，自古是江津象征，呼应一湾浩荡江水，把古城掩映在青山碧水间的硕大平阶地之上。鼎钟耸峙，为津城屏障。现已被扩张的城市高楼所掩埋，名存山不存，无踪可踩。

（二） 华盖晴风

其一：

长风卷雨开晴昊，画障苍苔淡如扫。

远山不肯放修眉，黛色时时露织巧。

我家正在山中居，浮岚滴翠满阶除。

共诧深林隐玄豹，十年不出将如何？

其二：

华峰春晓雨晴时，岚气凝云起欲迟。

冉冉暂随林雾聚，飘飘还借谷风吹。

从龙出岫宁无意，捧日当天曾有期。

未拟为霖苏万口，山间草木已蕃滋。

华盖：德感街道境内华盖山，又名华盖槽，系缙云山支脉。从双溪老关口入境，至油溪店子大白岩止，绵延长江北岸。东西长 25 千米，南北宽 3—4 千米，是津北最大的林带。面长江拔地而起，像古代高撑在辇上方的华盖，故名华盖槽。两侧峰峦连绵，中部地势低洼，形成走廊似槽状。主峰为原临峰乡感山寺，海拔 767.4 米。

（三） 龙门春浪

其一：

蜀天春暖雪山消，岷江千里飞洪涛。
夜深忽见神鱼化，狂风鼓浪龙门高。
舟人渔子奔回顾，倚棹怵惶恐难渡。
不知变化在须臾，人间别有青云路。

其二

蜀江春涨涌波澜，泛滥龙门两岸宽。
羊角风生滩正险，峨眉雪化水偏寒。
鱼龙泼刺飞腾远，舟楫沿流济渡滩。
谁解扬鬢三汲去，早乘雷雨拜金銮。

龙门：即龙华镇长江之龙门滩，滩险水急。乾隆本《江津县志》载：因滩水凶险，蜀王命工凿石梁为门，乡人以江水如巨龙穿门而过，因称龙门滩。历代多有题吟，唐代著名诗人陈子昂《龙门峡》云：龙门非禹凿，诡怪乃天功。西南

出巴峡，不与众山同。长窈画五里，宛转若嵌空。伏湍煦前石，瀑水生轮风。流动无昼夜，喷薄龙门中。潭河势不测，藻葩垂彩虹。

（四） 鹤峰霁雪

其一：

遥峰欲翠留晴雨，素练平铺渺千里。
并刀剪水随风飘，乱落杨花飞不起。
骑驴仙客来探梅，霜蹄个个翻银杯。
冻鞍卧倒跨黄鹤，乘风直上琼瑶堆。

其二：

积素凝华望不穷，参差埋却翠芙蓉。
高丘一夜成琼岛，老树千年化玉龙。
银海忽惊红日上，丹崖疑被白云封。
梅花开放知多少，雅称诗翁策短筇。

鹤峰：即鹤山坪，上有仙鹤池，系邑封御使杨济之居此。分上中下三坪，呈东北西南走向。坪上原有双石麻柳两乡。北面陡峻的山崖下是波宽浪急的长江，南面崖下系笋溪河。东西两面陡峭险峻。在 11 处险峻崖沿筑有严实城门，形成山寨，故又称鹤山坪大寨，为津城保障。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陈独秀先生来鹤山坪居住，并逝于此。

（五） 古寺晓钟

其一：

瞿昙夜半吼长鲸，天风吹落云间声。
几多逐利求名者，匆匆车马奔遥程。
藪屋谁知有贤士，寤起烧灯究经文。
满朝却听长乐起，肥马貂裘艳青史。

其二：

谁扣蒲牢向夜分，通城烟火动氛民。
催残银海千家月，散撤瑶空几片云。
游客梦回思远道，老僧出定厌声闻。
缅怀骑马趋长乐，三十余年颇效勤。

此诗所云古寺有两处，一在县南门外古塔寺，即今天长风社区原长风医院塔坪路处，已名寺皆无。一是德感街道高坪村石佛寺，即江津城对岸约一里许的石佛山，山有石佛寺，有巨蟹泉，有摩崖造像，刻于宋明两代，共四龕二十八尊。其中 20 尊保存完好，横排于长 20 米，高 3.5 米之岩壁。

（六） 马骧春色

其一：

丹崖碧嶂如排列，乾坤秀气钟奇绝。
一夕东风送雨来，烧痕幻作青青色。
有时挂笏当轩中，拖蓝染黛看无穷。
只恐春光易衰歇，碧桃零落胭脂红。

其二：

隔江山势耸亭亭，宛转浑如列画屏。

膏雨染余岚气碧，软风吹散烧痕青。

何须扼险夸天堑，已荷生贤表地灵。

且爱山中多禅侣，携琴时复到林垌。

马骠山：有两处，一今德感街道高家坪山。在江津县城对岸江北。其山萦曲，形势峭拔，依江而立，周长三里，间呈坪地。传因骠骑将军马邈葬于此而得名。另一今天五举沱去鹤山坪上安定门处马骠嘴，此处又名马骠山。地方文献记载，北宋乾德五年(967),江津分设鼎山县，县治曾一度迁于此，并置马骠镇。此诗所指应为德感街道马骠山。

(七) 仙池古迹

其一：

骑鸾仙子无消息，蔓草凝烟带化碧。

山桃野杏浪迎春，怨紫惊红几时毕。

池边不见香草楼，空遗初月挂帘钩。

芙蓉寂寞含霜老，枯荷战雨鸳鸯愁。

其二：

何年遗迹在林丘，尚记双成此地游。

笑引碧池开作镜，戏拈香草结为楼。

春花秋月还堪赋，暮雨朝云空自愁。

欲向高唐重想像，才非宋玉更夷犹。

仙池：即今先锋镇仙池坝，是江津最早有文字记载的神话传说地。宋《太平广记》云：渝州仙池，在江州南江津县

界，岷江南岸。其池周围二里，水深八尺，流入岷江。古老传说，有仙人姓然名独角，以其头有角，故名。自扬州来居此，池边起楼，聚香草置楼下。独角忽登楼，命仆夫烧其楼，独角飞空而去。因名仙池。现有石崖一所，向岷江而见在。此系江津肥沃富饶之地。

（八）江心砥石

其一：

老龙脱骨当鸿濛，六丁移下冯夷宫。
屹立中流作砥柱，百川倒障皆朝宗。
想当神禹工疏凿，波涛奋卷风雷恶。
巨电斫断驱山鞭，乾坤从此开峭腴。

其二：

江心砥石激奔湍，砥柱中流障百川。
每视低昂觐水候，还将出没验丰年。
根同海底千寻玉，形比峰头百丈莲。
一自神功疏凿后，独留万古镇风烟。

江心砥石指江津莲花石，又名跳蹬石。位于江津主城滨江路东段外长江主航道北侧江中，北迎浒溪，南对东门，由36块大小礁石交错组成，礁石高180.89米，全露面积可达800余平方米。水从西来，浪花翻滚，浩浩荡荡，气势壮观。由远望去，形如盛开在碧波之中的莲花，故名。长年淹没江中，难以显露，只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枯水年份才露水面。

是长江上游重要的水文题刻，为“川江七大枯水题刻”之一。

二：江津后八景（8首）

1、金井寒泉

传闻孝女购灵湫，投落金钗影未收。

三尺冷涵平地雪，一泓香湛半山秋。

濯纓顿觉尘器净，入口方知病疾疗。

好酿黄流供大脯，未应专美在西州。

此景指两处，一指金钗井，在江津城区东门转盘至原县委莲池之间的武城山下中段，有一小庙叫金钗寺，寺门对面是一古井名金钗，井泉清甘，甚旱不竭。今名存井无，遗迹难寻。另一处指龙华镇罗坝场东侧周望山下的金钗影。传说有孝妇周氏，婆病渴思泉，时旱，妇徘徊周望山下，遇仙拨钗掷地，泉出，婆饮泉病愈。今乱碛中有一水凼，隐显金钗一双。

2、石笋凌云

昭堯玉笋插云烟，万丈丹梯未可缘。

屹立数峰高拔地，孤撑一柱上擎天。

盘根迥出鸿蒙外，落箨原从造化先。

拟驾飙轮凌绝顶，徐看海水变桑田。

即石笋山，有两处。一于石门镇永安村与永川区柏林镇交界处，有雌雄石笋双峰相峙，雄属永川，雌属江津，海拔

700 余米。青峦叠翠，云雾缭绕。峰顶有佛寺、道观、城墙、城门等遗迹。山涧清泉湖泊与绿荫相印生辉。另一说在江津东二百里处，平地一石突起二十余丈，有石磴可登至顶。顶平可容数十人。上有石刻棋枰坐榻等。此处具体方位无法寻觅。

3、古佛禅院

招提高耸与天邻，夕梵晨钟远近闻。

出洞龙翻千嶂雨，上楼僧踏一梯云。

巉岩古记何年刻？深院名香尽日焚。

安得投闲居此地，北林猿鹤想同群。

古佛禅院有二，一在江津北部约 30 里原双河乡下狮桥与十八洞之间的长河扁下的四桥坎上，此处原有地名尽废，名无寺无，无法寻址。二是在江津南部山区中山镇之太和村，又名嘉乐村。在该村一土地岩下，有庙原名三府庙，当地群众又称古佛寺，古时禅院深深，香火甚旺。今只留下两三陋宇。

4、南江寓钓

夔溪遥合大江流，浩荡烟波送白鸥。

暮雨半衰移浦内，夕阳一线挂滩头。

鱼穿柳絮好沽酒，竿拨桃花懒系船。

圣代只今召隐逸，何须频下饵文钩？

南江又名綦江，古名夜郎溪、夔溪。长江右岸一级支流，

全长 231.3 公里。发源于贵州省桐梓县，由南向北，左奔右突，最后在江津区顺江口汇入长江。江水清碧，浩荡烟波，风光旖旎，特产柑橘。明代曹学佺《蜀中名胜记》载：“綦江发源于夜郎，作苍帛色，故名綦。昔南平军之长官司也。”古为重庆府重要水隘。

5、石羊晚渡

落日苍茫古渡头，几人相聚立沙洲。

萧条行李无知己，浩荡烟波少济舟。

隔岸晚吹明夜火，谁家寒杵动清秋。

此时名利心虽壮，风雨何堪起暮愁。

石羊，在江津区油溪镇石羊村境，面临长江，是有名的古渡口。文献载：北宋江津辖七乡十四镇，其中有一大镇石羊镇，即为今天油溪镇，其核心地域即位于今之石羊村。发掘有石羊、石马等文物。疑似三国时乐城古县城池之地。

6、栖清书院

春风崖畔草青青，苔藓模糊篆刻平。

壮士已随龙虎逝，剑光犹傍斗牛横。

三馀事业今安在？一代文章空有名。

桂影婆娑明月夜，咿唔疑有读书声。

栖清书院即今德感街道圣泉寺，位于江津城长江对岸北约 12 千米。这里古木葱茏，清泉淙淙，寺后石岩上遍布题刻，江渊幼时曾在此刻苦攻读诗书。几年后，他直接从书院

进京赴考，一举金榜题名。江渊功成名就，十分感谢书院栽培，曾捐资维修书院，今日圣泉寺遗址里尚存。

7、浒溪烟雨

人家比屋临溪渚，翠树层层霭烟雨。

放舟拟作潇湘游，玄圃沧洲渺何许。

推窗坐对心神娱，彷彿缃缣开画图。

几迴误认辋川曲，落红飞絮春模糊。

浒溪，原江津县德感区双龙公社内的一条溪河，在江津主城区长江对岸注入长江的，此处名浒溪口。双龙公社曾设浒溪大队，队因水名。队域耕地 823 亩，1819 人。现溪在名在队撤。现属江津滨江新城的核心开发区之一。

8、莲塘夜月

方塘弥漫侵江城，云影天光滉漾生。

影湛碧波千顷浪，光涵孤月半轮明。

芰荷香泛琴樽润，杨柳风微泮壁清。

安得坡仙同载酒，细听一曲洞箫声。

莲塘，即莲花池，今江津城区东门外原县委机关驻地。池广三十余亩，遍种莲花，杨柳依依。此是古代江津城百姓外出郊游的最佳选择。池中建有一楼，名水心亭。莲池岸边，有一个遗爱祠，百姓称为遗爱寺。是津城最重要的历史遗迹之一，“白屋诗人”吴芳吉和“联圣”钟云舫等都题有诗联。现池无，改建遗爱池商圈。

(原载重庆《市政园林》杂志 2014 年第二期)

第二章：事件留痕

古代江津地域最早的县——乐城县

在今江津这块土地上，古代最早析置的不是江州县，而是乐城县。江津地域至今有建县历史 1791 年。如算上后来撤县设市设区这段历史，有 1810 年。江津不愧为历史文化名城。

东汉末期，全国建置分为 13 个州，这相当于今天的省。州下设郡，相当于今天的市或地，郡以下设县。时所设益州辖境大概为今四川、贵州、云南及陕西汉中区域。益州下设 9 郡，包括：汉中郡、巴郡、蜀郡、广汉郡、犍为郡、越隰郡、牂牁等（读“脏科”音）郡、益州郡、永昌郡。时江津地域属益州巴郡。

到汉献帝（刘协）建安六年（201 年），天下大乱，益州牧刘璋将巴郡改设为 7 县：江州县（重庆治所在江北），枳县（涪陵），临江县（忠州）、平都县（丰都）、垫江县（合川）、常安县（眉山）、乐城县。乐城县就是现在的江津一带，但辖地比现在江津地域大得多。这是历史上在现在的江津区域内单独设县的开始。

到了建安十八年，张飞率兵由湖北荆州入蜀后攻占巴郡，占领了江州（重庆）。不久，刘备在成都称帝，建立蜀汉。三国鼎立形成，但乐城县仍不变。刘备死后，胸无主见的后主刘禅在延熙 17 年（254 年）搞改革，调整蜀国行政区划，将乐城县撤销，乐城县地回归到巴郡原江州县（重庆）辖区。乐城县在历史上只存 54 年时间。

乐城县治在什么地方呢？此有两种说法：一说在今天的油溪镇，另一说在今天的龙门滩镇。

史学家刘琳教授认为：乐城县内有乐城溪，乐城溪就是发源于今天璧山县南流的璧南河。乐城县治在璧南河尾，即是今天的油溪镇（见巴蜀书社 1984 年版《华阳国志校注》56—71 页），《方輿纪要》卷六十九云：江津县西三十里有乐城溪，注入大江。刘琳教授认为：从地理上看，这乐城溪即是今天的油溪河，故乐城县县治应该在今油溪。

史学家邓少琴则认为：江津最古老的乐城县治在龙门滩。《方輿纪要》记载：江津县城西有乐城溪，流入大江，因有乐城溪，县因此得名。最早的《江津县志》（明朝中期版本）中，有一幅江津地图，地图中编制有乐城溪。这是一条小溪，在今天的龙门场附近注入长江。乾隆版本的《江津县志》又记载：乐城滩在龙门滩下。这与明代的《江津县志》中的地图吻合。虽相隔 200 多年，但图文一致。由此可见，乐城县治应该在龙门滩。

常说的江津县历史有 1500 年，这是不准确的。江津县是隋开皇（杨坚）18 年（598 年）由江阳县改名而成，至今 1413 年。如算到 1992 年江津撤县设市，江津县历史存 1394 年。但从建安六年益州巴郡在今江津地域内设乐城县治始，到 1992 年江津撤县设市，江津有建县历史 1791 年，加上后来的市、区这段历史，有 1810 年的历史。

（载《重庆政协报》2012 年 9 月 7 日 4 版 原名《江津史话两则》）

此江州非彼江州

许多介绍江津历史沿革的书都这样说：江津古为巴国地。秦置巴郡江州县。西魏改江州县为江阳县。隋开皇十八年改江阳县为江津县，至今有 1500 多年历史。其实，这种说法是不对的，至少是不准确的。

在巴蜀史上，曾经一前一后有过大一小两个江州县。此江州非彼江州，如不甄别，就会混淆。

先说大江州县：

秦在周赧王元年（公元前 314 年）析置巴郡，巴郡郡治先在阆中县，后迁江州县。即是说在这时就有了江州县。江州县大致管辖今重庆城区和近郊包括江北、璧山、永川、江津等在内的诸区县范围。江州县治先在今重庆市渝中区解放东路一带，后迁江北刘家台。这是所谓的大江州县，巴蜀史上的第一个江州县。

到南北朝时期，南朝相继为宋，齐、梁、陈四个朝代。齐灭了宋后，巴郡改为巴州，巴州所辖江州县管辖地域未变，维持了 8 年，到南齐永明五年（公元 487 年），江州县改为垫江县，大江州县至此结束。大江州至少存在 170 多年时间。

再说小江州县：

大江州县改为垫江县后，为了加强管理，随即新析置了另一个江州县，这个县与前江州相比，管辖区域小得多，大致是今天江津区域或更大一些。我们可称其小江州县。小江州县治由重庆迁至江津与綦江（古名樊溪）交汇的樊溪口，即今天的顺江场。

江津地域古称江州县从此开始。在今江津地域内建江州县距今已有 1524 年历史。值得一说的是这个县名有点反复，梁武帝晚期发生侯景之乱后，巴郡被西魏所据，西魏将巴郡改为楚州，楚州管辖三郡，其中有个七门郡，郡治就在今江津县七门滩，时江州县改为江阳县，小江州县只存在 66 年。七门郡只管理一个江阳县，江津地古称江阳就此开始。557 年即北周孝闵帝元年，县治从樊溪口迁到今天的几江津渡，仍称江阳县。

隋朝建立，开皇（杨坚）18 年（598 年），改江阳县为江津县，仍隶属巴郡，江津县得名从此开始。《隋书》曰：巴郡，统三县：巴、江津、涪陵。又云：江津，旧曰江州县，西魏时改为江阳，置七门郡，开皇初郡废，十八（598）年，县名改焉。

可见，从析置江津县起，到 1992 年撤县设市，江津县历史存 1394 年。

(载《重庆政协报》2012年9月7日4版 原名《江津史话两则》)

江津曾置鼎山县

江津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地区。在今天江津这块土地上，古时的行政区划几度变迁，县名也几度变化，曾析置乐城县、江州县、江阳县、江津县等。这些县名大多为今人所知。但在这块土地的历史上，曾析置过鼎山县，这段历史就鲜为人知了。究其原因，一是这期间县内没有发生重大历史事件，二是这块土地上析置鼎山县的时间太短。

在西魏初年（553年），县治（县城）在长江与綦江交汇处的樊溪口的江州县，改名为江阳县。5年后，即北周孝闵帝元年（557年），江阳县治（县城）从樊溪口迁到了今天的几江。江阳县先由郡治设在县内贾坝沱七门滩的七门郡管辖，后由渝州管辖。几江半岛是长江上的一个重要津渡，于是在开皇十八年（598年），江阳县改名为江津县，这是最早析置江津县的时间，也是江津县得名的时间，至今有1413年。

赵匡胤于公元960年发动陈桥兵变后，取代后周建立宋朝，五年后平定巴蜀。为了加强统治，在行政建制上作了较

大的改革，形成了路、州、县三级行政建制和在路之下建置府、州、军等。加大中央对地方的控制。重庆升为府后，江津隶属重庆府。不久，又将万寿县和南平县并入江津，使江津县域更为阔大。时江津县属剑南东川。为了便于管理，朝廷令江津县治（县城）迁往马鬃。马鬃在何处？有三说：一是在今珞璜镇的马鬃场，二是在今天江津对岸的马骝山，这里又叫高家坪。三是在今天五举沱上的马骝嘴。

江津县治（县城）迁离几江后，出现了许多行政管辖上的真空，于是朝廷析置了鼎山县。置鼎山县后，县治（县城）在什么地方？管辖区域是那些？这也有两种说法。

《读史方輿纪要》卷六十九曰：“鼎山在县治南，有三峰鼎峙。《志》云：宋尝置鼎山县。今正史不载。又治北隔江一里有石佛山，与马鬃山相连，又县西北十五里有华盖山，皆高耸。”这段话是说：北宋时期，鼎山县的县城就在当地几江城郊的鼎山或附近的某个区域内。鼎山县管辖的区域主要指现在江津长江以南的包括綦河流域和津南地区或稍作延伸的地区。

另外有一说法，鼎山县当时管辖的区域很大。包括现在江津长江以南和綦河流域的地区及现在綦江、万盛和贵州省的桐梓等地区。县治在现在桐梓县城附近的鼎山。《桐梓县志》云：“县境内，设播州城于今桐梓县城南郊，隶于南平军。旋改城为播州县，仍隶于南平军，其后，改称鼎山县，治迁

于鼎山城，后将鼎山县改隶复置的播州安抚使。……元代，桐梓地先为鼎山县。后改播川县，治设鼎山城，属播州宣慰使司。”綦江、万盛等地的地方史志都有这样的说法，当时这些地方（也包括江津）属于鼎山县。

这种说法是有依据的，但在时间上有些不相符。江津地设鼎山县的时间在北宋乾德五年即 967 年。20 多年后原江津县治又从马鬃迁回几江半岛，这片地区又回归江津，即是说江津地析置鼎山县或属鼎山县的历史只有 20 多年，而桐梓置鼎山县是北宋宣和年（1123 年）始至元朝至元十六年（1279 年）废，中间相差 150 多年。我们只有这样理解：今江津区域内的鼎山县辖区 20 多年后恢复回江津县后，綦江、万盛、桐梓所置的鼎山县依然存在并在后续。

江津析置鼎山县，虽只有 20 余年时间，离今已 1044 年，但这仍是江津地方史上的一个链点。20 多年，长河一滴，时间太短，所以在正史上很少有记载。难怪《读史方輿纪要》转述说：“《志》云（江津）宋尝置鼎山县。今正史不载。”

（载《重庆政协报》2012 年 2 月 24 日）

江津古时寿官和寿星

2012年6月，江津被授予为“中国长寿之乡”。江津是重庆唯一的中国长寿之乡，而且是全国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百岁寿星分布最均衡的中国长寿之乡。到2015年12月截止，在江津全区150万人口中，百岁以上寿星就有129位，占全重庆市10%以上。

巴渝名邑江津真神奇，古时寿官多达五人，寿星特多。

古代江津出过五名寿官，这也是一个很特殊的现象。明清两代朝廷钦赐寿官本来就少之又少，江津不但多，出了五名，更令人拍案惊奇的是这五人中，有四人出自郑氏一门。郑氏父子四人皆被朝廷钦赐为寿官，当时天下皆惊。

寿官是明清时代的一种官名或叫官衔。是在明清时代的养老制度中，由地方推选并经皇帝恩诏颁旨，授予长寿老人冠带的一种名誉头衔。按照明清时代的制度，这是个虚职，是一种荣誉，但有品阶。主要是为奖励长寿并“德行着闻，为乡里所敬服者。”

寿官有官帽和官服，主要是八品或九品，也有七品、六

品和五品的，但为之极少。寿官虽有官帽和官服，但没有爵位。受赐年龄最初为百岁，到明万历以后降为七十岁。不同时期，对年龄、选择条件、奖励物品都有所不同。由于寿官称号只在皇帝恩诏颁布时才得以下旨恩赐，所以整个明朝三百多年里仅授过 19 次。寿官的条件主要是年龄，其次是“德行著闻，为乡里所敬服者。”明朝在很长时间里，人们平均年龄只有三十多岁，要活到八九十岁，很难，也很少。当时一个县，七十岁以上的人多只几十人；而八十岁以上的就更少。寿官通常每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评一次，加上要求特严，评选流程很复杂，并且常常涉及很多因素。首先要经过乡里、同宗之人、士大夫推举，再由官府衙门推荐，再参报朝廷评审。

明朝三百年，全国累计只有几百人被钦赐为寿官。所以，被评为寿官是一个县都很荣耀的事，对被赐者来说，殊属难能可贵。江津有五人被明代朝廷钦赐为寿官，而五人中，郑氏一门四寿官，可谓全国罕见。

光绪本《江津县志》“卷六·明”记载：“郑永宽，字大亮，宏治（弘治）戊申大旱，宽出粟壹千石赈贫乏。奉恩授七品服。十七年，复旱，子越宗、泰宗、兴宗各出粟柒百石助赈，三人俱恩例冠带。邑令王仪匾其堂曰世义堂。进士邹双山有诗赞。”

清末《江津乡土志》“卷三·地理”篇曰：“郑氏世义祠，

在县东南一百里黄泥场，内供明五品寿官郑永宽父子。奉勅建祠。”郑永宽是江津县骆駮山黄泥场人。他及三个儿子郑越宗、郑泰宗、郑兴宗都被明朝恩授为寿官。

弘治为明朝第九个皇帝明孝宗朱佑樘的年号。明宏治（弘治）年间皇帝有两次恩诏颁布：一是弘治五年，一是弘治十八年，郑永宽是弘治五年被朝廷恩授这长寿之官的。

《孝宗实录》六十一卷载“弘治五年三月戊寅册立皇太子诏”曰：“民年七十以上者，与免一丁侍养。八十以上者，有司给与绵布二匹、绵花二斤；九十以上者，给与冠带荣身；仍一体优免一丁侍养。”显然，江津骆駮山人郑永宽属“九十以上，给与冠带荣身；仍一体优免一丁侍养”者。

郑永宽的三个儿子郑越宗、郑泰宗、郑兴宗中是弘治十八年被恩赐为长寿之官的，此时，其父郑永宽已驾鹤仙游。

《武宗实录》卷四载：“弘治十八年八月丙辰上两宫尊号诏”曰“军民之家，有年七十以上者，许一丁侍养，免其杂泛差役。八十以上者，仍给绢一匹、绵一斤、米一石、肉十斤；九十以上者，倍之。其男子八十以上，为乡里所敬服者，加与冠带，以荣其身。”显然，骆駮山人郑永宽之子郑越宗、郑泰宗、郑兴宗属“其男子八十以上，为乡里所敬服者，加与冠带，以荣其身”者。

清代著名诗人，进士邹双山曾题诗赠赞郑氏父子四人。

诗曰——

熙攘尘情计利真，君家尚义许谁伦。
父曾红粟举邻火，子更奇资拯世沉。
簪笏当年承眷宠，箕裘奕叶必峥嵘。
恩膏此际民难缓，漫联与情颂德音。

郑氏家族在西湖镇的骆駮山黄泥场一带是大姓宗族。黄泥场花蛇凼有一宗祠，曰松竹祠，是元末由江南徙蜀的郑氏族人的祠堂，故又称郑松竹祠。祠后有诰命夫人墓。郑氏族人来此已 700 余年。郑氏族人的先祖曾同居十世，奉旌义门。迁蜀的郑氏族人于黄泥场所建祠堂，则称世义祠。綦河岸，郑氏家族共有五座祠堂，世义祠为总祠，松竹祠为分祠。难怪明代的江津知县王仪对郑氏赠匾曰“世义堂”。

江津县另外一个被明朝恩授为长寿之官的是王朝佑。光绪本《江津县志》“卷六·明”记载曰：“王朝佑，字廷杰，太学生，邑大旱，输米二百石，赈济。奉恩赐寿官。”对此王寿官，还没有发现其他新的文字材料。

其实，古代江津就是长寿之乡。在战祸连绵的古代，偏于西南一隅的江津，环境安定，少有战争，历为避乱之境；江津历史上五次移民，来自五湖四海的人群之间的通婚，使得后代具有“远缘杂交”的遗传优势。江津自古以来多寿星，清道光《重庆府志·耆寿》记载各县长寿老人及百岁寿星人数。巴县 5 人，其中百岁 3 人；江津县 10 人，10 人均为百岁以上；长寿县 4 人，其中百岁 1 人；荣昌县 3 人，其中百

岁 1 人；綦江县 3 人，其中百岁 1 人；铜梁县 8 人，其中百岁 1 人；安居县 6 人，其中百岁 1 人；璧山县 9 人，其中百岁 6 人；定远县 5 人，其中百岁 3 人；江北厅 2 人，其中百岁 1 人……

清代三部《江津县志》以及《江津县乡士志》和民国版《江津县志》均对江津长寿老人进行记载。在封建社会里，长寿老人入史入志除了本身要长寿外，还要有其他的标准。光绪版《江津县志》的《耆寿》、《续·耆寿》篇，记载了当时江津“耆寿”者 30 人。这是当时最多的县之一。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江津真有些与众不同。江津人的寿命普遍较长。江津山之魂、江津水之韵、江津风之淳、江津物之珍，孕育了江津这个长寿之乡。大山大水美江津，历史悠久孕江津，人文荟萃育江津。江津能成为长寿之乡，有多种因素，通常说江津是生态之乡、是富硒之地、是实力之区、是和善之城、是养生之域，另外医疗卫生助长寿，体育运动助长寿，文化活动助长寿……总之，江津大山大水，气候宜人，水土养人；得山水之利，物产丰富，犹以山川山水为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江津地域特殊的历史、地理、人文条件，造就了这和谐包容的社会环境，淳朴厚善、尊老倡孝的民风民俗，豁达乐观、宽以为怀的人文心态……所有这一切，成就了长寿江津的源远流长。

（原载《 》 年 月 版）

刁化神屯兵骆駱山对峙三方

明朝末年，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崇祯十七年(1644) 五月，农民军李自成攻占北京，但北方清军迅速入关，很快打败李自成占领北京，大清迁都北京，明朝主体灭亡。但是，明朝一些逃到了南方的宗室遗臣建立了一个与大清相对抗的南明政权。这年张献忠再度入川攻占成都，并在成都称帝，建立了“大西国”。

大西国辖今重庆、四川大部分地区。但巴蜀州府及地方武装根本不承认张献忠这个“皇帝”，只承认明朝摇摇欲坠的延续体——南明政权。残暴和气恼的张献忠就来了一个“血洗四川”。当时有一句话叫“张献忠反四川，杀得鸡犬不留”。巴蜀百姓对此非常恐惧，纷纷携家带口逃到贵州山区等地躲避。江津知县梅运昌，为忠效明朝旧君，率江津军民固城严防，抗击张献忠部。梅作为父母官，日夜操劳，勤练兵丁，囤粮固城以严防死守。六月，张献忠为攻占浮图关，率精骑在铜锣峡口南岸的大兴场登陆，由小道西进，绕过重庆城疾驰约 70 余公里，直抵江津县城。时“江津附近其他县令或开门迎降或闻风而逃无人抵抗。”只有江津，全民皆

兵，奋力抵御，坚守日久，终因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弹尽粮绝，以至江津城破。知县梅运昌战死。津城破后，重庆城也被攻破。

此时，包括江津在内的巴蜀地区，有三大政权：中原的满清政权；明朝宗室和遗臣败走南方后建立的南明政权；张献忠在成都建立的大西政权。巴蜀大地，可谓你挣我夺，你拼我杀，混乱不堪，百姓遭到屠戮。

刁化神本是江津县油溪镇人。系江津刁氏入川始祖、湖州知府刁时范第九世孙。他是明崇祯戊辰进士，作户部郎，守荆南施归道。因时政局动荡，社会衰乱，就辞官回到江津。虽退官回乡，但他在江津组织百姓修浚城池寨堡，以卫桑梓。正逢张献忠攻破江津和重庆，在成都建立大西国，眼看明朝崩塌，刁化神便借助原为明朝命官，能带兵打仗的力量，在江津起兵反抗大西政权。作为明朝旧臣，刁化神不愿失去大明朝廷，他树帜起兵，既要反满清，又要反大西，图以复明。

刁化神在江津，避实就虚与强大的张献忠部队搏杀。最大的成就是袭杀了张献忠委派的新知县。他派出袁某屯兵县西三十里属思善里九都的油溪镇，这是他老家，这里一时旌帜占道，兵窜马走。

刁化神此时只有人马数千人，而且多是收罗的当地残弱武装人员，纪律松懈，犹如乌合。他们不懂排兵布阵，不听指挥，不讲军规兵纪。更为愚蠢的是这支队伍从帅到卒，大讲巫术道法，举止鬼怪神秘，因而人称“神兵”。

此时，南明政权关防十三隘将，受南明总兵曾英等自叙永府统一节制。江津属十三关隘之一，曾英派兵屯驻江津，引起刁化神不满。曾英、刁化神都属明朝旧臣，但此时天下大乱，都想兼并对方，壮大自己。曾英属南明正统，兵强马壮，一进驻江津，刁化神部就望风而逃，曾英不断收罗刁部。

刁化神有自知之明，他不能与曾英火拼硬打，只好悄然隐匿。他带着精悍的一班人马到了江津南部蔡家岗、月沱场、龙门漳等地，坚壁清野，暗中组织粮草，暗中招兵买马。

此时的巴蜀大地，一片混战，各股反清势力在相互火拼，各股反大西政权武装，在相互争杀。张献忠的大西军队更是残忍无比，蜀中窜弑无穷，将巴蜀折腾无宁，虎叫狼嚎。此时的江津更是四处荒凉，哀鸿遍野。狼烟时起，尸横遍野。

刁化神队伍又渐渐拉大，他也加入混战之中。他急于找到一块可进可退的根据地。他看准了县东南九十里属杜里四都的骆駉山。于是，他抢占领了这个地方。

此时，南明参将曾英、贵州遵义守将王祥正觊觎着刁化神的人马，想再次吞并他。刁化神除了要对付满清军队外，还要对付大西军，同时还要对付曾英、王祥等。一些地方武装时不时也对他进行厮杀。。

骆駉山地势险要，连接江津、綦江两县，有充足的后方补给优势，是理想的屯兵之地。刁化神在骆駉山亮出“反满清、反大西、复大明”的旗帜。他大兴土木、修营造寨、加边筑隘，天天打造兵器、练兵整队，骆駉山营旗飘飘。

1645年，南明曾英移兵渝城之南岸，这时南明王朝一盘散沙，诸隘将无法统摄，大家只好推举曾英为统帅。

曾英以南明统兵的身份找到南明遵义守将王祥，欲借粮款，但王祥不愿，并从中构衅，使曾英与总督王应熊之间产生隔阂。于是，王祥、曾英、王应熊互不联协并相互猜疑。

王祥为遵义南明守将，以勇悍著闻，为九围子隘官，他本是綦江县永兴场人，在骆駉山东南坡之下，算刁化神“老乡”，他对毗邻江津很熟悉。他驻兵遵义、桐梓、綦江等地，其兵马扩张到綦江与江津交界的笋里石龙峡一带（今笋溪河两岔与蔡家镇交界处），这实际上也是骆駉山南脚。王祥还在阳照山附近的白云寺屯兵，此处四面俱险，易守难攻，距刁化部屯兵的骆駉山遥相对望，只30余里。

刁化神在骆駉山有兵马略三万。他四面设寨，加强工事。设立了大营盘、小营盘、细化屯营，增设哨棚隘卡，严防死守。

王祥听说屯兵骆駉山的刁化神粮草充足，是个“土老肥”，就派出兵使前往骆駉山，欲借粮草，其托词是联盟守备，攻打大西军。刁化神知道其意是吞并，对苦心经营的一兵一草紧抱不放，坚决拒绝。

王祥非常生气，自己属南明正宗统兵，向一草寇乌合般的地方杂牌“刁家军”借粮赍草，却不给面子。于是，决定刀枪相见，取占骆駉山。

明崇祯十九年（1646），王祥两次从骆駉山綦江方向南

坡和西南坡方向向刁家军发起进攻，但由于刁兵早有准备，加上据占陡峭山岩，严守险关，居高临下，所以两次进攻都没有占到便宜，攻到半山腰，就撤下。强攻不行，只有智取。王祥与军师商量后想出智取绝招——羊兵攻山。

王祥派出兵卒在綦江县各山区收购二万多只野性十足的山羊。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深夜，王祥兵卒将每只山羊双角上挂上小灯笼，然后猛赶上山，同时吹响鼓角。这些山羊如受惊一般，急急往山顶爬去。此时天高月黑，刁家军发现满坡灯火，认为是王祥大军已致，于是发令进行夜攻。刁家军使用上了所有的枪炮和矢石，快天亮的时候，刁家军的刀箭和垒石已基本消耗完。此时王祥发起总攻令，众多兵卒一股作气，冲锋上骆駮山顶。

王祥潜师突上的先锋包围了在小营盘内的刁化神父子。很快将其二人擒获。王军不审不询，刀举头落，刁化神父子两人头颅同时掉地。余下刁兵军师小班等见头目被杀，全都跪地求饶。天亮前战斗结束，骆駮山被王祥占领。王祥同时收并刁家近二万残余兵马。

就在这年底，张献忠在西充凤凰山被清军射死。江津、綦江等地被大西政权占领一月后，大西政权又被败走云南。津地在以后几里，均属无主之邑，或被相互割据，直至 12 年后的清顺治十五年（1658），江津才正直纳入清朝版图。

清嘉庆版《江津县志》载有知县曾受一所撰《刁化神论》一文，评述刁化神。在现今江津和綦江两县，还流传着

这样的一句民谣：不怕刁家人马多，只怕王祥半夜摸。

附录

《刁化神论》

清·津邑知县 曾受一

从来建天下之大功成一代之伟人者，恃乎志之立，运以识之，明竖以节坚，纬以才之大，斯四者相辅而成，缺一不可也。志欲干济而识足周之，节持挺特而才足副之。卒能维既危之宗社，拯一世之生灵。自树若此，斯为全矣。然持此以绳人于三代而后，往往不可多得，则又当其大焉。故明刁化神，以进士作户部郎，守荆南施归道，其生平言行居官政绩莫可祥考。第其当明季衰乱致仕归里，修浚城池以卫桑梓。甲申献贼寇蜀屠渝，津城失守。化神起义兵杀贼。伪令当是时十三隘将推鲁英为总统，王祥据守遵义，阁部王应熊奉命办川寇，总督樊一蘅誓师讨贼，使化神稍有智略，以致仕大员倚毗王樊，协心赞画，用曾英王祥等戮力剿寇献贼，不足平也。顾计不出此，率乌合村农屯游溪徘徊观望，曾英自戎泸下，众见股栗，遂为所拜。已乃逡巡逸去蜷伏两载，复起兵骆嵎山，为王祥击败，父子遇害。夫王与樊皆大臣，福王永明诏命剿贼，而不知奉其节制，共图兴复。英与祥兵力最强，不知用之。又不知与之。和协自号好生，台举止若道士，意欲效田单假神师下教故事，以为耸动，而师无纪律，不加训练，乃

提一旅孤军，前无凭藉，后乏应援，始垂翼于曾英，终拜衄于王祥，不特献贼不能诛，宗社生灵不能保，并乡里亲戚亦不能卫，如走险之，鹿困关之兽，踉跄而死，不亦可哀矣乎。是故论其志，倡议举兵，亦欲干济而识之。因如此论其节，父子捐躯，亦云挺特。而才之庸如此，宜为里人所不满也。虽然化神之自树洵有余憾，而我辈之论人贵有公，评彼其才识不足称，而其志节庸可莫乎。夫责备求全，非忠恕之道也。记瑕弃瑜，失是非之公也。前人即未规其全，后人并不录其大。不可以示训也。予化神无由综其轶事而传之，因论其梗概以俟后之君子有所考鉴焉。

《江津县志》卷十八载清邑令曾受一 著

(原载《 》 期)

镌刻在綦江岸壁上琐碎的记忆

綦江是长江上游南岸的一条重要支流，又名綦河，早前俗称綦水，古名熨溪、夜郎溪、南江，发源于黔北云贵高原桐梓县崇山峻岭的大娄山中，流经黔渝两地桐梓、南川、万盛、綦江等县。在綦江城下游北渡场流入江津区境后由南向北，左奔右夺，在仁沱镇汇入波宽浪急的长江。全长 220 千米，是綦江区内第一大河，江津境内仅次于长江的第二大河。

綦江古老而美丽，明工部尚书江渊有诗赞其曰——
熨溪遥合大江流，浩荡烟波送白鸥。

暮雨半蓑移浦内，夕阳一线挂滩头。

鱼穿柳絮好沽酒，竿拔桃花懒系舟。

圣代只今召隐逸，何劳频下饵文钩？

清贡士周名祚著《熨溪》诗，更是赞美綦江景色和人文——

涓涓澎湃辟源长，百折滩回下夜郎。

黔播峰莲攒万笏，岷峨波会敌三湘。

石城古国传巴子，賸语微歌谱汉皇。

曲似武夷双桨去，村村烟火望苍茫。

两诗主要写了綦江下游之景，其故事和美丽也主要也集中在下游。这条日夜奔泻的古老之河，沿途走过很多险滩，看过很多嵯峨怪石。奔泻浩荡，形成很多碧潭深沟。由南向北，形成无数的旋流与急流、曲水与回沱。

綦江水流沙坝，记载着一幕幕有大有小有重有轻的往事。这些往事有的被潮涌浪来的时光冲淡和掩埋，有的惊心动魄，被镌刻在岸壁坚硬的石滩上，任凭潮涨潮落，都无法吞噬所留下的痕迹。

一：名字来历各有因

这条古老江河，曾有过几个古老的名字。民国版《江津县地》转引《舆地纪胜》、《省志·古名》说，樊溪在（江津）县东南源自夜郎溪又曰綦江曰南江……入江口曰江口即南江口樊溪口……县在南齐时曾治江口……遂有樊溪之名等等。

何为樊溪？是因其水可通樊地。汉武帝曾派使臣唐蒙经益州（四川）巴郡江州县，在现长江与綦江交界的顺江口取道，沿綦江河去夜郎（遵义桐梓）析置犍为郡。夜郎以西、南诏以东郡内皆樊人所居。水之通樊者为樊溪，道之通樊都为樊道（宜宾）。有人说，綦江古叫樊溪，入江口名樊溪口，真武场綦河下与笋溪河交汇处洋满咀又名樊溪乡，所以古代

津邑之地属夔地，津邑之人属夔人。清代学者、江津知县曾受一考辨后认为：此是误传，津邑之地之人一直属巴郡蜀郡等，不属夔地夔人，津邑只是有水通夔地而也。

早前在夔溪口发掘有新石器时代遗址，此又是南齐江州县治所和汉使唐蒙取道去夜郎之处，今有渡江遗迹。此处已成为江津有名的人文景观和重要历史遗存。

夜郎曾是流放犯人之地。唐代大诗人李白就曾被流放于此。当年他离浔阳、过巫山、至万县、穿涪陵、走渝州，最后到夜郎。这一行途是否可说明李白是在江津南岸进入唐蒙所取之道沿綦江而去流放之地夜郎？不知李白在江津住上一宿否？

又名南江是因它有一条支流在南川。名綦江传说是以綦姓得名。时有綦姓三人同榜考取进士，成为望族，朝上遂将南川税务市搬迁至此并改为綦市。江以姓名，曰綦江，县以江名，曰綦江县。

但是，明代大学者曹学佺所著《蜀中名胜记》说得明白：“（綦）江发源夜郎，作苍帛色，故名綦。”原来此是因江水颜色而名，有书为证。

二：客家移民古道和川黔水道

在綦河上，留下脚印最多最深并向两岸走得最远的莫过于客家移民。明末清初，西南一隅的巴蜀因长年不断的战争、

加之瘟疫和饥荒，人口锐减。如康熙六年江津全县仅 114 户 1032 人。可谓人烟断绝，遍地哀鸿。于是当时政府就主导了一场持续很久的“湖广填四川”大移民运动。湖南、湖北、江西、广东、福建、陕西等省的客家移民携家带口，纷至沓来，在綦江两岸插筓为业。真武场就成了涌来巴蜀的客家移民的中心之一。日转星移，真武场留下了世事的沧桑……

当年的客家人“填川”的线路主要有二条：一条是湖广、赣北、闽北的客家人，他们主要是穿过三峡入蜀，到达大本营重庆城，在此稍作歇脚后，绝大多数又继续沿长江而上西行，欲走成都平原等地。但他们离开重庆城西行的第一站就是江津，进入江津时发现长江南岸有支流綦江及其笋溪河，这里土地肥沃，地势开阔，于是就有一部分客家人停下选择在这“两江一河”地带创业。第二条入川线路是粤、湘南、赣南、闽南的客家人，他们是沿黔北而行，经遵义入川进入綦江县。入川后所见的第一条大河流便是綦江，于是顺綦江而下寻找理想之地。终于寻找到了綦江与笋溪河、长江相交汇处真武场这风水宝地。于是两路客家人在这里有意无意中汇合。

历史上川黔间早就有古道互通往来。明清以来川黔交通畅通，主要交通路线仍是两条：一是焚溪河道。从江津南下，经綦江，入贵州桐梓，而至遵义；二是黔江河道，从涪陵沿乌江，经武隆、彭水达贵州务川、思南等地，此路难通黔北。

第一条樊溪河道正是綦江河，真武场是道上一个大码头，是四川商船进入贵州和贵州商船进入四川的一个中转渡口，是川盐、广柑和黔地山货如棕片、桐油等商品的重要集散地。清咸丰年间，客家人戴登宵在上游东溪购回生铁，在此开办锅厂，相继三代，产业很大，后又发展多家，扩展到綦城。解放后綦江县有名的铁锅产业，其源应是下游的真武场。

五湖四海的客家人来到这里，与土著人一起耕耘这方富庶之地。真武场因客家人而起，客家人因綦水而兴……这里的天上宫、南华宫、万寿宫等“九宫十八庙”可谓巴蜀有名。古黄葛、古渡口、古建筑、古楹联可谓闻名遐迩。至今真武场仍然有在西南地区属保护最好的客家移民会馆群，真武场成为重庆市唯一处于镇乡的省级历史文化名街区。重庆市政府评出的第一批优秀近现代建筑 152 个，江津有 7 个，而真武场就占 5 个。綦江两岸有民谣曰：綦江水，浪打浪，前浪打到桐梓坝，后浪打到真武场。

綦江沿途两岸有着岁月的大风大雨留下的许多沧桑痕迹。在河岸两侧的广兴、北渡等地一些低矮山峦处，有着成堆成堆的鹅卵石，其中可找到海生贝壳类动物化石。贾市场对岸一千多米高的龙蹬山，相传在古代曾停泊过舟船，至今山岩上还留存着竹纤藤勒出的痕迹和篙杆戳出的凹印。人们仍会唱那首“风吹灯笼团团转，火烧灯笼满天旋，綦水潮天我不怕，变个麻雀飞上天”古老的歌谣。

三：血染綦江卷怒涛

这是綦江的一个黑色的记忆。抗日战争时期，綦江河畔曾发生过一件震惊中外的冤案，史称“綦江惨案”。这事不仅会被刻记在江岸的石滩上，而且还会永远记录在国民党反动特务残暴无情、狠毒奸险的耻辱柱上。

1938年春，国民党在武昌设立“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简称“战干团”），以抗日救国为名，招收青年学生入团，加以法西斯训练。武汉沦陷后，该团撤退到湖南沅陵，1939年又迁到綦江沿岸的桥河场、綦城、兴隆场、广兴场、五福场等。这些青年学生军官在綦河沿岸场镇和其他集镇进行抗日宣传。“战干团”所属“忠诚剧团”上演了话剧《李秀成之死》，被特务密报为影射攻击蒋介石，宣传共产主义。战干团教育长桂永清经团长蒋介石、副团长陈诚批准，从“忠诚话剧”开始，继而在全团5000多学员中，以清查“异党”为名，对“战干团”学生进行残酷镇压。到1940年，先后分别在綦江、桥河、湾滩子和江津县的广兴、五岔一带驻地，惨杀、活埋学员200余人，其中有任“忠诚剧团”美术组长的地下党员胡恩涛。酷刑致残40余人，制造了震惊中外、惨绝人寰的“綦江惨案”。由于綦江县地下党组织和江津县地下党组织未与“战干团”内的抗日宣传活动发生横向的关系，所以两县地方党组织幸免遭受破坏。后

来，一个逃出虎口的学生逃到重庆，在《新华日报》上揭露了此事，“战干团”制造“綦江惨案”的罪行才暴露于世，国民党特务组织遭到中外人士的强烈反对和谴责，该团遂于1941年不得不撤销。

著名学者、政治活动家章士钊对这起由国民党特务导演的奇冤惨案当时在报上作诗叹曰——

自古奇冤多，
大者綦江狱。

四：綦江是条抗日河

1937年，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二十九兵工厂随之迁来，兵工厂在生产上所需要的煤炭、铁矿等原材料，都要靠綦江沿岸各县供应，这就必须开发整治綦江，使其发挥更大的作用。

綦江两岸百姓充当民工积极参加“导淮”，很快完成第一期五座船闸建设的施工任务。陈果夫分别命名五座船闸为大智、大仁、大勇、大信、大严。此后又对綦江开展了以“渠化”为主的第二期工程。在綦江上又将修建石溪口、滑石子、剪刀峡、桥溪口、车滩、五岔六个船闸。这些船闸大坝建成后可使30吨的船只和汽轮通航。江津境内的桥溪口、车滩、五岔三个船闸坝，将是綦江上最长的重力式船闸坝。坝长分别为97·9米、144·9米、105·5米。

此正值全国抗日高潮，为同仇敌忾，鼓舞全国人民抗战志气，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著名爱国将军、“丘八诗人”冯玉祥亲自题写一首“丘八诗”——

中华常胜利，民族庆复兴。

道德本忠义，公理在和平。

为崇尚前方抗日将士的英勇，时人遂以诗的各句前冠以“大”字后，作船闸大坝命名。綦江县境内的石溪口闸名“大中”，滑石子闸名“大华”，剪刀峡名“大常”；江津县境内的桥溪口闸名“大胜”，车滩闸名“大利”，五岔闸名“大民”……

有一个非常神秘的地方叫鸡公槽，在笋溪汇入綦江的洋满嘴下游。茂密的修竹和苍劲黄葛将河段及周边山沟掩蔽得严严实实，外人难以探视其中。这是兵工署一厂，厂长陈鉴，有军工 1500 多人，密造武器弹药，运往抗日战场。綦江人素有反抗和斗争精神。清代张登华为防黔匪沿江入津，在仁沱至广兴江段扎竹为筏，密设河营。又在奔溪口河营大败石达开入川残部“长毛贼”。廖氏家族设局大造“牛儿大炮”（土炮），在綦江沿岸水隘山关修城筑寨，居高布阵，这土炮杀伤力很大。至今陈列在三峡博物馆门外的两门大炮均系江津造，抗战时廖氏还为前方战场制造地雷。綦江是条抗日河，浪花唱出抗战歌。

六：一江如练缀珍珠

幽幽綦河，碧波潋滟。现在的綦江犹如一条蜿蜒飘逸的绿色绸练，上面点缀着美丽的珍珠。綦江上的彭桥、广兴、夏坝、五岔、贾嗣、西湖、清泊、真武、仁沱、顺江等集镇，犹如一颗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綦江河畔上。这些小集镇建设各具特色，或红砖碧瓦，或粉壁黄顶，点缀江畔。使这青山，这绿水，这小城，相交相映，煞是好看。两岸特别有名的是红橘，每到秋季橘红之时，簇簇橘树挂满了火一般鲜艳的橘子，将这原本的青山绿水装点成红、绿、黛相间的山川世界，构成一道迷人的风景线，可谓“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今天的綦江，渝黔高速公路、渝黔铁路等或跨江过河，或并列而行，相缠相绕，时并时分……沿岸集镇高楼大厦鳞次栉比，流域的经济、文化发生了巨大变化。但那不变的淳朴民俗，常唤起人们悠悠的綦江情思，散发出的千古巴渝民风，将永驻我们心中。

（原载《江河文学》2014年第五期）

佛学大师欧阳渐与江津支那内学院

支那内学院是中国佛教学院的前身。它是一所说佛、教学、刻经和进行佛教研究的机构。是闻名于世的佛教大师欧阳渐在南京市公园路“金陵刻经处”基础上创办起来的，1922年7月在南京正式成立。

支那，是玄奘译经中的梵文“中国”的音译。内学，是佛教人士对佛学的特称。他们将学问分为三类：一是西洋文化，是求生竞存的文化，其宗旨在于征服自然、争取支配，它是人类最为原始的文化。二是中国文化，是淑身善世的文化。其宗旨在明明德于天下，为较高的文化。以上一、二类文化，佛教人士称之为“外学”。三是内学即佛教文化，是转依解脱的文化。其宗旨在“一切众生我皆令入无余磐涅而灭度之”，这是最高级的文化。因而，佛教界就把说佛、讲佛、刻经和进行佛教研究的学校定名为支那内学院。

欧阳渐，字竟无，生于清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江西宜黄人。其父在京任户部主事20余年。欧阳渐20岁考中秀才后对科举无意，入经训书院从叔父而读。34岁以优贡身

份入京廷试，回家途中去南京拜谒金陵刻经处的著名居士、佛学家杨仁山，转而学佛。后到日本搜集到佛学典籍 300 种数千卷。杨仁山去世后他主持金陵刻经处事务，他含辛茹苦，多方奔走，终于在 1922 年 7 月成立支那内学院。梁启超、梁漱溟、鲁迅、班禅额尔德尼等名流都曾听他说佛讲学，他成为闻名天下的佛学大师和国学大师。

1937 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华战争，位于南京的支那内学院院舍及院内 30 多万卷经书被毁。嘶声痛裂的欧阳渐率院众千里跋涉，背着经版内迁到“陪都”重庆近郊的江津。

欧阳渐到江津后，得到江津人士的大力支持。张茂芹兄弟让出土地 12 亩，邓瞻秋捐助千元，使得他能在江津县城东门（现江津东门公园老图书馆处）建院舍 30 余间。1938 年正月初七（这天是天人感应的人日）支那内学院正式恢复刻经、说佛、讲学。第二年在江津重建学院，分毗昙、戒律、瑜伽、般若、涅槃 5 科。规定每年人日和十月初八这两天，门人集会。1940 年发起编印《精刻大藏经》，流通处和刻经作坊开始运转。至此，每年的会期，好友和门人聚集论道，江津、重庆等地的信徒纷纷前往聆听欧阳大师说佛，在大后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许多知名的寺庙如重庆罗汉寺等也专门派人前往学习。汉藏数理院、四川佛学会以及重庆的许多知名人士如张澜、蒙文通、吴稚晖或亲自或派人来访。四川、西康两省教育厅还每月发给补助经费。流寓江津的名人陈独

秀、高语罕等常相偕来院内，谈文赏艺，交换诗文。欧阳渐还常到德感、白沙等地访友和说佛讲学。他与江津学佛信佛的邓瞻秋、吴汉骥交往甚密，曾手书一联赠送吴汉骥——

苍茫一古剑；

风雨万梅花。

欧阳渐应邀多次外出进行抗战宣传演讲，这个地道的“下江人”已经真正融入了巴渝人家。江津人民对他非常敬重，他也竭力回报江津人民，他亦佛亦儒，每年春节都要率院众当街义卖或义写春联。

1943年2月6日，欧阳渐患感冒后转为肺炎，23日去世，他的亲人远在国外，由院内门人吕澂主持治丧。国民政府下令褒扬，拨恤金一万，教育部发布了公祭文，部长陈立夫亲撰挽联，联曰——

潮音云寂宗风远；

法相无常教泽长。

西安、成都等地佛学界举行了公祭活动。欧阳渐葬于江津县城西门外官山（今江津中学校园内），后迁艾坪山。

此后由吕澂主持院务，支那内学院继续刻经讲学。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腐败，经济崩溃，学院经费陷入困境，举步惟艰，学院甚至变卖了院舍侧的9亩土地，艰难地支撑着刻经和讲学。学院共刻经30部，50余卷，还根据已收到的大量佛学经典，经过校勘、加注、整理，分理为瑜伽、唯识、

俱舍三大类，编印成《藏要》三辑 50 种，400 余卷。这些经卷，后来一半以上被日本佛教大学作为译本，并被印度国际大学作为补充教材。

到解放时，支那内学院教职工已仅只 10 人。原来从事过新闻工作的佛学研究员谈壮飞立即向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汇报了支那内学院的历史、现状及其作用等。1950 年 12 月 4 日，文教部函令江津县人民政府调查并妥善保护好经文、图书、刻片等。不久，将支那内学院更名为“中国佛学院”，刻经、讲学、说佛、研究等活动照常开展。

1952 年秋，在赵朴初的支持下，南京金陵刻经处开始恢复。处在江津的“中国佛学院”将收藏的文物资料、欧阳渐手稿、洛阳石刻玄奘取经图题赞以及经版 14300 片、《藏经》纸 2624 张一并移交金陵。现在的南京金陵刻经处不仅成为世界佛教经典的刻印中心，而且成为收藏佛教经典图书、佛像和佛教文物资料的宝库。

（原载《重庆晚报》2011 年 01 月 10 日）

掩映在密林中的精神文化大讲堂

幽谧肃穆的文化家园

在浓荫密布的重庆市江津区白沙镇黑石山聚奎中学内，一块硕大的石包上建有一座仿罗马歌剧院式的别致建筑，这就是曾经享誉西南的学术圣地——鹤年堂。

鹤年堂建筑面积 1417 平方米，为土木砖石结构，平面呈长方形，屋顶为重檐歇山顶。面阔 5 间，进深 9 间，西为门厅，东为休息厅，中 7 间为礼堂。分上下两层，下层为大厅，上层为参会者听讲之用。室内结构又分两大部分，西端一间为门厅，两侧设小门进入大厅，大厅西端有一舞台。如今看来，修建这样的建筑算不上什么高难度，可是在当时比较封闭的环境下，却是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

鹤年堂始建于 1928 年，当时江津尚无修建这种建筑的技术人员。巧的是，重庆城里正在修建华瀛大舞台，其施工队伍中有一批来自上海的技师技工。于是，监修邓缙仙从中聘请高手来到江津黑石山。这年 3 月，以甘栋梁为“掌墨师”开始动工修建鹤年堂，两年后建成。堂门上“鹤年堂”3 字

和堂外石坝上所立三棱石碑上“奋乎百世”4字由著名书法家于右任书写。鹤年堂庄严肃穆，民国时期被称为川东第一大礼堂。

鹤年堂历经80多年风霜，是中国文化由20世纪跨入21世纪的见证者，也是当时人们的精神文化家园。

1929年底，鹤年堂建成后，聚奎学堂立即开办初中班。“九一八”事变时，聚奎初中已经达165人，高小150人。抗日战争爆发后，为避日机突袭，邓氏家族开办的新本女校由溜马岗迁到黑石山与聚奎中学为邻。于是，鹤年堂就成为聚奎中学与新本女校合用礼堂。

鹤年堂得到了频繁的使用，两校每周的周会都在这里举行。每次周会，老师都会登堂演讲，教育学生发扬自辛亥以来的爱国精神，呼吁抗日救亡。当时的邓少琴（后来成为著名史学家）、吴芳吉（后来成为著名的爱国诗人）等作为优秀的学生代表，曾几度登堂演讲。

抗战呼声响彻堂内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我国华东大部分地区，一些外地文人陆续避难入川。这年夏天，著名思想家、国学大师、爱国人士梁漱溟先生来到这里，数次登堂演讲，深受社会各界的欢迎和好评。下学期，著名加拿大国际友人、学者文幼章来到鹤年堂，用英语作支持中国人民将抗日战争进行

到底的演讲，教师吴汉骧全场同步翻译。这是第一个来白沙镇公开演讲的外国人，在全县引起了轰动和强烈反响。演讲时，全场掌声经久不息，听众大开眼界。但观众的热情也有一次例外——

1938年春，一位澳大利亚的牧师来鹤年堂演讲。不想这位牧师大谈中国无法战胜日本，中国对日方只能求和，这才是出路。他在台上才讲几句，全场空气顿时凝结。突然，一位听众跳上堂台，对他厉声驳斥。随后又有几个青年知识分子上台继续驳斥。弄得这位牧师无地自容，只得灰溜溜地离去。这时，堂前台下高呼起“抗战到底”的口号，满场听众无不热血沸腾。这是鹤年堂建成以来到此演讲者中，第一个被听众赶下台的人。

不久，以“青年救国义勇军”为主角的集会在鹤年堂举行。“青年救国义勇军”由青年学生代表王西浦、蒲正渊发起组成。当天，军乐队奏起了《义勇军进行曲》，接着，这个古典的罗马式礼堂中又持久地回响起《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毕业歌》、《码头工人》、《回春之曲》等抗战歌曲。经过一番仪式后，“青年救国义勇军”由鹤年堂出发，分组走向白沙、李市、罗坝等地，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以后，“救国义勇军”长期开展军事训练，时刻准备上前线杀敌救国。事实上，他们中的许多人员以后都奔赴到了抗日前线，有的考上了抗日空军飞行员，如邓祖培（后在印度殉难）、

刘子英（后起义）等等。蒲正渊（后改名田心）走出鹤年堂后，于 193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去了延安，1941 年被分配到绥远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工作。

1939 年夏天，寓居江津的陈独秀应邓氏邀请来黑石山小住避暑。时聚奎中学校长周光午得知后，特请他给全体师生讲演。10 月 2 日，陈独秀身穿蓝布长衫，外套马褂，脚蹬布鞋登上了鹤年堂讲台。他以慢而有力的话语，从匡衡凿壁偷光的掌故说起，劝告青年学生要珍惜光阴，努力学习，为民族作贡献。继而讲到当前日本妄图霸占中国，全国人民要一致对外，争取抗战胜利……陈独秀讲演约 40 分钟，师生们听得津津有味。讲演完毕后，学生们站立两旁，热烈鼓掌欢送他。陈独秀——这位早年叱咤风云的人物、著名的政治演讲家在这鹤年堂作了人生的最后一场演讲。

1940 年，从沦陷区迁来江津避难的机关和学校越来越多，如国立编译馆（当时全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之一）、中央图书馆（全国最高图书文物保管单位）、女子师范大学（全国唯一的女子师范高等学府）、大学先修班、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等等。一时间，“津沙坝”文化教育机构林立，人文荟萃。这些机构在此较为稳定地开展一些业务学术活动。许多文化名流先后到鹤年堂登台亮相，或演讲、或讲学。他们除联系实际进行抗战宣传外，还从自己的学术专业出发，用通俗的语言进行讲学，扩大了当地群众特别是中小学

教师和学生们的视野。

1944年4月9日下午，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将军来到鹤年堂对聚奎中学和新本女校师生进行“节约献金抗日救国”演讲。高大的冯玉祥站在讲桌前似一座铁塔，稳稳实实。没有主持人，也用不着多余的介绍，他开门见山地讲了话：“同学们，你们捐了钱、献了物，帮助国家买飞机、买大炮，打日本鬼子。我冯玉祥万分地感谢你们，全中国人民感谢你们！到时候买回了飞机，一定在机翼上写下几个大字。一架写‘聚奎号’，一架写‘新本号’，让两架飞机飞临黑石山鹤年堂上空，叫它盘旋几圈，让你们看看你们捐钱买来的飞机！”大家欢呼雀跃，热情奔放，感到无比自豪与荣耀。冯玉祥将军在白沙镇募得700多万法币，这是当时筹募的最大一笔款项，超过自贡和乐山。后来，冯玉祥还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就叫《最爱国的集镇——白沙》，盛赞江津人民的爱国热情。

古殿堂焕发新春

新中国成立后，因各乡镇都办起了中小学校，黑石山聚奎中学的学生减少，除一些重大文化活动在此举行外，鹤年堂很少使用。到1960年，由于礼堂的抬梁开始朽坏，考虑到安全问题，更是停止了使用，堂室内两旁看台改为教师宿舍。

鹤年堂被闲置40余年后，2007年5月29日，经当地政

府维修和改造后的鹤年堂以崭新的面貌再次投入使用，迎来了中国著名小提琴演奏家潘寅林及其夫人、著名的钢琴家邓蓉。他们夫妻俩既是到此义演，也是回娘家。原来，邓蓉的父亲就是当年新本女校的校长。潘寅林和邓蓉以“红色浪漫”为主题，演奏了《梁祝》、《千年铁树开了花》、《母亲教我的歌》、《爱的致意》等经典乐曲。历经沧桑的鹤年堂，响起了高雅和谐的新乐章。

也就是从此时开始，江津地方宣传文化部门陆续邀请全国知名的专家、学者、教授等名流来鹤年堂演讲，被人们称为“聚奎大讲堂”。古老的鹤年堂焕发出了新春，成为一道亮丽的文化风景线。

因为工作的关系，我近期得到一份曾来鹤年堂演讲的人员名单（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职务与头衔为当时所有），特将此附后，以飨各位。

1949年前：

梁漱溟：著名学者、国学大师、爱国民主人士；

文幼章：著名国际友人、著名学者；

陈可忠：化学家、国立编译馆馆长；

蒋复璁：博物学家、中央图书馆馆长；

谢循初：女师学院院长、心理学家；

唐圭璋：词学家、《全宋词》的独立编者；

卢 前：曲学家、世称金陵才子；

胡小石：文史学家、中央大学教授；
魏建功：文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
隋树森：翻译家；
曹靖华：翻译家；
邵静农：文史学家；
冯玉祥：著名爱国将领；
陈独秀：著名学者、新文化运动领导人之一；
曹 刍：大学先修班主任；
劳君展：女师学院院长；
余雪曼：书法家、文学家。

1949 年后：

程天民：中国工程院院士、病原学和防原医学专家；
邓敬书：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
鲜于煌：著名教授、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领衔导师；
陈义华：著名教授；
刘汉秉：中央党校著名教授、中国市场研究会副秘书长；
邓若曾：中国女排前主教练；
邓鹏作：美籍华人、美国海波因特大学著名教授；
黄春平：航空系统和弹头专家、中国第一艘载人飞船神舟 5
号火箭系统总指挥；
梁 衡：著名文化学者、《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

（原载《红岩春秋》杂志 2011 年第六期）

一副楹联与一个场镇的故事

重庆市江津区东部与巴南区西部交界的地方，有一个很有名的老场镇叫高歇场。这个场镇建在一条长形的山岗上，山岗之下，四周皆是一片肥沃的土地。高歇场是一个边界场镇，早在清代，这里一部分属巴县，一部份属江津县。

其实，在很久以前，这里并不叫高歇场，当地人只简单地称其为“岗岗”。后来曾叫过永隆场，再后正式定名“高歇场”。不过永隆场也好，高歇场也罢，都与一幅楹联有关。

明末清初，这里没有场，更没有集镇。在这个长形的山梁上，只有一间非常简陋的茅草房，是个卖大碗茶的老太婆开的么店子。这里是川黔古道在明代末期改走重庆黄葛垭之前，老大路进入江津的首个驿站。不久，这里又增加了两三间茅草房，但人烟仍然稀少。

到了康熙初年，湖广等地移民填四川，许多人来此插筇为业，这里的人才开始多起来，他们相互“打乡谈”，抱团发展。人口有所增进，但当时这里仍没固定的名儿。到了清代中后期，又有人就在此修建起几间栈房，人户也多达十多

户，人丁近百，人们沿着这山梁修建了凉亭，这里开始真正热闹起来。

这里成为重庆府通往綦江、再去贵州古道上最重要的歇宿点之一。每天晚上都很非常，客栈全都住满。江津、巴县、綦江三县毗邻百姓前来赶场，进行交易，常常是晚上二更时（约 21 点）时才收摊散场，有的就干脆住进这里的客栈不走了，加上路过此地的抬夫走卒，这里各家客栈全都满号。有的只好在栈房的森林木楼上打地铺。一排客栈在高高的山岗上，客人半夜入睡，风雨雪月，尽在梦中。

不久，江津县衙一县丞来这里公干，因天黑无法回县，就夜歇于此。他见这小山岗上晚间的热闹情景后非常感慨。于是提笔写下了一幅楹联——

月小山高人散后；

风残雨歇客来初。

横额：永远兴隆

这幅楹联描绘了这小山岗的地理特点和奇特的夜景夜市，精巧的文字写出热闹喧嚣后静谧的夜景。

当时这里有一个初通文墨的小商贩，提议大家将这幅楹联横额中最前、最后两字“永隆”作为这里的场名。提议得到了响应，于是这里最先就叫“永隆场”。当地一个有名的石匠，将这一幅楹联镌刻在进场口的大门石柱上。

有了“永隆场”场名，算是名正言顺。这里也就更加兴

隆和热闹起来。但是麻烦也来了——

这古驿道前站叫广兴场，再前站叫兴隆场，兴隆场还建有香火很旺的兴隆寺，正对北渡水驿。这永隆场附近巴县又有一古驿叫隆盛，也叫隆盛场。总之，这永隆场名儿一出，别人都认为这是排行老三的“幺毛弟”。于是，这场上就有人要求改名。他们请回县丞，与当地几个初通文墨的人一起查经阅典，但也没有取出更好的名儿来。又经过讨论，他们想到这“永隆场”是建在这一条高高的山梁上，场上热闹，晚上投宿歇脚的商贩多的现状，他们又想到了这幅“月小山高人散后；风残雨歇客来初”的楹联，于是茅塞顿开，将上联第四字“高”字和下联第四字“歇”字合在一起，取名“高歇”场。“高歇场”终于得名。于是，在江津、巴县两县，就流传出这样一条至今都还常常被人挂在嘴边的歇后语：楼上打地铺——高歇（息）。

高歇场得名后，此处的重要性越显突出。官府在此曾设高歇塘、高歇驿、高歇铺司等机构。新中国成立后，这里全部划归江津县管辖，设置了高歇乡、高歇公社、高歇镇等等。这里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小城镇。

为了使人们不要忘记高歇场原名永隆场，人们又将高歇场侧边的一个行政村，取名为永隆村。

高歇场现已划归江津区杜市镇管辖，成为一个功能完善的城镇社区。但是，知道这个场镇与一幅楹联故事的人也是

越来越少了。

(原载于《重庆政协报》2016年6月14日副刊)

江津一桥三名显沧桑

江津区有这样一座古桥，一桥三名。桥最初建于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县大老爷取名万古桥，寓为功德万古。后几经改建，这名早没了。当地一拨文人秀才取桥名为利济桥，老百姓说这名文诌诌的不好使，老百姓给桥取了个简明的名儿——板桥。此桥是江津区现存的最古的老桥之一，现为重庆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四川省江津县地名录》中说，此桥有川东大板桥之称。

朱杨溪发源于荣昌县，流经永川区后在云雾坪山麓流入江津区境，在一小镇处注入长江。镇以溪名，该镇就叫朱杨镇。在朱杨溪上游即江津与永川交界处一段，古时常有云雾坪大山的猴子下来戏水，所以这段又叫猴溪。猴溪不仅是江津到永川的必经之道，而且还是重庆至泸州的官道。但是，一溪相阻，隔河千里，两岸群众很不方便。摆渡的“刀船”常被易涨易消的溪水打翻，溺水事件常有发生。“士民驾小舸需索行旅，且非时招之不遇，甚涨尤虞覆溺。”

从清乾隆十五年开始，在乡人的倡导下，当地百姓募谷集资，历时五年，终于在乾隆二十年于猴溪上修建了一个石拱桥。通桥前，有乡人建议，如果能将江津县衙的知县王大爷请来“踩桥”，这地方肯定会更热闹。

当时这里属江津县思善里七都石门场管辖，离县城近 60 公里。知县大爷叫王政义，字衡一，贵州省贵定县人，乾隆十七年(1752 年)太后六旬壬申恩科进士。乾隆十九年任江津知县。这天，知县王大爷带着师爷蒲钟湄来到这里，见新桥已建，就象征性地捐了点纹银。在“踩桥”前，当地官吏上前问：“县太爷，你给新桥取个名吧——”王知县还没有开口，旁边的钟师爷就抢过说：“就叫万古桥吧。王大爷功德万古，拱桥千秋……”

于是，这桥最先名就叫万古桥了。时津邑博学（学官）何玮还写了《万古桥纪成十六韵》一诗。诗曰——

山间朝宗水，波涛涡诡地。
天行大雨时，潢涌蛟龙壘。
驷骑负担阻，刀舟济不易。
舵折桨或摧，漂沦鱼鳖食。
自古代有桥，架木如儿戏。
啮楹蚀其榑，随波扬荷芰。
君子尽伤心，相拉竭材智。
欢喜舍金钱，不惜仓储积。

募化遍十方，艰大咸惴悸。
鸠工十八人，戴月披星累。
凿石造鳌拯，彩虹凌空施。
五洞连东西，屹岬岗陵岿。
积五年通汁，万金费如天。
造地设从此，往来利我用。
祝河伯不许，螭魅肆桥舆。

但是，此桥并没有万古千秋，沽名钓誉的县太爷在一年后就去职离津，到了 80 年后的道光十六年，一场洪水将此桥冲圮。当地群众怨声载道，涉水过河又遇到了困难。人们再也不说万古桥这名了，这名后来就被世人所忘，只有从旧《江津县志》破纸中才能找到此名。

当地百姓又开始募谷集资，多年时间后修成五孔卷洞桥，全长 100 米，宽 9 米，高 25 米。其中，最大一孔跨度 13 米，拱高 8 米。建成时，当地群众兴高采烈，玩龙灯耍狮子庆贺了三天。当地乡绅说，总得该给这桥取个名吧。于是他们请来了当地的一些秀才。这些文人经过讨论，就给此桥取名为利济桥，其意为利民济世和施利济功。

当地百姓听了这名，又提出了相反意见。他们说：这桥是百姓募谷集费而建，而利济桥这名，文绉绉的不好使，不如就叫板桥，板桥这名好听好记好使……

原来，这桥全用大小石板建成。桥墩用巨大石板砌成，

桥拱用长条石板卷合，桥面用平型石板铺就，桥栏也全是用长方形石板镶嵌。据说此桥用了上万块不同大小的石板，每块石板之间紧密相连，恰当合适。老百姓将此桥称之为板桥，既真实、贴切、明了，又好记好使。于是，板桥就成了此桥响当当的名儿，此成了闻名巴蜀的“江津大板桥”。

到民国十一年，川东发生洪水，猴溪猛涨。此桥受到一定损毁。水消后，当地百姓又组织民间募谷集资，再对板桥进行培修加固。

板桥桥面十分平坦整洁，当地百姓将此当成晒谷场。桥两侧石砌桥栏有浮雕花纹，可惜风化剥蚀了不少。幸存的浮雕中，“文书”、“宝剑”二图依稀可辨。前人在建筑物上雕刻图案，除了装饰美观，再就是为了图吉利。桥面上铺就的均为条型石板，只桥面正中间一块石板呈不规则形状，呈七角形，是人们传说中的“神仙石”、“鲁班石”。

从万古桥名到义济桥名，前者沽名钓誉，后者文绉绉的，老百姓取的板桥这名，直朴、大方、字少、好记、管用。

板桥建成后，桥头两岸形成了一个很有名气的乡场，场因桥叫，叫板桥场。民主革命时期，这里是中共地下党组织的一个红色据点，建有地下党板桥支部。解放后，这里曾设过一个建制乡，乡因桥名，叫板桥乡，后又改为板桥公社。现在此处属朱杨镇，建有板桥居委会。

板桥旧貌换新颜，如今的板桥仍然发挥着区县边贸集镇

作用，桥头桥尾以及桥中都成了赶集的闹市，场上高楼鳞次栉比，商品琳琅满目。江津、永川边界两地赶场的群众摩肩接踵，形成了一道亮丽的边界风景线。

(原载《重庆晚报》2014年12月10)



“杨荷花”与江津

“杨荷花”何者人也？“杨荷花”就是杨裕勋，字建屏，别号笑笑居士。他潇洒倜傥，飘逸不羁，卖画得钱总是一挥而就。他还自称前生是城南寺内的僧伽，因画荷未成转身成今世……

“杨荷花”何者人也？

“杨荷花”就是杨裕勋，字建屏，别号笑笑居士，忠州(今忠县)人。清末有名画家。他是同治时的廪膳生员，后研习书画，对人物、山水、花卉、翎毛均有造诣，尤长于画荷花，人称“杨荷花”。他被收录入《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大辞典——重庆》卷，成为四十一名重庆杰出人物之一，排名第十一。

民国版《江津县志》“卷六·官师·教谕篇”云：“杨裕勋廪贡光绪二十八任(教谕)兼摄训导年余”。他既是教谕，又是训导，当时任训导的还有成都增生孙湛。在江津时已六十五岁，此前他还在达县、涪陵等地任过教谕。在江津作官近两年，发生了二件“大事”，虽他极力申辩，但他还是因此

丢官。“杨荷花”是一个非常豁达的人，不当官就潜心画荷花吧，他画艺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

杨建屏在四十岁前没有作官，他只身漫游于各城市，靠卖画为生。他潇洒倜傥，飘逸不羁，卖画得钱总是一挥而就。他还自称前生是城南寺内的僧伽，因画荷未成转身成今世，因而他的衣着常以红绿细绸做成圆领大袖，鞋则是绣花缎做成，颇似僧装。他画荷题字也多是“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他作画讲究气韵，追求淡雅，在成都时曾为二仙庵道长邀作巨幅荷花图悬于客堂，道士和信众都说，观堂上荷花，好似迎风起舞，栩栩如生。他的名气越来越大，在民间有“家有杨荷花，必是俗人家”谚语。

杨建屏四十岁后他回到老家忠州屏山，在母墓侧修凿建造了“墓庐”毓秀山庄。所谓墓庐，就是墓旁之屋。古人为守父母、师长之丧，筑室墓旁，居其中以守墓。该墓庐左为清凉书画馆，前为趣园，右有荷花池，他常来此为母守墓，观察荷花体态，也常招友来此饮酒赋诗，其乐无穷。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杨建屏教谕江津，成为岁俸三十一两银的“地方最高教育行政长官”。但他作官作画两不误，“冷署常开北海樽”，闲暇时常邀邑内的文人墨客谈诗论画。他性情谦恭，宽容少忌，喜诱益后进，深受全邑生员、绅士等好评。江津、忠州虽都在长江之畔，但上下两游相距甚远。独在异乡，他非常思念死去的母亲，可水途迢迢，他

无法到“墓庐”为母亲守坟祭祀。于是提笔画成《墓访图》，以期睹画思人，寄托对母亲的哀思。

杨建屏与江津才子钟云舫特别交好。钟云舫因早年写诗作联讽刺狎妓嫖娼的知县朱锡藩被革除了廪银，他从成都避难回来不久，在邑内教私馆糊口，杨建屏很很佩服钟氏的人品文品和师德。两人常相聚饮，畅谈达旦。钟云舫曾说：“先生坦坦蹈其和，为我前途诉坎坷”，他长钟氏十岁，作为学官，他竭力为钟氏的遭遇而鼓与呼、鸣不平。他们常结伴在城郊观音岩等处游玩，唱诗和词，赏画作联。杨建屏还为江津观音岩“四大王庙”山门题写了门联——

凸壁摩空，乘楼架阁；

凹岩抱佛，辇秀输青。

一天，杨建屏将钟云舫请到泮宫(学署)，将所作的《墓庐图》展与他看，钟氏“披图即已领春风”，对这幅墓庐山水画赞叹不已。他提笔作《题杨建屏学师墓庐图》长诗，对墓庐幽雅别致的环境进行了精湛的描写：“大江纳而横流，曲沼漾而深凿，桐何事而栖鸾，竹无端而引鹤……”，又描写了墓庐的别致的风格，“活泼离侏逞巧，公输孰度，十景在望；六工咸作，翼然一亭，翛然万落……”此外，钟氏在诗中，对“杨荷花”的画艺、慈孝，人品、文品和他们两人之间的感情都进行了深刻细腻的描写。《题杨建屏学师墓庐图》后被收入光绪版和民国版的《振振堂诗稿》中。

光绪二十六至二十八年(1900至1902年),江津“二岁三秋赤旱”,处处惊闻“六万灾黎疾苦”,处处“哀鸿惨状”,但前知县叶桂年和后知县武文源不但不按律减赋,而且还篡改粮章,加征粮税,津邑上下哗然,怨声载道,引发了震惊巴蜀的“粮章案”。

时江津举人张泰阶、塾师钟云舫与其他绅士和学人,联名用四字、六字句对偶排比,纂写成洋洋洒洒的骈体诉状,呈递给刚总督蜀省的岑春煊,参控邑衙篡改粮章,揭露其贪赃枉法,诉状言之凿凿,语言锋芒刚烈,而且还少有偏激之句。岑总督派员稽查后将武知县的顶戴摘除。不久岑春煊外任,武文源勾结余党,并重金贿赂同乡、重庆府尹张铎。他们在诉状中断取部分偏激言词,并搜罗钟云舫平时诗联中揭露和批判当局的尖锐锋芒的句子,反控张、钟等人“图谋不轨,欲聚众起事”等等。

此“粮章案”牵连众多人员。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5月),张泰阶、钟云舫被当局羁押到成都府科甲巷提刑按察使待质所“待质”,钟被羁押长达三年。在此案中,一举人、两廪生、两秀才被革,一知县、一校官、一县丞被革。因杨建屏平时与钟云舫交往甚密,已遭挂误。当时杨建屏与另一名学师文渐逵(泸州人,增生)参与了这洋洋洒洒的长篇诉状的构订,使其“郁郁乎文哉”,但在呈向岑总督的“诉状”上,没有签列杨建屏之名,杨即向重庆学宪(学政)呈文进行

申辩，学宪查无实据，只好对此不了了之。但不久，当局又以杨建屏包庇劣生之案，参本重庆学宪。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杨建屏真是有口难辩。清末文人、《振振堂》集的辑注者郑坝(字芥青)对此评论道：“无论其非包庇，持此问天下，有如此才而可名之劣生者乎？”最终，杨建屏被削去官职。

杨建屏回家后创作颇丰。清宣统三年(1911)，他才得挚友钟云舫辞世的噩耗。他无限伤感，特为钟云舫洒酒祭奠。民国 10 年，84 岁的他在居所无病而终。当地友人知道他与楹联圣手钟云舫交好，也送他了一副挽联——

终生欢喜不知愁，善书、善画、善饮、善诗，得一钱
用一钱，竟忘却我为何人，今是何世？

过眼繁华真若梦，有花、有酒、有园、有榭，去几日
乐几日，能如此生而无恨，死亦无悲！

(原载《重庆政协报》2007 年 11 月 30 日，原名《杨荷花》)

江津的辛亥反正

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共和国，在中国历史上谱写了光辉的民主革命新篇章。江津在这场斗争中也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巴蜀地区影响颇巨。

民怒激风云

江津自戊戌维新以后，一些有志之士力图拯民救国，外出留学寻求富民强国的经验。先后有冉献琛、邓鹤丹、周常昭、聂祖辉、王雅莪、龚农瞻、丁慕韩等江津籍留日学生，在日本参加了同盟会。归国回县后，倾全力于革命活动，倡导新学，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播撒革命火种，利用哥老会的力量扩大组织活动，激发江津人民的爱国热情。

1911年5月21日，巴蜀人民反对清廷出卖铁路主权的“铁路国有”决定，在成都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各县相继成立分会或支会，掀起了波澜壮阔的保路运动。江津保路同志会于6月初6开会成立，到会者2000人，根据四川保路同

志会通告精神，大会群众选举邓鹤丹、杨锡藻为江津保路同志支会正副会长。决定以川汉铁路江津股东分会地址为事务所，并于6月10日向成都四川保路同志会呈报成立，江津与全省的保路运动联成了一片。

四川保路运动日益高涨，江津县内同盟会会员冉君谷（名献琛）、王雅莪（名培菁）、邓鹤丹等人根据“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在民间积极从事发动群众的社会活动。

经过同盟会的暗中发动，当时的白沙、几江一带，借发现“孔明碑”、“刘伯温碑”或“烧饼歌”之类的民间谶语形式，预言清代的覆灭和革命的胜利，借以鼓动人心。

紧邻綦江县的广兴、五福一带乡镇的哥老会首领郭云程、彭鸿钧、邓老偏等，在同盟会的领导下，不仅大肆发展哥老会会员，壮大力量，还有意识地参与了綦江县人池列伍、池洪蹇领导的共进会。

1911年7月间，江津中学堂、聚奎学堂的师生在各镇乡群众中公开进行演讲和宣传，指出革命形势巨变，亟需组织乡兵，扣留厘税，进行抗争。江津同盟会会员王雅莪在县内策划武装斗争，并与江津中学堂教师张鹿秋密切联系，草拟宣传大纲，动员学生中的积极分子深入各场镇，唤起群众，投入反清革命斗争。第三班学生刘平先，一班学生刘仿桥，被分配到家乡永安、旺龙两场开展宣传。邱次元在油溪秘密

开办军事研究所，为武装斗争培养骨干，刘先平、刘仿侨等同志参加学习。不久，白沙和江津相继起义，刘氏兄弟成为江津革命同志军的骨干。

四川保路斗争激剧开展，荣县同盟会员萧湘（字绮笙）、谢伟甫密谋革命，事情泄密，谢伟甫被清知县王棧所杀，萧湘被通缉，萧湘应江津同盟会会员邓鹤丹的邀请到聚奎学堂任教。他擅长演讲，经常以慷慨言辞宣传革命救国的理义。堂长邓鹤翔积极倡导，师生都投入到保路斗争中，并迅速组建学生军。学生军由綦江县蓝敬夫担任军事教习，开展军事训练，动员学生将自己家所有的毛瑟、九子、前膛等各类枪支集中学校，以备急用。云阳人胡襄伯在化学课中教学生制造白药（炸药），除储备自用外，还供给乡团练作“四瓣火”引火之用。当听到荣县宣布脱离清廷独立的消息，全校师生沸腾，无不摩拳擦掌。堂长邓鹤翔因任江津铁路股东分会和保路同志会的代表，先赴省城成都，目击保路运动已由单纯的经济斗争激化为武装革命的政治斗争，立即回津，筹划起义。

津沙举义旗

革命形势瞬息万变，发展很快。成都邻近各县用无数木板书写上各地同志军革命斗争动态和号召，投入江中，源源不断地沿江漂流而下，传知各地。百姓称之为“水电报”，江

津人民收到这些“水电报”后，又增加江津的内容续编为新的“水电报”后投入江中顺江下传至川东和鄂西各县。9月27日（公历11月17日），同盟会会员程德音、夏风薰、孙承先、周国昌等受江津县保路同志支会派遣，去聚奎学堂向师生宣传革命，密谋行动。

9月27日夜，程德音、夏风薰等同邓鹤翔，周宅三等商议，策动白沙盐防安定营管带（营长）夏寿廷响应革命，全营一致赶造“汉”字大旗，28日晨遍插商铺和住户门前，还在镇公所五显庙大殿前插上书有斗大汉字、四周密布着18小圆圈的义旗。萧湘事先奋笔疾书的《聚奎学校为白沙首义布告全川父老文》，由同盟会员在街市张贴并传檄全省。当天，盐防安定营全营士兵和四乡团丁、聚奎学生军和各学校师生、人民群众共约数千人齐集五显庙，邓鹤翔登台演说痛斥清廷丧权辱国，阐发了起义救亡图存的宗旨。他声泪俱下，听者无不动容。演说后，在场军队和学生，都按所持枪械，分类编队，各校学生，人民群众跟后排列，由邓鹤翔和夏寿廷、吴汉臣等率领游行示威。人人手执白旗，高呼起义口号，群情激奋，街市乡野为之震动。以后的接连几次的集市日期，组织团丁劝赶场的农民剪去发辫。

28日下午，邓鹤翔随同程德音、夏风薰等赶赴县城几江，发动全县起义。先前同盟会会员冉君谷为谋革命多次与知县吴良桐交谈，知其能识时务，乃进而秘密商议，决定待

机和各地一同起义。冉君谷又去重庆联络同盟会组织，协商起义事宜。9月29日，（公历11月19日）冉君谷返回江津通报情况决定起义。吴良桐深知民主革命是大势所趋，不可逆阻，次日，慨然将县印交出，并在城上高竖汉字大旗。江津全县在10月初1宣布独立。

江津蜀军分府成立后，知县职位改为正统，吴良桐参加哥老会，任正统。同盟会会员、县人王雅莪、马继良任协统。其下分设司法、军谋、军需、财政、外交、庶务、交通等职能部门。由冉君谷、杨鲁芹、赖彤舞、陈厥成、陈文涛等赞襄规划，刊制各职大小木印几十方，以利行使职权。各乡镇同志军整建统一组织，特在东门外的大沙坝集合点阅，整编为15个营。

发兵援合綦

重庆建立蜀军政府后，因毗连江津县的合江同志军围城日久不下。江津特别派遣第二安定营营长保焱卿、边防营营长聂庆云率领队伍驰援合江。委派江津蜀军分府协统、同盟会会员王雅莪为进攻合江的同志军南路司令，统一领导江津派遣援助合江的第二安定营和边防营。

綦江方面，共进会会员池列伍、池洪蹇等密谋革命已久。11月，江津派遣协统马继良带领相关人员到綦江联络，江津、綦江两县的共进会和哥老会首领在江津县的广兴场团防局

开会，商议起义的具体措施。11月24日（农历10月初4）夜间，广兴、五福等各乡的同志军和綦江县北路的永新、升平、三会各乡的同志军一齐行动，到预定的甑子场集合。当夜各镇乡实到同志军约500多人，大家公推綦江的池列伍和江津的彭鸿钧为攻城总指挥，率队攻打綦江县城。拂晓时，终于攻破綦江县城，将清廷綦江知县顾浩成从床上捉住。顾为求生，乃双手捧交县印。赓即成立了新的綦江县军政府，綦江县宣布独立。

（载《重庆政协报》2011年10月25日）

江津同志军与綦江反正

1911年6月,四川成立保路同志会后,各地纷纷成立分会或支会,掀起波澜壮阔的保路爱国热潮。6月下旬,江津保路同志支会成立,同盟会会员邓鹤翔被选为会长。9月7日“成都血案”发生后,巴蜀各地保路同志军纷纷揭竿而起,保路运动已经激烈地转化成为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江津同盟会也积极筹划起义。11月18日,江津白沙民众和盐兵、乡兵宣布起义,街头树起“汉”旗。11月20日,江津县通电起义,宣布脱离清朝政府。重庆11月22日起义成功后,建立了“重庆蜀军政府”政权,江津则建立了“江津蜀军分府”政权。清政府在江津的统治宣布结束。江津蜀军分府官职设正统一名,协统三人。吴良桐担任正统,同盟会会员马继良等任协统。各镇乡同志军组织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革命力量不断发展壮大。

与江津相邻的綦江县,同盟会分支共进会会员池列伍等受到江津县起义形势的鼓舞,认为在綦江起义推翻清王朝统治的时机已基本成熟。与“江津蜀军分府”联络,商定綦江

起义事。1911年12月下旬，綦江、江津两县“会党”首领在江津县广兴场团防局开会，商讨起义具体实施方案。会议除讨论决定了起义的时间为本月24日外、还决定了武器、标志、进攻方向等重大事项。决定以原有“乡团”、“会党”为起义基本队伍，统编统称为“同志军”。会议推选江津武秀才彭龙钧、綦江县池列伍为攻城指挥。会后，江津县彭龙钧、彭玉章、唐玉林等人立即行动，积极组织广兴、五福场的保路同志军，准备参战。

这天当晚，綦江永新、升平、三会各乡与江津县广兴、五福等地的“同志军”以“齐团”为名携带武器，趁着夜色整队出发，他们扬言到北渡集中，实际到甑子场集合。广兴到綦江县城有水、陆路可通，水路30来里，起义军分两路进军，彭龙钧、唐玉林各率领一路，两队均以手臂缠白带为记。起义军沿桥溪口、北渡场逆綦江河而上。

寒冬深夜，冷气袭人，朦胧的江面上慢腾腾地游动着一团团雾霭。但同志军心中却燃烧着熊熊烈火。他们没有一个人吭声，只听到“嚓嚓嚓”的脚步声。在离綦江县城不远的地方，彭龙钧作了安排后，同志军直奔城下，包围了县城。城内静悄悄的，显然城内清军没有觉察。彭龙钧一声令下，同志军齐向城内发起进攻，在睡梦中被惊醒了的城内清军先是乱成一团，当他们得知是同志军在攻城时，就凭仗坚固的城墙向城外还击。綦江县城东门临綦河，难于进攻，起

义军决定由彭龙钧率领江津的同志军攻打西门，池列伍攻打北门，南门则由石角、东溪等地的同志军埋伏，以防清军突围逃跑。但西门城墙坚固而高厚，起义军久攻不破。彭玉章当即献计：在离城一里的綦江上游桥河镇，用缸钵装菜油点灯，放置江面，使其顺流而下。江津的同志军按此计施行。此时，城上清军望见河中灯火密集，以为遍地皆是同志军，大部份清军被调经东门，以对付江面上的“同志军”。这时

在西门攻城的江津同志军趁机将火药装进楠竹筒后用大箭射向城墙，城墙终被炸开一缺口，彭龙钧手挥大刀，首先跃上城墙，后面的同志军呼喊着急跟随后，杀入城内。彭龙钧率领同志军直捣县街，捉住了知县，搜出了县印，并准备将知县推出斩首示众。

正在此时，城内残余清军又伺机挣扎，加之起义军纪律不严，于是清军乘机反扑进攻大堂。彭玉章见势不妙，即暗示彭龙钧立即离去，彭玉章随即入座拖延时间，并重新宣布“知县交印投降免斩，彭龙钧乱下杀人令应该法办，与我拿下——”，复辟的清军立即就去追杀彭龙钧，但彭龙钧武艺高强，他很快就杀出重围，趁着黑夜逃出城外。正当这关键时刻，另一支同志军杀入县衙，他们喊声震天，杀声动地，很快局势终于又发生了变化，知县和残留的清军见状，深知大势已不可逆转，只好跪地求饶。

同志军立即召集各路人马开会，决定由各公口维护城内

秩序，并鸣锣通告城内各铺店居民遵守秩序、不听谣传、天明照常营业。第二天一大早，人们奔走相告，全城百姓异常兴奋，自动用白布做成旗帜，写上“汉”字插在自家门前。他们燃放鞭炮，以示欢庆，綦江县宣布独立。

“綦江军政府”成立。县同盟会领导人杨锦云被推举为都统。同盟会会员危抚辰任行政部长兼理县事，同盟会会员陈硕凡任教育部长。清政府在綦江的统治从此结束。

（载《重庆政协报》2011年6月9日）

江津江安有故事

楔子

经江津区政府教育督导刘世康牵线，初夏，重庆江津区作家协会到四川江安县访问。江安江津各在长江上下游，相隔尚远，分属渝川。交流中两地作家都问：江津江安有何瓜葛？我从事渝川地方党史工作多年，知道抗战时期渝川的一些旧事，所以就写出此文。虽感牵强附会，却是偶然中的必然。

故事之一：江津“中国书店事件”与江安国立剧专

抗战时期，四川江安县城内有一所很有名的学校叫江安国立剧专，它被誉为“中国戏剧摇篮”。虽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但它对许多青年学生有很强的吸引力。

江津有一个地下党员叫陈建新，他做梦也想考入江安国立剧专，由于他的痴迷，使他叛变了党组织，导致了在川东川南地下党组织中影响颇大的“中国书店事件”的发生，给地下党组织带来了很大的损失。

陈建新原本是南京的一名青年学生。当时他的志向就是

报考 1935 年在南京创办的国“国立剧专”。抗日战争暴发后日本鬼子占领了南京，陈建新与无数青年学生一起流落到“陪都”重庆近郊江津县。1939 年，国立剧专随之迁到四川省江安县城，取名为“江安国立剧专。

陈建新原本在江津县城的被服厂做小工。他爱学习，业余时间温习课本，正因如此，他被地下党被服厂支部发展为党员。因为他有文化，爱学习，党组织就抽调他到白沙镇开设中国书店分店。这里表面上是书店，实际上是地下党的交通站。在白沙镇街上，陈建新常常组织歌咏队，宣传抗日，吸收学生和街道青年参加。同时出壁报，贴标语，推销《新华日报》和进步书刊，他将声势搞得很大。

由于白沙“中国书店”活动搞得太突出太张扬，严重违反党的地下工作纪律，受到江津县委的批评。无孔不入的国民党特务发现了书店的端倪。一个姓张的特务天天到书店阅读进步书刊，流露出对国民党不满的情绪，还表示要去延安。陈建新吸收他参加了歌咏队，答应为他去延安想办法。书店的情况，被特务机关秘密掌握和监视，国民党军警宪兵等待机会，准备利用书店这个缺口，一举破获江津党组织。

1939 年 8 月，陈建新考取了国立江安剧专，他欣喜若狂。书店决定在 27 日为他开欢送会。这天，与书店关系密切的进步青年和读者，欢聚一堂。共产党员刘星、朱芳道和预备党员董新等人参加了聚会。张姓特务以为这次聚会有重

要人物出席，遂报告特务机关，他们制订了凌晨逮捕计划。凌晨3时，特务包围了书店后采取了行动。

国民党特务逮捕了陈建新以及参加聚会后住在书店的入党积极份子张自新、夏渝白和蒋萍后，又在旅馆里搜捕了刘星和董新。天亮后特务放出风声，说在白沙中国书店抓捕了一批汉奸，并将书店贴上封条。负责此次行动的宪兵头子牛传钦致信白沙区区长傅先楷称：“查白沙镇中国书店出售违禁书刊，破坏抗战，诬陷政府。为巩固国防，保证胜利，极应予以查封。”

陈建新被押解到江津县国民党宪兵营。其他被逮捕的人员因查不出“破绽”后被释放。陈建新被关押了三天，特务对他进行了严刑拷打，叫他交待出他的组织和上组，但他没有开口，他几乎昏了过去。特务见硬的不行，就来软了。第四天又提审他。牛传钦提审时说：“小伙子，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你考上江安剧专多么不容易。这是一所多好的戏剧艺术学校呀。只要你说出了你的组织，我们立即租轿送你到江安上剧专。我可立字为据……”牛传钦拿出送陈建新到江安上剧专的“承诺书”。陈建新经不住这样的诱惑，为了实现他上江安国立剧专的“美梦”，他开口说出了江津被服厂总支及其县委主要负责人名单。

叛徒陈建新一离开江津，还未赶到江安县，江津地下党被服厂总支书记岳建和县委书记王世焕相继被捕。江津地下

党组织遭受到了严重的破坏，白沙和江津城关两地的地下党员纷纷被捕，县委和各支部几乎瘫痪。这是江津地下党自1926年成立后遭受的第四次较大的破坏，在川渝地方党史上被称为“中国书店事件”。

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立即通知川东地区各级党组织暂停与江津地方党组织的联系，通知没有被捕的党员立即停止活动并向外撤离。

故事之二：“江安国立剧专”与江津“民众剧社”

1939年4月至1945年6月，国立剧专在江安办学六年，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戏剧人才。这是一所进步的学校，学生运动此起彼伏，学校的秘密地下党组织非常活跃。由于受这所学校的影响，江安县城群众性的爱国热潮高涨，引起了国民党军警宪特的恐惧，他们对此进行了残酷镇压，整个学校和江安县城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一些剧专的学生在此呆不下去了，谅想离开学校，到一个能更好地宣传和开展抗日救国运动的地方去。

们准备到什么地方去呢？

剧专有个学生叫周德华，江津县李市坝人，是个学生领袖，他上了江安县特务的“黑名单”。他与另外一个仍在此读书的江津同学夏渝北商议后，就邀约另外几个剧专的同学陈思、曾强，王杰等商议去江津，他们认为江津是重庆“陪

都”的近郊县，水陆交通方便，迁来的大中学校较多，还有武昌艺专等这样的艺术类大学，便于自己求学和开学抗日救国宣传运动。

周德华等人鼓足勇气，离开了江安县城的剧专，乘下水船走了两天两夜到了江津。他们是学戏剧的，在江津县城稍作修整就开始活动起来。他们想在江津成立一个青年戏剧团体，目的是一是宣传抗日救国，二是实习自己的专业，三可补贴生活费用。周德华和夏渝北是江津人，情况熟悉。周的家族势力大，人脉好，他们就邀请到流寓到江津的另外几个戏剧爱好者如刘沧浪等加入这个团体。经周德华反复劝说，江津银行界涂克应等人还对些进行了赞助。大家给剧团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烽火剧社”，其寓是抗日烽火遍地燃烧。

剧社刚成立，江津职中学一个叫朱近之的老师就暗中找到周德华，原来他是一名地下党员，他的女儿也是地下党员，他很关剧社，对剧社提出了许多建议和意见，并进行精神鼓励。但他从来不参加公开活动。剧社遇到什么困难，总爱请教他，他暗中出主意。

1942年初，以江安国立剧专学生为主体的这个团体开始正式在江津排演。首场演出是在江津县城的一所学校里，演出剧目是老舍的名剧《国家至上》，演出结束就引起江津全城的轰动。

剧社的前几场演出就引起的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刁之鲜

是中共地下党叛徒，他叛变后当上了国民党江津县党部宣传总干事，又任江津民众教育馆馆长。他气势汹汹来到剧社说：“名叫烽火剧社就是通共——不准搞了。要搞就由我来领导，改名‘民众剧社’，否则全部拉去关进宪兵队……”

大伙都懵了。原来江津江安一样，都是受到国民党军警宪特把持。周德华找到朱近之，请他出主意。朱近之说：“刁之鲜是个叛徒，现在很得势，我们不能与他们硬斗，我们可改名，但在暗中要与他作斗争……”

于是大家统一了意见，将剧社改名为“民众剧社”。刁之鲜是个大马哈，不常来剧社，大家排演了许多抗战救国的进步戏剧。暗中进行共产主义思想宣传，揭露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虽然很辛苦，但都感到很充实。只要刁之鲜来到剧社，大家又装着别无他事的样子。

江津有个地下党员叫张西洛，以主办《江津日报》和开办“大公书店”为掩护从事革命工作。周德华等这些江安国立剧专的学生常去他处交流。张西洛也是非常关心“民众剧社”。他约剧社的人员在报纸上出了一期文艺副刊，文章全由剧社的人写，用笔名，内容全是骂国民党的，报纸很快发到广大读者手中，大家读了都有痛快淋漓的感觉。这事居然没有被国民党江津县党部宣传总干事刁之鲜发觉。后来因张西洛身份暴露，党组织安排他离开江津，他走后“民众剧社”的人都很失落。他到重庆《新民报》作记者，不久去延安采

访毛泽东。《毛泽东选集》中的一篇叫《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的文章，就是指的这次采访。

“民众剧社”还排演了法国名剧《祖国》，这出剧宣传爱国主义，剧中有大骂特务、叛徒等情节，演出非常的成功。刁之鲜这个甩手掌柜，有时还不知道剧目的内容，加上大家都瞒着他。他在场时大家都不说什么，走后大家又积极活动。

赵国相是一位职业革命家，在成都从事地下革命活动，因暴露，被敌人追捕。他疏散到江安国立剧专隐藏，但江安也是严重的白色恐怖，成都的特务又追到江安。江安剧专的老师肖锡基（解放后曾任四川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写了一封信，叫他到江津县找周德华等同学，赵国相来到江津后，很快就与大家融为一体。他很有斗争经验，秘密指挥大家如何和敌人作斗争。

“民众剧社”在江津影响越来越大，成为江津城乡妇孺皆知的宣传抗日的演出队伍。此时江津的白色恐怖也越来越严重，国民党军警宪特总怀疑“民众剧社”是红色的，认为里面肯定有共产党。于是派出宪兵全副武装天天到“民众剧社”住宿地和排练场巡查，对演员进行监视。国民党县党部还派出一个官员到剧社召开演职员大会，清查大家的来路，叫大家写自传，找大家“谈心”，谈经历，谈演戏的目的等等。在朱近之、赵国相等党员的策划下，大家回答得非常巧妙，说我们是江安国立剧专的学生嘛，就是搞戏剧演出的，

就是为了宣传抗日救国等。国民党特务只好悻悻而去。

不甘心的敌人使出最毒的一招：军统局重庆站江津稽查处派出一个科长，以演员的身份进入“民众剧社”，这科长叫何名苦，自称是云南师范学院学艺术的。他天天都来与大家一起排练，实际上是对大家进行监督。

江津的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加上敌人已打入“民众剧社”，一切活动都在特务的监视之下，几名党员与周德华等一商议，决定撤离江津。由于国民党军警宪特对“民众剧社”盯得很紧，因此撤离的办法是暗中分期分批进行。不到 10 天时间，十多位“民众剧社”的成员全部安全撤离江津，他们有的回了江安国立剧专，有的到了泸州，也有的到了重庆。历时近一年的“民众剧社”划上了句号。

解放后，叛徒刁之鲜被镇压。这些当年来江津的江安国立剧专学生，大多成为知名人士。曾强成为著名的剧作家，曾在湖北电视台等工作。王杰曾任北京《电影艺术》副主编。周德华参加抗美援朝，牺牲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成为革命烈士……

（原载《宜宾晚报》2012 年 9 月 3 日副刊版）

江津酒与历史文化名人

江津是有名的酒乡，酿酒历史久远，酒文化底蕴深厚。乾隆本《江津县志·赋役志》记载，早在明朝嘉靖年间，江津就缴纳土贡“酒税钞八十五贯八百元”。这是记载江津酒最早的文字。按此推算，江津酿酒已有460多年的历史。清末民初金融学家周洵（字宜甫）所著《蜀海丛谈》记载了四川酒税收入“以江津、泸州、绵竹等湘妃产酒之区，收数最旺”。民国版《江津县志》云：“高粱津人多种之”，“以之造酒”，“县城外白沙游溪及各场多有造酒人家，俗呼糟房”。“此酒上销成都，下销宜昌沙市各地”，“江津产酒甲于省”。“川省每年出酒二万万斤以上”，“江津产酒达四千多万斤”等等。民国四年八月，江津在鞍子街成立烟酒公卖局，在县属八处水陆要道（出县口）设分卡稽查酒商……

《白沙镇志》载：“清朝初年，白沙酿酒业兴起，当其盛时有糟房300余家。白沙烧酒驰名全国，糟房多建在镇西驴溪河畔，形成一华里长的糟房街”。这是史上最牛独一无二的“糟房一条街”，现在这里仍叫原名。江津烧酒民间又

称“老白干”，有民谣说：“江津豆腐游溪粑，要吃烧酒中白沙”。到民国初年，白沙槽房仍有 230 多家，每日产酒 4·6 万斤，年产达 1000 万斤以上，远销全国各地。酿酒取水的驴溪清澈见底、含矿物质极微，以此水酿酒，品质极佳。1944 年，爱国将领冯玉祥到江津宣传抗日，喝了江津“老白干”后感慨地说：“好水不过驴子溪，好酒不过老白干。”这里因酒而兴，因酒而起，成为誉满巴蜀的文化名镇和商贸大镇。

抗战期间，江津全县有槽房 389 家。抗战艰苦卓绝，坦克、汽车、飞机等动力原料紧缺，全靠酒精。从 1941 年至 1945 年间，每年江津向战区生产酒精 1700 多吨。江津的酒业为抗日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

江津不仅是酒乡，而且还是联乡，是文化大县，历史文化名人倍出。清末钟云舫是历史文化名人，被今人誉为联圣，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包括“史圣司马迁、诗圣杜甫、画圣吴道子、书圣王羲之，词圣苏轼”在内的“文化六圣”之一。他学识渊博，遍览经史百家之书，工诗文、词曲、尤善对联。清光绪年间，因撰写对联嘲讽贪官知县被迫远走成都避祸。回来后不久又遭污陷，被羁于成都提刑按察司待质所三年。在此他创作了天下第一长联《拟题江津县临江城楼联》。光绪三十二年回津后，著《振振堂联稿》四卷，《振振堂诗稿》二卷、《振振堂文稿》二卷，联稿收录对联 1850 副，100 字以上长联 10 副。在清末和民国期间，《振振堂》再版多达 5

次，它是中国楹联史上最为经典的著作。

和大多数中国文人一样，钟云舫也是个善饮之辈，他一生痴爱江津酒，对其酒文化领悟颇深，酒文相依，在他所创作的诗歌和楹联作品里，也散发出浓浓的酒香。钟云舫颇具个性：纯直、刚劲、豪气，不渗半点杂质。其门人、《振振堂》集的辑注者郑坝描写钟云舫在书写对联时常是“左执樽，右执管，泼洒而就”。因他贪杯，“中酒染疾”，光绪七年（1881年），34岁的钟云舫在高牙场教塾馆，得了一场差点夺去他生命的大病。他有一个最好的酒朋友叫张松生，他们“十年交好，西窗痛饮，爪战欢呼。美酒一盅，佳肴数品，倾心吐胆，醉不言归。良夜迢迢，谈心至晓。”（钟云舫《与张松生化袂文》）由于他与张松生等长期无度酗酒，使身体受到了严重的损害，这年四月生病，多方寻医问药，不见好转。病入膏肓、痛苦无限，他想这回是无可医救了，只得等死，但阎王不招留他，五月中旬病愈，但他不敢喝酒了，而且还感到非常厌恶酒味，一闻到酒味就“熏熏欲呕”，于是他趁此戒酒。

就在他重病前一个月，他的酒朋友张松生同样因滥酒而生疾，得了一场大病，多方寻医无果，四月初八去世。钟、张二人最为“意合情投”，张家本把丧信告诉了钟家，但此时钟云舫也生重病，家人担心这噩耗将会使他病情加重，因而就没有将丧信告诉病榻中的钟云舫。钟云舫病愈一月后，

家中人才告诉他，他听后泪流满面，久久说不出话来。他立即写了祭文《与张松生化袱文》，包了袱纸，一人蹒跚地来到张松生的新坟前祭奠这位最好的酒友。数月不见，现在竟是一堆黄土，钟云舫潸然泪下，以泪和墨写下挽联——

我病不寻常，一月弥留，几致幽魂从地下；

兄归何迅速，十年交好，竟无杯酒奠灵前。

钟云舫戒酒数月，但就在八月中旬的一天晚上，他梦见自己又在张松生家，如似从前，两人举杯痛饮，淋漓尽致。

“自此之后，渐而思饮，渐而小酌，渐而手不停杯……”他又开饮酒了。以后多年，他在睡梦中都与张松生西窗痛饮，爪战欢呼。钟云舫说：想必张兄在阴间冷落，无人陪酒，待我将祖母、儿女“大事卸肩”后，定来继续陪他饮酒……

钟云舫的第二个特别好的酒朋友是杨爽山。杨本是四都团副，四都团正是钟云舫堂叔祖钟平之（字体端）。清同治三年（1862），钟平之和杨爽山率乡团在高牙场、鹤山坪寨等地阻击石达开进攻江津获胜。时钟还是个少年，几年后他们就成好朋友。他们经常一起喝酒，一文一武，相得益彰。俩人都是性情中人，相逢必饮酒，饮酒必划拳，划拳双双醉。在钟云舫的《饮杨爽山家即席》一诗中，一个秀才、一个乡勇，双双饮酒的豪爽之气栩栩欲活——

爽山豪爽不可当，花间一醉酒千觞。

奇花满地皆矜贵，入室但闻王者香。

是夕开东阁，邀余同小酌。
瓜战群雄欢复哗，长鲸吸浪蛟龙渴。
英雄知遇讵文章？休把儒生恼汉王。
且饮一杯歌一曲，天高地阔容我狂。
爽山笑曰君言是，天与斯人早位置。
闲评花史邀醉侯，武乡事业陶公志。
一壶未尽诗成篇，今我何如李谪仙。
举觞问花花不语，秋在人间月在天。

钟云舫 30 多岁时曾在渝州城内游学，他住在客栈内，一天傍晚正在客栈内小饮，突听隔壁传来琵琶声，原来是一歌妓在演唱，这歌妓离家十年，还深恋着丈夫。钟云舫由此及彼，想到白乐天所遇到的琵琶女，想到自己的爱情，他无不伤心感喟，由小酌而狂饮，既而与她共饮，当晚钟云舫写下《渝州即席》诗。郑垕对此诗批注云：“一老妓耳，而卷卷恋旧，情深若此，天下惟多情者能种情，亦惟多情者言情耳”。

十年一梦感沧桑，卿已蓬头我鬓霜。
手把琵琶诉往事，夜深零雨打秋窗。
纱窗绿映红绫袄，歌罢怜依歌懊恼。
相知只问情有无，那管桃花春既老。
旧酿春醅白玉浆，双卮擎着劝亲尝。
此中甘苦君知否，惟有离杯味更长。

花非恼树轻离别，无那秋风振秋叶。
咬定情根死不松，地远天长有今日。
急水滩前不紧舟，雨淋铃夜感漂流。
大家含着酸辛泪，莫与愁人添别愁。
今宵且共樽前语，我为楚歌卿楚舞。
生生世世有情天，此后更烦娲母补。

忠州杨裕勋，字建屏，别号笑笑居士，同治时的廪膳生员，研习书画，尤长于画荷花，人称“杨荷花”。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65岁时任江津教谕兼摄训导。他对钟云舫的才华和师德师风非常赞赏。一个地方教育长官，一个是塾师，一个画荷花，一个写对联，两人最为交好。杨建屏“冷署常开北海樽”，隔三差五请钟云舫到学署内对饮，推心置腹，谈文说艺，每次都是畅谈达旦，“醉眼而归”。杨还给钟看他画的修建在母墓旁的墓庐，钟云舫特写《题杨建屏学师墓庐图》诗，该诗记下了他俩“酒逢知己千杯少”的情形。一年半后，两人都被牵扯进“举诉县衙赤旱之年加收税赋”的“粮章案”中，杨被解职归乡，他活到84岁，民国十年（1921）才过世。但钟早在清宣统三年（1911）就离开人世，他得到钟辞世的噩耗后，无限伤感，在长江边为钟云舫置酒祭奠，还撰写了挽联——

终生欢喜不知愁，善书、善画、善饮、善诗，得一钱
用一钱，竟忘却我为何人，今是何世？

过眼繁华真若梦，有花、有酒、有园、有榭，去几日
乐几日，能如此生而无恨，死亦无悲！

钟云舫每日中、晚饭前必饮酒，独个在家也不例外。夫人谢氏是贤妻良母，还要给他弄上几个拿手小菜，然后陪他小酌，红袖添香，其乐无穷。谢氏五旬生日，家中办小宴庆贺，夫妻对饮相戏，儿孙把杯相敬，真是天伦之乐。钟云舫有二联记录了此事。

其一：

儿奉酒，孙奉羹，但凡瓜葛之亲，予小子其退；
卿祝老，侬祝少，且把菖蒲作酒，我二人共贞。

其二：

二三辈，嬉游儿女，何解称觥，惟好取蔬食充肠，对此红榴，倾兹绿酒；

五十年，贫贱夫妻，忽然伤老，愿各向情天稽首，拔我白发，还汝朱颜。

光绪三十三年(1807)农历8月初9是钟云舫60生日，他从牢狱中出来不久，本也身衰力竭，仲子德廉已逝，季子德谦远在日本。陪他饮酒过生的只有夫人谢氏和门人郑埭，他心恢意冷，倍感凄凉，只借酒消愁，喝得个淋漓尽致，还写下一副《六十自寿联》——

笑我菲材，六十日耆当指使；
与君共醉，十千沽酒莫辞贫。

一次，钟云舫与朋友一起喝得酩酊大醉，回家后诗兴大发，挥毫写下《醉歌》长诗，该诗想象神怪离奇，曲曲折折，古奥深邃，是一首充满着浪漫主义彩色的诗歌。

钟云舫师友多，联友多，酒友多，又爱打抱不平，因而请他喝酒的人特多。加上他豪气、耿直、干练，所以常喝醉。本是个非常较真的人，喝了酒，更敢直言，各方是非都要进行批评和讽刺，对县衙内的官吏更是讽刺无遗。因而他不仅得罪了一些朋友，还得罪了官府。白溪场望族江镜轩乃书香门弟，他和钟云舫都是秀才，他俩在县城客栈里因喝酒而相识，熟悉后相互交换诗联，互为唱和。但江镜轩酒量不大，喜酒而不嗜酒，每次只能用一小盅，而钟云舫每次都是几大盅，他喝得面红耳赤，然后对江镜轩和各个师友、文友品头论足，甚至吹毛求疵、横加指责，“暴气凌人，不可一世，辄肆口谩骂”。对县衙更是写诗题联进行批判，得罪一大拔人，“几於毁冠弃弁，便溺儒生，终属贾祸之道……”。江镜轩是挚友，深知其秉性，因而从不记较，反而多次规劝他，“酒后耳熟，气旺胆大，口无遮挡，万不能妄加指难他人”，他还多方到被钟云舫谩骂的朋友家中替他开脱，说钟“心胸耿直，只酒后乱言”等。后来钟、江两家成为亲家，钟云舫长女嫁了江镜轩的儿子江少轩。钟江两秀才，因酒相识，由酒友到文友，再到亲家，也算江津酒历史上的一段佳话。

光绪二十九年(1903)，钟云舫蒙冤被羁押到成都提刑按

察司待质所，官府对他实行“不质不询不释”的“软打整”，他被整整监禁了三年。三年凄风苦雨，夫人谢氏非常牵挂他。她想起在家时夫唱妇随，时时为他斟酒添菜的情景，无不伤感落泪。在牢笼里谁人能为他斟酒？第二年中秋之际，谢氏写了《薄命伤寄外诗》托人送到给丈夫。诗中有四句是这样写的——

偶然惦记好时光，两年孤零独称觞。
有谁杯酒助清狂？妾稽首为君筹一觞。
心随明月进君旁。进君旁，劝君尝，
此中点滴血成浆，怎不教人泪两行！

此后，谢氏又托去成都的熟人如丁剑秋、龚农瞻等给丈夫捎去江津酒。就是因为有江津老白干的浸润和滋养，牢笼中的钟云舫在无一书可参考的情况下，也是灵感如泉涌，文思尽飞扬，写下了被今人誉为国宝的 1612 字的天下第一长联《拟题江津县临江城楼联》。这也算是江津酒对中国楹联艺术的伟大贡献吧。

光绪三十二年（1906）钟云舫走出牢笼，他身体很差，但嗜酒不改，只是在量上有所缩减。他朋友刘靖成的二弟在游溪场开张烧酒房（糟房），他执意要前往庆贺，并送去了贺联——

遍地植春风，桃花尽饮刘伶酒；
沿山开夏屋，杨柳相依白传邻。

钟云舫既是好酒之人，又是楹联高手，城中各大小酒肆和白沙、龙门滩、仙峰、仁沱等场的许多糟房都有他撰写的楹联，特择录几副供其雅赏。

不算英雄三几杯何必尽推尽让；
莫装醉汉一两吊还须现吃现开。

在红尘浪饮三杯打开怨府愁城显露得将军赤面；
有清风不能一醉叫做怪肠俗骨辜负了年少青春。

此是便益坊君子有酒宾式燕；
何须老鼓板众人皆醉我独醒。

一炉火候观蒸气，
十里春风闻酒香。

提瓶酒来醉醺醺好谈千古事；
扯张席坐香馥馥偏啜五侯鲭。

饕餮用百有二十品；
醉到一万八千年。

糟邱生何处提壶当由灌口；

麴秀才于此加烤量有作头。

斯人待我行觞政；

此地封侯得醉乡。

浓淡相兼愿与醉侯斟酌去；

圣贤同道曾经麴部品题来。

好从箱口觚涪水；

喜得泥封向酒泉。

诗人无酒苦吟哦，笔蘸酒墨写华章。钟云舫对江津酒的嗜好已达到了痴迷的境地，清冽纯正、醇甜柔和、馥郁净爽的江津酒催生出他诸多的创作灵感，对酒当歌，他成就了联坛圣人的地位。但钟云舫过于贪杯纵盞，这酒又使他时常进入某种虚幻的精神陶醉境地，他在麻醉中体会到社会的不公和人间的无奈。

下面几个名流对江津酒的爱好的钟氏相比却又是一番情趣。

1938年，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流寓江津，住鹤山坪石墙院。60多岁的他因疾病缠身显得非常苍老。其实，年轻时叱咤风云的陈独秀是非常喜爱饮酒的。他早年从日本留学归来写了一副对联送同学台静农——

坐起忽惊诗在眼；

醉归每见月沉楼。

不久，陈独秀到杭州，与北京大学同事、著名学者沈尹默相交甚密，他们过的仍是一种“诗酒豪情”的生活，两人常常狂饮作乐，陈独秀还作了一首诗——

垂柳飞花村路看，酒旗风暖少年狂。

桥头日系青鬃马，惆怅当年萧九娘。

由此可见，早年的陈独秀也是一个非常嗜酒的先生。后来由于他进行革命，经历了一次劫难、八次被通缉、四次被捕入狱，流寓到江津后，身体每况日下，所以他不能饮酒。但每当他慢步江津街头，偶尔从酒肆中飘飞出能使半街生香的酒味时，他又垂涎欲滴。1940年初冬，他应邀到鹤山坪下坪参加一个农家青年的结婚宴，他先品醮了一小点，这酒太醇香了，于是喝了两杯，晚上经不住诱惑又喝了两杯，“闹洞房”时，他第一次看到这男女老少和尊卑不分、对新娘乱说乱动的“狂闹”民俗场面时，酒兴和诗兴大发，平时是“谦谦君子”的“陈先生”也动起手脚来，还写下了一首《江津乡间闹房酒》的诗——

老少不分都一般，大家嬉笑赋关关。

花如解语应嗤我，人到白头转厚颜。

次年农历5月初5，流寓到江津的文化名流聚奎中学校长周光午、国立九中教师何之瑜、女子师范学院教授、国立

编译馆编辑台静农、魏建功为屈原祭日设酒聚饮，他们大饮江津老白干，全皆大醉。独自在石墙院闻知此事的陈独秀不由得又触发出一番感慨。这些人都是他很好的朋友或学生，他们以酒会友，以酒凭吊先人，怎么就不邀请我？他们应该知道我也是一个性情中人，也爱诗爱酒爱屈原……于是，他怀着一种伤感和受人冷落、遗忘的复杂心绪写下《闻光午之瑜静农建功于屈原祭日聚饮大醉作此寄之》一诗——

除却文章无嗜好，世无朋友更凄凉。

诗人枉向汨罗去，不及刘伶老醉乡。

著名诗人吴芳吉可说是中国诗界人人皆知的人物，白沙聚奎是他读小学时的母校，他常常穿行于槽房街，后来他又主政江津中学。他对江津满街满城酒香的情景是再以熟悉不过了，对此他创作了一首《几水歌》——

几水真真好，津城处处垆。

江团青玉盏，竹笋少娘厨。

酒贱无须知价饮，街平不必倩人扶。

猜拳故意输，爱客谁能如？

国学大师王利器也曾创作过二首关于江津酒的诗歌，这可见他对江津酒的倾心程度。大师在作品中描写了醇厚甘美、浓郁爽口的江津美酒飘香山野和江津美酒处处醉到乡客的景象。

其一——

广柑美酒数江津，桔绿橙黄景物新。
识得东坡诗句意，嘉名肇锡洞庭春。

其二——

白干白屋入诗篇，喜见街头有醉仙。
酒贱无须知价饮，名高岂虑少人传。

著名通俗文学作家聂云岚和著名书法家周浩然对江津酒也是情有独钟。聂云岚有诗写道——

客到江津酒当茶，豪情佳酿两堪夸。
杯倾液溢梅花醉，坛启香熏冷月斜。
不惜虚荣高身价，愿将醇馥暖天涯。
惟逢感世方兴瓮，随伴欢娱入了家。

周浩然的诗作曰——

酿成琥珀流霞，香甜味美堪夸。
质优营养丰富，巴蜀果酒名花。

说到对江津白酒业发展的关心，最不能忘记的当是我们敬爱的共和国开国元勋聂荣臻元帅。他在回忆录中多次写到江津白酒。共和国成立后，家乡人民常去看望他，捎的礼品中更少不了江津酒。他除留一部分自己品用外，一部分送给战友或同事，这时他就会喜上眉梢、情不自禁地说，这就是我家乡最有名的老白干。1955年他回到阔别32年的故乡江津，在听了当时的县委县政府工作汇报后，他关切地说，江津要大力发展食品工业，要将具有悠久历史的优质名牌产品

发展壮大，特别是江津老白干等，要走出江津，走进北京……如今的江津酒业也成为江津重要的支柱产业，江津酒厂也成为全国最大的小曲清香型白酒生产企业。中国糖业酒类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兼高级经济师、中国酒业商业协会副会长刘锦林先生在赞叹江津酒时说：“巴蜀名酒，清香鹤立，神州大地，几江横溢。”

说到江津的酒文化名人，古玉辉这个人不得不提。时下江津人对他知之甚少，但他对巴蜀的白酒产业是有重大贡献的。众所周知，郎酒是我国两大酱香型名酒之一（其一是茅台），然而郎酒的创始人正是上世纪二十年代末的江津县吴市乡大屋基人古玉辉。他生于 1888 年，青年时曾在江津的多家糟房当过伙计，对各个糟房生产工艺流程非常熟悉。后到贵州赤水、土城与古蔺二郎滩人雷绍清合伙经营布盐，在游溪、吴市、璧山丁家坳等地设立经理部。1929 年他向雷提出筹办“集义酒厂”，成功酿成了“回沙郎酒”，取名郎酒，引起酒界轰动，后逐渐发展成为大户，直到解放，酒厂仍是古氏、雷氏等经营，后由人民政府接管。可以说，郎酒厂的创办，来至酒乡江津的古玉辉功大莫焉。

（原载《食都文化》2012 年第 5 期总 15 期）

两岸共同的记忆

——作陪国民党党史高官邵铭煌

上级安排我陪同“中国国民党党史馆抗战遗址寻访团”来江津的寻访。我有两个任务：一是在座谈会上代表我方介绍江津县开展抗战活动和现在抗战遗址遗迹的保护情况，二是在途中向国民党这个寻访团对各个抗战遗址遗迹作更细的说明……

台湾“寻访团”共有4名成员，他们是：中国国民党党史馆馆长邵铭煌先生；邵先生夫人童淑纯女士；台湾“中正纪念堂”展览部主任张美美女士；台湾“中正纪念堂”展览研究员林佳桦女士。

此外，重庆方面也有陪同人员，他们是重庆市委抗战工程办的朱高建处长和何林同志，《红岩春秋》杂志社的杨山山和吴莎莎两小姐。江津方面陪同的有区委常委统战部长翁一丰和区委常委宣传部长辛华，当然也有我这个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作为一名中共党员干部，我深知国共两党的恩恩怨怨。

在“四·一二”和井冈山五次反围剿等等大大小小的历史事件中，国民党屠刀下流淌着成千上万共产党人的鲜血……虽时过境迁，大陆不计前嫌，两岸坚冰开始消融，但要我作陪接待国民党高官，且又是第一次，所以我心理上也得作一些调整。我们虽为党史同行，但毕竟立党不同，主义来同，信仰不同……

中国国民党党史官员到江津，原因是江津这地方留下的许多抗战遗址遗迹。换句话：就是有值得寻访的地方。

抗战全面暴发后，国共两党合作，重庆成为“陪都”。江津县处于重庆近郊，交通方便、境域宽广、物产丰富，是陪都人员疏散的重要区域。同时承担安置了从沦陷区迁来工厂、机关的任务，是当时有名的“迁建区”。来自安徽、江苏、浙江、湖北、湖南、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大量难民涌入，当时统称为“下江人”。当时江津就有4所高校，4所初等专业学校，4所初等师范学校，8所完全中学，16所初级中学等共计各类学校37所。与此同时，国立编译馆、中央图书馆、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会、军政部被服厂等文化机构和工厂也迁江津。陈独秀、冯玉祥、于右任等众多知名人士先后客居江津或多次往来于此。几江和白沙两镇就有公开出版的报刊10家，书店14家。江津的白沙坝、北碚的夏坝、渝中的沙坪坝、成都的华西坝被称为“中国抗战大后方四大文化区”，又简称“文化四坝”。

正因如此，江津才留下众多的抗战遗址踪迹。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资料显示：江津境内有抗战遗址遗迹 35 处(单体文物 54 个)。2009 年，经重庆市文物委员会评定并公布挂牌保护的抗战遗址遗迹有 25 处，占重庆总数的 20.8%。其中，几江街道 6 处、夏坝 1 处、白沙 18 处。此外，有近 20 个镇街零星分布着目前尚不属于文物范畴的抗战遗址遗迹。

在陪同方案上，我发现寻访团的线路中，只有白沙镇的朝天嘴码头、国民政府审计部遗址、夏公馆、新运纺织厂、聚奎大讲堂 5 处。这几处固然重要，但另一处位于白沙街上的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会遗址没有列上，我感觉得事后可能会带来遗憾，就建议补上，因来访者身份是国民党党史官员，让他们寻访“老家”，会产生共鸣。这建议很快就得到回应，方案制定者欣然采纳。

5 日上午寻访团本应由重庆乘车到江津，上午座谈，下午到白沙寻访，但早上邵铭煌先生在由重庆来江津的车途中突然提出要“看一看聂将军纪念馆”，既然他主动提出，我方就爽快答应。须知先前是没有安排他们参观聂帅纪念馆的，原因虽有些微妙，但细想不无道理：聂荣臻是打败国民政府、建立新中国的十大开国元勋之一……让作为今天客人的国民党党史官员参观聂荣臻纪念馆，会忌讳的。

聂荣臻元帅纪念馆各展厅是按聂帅革命生涯的时间来布置了。分为青少年时代、寻求真理、长征途中、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科技主帅等部分。到了纪念馆，由于事前没有给解说员细说客人的特殊身份，他们就如同平常一样解说。邵铭煌先生一行走到“聂荣臻青少年时代”展厅前，解说员一口解说道：聂荣臻青少年时代，国民党政府腐败黑暗，民不聊生……

邵铭煌先生突听解说词，眼睛突然闪动了一下，但他很快就镇静下来，做出什么话也没有听到的样子，只是提快了朝前走的脚步。我等跟着很快就来到聂荣臻参加南昌起义的照片下，他稍一停顿，看了一下照片下的文字说明，这时跟上的解说员又解说：这照片是聂帅参加八一南昌起义时照的。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打响的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邵先生等四人听了这话后，径直往前走去。

我站在邵先生的身边，感到有点难为情，想对他解释一下，但他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我还没说完，他就笑着对我说：没关系，没关系……邵铭煌先生大概不想在这几个展厅作过多逗留，他一边说一边朝“抗日战争”展厅走去……

我回过身来悄声对朱高建、何林说：我能否提示一下解说员，因客人身份特殊，注意一下解说中的措词。但二人都说没这个必要，他们以前接待过邵先生等……

在“抗日战争”展区，邵铭煌先生等四人显然放慢了脚步，他几乎对每一件文物，每一张照片都看得非常仔细，他站在聂荣臻穿过的一件粗布八路军军装展柜前看了很久。我

走到他跟前说:这八路军军装的布料是土布,你看这纱很粗,有的纱都起疙瘩了……他没有直接回答我,也没有回过脸来看我,只自言自语地说:当时国军的军装要好得多……

到了“解放战争”展厅,邵铭煌先生的步伐又自然加快。当他突然走到了一张放大的《晋察冀日报》照片下,报纸的下端有“蒋介石一定失败”7个非常醒目的大字,真是一目了然。他在这里站了一下,看着这7个大字,心里好象产生了一丝沉重,但这沉重很快就消失。我走过去对他解释:这文物……不想我还没说完,他就回头说:没事,没事,这是事实。我们的蒋先生是被共产党赶到台湾去了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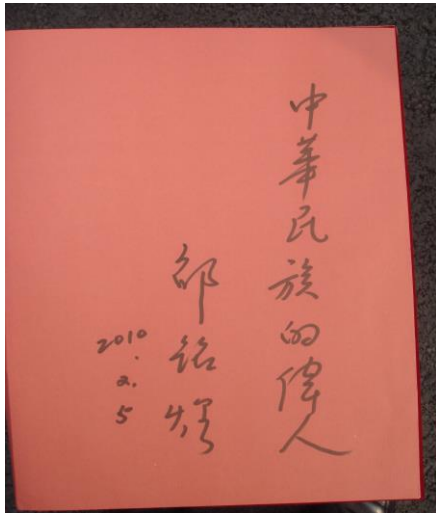
在第四展厅也很有趣。展区的红色大标题是《新的长征》,邵铭煌先生站在这个红色大标题下是满脸疑虑。他对“新的长征”这四个字好象琢磨不透,难道中共又要走长征路吗?他居然问解说员:这新的长征是什么意思?解说员回答得很妙:这是寓意,指我们不怕困难,继续前进。

……

参观结束后,大家来到门厅准备乘车离去。不想馆里的工作人员取出“留言簿”请邵铭煌先生留言。我几乎觉得这是一道难题,他也显得有点难为情。我说:邵先生如果方便的话就写几句吧……

他提着笔连连说道:写什么好呢?写什么好呢……?这时大家都在猜想他会写什么。片刻,他很快就在留言簿上竖写

下 7 个大字——中华民族的伟人!



这是一个有着国民党党史高官身份的人对聂荣臻的评价，这难题没有难住邵铭煌。大家松了一口气，他正要填写日期，不想他抬起头问大家：今天是好多年好多月好多号呢？大家突然感到好笑，原来国民党的党史高官居然不知天日，是他大智若愚还是幼稚？我笑着回说：今天是 2010 年 2 月 5 日。他很快落笔写下这日期。后来我们才醒悟：他邵铭煌在台湾，用的是中华民国年号，回到大陆，一时没有记起来……

我们得抓紧时间赶到区政府会议室座谈。因为下午我们还得去白沙。翁一丰部长主持座谈会。辛华部长致辞，他首先对国民党中央党史馆寻访团来津表示欢迎，然后介绍了江津的历史人文和经济发展况，最后提出希望两岸进行抗战文化的交流等建议，邵铭煌先生表示赞可。

我的发言分为两部分：一是江津人民对抗战所作出的贡献；二是江津抗战遗址遗迹的现状 & 保护情况。江津人民对抗战所作出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出钱、出力、出粮、出。

以出人为例，当年江津有4万多壮丁作为兵员络绎不绝地补充到抗日战场上，而这4万多人绝大多数都牺牲，但江津县档案馆仅只有50多人的阵亡通知书。江津这4万多抗日军人绝大多数没有了档案，成了无名英雄——当然也有一部档案被运到了台湾。

我还向大家展示了不久前征集到的当时江津县长兼优委会主任委员肖烈向出征抗日的聂春台家属签发的“杀敌光荣”的荣誉证书。对这份珍贵的抗战文物，邵铭煌一行非常感兴趣，他们传看了许久。他还说：台湾现存的抗战文物和史料中，有一些涉及到江津，我们可以互访，共同开发抗战文化……

座谈会上，白沙镇党委书记秦敏也介绍了该镇抗战遗址遗迹的情况。邵铭煌、张美美、林佳桦先后发言，座谈会在充满和谐和热烈的气氛中结束。

邵铭煌先生是一个很容易接近的人，所以不论是午餐时分还是下午去白沙镇的途中，我都尽量与他接触。在辛华部长的指点下，我干脆换乘与邵铭煌先生同一辆车，这样我们更便于交流。我谈起了抗战史研究专家周开庆，邵铭煌知道周开庆，但不知他就是江津人，他希望我向他介绍一下周开庆早年的身事和家事。好在我前不久写过一篇关于周的文章，有关周的信息全派上了用场。

在台湾，国民党党史工作和研究机构叫“党史馆”，隶

属于中国国民党中央文化传播委员会，通常称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馆，馆长又常称作主任。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下面包括省县一级是没有党史工作机构和研究机构的。

区政协副主席唐德玉赶来陪同。到了白沙镇，大家一起参观了朝天嘴码头。这是白沙最大的进出口码头，很有点重庆“朝天门”的样子。当年抗战的军队，机关等等在此走过长长的石梯，或上船或下船，很是繁忙。如今这个码头还基本保留了当年的风貌，站在码头上，面对滚滚长江，想象着当年这里的人和事，顿感世事的变迁和沧桑……

在白沙，邵铭煌先生看得最仔细的算是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会遗址。在这条小街上现在虽然四处都是现代建筑，这砖木结构的小楼已有些破损，显得风雨飘摇，但仍是格外引人注目。邵先生很感慨：我一定得好好看看……他站在门前凝视很久，与夫人在门前单独照像后，又与大家一起照。他还登上二楼、三楼，对每一间房间一一细看，在他的脑海想象着当年同行们在这里工作的情景。邵铭煌说：我知道当年为了防日机的轰炸，我党的许多贵重党史资料都藏匿陪都重庆近郊巴县含谷场的胡家山洞里，山洞有少许士兵守护。而党史编纂人员则分住在巴县比邻的江津县白沙镇，但具体在何处我不清楚，今天终于寻访到这地方。我这也算是回老家了……

是的，60多年过后的今天，作为国民党党史高官，终于

来到了他的前辈同行们工作过的地方。现是人去楼空，世事巨变，这怎不叫他生出无限的感喟来。

在白沙我们还陪同邵铭煌先生一行参观了陈独秀当年对青年学生进行励志和抗战演讲的鹤年堂。邵先生说：陈独秀也好，聂荣臻也好，都曾经是我们国民党的朋友，聂荣臻还是黄埔军校的教官，又是国共合作期间著名的抗日名将，这些都是我们国民党史研究的重要人物……

很有趣的是邵铭煌先生在黑石山于右任题该处和新运纺织厂前的表现。于是大书法家，是国民党的元老，时任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后又在台湾任高官。抗战时他到黑石山为聚奎中学题写了“奋乎百世”。新运纺织厂是当年宋美龄为配合蒋介石所倡的“新生活运动”而主持开办的一家妇女企业。这背景材料对邵先生研究国民党党史是非常有用的，所以当他站在于右任题刻前照像时，特别提醒工作人员：一定要将题该的全文和于先生的署名一同照下。在新运纺织厂，他第一次照像时没有照下陈旧的“新运纺织厂”老牌子，只照上现在的新厂名，他就再次站在老牌子下，要求从新拍照。

在白沙镇邵铭煌一行还寻访参观了国民党审计部遗址、抗日名将夏仲实将军公馆、七七纪念堂、郭沫若题刻等等。他很有感触地对我说：我是第一次到江津，真没想到抗战时在白沙这个地方留下这么多东西，这太值得我们去研究去挖掘

了……

由于邵铭煌先生的开朗，我俩的交流很容易达成共识，我们交谈得很愉快。他将我称作同行，但他又对我说：不过，你研究的是中共历史，我研究的是国民党历史……。我说：国共两党历史上有过两次重要的合作时期——

说完这话，我俩都笑了。在我们俩的交谈中，我忌讳的一些话题他反而不忌讳。比如他说：我们的蒋公和他领导的国民政府被毛先生领导的共产党打到了台湾，这是事实啰……但我也发现，他与我交谈一些较敏感的话题时措辞也是非常注意的。比如我们上午在聂荣臻纪念馆，大家都称聂荣臻叫聂帅，而他多是说聂将军。再有就是他二三次谈到“毛先生领导的共产党将国民党打到了台湾”或“赶到了台湾”，这“打到”“赶到”文字是很有意思的。从这点看，邵先生倒不像只是一个单纯搞历史研究的学者。

在我们往返白沙镇的途中，看到高速公路两侧飞速过而的一处处农家小楼院，邵铭煌先生发出感慨：江津这地方真不错、真漂亮哟……

在午餐和晚餐时，我都几次向邵铭煌先生敬酒，他也非常乐意接受。我一边敬酒一边给他讲抗战时国民党中常委、副委员长冯玉祥到白沙镇驴溪河的槽房街宣传抗日的事，当地人用江津白酒“老白干”招待冯将军，冯将军饮后写下“好水不过驴子溪，好酒不过老白干”的“丘八诗”句，邵先生

不乏风趣，他听后会心一笑。我俩举杯对饮，我对他说：邵先生，我俩来个合作，一同举杯将各自杯中的剩酒喝完……他连声说：好、好、好，我们将这‘鬼子’一口干掉……

晚宴比午餐更有趣。在外公干的区政协主席王忠德特地赶回作陪，他是一名学者型领导，在与寻访团等人的交谈中大谈两岸文化和民俗，头头是道，邵铭煌等一行无不点头称道。同午餐时一样，邵先生都要送礼品给相关人员，他将一副大红春联送给王主席。我们有点纳闷：隔春节还有一段时间，这么早就送春联？原来，这第二天就是过我国北方和台湾等地区民俗中的“小年”了，这红色春联文字很短，只有“福虎生风、万事亨通”八字，春联的落款是“马英久肖万长同贺”字迹。忠德主席接过春联，全桌人鼓掌。

邵铭煌先生又站起来向忠德主席说：今天我还要送你一个大红包——忠德主席一听说送红包，立即说道：邵先生，红包的我不要……邵先生立即解释：主席先生误会了，我这虽是红包，但并没有金钱财宝，我这红包是对主席先生的一个红红的大大的祝福和祝愿……大家又开怀大笑起来。

席间，江津方面也向国民党寻访团的各位客人赠送了礼品。

……

晚上约八点，我们送别客人。邵铭煌一行要随重庆市委抗战工程办的朱高建、何林等一同回到重庆下榻的宾馆。邵

先生高兴地说:我们第一次到江津收获很大,我们寻访到了许多抗战遗址遗迹。今天我们也过得很愉快……大家握手言别,相互请邀访问,江津欢迎你,台湾欢迎你……

(原载《重庆政协报》2010年4月9日)

江津笋溪河“圣旨碑”

在江津区李市镇两岔村笋溪河西畔，一条简易的机耕道下面是一大坡的乱石，乱石中有一陡峭的石壁，石壁四周长满茂密的绿竹，这石壁上有一个早在清末和国民时期就远近闻名的古碑，这就是笋溪河“摩崖圣旨节孝碑”。

摩崖碑亦作磨崖碑，它是指镌刻在山崖或石壁上的文字、图案等，并凿之成碑状。其特点一是直接以自然崖壁为载体，呈现不可移动性。二是形式多粗犷、奔放、随意，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给人以质朴真率、心旷神怡之感。摩崖碑是我国石刻系列中一大支系之一。

现在，江津许多当地人均不知道此处还保存着比较完好的摩崖古碑。因为这古碑被一簇簇茂密的竹林所掩映，又在一片陡峭的乱石山坡上，四周杂草丛生，没有了道路，坡下是湍急的笋溪河。若要去探幽此碑，真的需得披荆斩棘，扶竹牵蔓，小心翼翼，慢慢挪步下行。

其实，很早前这里是有一条宗大路的，而且这路很热闹。它是由江津两岔场沿笋河去沙埂场，再去江津县城的大路，以前的大路多是沿河相绕，这路上每天可是轿马不断。但是，后因沿着这笋溪河修筑农业机耕道（简易公路），公路修通

了，原来的宗大路毁了。摩崖古碑在修公路下，幸没有在开山取石时毁掉，但四周全是乱石和杂草及修竹。时过境迁，现在的老年人全都忘了古碑，后来的人根本就不知有此古碑。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说，还保护了摩崖圣旨节孝古碑。

摩崖圣旨节孝碑颇为高大，宽约1米，高约3米，中凹外凸，顶部刻有龙凤腾飞的图案和狮头等图案。“圣旨”二字历历在目。正中所刻“旌表幸启贵之妻刘氏节孝”十一大字非常清晰，笔法雄健有力，遒劲隽秀，自成一家。右刻有小字：大清同治四年二月十一日 六年四月初十奉立。左刻小字：龙飞光绪元年乙亥六月朔一日竣，下刻立碑人姓名，有子、孙、曾孙、玄孙十余人。其于所刻小字虽辨识较难，但也能猜度出一些内容。

摩崖圣旨节孝古碑两刻有一副对联。该楹联字体清丽刚劲，笔法娴熟老成。其联曰——

矢志抚孤为山河生色；

镌碑表道与日月增光。

此联对仗公稳，寓含深刻。前实后虚，虚实相应。虽短小精练，但大气浑圆，别有新意。不愧为一副佳联美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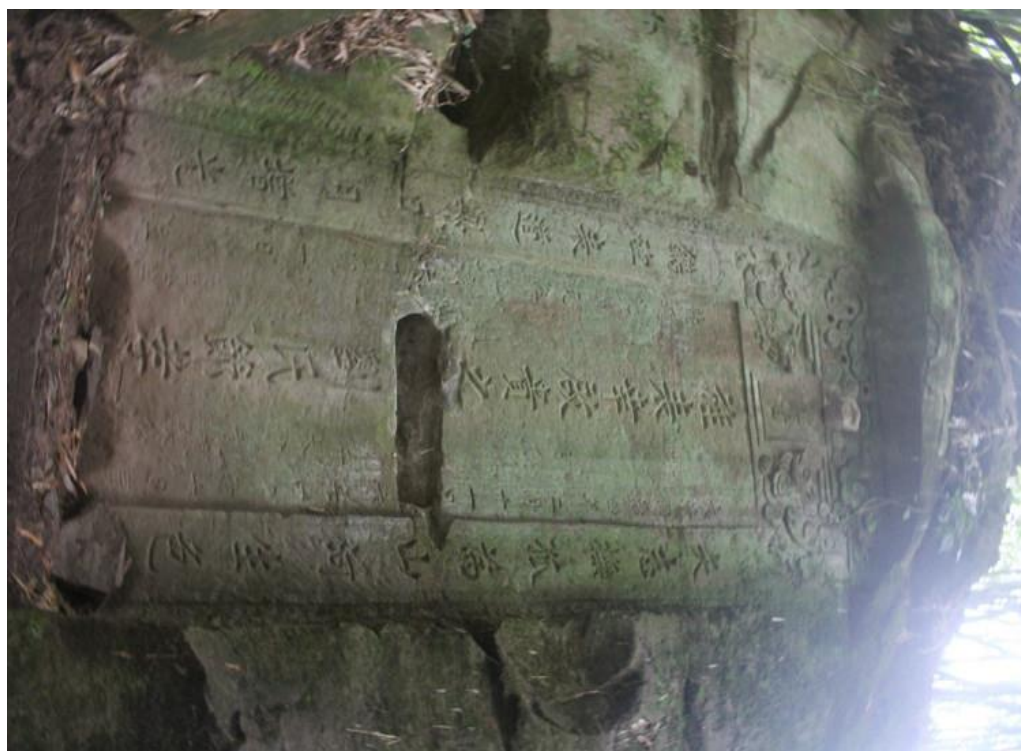
碑上铭文所载内容是：幸氏是当地大氏之族，幸启贵不幸早逝，其妻刘氏恪守妇道，孀居未嫁，矢志抚孤，使其成人成才，是谓“节”；刘氏孝敬公婆，使二老尽享天伦之乐，是谓“孝”。其实，在封建时代里这样的女性为数不少，是

因刘氏极其贤慧又善于持家，造就了后来这户人家兴旺丰足，四世同堂，声名显赫，便由江津县衙奏报朝廷，同治皇帝遂颁旨旌表。由其碑上文字可算得出来，幸启贵之妻刘氏于清代同治四年（1865）受朝廷颁旨旌表。逝后三年（大祥）（1862）其孙开始“摩崖”修凿此碑，直至十三年后的“龙飞光绪元年”（1875）的玄孙辈才建成。

幸氏后人将此碑“摩崖”于此，除了选择此处岩崖壁立如削之外，更为重要的是，此处系江河津渡之畔，车马繁忙，便于路人瞻仰扬名，以显女宗之形象。

江津区李市镇筭溪河两岔摩崖圣旨节孝碑，是研究清末和国民时期巴渝地区婚姻、家庭生活以及摩崖石刻艺术、书法艺术的重庆实物之一。

（原载《重庆日报》农村版 2014 年 11 月 25 日）



（圣旨碑 庞国翔 摄）

江津旧时过年“五拜”

春节是我国的传统节日，巴渝农村对这个节日的叫法与其它地方却不太一样。本来腊月 30 这天叫“过年”，正月初一这天叫“春节”，正月十五叫“元宵节”，但巴渝农村多将“过年”、“春节”、“元宵节”统而概之，都称作“过年”。巴渝农村在过年时要拜神、拜祖、拜老、拜坟、拜亲，这“五拜”风俗多数相延至今。

拜神，就是过年拜菩萨神仙，这是巴渝农村旧时过年的第一拜。过年这天，在吃团年饭前，家中长辈在房前或房后向东的地方，用小桌摆一些供品，烧钱化纸，然后跪地磕头，拜各路菩萨和神仙，以保佑本家在新的一年里如意安康，万事大吉。如果这家是做买卖的，还要跪拜财神菩萨，开药铺的要跪拜药王菩萨，教书先生或家有读书郎要跪拜孔圣人等。传说如果哪家过年不跪拜菩萨和神仙，上天就会发怒惩罚这家。拜神体现了一个惧字，当然这是迷信。

拜祖，就是过年这天，家中主人跪拜了菩萨神仙后，又在家里的堂屋内摆上八仙桌，放上刀头、果酒等供品，然后点香化烛烧钱，跪拜本家的祖先，请本家列祖列宗“过年”，

给他们送去阴间享用的“纸钱”。讲究的家庭，拜祖时还要写“袱子”，就是将自家和亲家列祖列宗的名氏和称谓全写上，包成叠块。这“袱子”有点近似于现在的“请柬”，请各位祖宗来“过年”。过年拜祖体现了一种孝道。

拜老，就是过年吃团年饭这天，家里的主人将拜神、拜祖的祭祀活动搞完后，就可以开桌吃团年饭了。但上桌吃年饭可有个先后规矩，家里如爷爷奶奶在，得拜请他们座上方席位，然后由他们先动筷子，之后晚辈才能动筷。拜老体现一个尊字。如果哪个好吃的小孩子，没拜请家中的长辈，而抢先去座上方席位或抢先动筷，脑壳上恐怕要被老汉用筷子头敲个青包的。这一风俗现在基本上不复存在。

拜坟，又叫上坟，一般在正月初一或初二这天进行。就是家长带着一家老小，到过世了的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等辈的坟头上进行跪拜祭奠，这活动近似于扫墓，主要体现一家人对去世亲人的思念，正所谓“每逢佳节倍思亲”，体现了一个思字。一般拜坟是很少上供品的，一家人来到坟头前，先是烧钱化钱，点烛点香，然后挂亲，再后是依辈份跪地磕头，最后走时燃放砰砰嘣嘣的鞭炮。

拜亲，就是给长辈或哥姐拜年。比较特殊的是，拜年只能针对长辈或平辈人，长辈是不能给晚辈拜年的。一般而言，自家孙辈给父辈、祖辈拜年，可从年三十晚上吃年夜饭后开始，给爷爷奶奶拜磕头拜年后，孙辈们可得爷爷奶奶的压岁

钱。对其他长辈的拜年多在正月初一开始，一直可持续到正月十五元宵节，拜年体现了一个情字。拜年是家中娃儿最喜欢的，因为可得到长辈们的“打发钱”——近似于现在说的红包。现在，很多单位、团体也开展这样的活动，只是取了一个很新潮的名儿叫团拜会。

（原载《重庆日报》农村版 2011 年 1 月 26 日）

江津“元宵节”民俗

农历正月十五日元宵节又称“上元节”，是中国传统节日。这天夜晚也是一年中第一个月圆之夜，是一元复始、大地回春之夜，人们对此加以庆祝，是庆贺新春的延续。民间的传统是在这天皓月高悬的夜晚，人们点起众多彩灯，以示庆贺。所以元宵节又称灯节。晚上，大家出门赏月、燃灯放焰、喜猜灯谜、共吃元宵，真乃合家团聚、其乐融融。

清末著名巴蜀才子、被今人誉为联圣的钟云舫在《振振堂联稿》中，有“上元节祭祀楹联七十七副”。晚上，全江津城的人都会根据自家的籍贯凭“牌子”进入天上宫或南华宫或万寿宫或禹王宫等，先是听会首宣读祭祀典文，三跪九叩。再是聚餐共叙乡情。最后是看戏班演出和猜灯谜、观灯会。全城张灯结彩，鼓炮齐鸣。钟氏楹联描写了元宵节燃灯放焰、喜猜灯谜的热闹场面。其一：昼夜观灯，夜夜夜灯灯不夜；大明生月，明明明月月常明。其二：仙侣赏花时，齐天乐，唱出声声慢；月底修箫谱，百字令，流成滴滴金。

民国版《江津县志风俗志》云：“灯会至初八日起十五日而极盛，是夜谓之元宵，又名上元，通谓之灯节，游人络绎彻夜不断，妇女尤多，半夜后又有偷青之俗……”所谓偷青，就是三五人相约在元宵节半夜后窜到附近菜地偷摘蔬菜

“煮食之”，这时只要听到菜园地主人在大骂就认为是吉利的。当时还有偷取他人房檐下的檐灯送人之风俗，“送人者谓可生子”。

历史的长河穿越了时间铺陈的沙砾之滩，流淌到了今天，“元宵节”这个充满风情的节日，仍然是我们最为器重的传统节日之一。江津人元宵节这天这走亲访友，拜望老人等习惯仍为风行。镇街文化站都要举行文艺演出，多年来文化馆、工人俱乐部、学校和街道文化茶园内举行的以猜谜语为主的游园活动，就是当年“元宵灯会”的演绎。几江、石蟆、白沙、塘河、中山等每年元宵节组织的川剧座唱，成了当地这个节日活动的最大报单。

科技的进步和大众传媒的发展又给元宵节这个传统节日渲染出浓墨重彩。这天，每个人的手机都会收到亲朋好友发送来的“元宵节”祝福短信，其语言经典可爱。诸如“盏盏花灯报元夜，岁岁瑞雪兆丰年，玉烛长调千户乐，花灯遍照万家春，祝您元宵节快乐!……”、“圆圆的圆圆的月亮的脸，甜甜的甜甜的鲜灵的汤圆，满满的满满的盛给你一碗，装上我美美的美美的祝愿，元宵夜你要笑开颜，祝您好运好梦伴一年!”等等。

(原载《重庆晚报》2012年2月4日)

江津消失了的传统节庆与民俗

江津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底蕴厚重的地区。虽处西南一隅，但“地当扼沪渝、控涪合之冲，接滇黔、通藏卫之隘”。奇特的地理位置、大山大水以及悠久的历史蕴涵了江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古代节庆和民俗。但这些节庆和民俗，多是在当时生产力水平不高、缺少科学文体知识条件下渐积而成，反映的多是祭祀活动或人们的祈求心理。

历史犹如一条巨浪翻滚、奔腾不息的长河，千百年来，无情地冲刷着这些古老的节庆和民俗。大浪淘沙，其结果有的被淘汰，有的被保留。保留的与时俱进，注入新的时代内容。淘汰的被人们渐忘。我们小心翻检这些发黄的纸张，以便总结历史。这里简要介绍一下在江津已消失的节庆和民俗。

A：消失了的江津地方节庆

一 迎春会

迎春会又叫迎春节。江津人把农历立春这一天叫打春，立春的前一天就叫迎春。旧时每年在迎春节这天，县城都要举办迎春大会。事先由江津城关五坊监保（民国时津城城厢

办事处之前身为仁、义、礼、智、信五坊，监保相当于现镇长）以及城中糖帮、油帮、米帮及先锋、高牙、德感、双龙等场镇的单位 and 群团进行协商，讨论办理各项活动，如舞龙灯、玩狮子、打连箫、走车车灯等。届时，根据分工进城进行庆贺。“三里十都”的“春官”在迎春前两天都须按时进城，协助办理迎春工作。

车车灯中坐着车幺妹。车前由一个小丑边逗边唱。车前车后的人跟着帮腔，左右还配有敲锣打鼓的，很是热闹。戏班子的演员们要排几出川戏，每出戏只有 2—3 人，站在四脚朝天的桌子上，四人抬着游行，叫川戏亭子。选择几个胆大的六七岁男孩，脸上涂红，头上梳“丁丁猫”，骑在马上游行，名叫鼎马。迎春会这天上午八时，各路队伍向县衙门汇合，边耍边唱。游行路线是由东门出城至北固门外河坝。观众很多，各路队伍一到这里，锣鼓声、吼唱声、欢呼声以及众多小贩的叫卖声，此起彼落。

迎春会主角是一只犹如真牛般大小的“春牛”，系竹扎纸糊而成，一般紧随鼎马登场。这支队伍威风十足：前有两名衙役鸣锣开道，一个放牛娃牵牛而行，两旁有十多名差役头戴竹编的高帽子，吆喝清道。12 名“春官”头戴官帽，身穿官服，排成仪仗队，走在四人大轿的县官前面，后面是威风凛凛的官兵压阵。入场式完后，县官上迎春台致词训话。内容是祝愿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安居乐业、不误农时之类。然后由“春官”依次上台，用各种曲艺形式演唱一些与“春”

有关的农谚，例如“立春晴一日，农夫不费力”等等，这名曰“说春”。春官说春后，迎春活动进入高潮。台下的龙灯、连箫、狮子、车车灯，大显身手。川戏亭子、鼎马等也要在迎春台前游行一转，围观群众，前呼后拥，整个会场很是喜庆。

三四个小时后，迎春台上的主持人宣布评判结果，由县官对优胜者发给不同数额的偿钱，最后，县官用小竹棍将春牛打滥，这叫立春叫打春，迎春会到此结束。

二 药王会

药王，本指神农，因传说神农尝百草，首创医药。旧时江津全县各场镇都建有药王庙。

江津因气候、土壤、空气等原因，适合各种中药材生长。江津向为巴蜀“川药”重要产区之一，曾被称为“枳壳之乡”，四面山、头道河等被称为“黄莲之乡”。每到采药季节，县外各路采药人涌向江津采药购药。江津县城和各乡镇都有“药帮”。参与者既有生产、加工、经营中药材和中成药的药商药贩，又有专事治病的中医。药帮募集资金，修建药王庙。江津的药王庙多分为三进。第一进是议事场所；第二进是大殿，供奉药王菩萨塑像及我国古代名医扁鹊、华佗像；第三进为配房，建有偏殿、住房等设施。较大的药王庙置有庙产，以维护日常开支。庙内请有堪司一人，日夜供奉香火，看守庙宇，接待香客。

药王庙又是药帮的议事场所，大凡会内和中药行业大小事务均在此商讨议定，如有扯皮擦筋的事情，也在此作出公断。民间传说庙中药王菩萨十分灵验，于是又有许多人来庙里祈祷、敬香，求药王菩萨保佑亲人平安康健或疾病得愈。庙内终日香烟缭绕，香火不断，十分兴旺。

药王会又称之为药王庙会。做药王会的时间是每年农历四月28日，这是药王菩萨的生日。江津从县城到场镇，凡有药王庙的地方都要举办盛大药王会，为药王菩萨贺生。会前，同业公会要发出通知，请公会成员及有关人士到时参加。这天，十里八乡的群众都齐聚药王庙参加此活动。首先要举行隆重的祭奠仪式，案上摆放着三牲、果品，香炉里插满香烛，上午九时许，由“会首”带领大家放火炮、上香、叩拜。仪式完毕，同业公会理事会成员到前面房内议事，其余人员在庙内或拜菩萨、或观赏景物、或到房屋喝茶休息，等天中午时分，统一聚餐。后来，随着官公营庙会产清理，热闹非凡的药王会也随之而慢慢消失。

三 山王会

“山王”又称“山神”，一般理解为镇山之神。人们将其用泥塑或石雕成像，其形为两眼圆睁、獠牙毕露、坐虎扬鞭，大有山摇地动之势。解放前，江津县山乡里的农民，从心理上切盼“山王”或“山神”保护一山安宁，使其不遭受垮山、洪水和野兽之害，山王故受山民的敬奉。

清代和民国时期，江津乡下一些重要山梁、道口都建有一些山王或山神小庙。当地百姓在此开展一定的祭祀活动，定期举办山王会或山神会。江津人对山王的祭祀，一般每年有三次。分别为每年农历三月初三，六月初六、九月初九。每次祭祀时要设宴聚餐，这一天设的宴会，称为“山王会”。

办会的会首由当地山民推选。设宴前要摆设“刀头”（煮的大块猪肉）、酒醴和焚烧香烛纸钱，在山王位前拱手作揖、虔诚祷告，有的还会在近处的岩石上凿若干小孔，装黑色火药，安导火线，在祭祀后鸣炮几十响。鸣炮的用意，一是表示祭祀的诚心、热闹；二是用巨大的炮声震动山谷，以示驱散邪恶，保佑山民。

祭祀结束后，大家一起聚餐。山王会的规模一般不是很大，多是以山为界。

四 清明节

清明会和清明节是有区别的。旧时，江津人常把本家族开展的清明会叫“做清明”，因为办清明会这天多是清明节。实际上后来很多家族举办清明会并不在清明节这天，而在节前或节后，有的前后相差很远。

清明会由各家族主办，多以本族祠堂为阵地。会前先要“晒族谱”。由族长指定“知书达礼”的族中长老，召集各房长子长孙齐集祠堂，取出收藏多年的族谱加以整理曝晒。同时，趁此机会向子侄辈讲述祖先氏族的由来，先辈搬迁的

经过，以及各祖宗名讳与生平、庐墓所在地等等，这叫“追远”。族谱晒整之后族长便要会同各房长老，将一年来全族所生子女，新娶媳妇，按字辈分别登载族谱。假如族中出了不肖子孙，有辱族亲，分别轻重，以家法处治，处治等次包括族谱除名、赶出祠堂等。接着是上坟，又叫扫墓。在民国年间，江津各家族宗祠，一般都要办齐三牲酒礼，由族长率领，一路吹吹打打到先祖坟地祭奠。江津有一俗语，笑谑别家清明会祭祖上坟，叫“打巩猪”（一种像猪的野兽，重约三四十斤，夜出偷食花生等作物）。扫墓后回到祠堂，接着开始吃清明酒。所有酒席全由祠堂中祭田放租的收入置办，或由族中富有子孙捐献。这时全族人按尊卑就座。大宗家族可连续吃两三天，但有一规矩是只吃不包。那些酒品不好、口无遮拦的人可要收敛些，因为同桌吃饭的人不是长辈便是晚辈，万一酒醉失言，开了“黄腔”，就会落个侮骂尊长或为上不尊的罪名，族人都要叫你拿话来说。一些族内纠纷，也在“清明会”上由族长解决。

清明节是农历 24 个节气之一，在农历三月上旬即 4 月 5 日前后。清明节到了，表示季春的时节正式开始。江津有农谚：清明要明，谷雨要淋。

五 尝新会

江津的尝新会没有固定的日期，以家族家族为主要参加对象，也有扩大到邻里乡亲的。活动主要在乡下，城里较

少。尝新会实际上就是传统的吃新节。

虽说这叫“吃新会”，但又没有固定日期。这是旧时江津传统节日中唯一没有确定日期的节日。江津人又叫它尝新、吃新、吃新米，是指早稻收割后，第一次吃新米。时间大约在农历“小暑”到“大暑”之间，以早稻成熟为标志。因江津各地水土、气候条件不一致，早稻成熟往往会相差一旬或一月。收割不一致，加上各家各户农事的多少不一样，所以，各家“吃新节”的时间也不一样，由各家根据自家的情况而定。

江津人很看重“吃新”这事。“吃新”当天，都要请许多客人，出嫁的女儿都要回家。这天中午，饭桌上要摆三只盛酒的碗，三只盛新饭的碗，每只饭碗上插上一双筷子，桌子中间摆着新出的蔬菜。接着点香、烧钱化纸，户主在厅门口小声地请五谷神、土地神以及家中去世的亲人，回来吃新米饭。祈祷祖先保佑全家老少平安，祈求人丁兴旺，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这个程序完后，才正式开席。按长幼辈分，请客人依次入座就餐。尝新米饭先是爷爷婆婆，然后是老汉和老妈，最后才是晚辈小孩。餐席以米粉蒸肉为主，还有鲜嫩的茄子、辣椒、黄瓜、南瓜、毛豆等时令蔬菜和鱼肉等。

“吃新会”表达出的是江津人对丰收的无比喜悦之情和对辛勤耕耘者的敬重。

六 娃娃场（会）

端午节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古老的传统节日。在旧时的江津，“端午节”又派出“娃娃会（节）”

端午节前的最后一个场期，在江津就被称为“娃儿场”。这天，只在家中有孩子，家长都要带着小孩上街赶场，购物玩弄，全场娃儿居多。这天娃儿要买东西，家长都会尽力满足。其实这时的娃儿赶场除了想家长买一块泡粑吃以外，最主要的是想赶场看热闹，而看热闹中看耍蛇是最重要的“节目”。那时江津各集镇都有“耍蛇”卖药赚钱的，他们在端午节前即开始捉蛇，捉后便在“娃娃场”这天在场上供人观赏。他把一条大蛇放在颈上，站在板凳上宣传他的药能祛毒，能治蛇伤，能包医百病。他用小铜瓢撮一瓢药叫人服下鼓三口气，随即捉一条红蛇在来人手臂上咬一口，咬出几颗血珠，但不红不肿，围观的人信以为真，就向其买药。还有耍蛇的将穿的中式裤脚用绳扎上，捉七八条蛇装在裤子内让其梭动，这称之为“蛇巴笼”。还有的就是借围观人多时耍毒蛇。耍前招呼大家不挤、不伸手，以防毒蛇射出咬人。然后把毒蛇从笼内倒在桌上，用折扇将蛇的头压住，捉起来用小铜瓢柄把蛇上下唇的四颗毒牙拨出来让大家看，并说被这种蛇咬了有生命危险等，最后他开始卖药，买药的人到还很多。

江津旧时赶娃娃场还有看“西洋镜”的，就是现代的一种幻灯片，但那是有钱人家才能享受的。农村穷人家的娃儿，天天放牛，一年能赶一次娃娃场看耍蛇，就很不错了。

七 马耳狗会

马耳狗会主要在江津的南部山区、东南部山区、北部临峰山区、西部燕头山区等乡镇。江津县城一带没有这一节会。江津的这些地方山高林密，民风奇特。马耳狗会又叫“请马儿狗会”，它就是奇特的民风民俗之一。

马耳狗又叫豺狗。现在已很少，或者根本就是绝种了。据见过的山民描绘，它身子象狗，长近一米，爪爪如虎爪，耳朵如马耳，行动机敏，跑得很快，故名马耳狗。马耳狗一来是就上百成群，它虽小，但誓与老虎为敌。它与老虎争斗时，不从正面扑打，而是凭借其灵活，绕到老虎身后，跃其背上，再用其利爪，抓脱老虎的肛门，将肠肠肚肚都拔出来，置老虎于死地。山中猛兽老虎、野猪碰见了马耳狗，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保护肛门，它们不敢动弹。马耳狗机敏如猴子，江津人又称它为“马猴子”。

江津山乡有野兽四十余种。过去山民们最怕虎豹吃人，野猪、猴子损庄稼。每当秋收季节，山民除上山守望吆喝驱赶野兽外，还要在农历七月十五日中元会这天，一家或几家联合办马耳狗会，请来道士、端公，焚香秉烛，敲锣打鼓，念念有词，祈求上天速调马耳狗来，把老虎、野猪、猴子赶走，以保五谷归家。

在请端公、道士的同时，还要请“降(jiáng)壳子”的人。“降壳子”不与道士或端公同行，他们是专门“降神”的。到时，他们好似神魂附体，主人及来看热闹的人接连发

问，降壳子者随口便答。别人专问怪题，他答得很快，出口成章。语多戏谑，挑逗笑闹，嘻嘻哈哈，热闹非凡。干这行的实际上是很有学问的，三教九流，士农工商，样样皆知，对答如流。这是江津人喜迎丰收时快乐情绪的一种宣泄，也是巫风降神留下的遗痕。现在早已没有这个职业了，只是在江津民间，还将巧舌如簧、能说会道的人说成是“降壳子”或“冲壳子”。“降壳子”可能是“降神”与“冲壳子”结合的意思罢了。

B: 消失的江津民俗

一 舞柑子龙

舞柑子龙曾流行于江津县李市场以下的南部山区如蔡家、四面山、中山、清溪沟等一带。清代最为流行，在民国初年开始退热，直至后来消失。

江津人过中秋节有打糍粑、吃糍粑习俗。中秋节是仅次于春节的节日，素有“小年”之称。江津人过中秋节打的糍粑多是圆形的。这中秋节多与圆形相关，蒸糯米的蒸笼，打糍粑的碓窝，放糍粑的簸箕，做馅的黄豆等等都是圆形的。一家人团聚，围着圆桌，边吃圆圆的糍粑，边赏圆圆的月亮。

早前，江津盛产一种土生土长的老柑橘，人们叫它老木柑，实际上就是土柚子。结的果如大碗一番，形状圆圆的。吃起来味特别不好，既酸又苦还麻。老木柑也因体形肥圆而

成为人们的玩耍之物，将其联缀成串，舞动起来非常好看。

制作一条柑子龙，需用大木柑 7 或 9 个，或 10 个以上。每个木柑用一根木棍钉牢，为龙身的一节。用五色纸分别做成一个与之相协调的龙头和龙尾，再用软绳将龙头、各节龙身和龙尾相连接，短的七八米，长的十多米。夜间玩耍，每节扎上一条油辫子，便于照明。表演时，选精壮汉七至九人，统一穿上传统服装或粗装，每人玩耍一节，舞动时在玩“宝”人的指引下，一条火龙翻飞起舞，令人眼花缭乱。在锣鼓器乐的伴奏下，场景壮观热烈，具有极强的观赏娱乐性。

舞柑子龙，有着其深刻的喻意。在金秋的季节，月圆的日子，人们尽情欢乐，喜庆丰收，祈求幸福。在人们的意念中，这一天大家说的是“圆话”，吃的是圆糍粑，赏的是圆月，舞的是圆圆的柑子龙，这圆即代表着圆满、喜庆、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江津中秋节玩柑子龙从清初直到国民初年，有近 300 多年的历史。后来江津的老木干柑减少直至全无，这一民俗消失。再后来，玩长龙代替了舞柑子龙。

二 换 肚

旧时江津有一种非常奇特的生育习俗，叫“换肚”。

人类要繁衍就要结婚生育，生男育女也是一种自然的人类的传承现象。但在旧社会，重男轻女思想特别严重。民国版本《江津县志》记载江津甚至有“溺女之恶性”。当时，

如是结婚后一两年，生了一个女孩，别人问起，婴儿的父母都很抬不起头，只说是“生了一个煮饭的”或“生了一个挑花的”等。若是生了男孩，回答别人时总是沾沾自喜，说“生了一个读书的”。若是贫困之家，也是乐滋滋地说“生了一个放牛娃娃……”可见当时重男轻女之风之盛行。自家女儿嫁到夫家后，生了一个女外孙，娘家人也跟着抬不起头。有的家庭，妻子第一个生女孩，第二个还是生女孩，就被“休”回娘家，造成家庭和婚姻悲剧。

江津的世俗，官宦之家嫁女后，如初胎得女或者不育，娘家人除了感到歉意外，还要积极想办法进行“换肚”。具体作法是：娘家要重新制作被子、帐子、大床、木榻等嫁妆，抬到女婿家。送上时还要办酒席、要贴喜联等，相当于重新办一次“交待女儿”的“喜事”，场面很是热闹。

另外一种“换肚”的方法也很奇特。就是对不生儿子或不生育的媳妇，娘家人选择一个吉日，买一个猪肚炖熟后放在茶壶里，由母亲或长辈妇女用竹篮送到女婿家，抵达后不与任何人交谈，直接到女儿房间，将装有猪肚的茶壶放在床上，然后一句不说就回家。女儿与女婿则在房间内，一起将猪肚吃完。这样，下一胎就可以生下男孩。因为人们认为吃猪肚即可以换肚，这是一种吉祥的表征。

清代著名巴蜀才子、楹联圣手钟云舫曾对“换肚”写过楹联。但他也认为，这“换肚”能生子是没有依据的，算是“奇闻”。当时江津县乡一些“换肚”的朋友来求他写楹

联，他不好推脱，在当时的情况下，别人抱着虔诚之心来求你，而你推诿，会影响别人家庭祈求添人进口的心情。于是，他只能代写“换肚联”。《振振堂联稿》中收录了他为朋友撰写的两副“换肚联”

其一：

天象动枢星，萱草宜男，必有岐嶷征吉梦；
我情殷宅相，椒聊多子，好熏香被育宁馨。

其二：

锦被与重缝，从今换得紫胞，千里麒麟兄及弟；
宁馨期再育，他日缠来赤电，两阶兰桂子而孙。

钟云舫注释说：“世俗官家嫁女，初胎得女，或不育，岳家重制被帐床榻赠之，名曰换肚。必系以联，始增荣，而真异闻也。余代撰二联，谨志之。”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程度的提高，“换肚”现象早已消失。

（原载《巴渝文化》2016年春季号，总第58期）

江津高寨坪刘氏祠堂及族约家训

重庆市江津区有个边远的石蟆镇，与四川省合江县交界。石蟆镇有个边远的东溪村，村上有个很大的高寨坪，刘姓是这里的大姓，早年有 70% 的人家都姓刘，其祖先都来自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时的湖广省麻城县孝感乡。

清朝乾隆三十一年（1766 年），高寨坪刘氏族长刘三吾倡导本族修筑了刘氏祠堂，祠堂很快修好，但不久，这气势宏阔的刘氏宗祠堂却被一场大火损毁，刘氏族人无不痛哭流涕。直到 136 年后的光绪二十八年；当地刘氏族人又集资重建刘氏宗祠，终于，一座气势更为宏大的江津高寨坪刘氏宗祠建成。这里成了当地刘氏族人开展族务活动的要要场所，也成为当时渝川边界上一个重要的宗族祠宇。引得其他氏族常暗中赞叹，而刘氏族人则引以为豪。

解放后，由于当地刘姓村民多，保护得当，加上地处边远，高寨坪刘氏祠堂破坏并不严重。当地政府还将祠堂办为农业中学，就是在“文革”中，祠堂也改作高寨坪村办公场所。1998 年，当地刘氏村民对祠堂进行了一些护修。这远近闻名的刘氏祠堂成了世纪风云的见证物，后来又成了文物保护单位。

刘氏祠堂坐东南、向西北。呈四合院布局，砖木结构，通面阔 23 米，进深 31.3 米，总占地 719.9 平方米。大门上方有“刘氏祠”三字。大门正面门楣为“汉室遗风”四字和人物图案，下面为八卦太极图。大门两侧有一楹联——

本植彭城枝繁叶茂；

门临江水源远流长。

祠堂大门雀替（插角）设有花卉，戏楼为四柱三开间，一楼一底，戏台前部设有木雕人物图案，损坏较为严重。底层上三踏步直通进院，戏楼与左右厢房之间设有天井。左右厢房同戏楼相同，同样为一楼一底。正厅为四柱三开间，为抬梁穿逗式混合梁架，悬山小青瓦屋顶。这建筑构架，是研究巴渝地区的宗祠建筑的实物资料。

其实，高寨坪刘氏祠堂是礼制建筑，但又与宗教建筑有着密切联系。该祠堂为当地刘氏执“家礼”之处，用于刘氏族祭祀祖先、执行族权、劝善解纷、惩治家门不肖等。建筑规模介于住宅与会馆之间，形制采用四合院落式，前为大门，后为祖堂供祭祀跪拜，两侧为食宿厢房，与入口大门结合，戏楼底层为通道。

高寨坪刘氏祠堂制有《刘氏家训》和《刘氏族规》。“家训”有 10 条：一是敦孝悌。孝悌为人之本，人惟孝悌为先。孝在养其身而顺而其心，悌在不藏怒而不宿怨；二是慎丧祭。父母临终，必亲躬附身附棺，一稽一拜必曲尽其诚；三是肃

闺阁。户必亲捡，翁姑无故不相见，叔嫂不戏言，子弟不轻入姊妹卧房，不留女守家等；四是严家教。子弟一言一行俱要端庄。妇女声音不闻于外，性情正而品节明；五是笃宗族。族中我果有余，多方设法，分润族人，将见祖宗，默佑其衷；六是正心术。心口如是，族党则能人爱，语云忠厚，留有余地，步和平养，无限天机；七是务本业。读书明理，自是有用，农工商贾亦自成一家。人必有业，务业须正；八是尚节俭。民生于勤，勤则不匮。须勤俭，不贪物，俭之实用；九是慎交游。古心古貌，不近邪人，善迎善合，最易亲人，能于正人而追随，于邪人而禁绝；十重是名节。族中如有贞女节妇，孝父母、立节操，请旨旌奖，以培风化。“族约”四条：一是族类当辨。约定同族同祠之事务；二是谱牒当重。约定本族谱牒编纂珍藏传承之事务；三是赋役当供。约定族人承担国家义务、早完国课，以免摧科之事。四是邪淫当禁。约定严禁嫖赌洋烟之邪行。

江津石蟆镇高寨坪刘氏宗祠堂建筑，被当地文史部门称为“川渝边前地区封建农村结构形态的实物百科全书”



(刘氏祠戏楼 王忠全 摄)

(原载《中国建设报》2014年10月31日)

宗祠建筑廷重祠

江津在明末清初，遭遇长达 37 年的战乱，“人烟断绝十八年”，后经“湖广填四川”，迁入大批移民“插占为业”。经过四五代的辛勤劳动，来自“五湖四海”的移民和江津土著人使江津开始有了生机，经济社会得到了一定的发展。这时，各宗族开始寻根定祖，纷纷修建祠堂。民国版《江津县志·风俗志》中说：俗邑颇重收族之典，多立祠堂。清末版《江津乡土志》记载，时全县有大小宗祠 77 处。其中城区 26 处。可也说修谱建祠在江津非常时兴，祠堂除了“崇宗祀祖”之外，各房子孙平时办理婚、丧、寿、喜等事也在此举行。族亲们有时为了商议族内的重要事务，也利用祠堂作为会聚场所。宗祠的规模和气派程度，成为宗族兴旺发达程度的象征。宗祠成为当时城城乡最有代表性的建筑。

新中国成立后，祭祀活动取消，祠产归公。在后来的“破四旧”和“文革”中，祠堂遭到严重破坏，有的改作学校、粮仓。到后来全县祠堂大多倾圮，或者只剩下断壁残垣。

但在江津边远的塘河镇，有一个祠堂还深藏在深山中没有遭到较大的破坏，它成为重庆市保存最完好的宗祠建筑，这就是廷重祠。

廷重祠位于渝、川、黔交界处的江津区塘河镇五燕村。廷重祠又叫孙家祠堂。江津孙氏家族原籍江西吉安府泰和县，初迁湖北麻城县孝感乡，为客家人。孙氏子孙超于明末迁居巴县磁溪镇，被尊为入川始祖。清初，其子孙志远因贸易迁来江津县思善里二甲百节滩（石门镇河口），后又迁思善里十都二甲（塘河），其子孙多在此居住。到清光绪时期，塘河这个山青水秀的码头开始繁荣起来，出现了三家大户，一为王家，二为孙家，三为陈家。除家业兴旺外，孙家与王陈二家有所不同的是特别重视族中办学。到光绪十八年，孙氏家族中的五房开始修建廷重祠。廷重祠占地4.5亩，建筑面积2000平方米，按客家人的建筑风格修建。为宫殿式建筑，主要分为正殿、中殿、戏楼三大部分，分别沿纵轴线排列三进重叠而进。屋脊全为镂空黄绿琉璃砖砌成，两边有高耸的圆穹式和重檐式风火墙。正殿两侧石枋上分别刻有“思孝”、“奉先”两字。戏楼前额雕刻有两台戏剧人物，两侧为书楼。高高的风火墙上有依稀可辨的彩绘，内部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天井。全部建筑，外观是砖，均为大型圆形木桩或

石柱支撑。共用 84 根柱子，20 根石柱，64 根木柱，所有地坝均用条石铺就。飞檐翘角，雕梁画栋，彩色浮雕，金碧辉煌。廷重祠四周有一大片孙氏大家族的古式庭园，这里前有照山，后有靠山，周围还有玉带水环抱，当地人称：这是一处绝佳的风水宝地。

廷重祠修建好后，孙家在祠堂内办私塾，供族中子弟读书，有专门的义田充作族中办学大小事项之资，因此孙家历代出了很多读书人。例如，从这里走出来孙镜清，先是东渡日本留学，回国后创办中国公学和电务学校。他成了孙氏家族中读书人的代表。

解放后，廷重祠改建成为竹林村小学校。2003 年小学迁出。文物部门已经批准廷重祠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廷重祠是成为目前重庆市保存最完好的宗祠建筑。

为何这孙家祠堂又叫廷重祠？这一直是我在心里的疑惑。我走访许多当地老人，他们都说不知。当地几个文化人猜测：这廷字应该是庭字之通假，祠堂庭院建筑中正殿、中殿、戏楼分别沿纵轴线排列三进重叠而进，故名“庭重祠”，后方知不是如此。孙氏家族时为江津望族，此是孙氏家族宗祠的一个支祠，为孙氏家族六大房中第五房修建的私祠堂，因孙氏五房入津六世祖孙朝珑号廷重而得名。

昔日的廷重祠承载着孙氏大家族的兴旺与发达。但时过境迁，今日人去楼空，满目苍凉，成为一遗址，不过它却又成为巴蜀宗祠文化的一个活化石。



(廷重祠戏楼 庞国翔 摄)

附录资料 作者冰锅

廷重祠——江津塘河，目前重庆保存最完好的祠堂完整重庆市优秀近现代建筑、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廷重祠，又名孙家祠堂。距塘河场 3.5 公里，位于今碕寨村境内，是清代晚期江津望族孙氏家族宗祠的一个支祠，为孙氏家族六大房中第五房修建的私祠堂，因孙氏五房入津六世祖孙朝珑号廷重而得名。据闻孙氏宗祠基地属“蟹穴”，水气旺，象征孙氏子孙绵延相承，家运兴隆。廷重祠周边翠竹幽幽，青山叠叠，水溪湍湍，廷重祠则巍巍峨峨，宛如矗立在一幅景色优胜的山水画中。

廷重祠建于清光绪十八年(1892 年)，占地 0.3 公顷，建筑面积 2000 平方米。整个建筑坐北朝南，砖、木、石混合结构，屋脊全是镂空黄绿琉璃砖砌成，两边有高耸的圆弯式和重檐式风火墙，为宫殿式建筑。面阔 21 米，进深 61 米，现保存有 1720 平方米，为复四合院布局，为宫殿式建筑，

全祠主要由正殿（上厅）、中殿（正厅）、戏楼、厢房四大部分组成。依地形起伏为基，四周用砖墙将戏楼、正殿、中殿联成一体，栋间施风火山墙，两端爪角飞翘，祠高 12 米。

中轴线上由南至北为正殿、中殿及戏楼，左右为厢房。戏楼设施齐全，楼台前额雕刻有两台戏的木刻，两侧为书楼，为太太小姐看戏之地。戏楼为石木结构、抬梁式梁架，歇山顶，面阔 9 米，进深 6 米，施八角藻井，由 10 根石柱支撑，两侧置廊楼与前厅相连，而戏楼又是祠堂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有“无台不祠”的说法。戏楼与前厅间是中院，面积约 200 平方米，全部用 10 余米长，宽 0.6 米左右的巨型条石铺成。前厅，五开间，进深一间，硬山式屋面，明间用前廊四柱六椽拊，次间以后用穿逗式梁架。前后厅之间为天井，左右为厢房。后厅面阔 16 米，进深 7 米，三开间，进深 2 间，抬梁式结构，硬山式屋面。正殿两侧石门之上，分别书刻“思孝”、“奉先”几个大字。另外，东西两侧各有一院，东院保留较好，西院基本已毁，根据现东院形制，两个小院为对称布局，小院中又有前后两院，为土木结构，建筑形式与主院相比较为简单，疑是后期加修。廷重祠内所有地坝均用条石铺就。全部建筑，外围是砖，内均为大型圆形黑漆木柱或石柱支撑。飞檐翘角，雕梁画栋，彩色浮雕，金碧辉煌。廷重祠共有近 60 根主柱，柱础、门框等均系石料加工而成，且柱础较大，石构件上的雕刻和木构件上的彩绘丰富精美，

在充分继承清代川东民居简洁、雄浑风格的同时，融合部分江南建筑灵秀的风格，是重庆地区民居建筑中的代表之作。

孙氏对廷重祠进行过多次扩建和修葺，形成今天的规模。现存戏楼为 1923 年修建。民国时期，曾在此办私立廷重小学，建国后塘河乡接管，属于塘河乡竹林村（后改为五燕村，今属于碕寨村）集体所有，曾作竹林小学（今改为五燕小学）校址，虽经改建，原貌大体尚存。2003 年，五燕小学搬出。现由塘河镇人民政府管理。廷重祠是目前保存最完好的宗祠建筑的典型代表，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保护价值。是重庆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廷重祠四周还有一大片孙氏大家族的古式庭园和当时响遍全江津的一座贞节牌坊（在今碕寨村），厚重古朴，韵味很浓。2009 年 12 月，廷重祠被重庆市人民政府批准为重庆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原载《重庆晚报》2015 年 10 月 15 日）

石达开兵败江津奔溪口

奔溪口，是发源于綦江区紫荆乡的箭溪流经重庆市江津区西湖镇后与綦江河交汇处的一个水名，也叫“奔溪渡”。箭溪全长 22 公里，主要流经江津区的嘉平、西湖镇。在这里两江交汇，地势险要。北岸有一观音殿，远近闻名，香火很旺，香足远。南岸有唐代大诗人杜甫的十三世孙、南宋“刚直御史”杜莘老后代所建的“杜氏廷瑞祠”，宏阔气派，当地人称杜氏祠。

在 150 多年前，石达开部经过奔溪口，与当地民团发生了一场恶战。石达开在此丢盔弃甲，大败而逃。

清同治初年，已是太平天国后期。冀王石达开率一支太平军在湖北长江南岸利川远征入川，其目的是想占领巴蜀这

块富庶之地。要想在四川站稳脚跟，就必须攻破南北阻隔的长江，先占重庆，再夺成都。而此时的满清王朝为保住四川这个重要的后勤基地，在巴渝地区的长江南北两岸驻屯重兵，以拒御石达开率太平军北渡长江。

清同治元年（1862年）石达开率部曾三次进军江津，欲攻占江津县城。一是1862年3月24日，石达开率部占领马宗场、仁沱子后深夜速朝江津县城进发后，在大沙坝（贾坝沱一带）遭江津县衙派出的刘潜兴炮船的严厉袭击，他只得退走高牙、先锋、峡滩、李市、白沙，最后潜入合江县境。但在4月下旬，石达开再率主部由綦江县永新镇、大垭口进入江津县月沱、清平等集镇。当他们沿李市坝方向向江津县城进军时，遭到清军“果字营”部追击，石达开只好率“众数十万、蔓延十里”的太平军改道南进，折回三合场，退回合江县。

石达开并不甘心，就在这年8月初一，他又率部进攻江津。石达开率先锋很快攻破江津县金紫坪场（属杜里四都）小水坪寨。他亲自在此设营，坐镇金紫坪。石部抢掠百姓牲口，宰杀后大办庆功宴。此时石达开部“人马连营数十里”。

数日后，石达开命令他的另外一支部队，由綦江方向金紫山、平滩沟和江津县贾市场方向移动。该部属石达开嫡系，汪姓先锋统率是石达开亲信，石达开命令他速到观音殿，在中秋节前后渡过奔溪口，占领杜氏祠。汪氏先锋率领部队迅速向莽溪口集结。

此时，四川总督骆秉章、清廷按察史刘岳昭等到处派兵遣将、调集大批民团和清军对太平军“相机截剿”。此处的綦河两岸，山势陡峭，有金紫山、骆岷山等，并驻扎有清军振武营、安定营。被骆秉章褒赏为“风阁先声”的江津地方团保张登华在綦河上大扎木筏炮船，加紧青泊滩、小河坝、溪门口、奔溪品一带巡逻，炮船藏匿于岸林之中。

中秋节前两天，正当太平军汪统领准备在奔溪渡河时，收到当地乡绅陈麟图、团保江元兴等人的邀请信。邀请他们于明天（8月15）日到奔溪渡南岸观音殿谈判。邀请信还说：当地绅士备储了果点，欲慰劳大军云云……

此前的陈麟图在綦河流域的青泊、西湖、五福一带征召了一批人马，舞拳弄棍，很有一些名望。石达开部并没将陈麟图这个山野之人放在眼了。也许是石部太轻敌，或者是真的馋涎于有名的巴渝“果点”，汪氏决定率领一拨人马在奔溪口上的观音殿与陈麟图进行“谈判”。

当汪统领领着大小头正进入观音殿准备“谈判”时，突然遭到当地民团伏军的袭击。原来，陈麟图暗设机关，组织团保江元兴、张兴华率 5000 民兵四面埋伏。同时通知清军的“振武”、“安定”两营作居高临下的后殿之军。此时奔溪口上的张登华数十艘炮船突然向太平军开炮，太平军水陆两路受敌，大败而逃，死伤无算。江津民兵缴获太平军渡河筏子数十个。此时，驻扎在金紫坪的石达开见山下部队在奔溪口受阻，就急忙率队下山营救，不想“振武”、“安定”迅速

出击，一锅端了石达开小水坪寨老巢，收复了金紫坪。

见自己的声东击西之法奏效，陈麟图迅派“五品军功”刘元鼎（江津筒家坝人）守住奔溪口，其于陈、江和“振武”、“安定”兵马乘胜追击，一直把石达开、汪统领和其太平军兵马追赶到西湖、青泊。此时的石达开两支部队只好沿河而退，在仁沱场翻越龙门槽山脉，过马宗、一品、石龙等场，退入綦江县境。

石达开太平军本是起义军，满清政府对此恨之入骨。但他们入川后烧杀掠抢，无恶不作，百姓深受其害，无不痛绝，称之为“石匪”、“长毛贼”等等。清廷各州府层层转扎发谕旨《剿办太平天国并坚壁清野筑堡御贼疏议条款》，各县乡大建民团、民兵，在关隘之处抗御太平军……

陈麟图，具体生卒时期不详。清代光绪版本《江津县记》记载他是重庆府江津县杜里三都人（西湖场一带）。1879年中举后任八旗教习。光绪十年，法国与越南发生战争，中国南方边境形势告急，陈麟阁为此两次上书朝廷，分析形势，提出共计 8 条对策，约万字。后又著《筹边策》，由都察院上奏朝廷，被采纳。陈麟图爱研究历代军事形势，辑成《历代筹边略》一书，共计 84 卷。

（原载《重庆艺苑》杂志 2016 年春季刊，总 103 期）

一份抗日杀敌《光荣证》的前尘后事



（保藏完好的“抗日杀敌光荣证” 庞然 摄）

1: 《光荣证》简述

2010年2月5日，台湾中国国民党党史馆馆长邵铭煌先生率“国民党党史馆抗战遗址寻访团”来重庆市江津区寻访。

在座谈时，中共重庆市江津区委党史研究室主持工作的副主任的庞国翔先生向邵铭煌一行展示了他收集到的一份抗日杀敌《光荣证》。邵先生一行对这份“证书”久久凝视，后来他不断地说：珍贵、珍重，这实在是一份珍贵的抗战文物……

是的，这的确是一份珍贵的抗战文物。这张抗日杀敌“光荣证”，却有着传奇的经历。

这是一张印在长 27cm、宽 23cm 的柔软黄色草纸上的“证书”。证书内花边长 21 cm、宽 19 cm。证书右边两列竖排文字是“民国三十四年为金刚乡抗战出征军人聂春台之家属题”。除乡名“金刚乡”和人名“聂春台”六字是毛笔填写外，其于文字均为草书印刷。证书正中是两列四个红色大字“杀敌光荣”。左边是落款和署名是“江津县长兼优委会主任委员萧烈赠”，仍属草书印刷。但在“肖烈”二字下，盖有一方红色篆字“萧烈”的鲜章。这份证书除有一些折痕外，文字非常清晰，特别是“杀敌光荣”四个鲜红大字和红色篆体的“萧烈”印章，几乎没有褪一点红色。说明这证书是主人精心而保存下来的。

现在，珍藏这份证书的主人叫聂勋文。这是他的母亲苏祖明在临终前交给他的。证书上所书“金刚乡抗战出征军人聂春台”就是他的父亲，是他母亲苏祖明的丈夫。

2: 聂春台的故事

“抗战出征军人聂春台”是怎样一个人？民国三十三年七月江津县政府制发的《四川省江津县金刚乡第十四保第二甲第八户户证》上有这样的信息——

姓名：聂春台；性别：男；年龄：三十一；出生年月：民二年；本籍：江津；婚姻状况：已婚；教育程度：私二；从业及服务处所：军；他住何处：湖北；附记：出征。

这是聂春台最基本的情况。聂春台是一个很有故事的人，1912年在四川省江津县金刚乡十四保第二甲一个叫高屋基的地方出生。这地方现在属重庆市江津区油溪镇金刚社区。聂家在当地算中等人家，靠种着几石薄地为生。他从小聪明过人，人们都说他“板眼多，是个机灵鬼”，家中父母视他为掌上明珠。他先在家里受启蒙教育，读了一些《三字经》、《百家姓》之类的启蒙书，稍长后又被家长送去读了两年的私学。聂春台又号聂荣开，这是他读书时用的书名。从这时起，他特别崇拜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他读书可算过目不忘，因为他记忆特好，家里人就叫他读些中药中医的书，他对中药突然感起兴趣来，《汤头歌》背了许多。聂春台成人后干脆就自学中医。因他聪明好学，很快就成了十里八乡有名的郎中。他走街串乡，凭借着自己七分的中医知识和三分能说会道的口才，居然成了当地名医。

1935年，他娶附近板桥乡柿子湾大姓苏家之女为妻，当

时妻子取名聂苏氏。不久，生女儿聂勋贵，两年后即 1938 年，儿子聂勋文出生。

时值抗日战争之际，日本鬼子侵占我中国东北、华北、华中等大部分地区，国内一片混乱。此时在大后方四川江津的聂春台也算是一个混世英雄。他行走于江津、永川、璧山乃至重庆、成都等地，以中医看病为业，他不但养活了全家，而且曾红极江湖，常出现在红黑两道之上。只要他一背起药箱远出，十天半月回来后包中总有现洋。有时他还会改头换面，着洋装，戴洋帽。当时村民对他的评价是：聂春台药能治病、嘴能医人（收拾人），板眼多、心机多、把戏多。据说成都一个当官的，被他收拾得有口难辩。

抗日战争的烽火越燃越烈。1940 年 5 月，28 岁的聂春台作为“壮丁”，搁下草药箱，扛起梆梆枪，他成为川军中的一员，出川抗日去了。

3: 苏祖明的故事

聂春台妻子苏祖明，其实她原并不叫苏祖明这名，她小时没名，家人只叫她么丫头或么姑娘。嫁给聂春台后，才取名聂苏氏。1949 年解放后，她自己才取名苏祖明。

支撑全家的丈夫聂春台扛枪出川抗日去了，当时大女儿聂勋贵才四岁，儿子聂勋文才两岁，这个家怎么办？

苏家在江津县板桥乡的苏院祠，在当地是有名的大姓。

苏家的一个哥哥叫苏少成，是当地甲长，管着十来户人家。他还在江湖上“嗨”了“袍哥”，称为大爷。苏祖明还有个二哥叫苏福川。

妹夫聂春台到前方去了，留下妹妹和幼小的外侄儿女，她家生活怎么办？

苏少成与家人商量，认为不能饿了妹妹一家。就将妹妹一家接回板桥乡苏院祠娘家。苏祖明吃住在娘家，自己当然也要干些力所能及的事。时间久了，自己拖儿带女的，她想：虽是娘家人，但总不能长期寄人篱下吧。于是她提出回到金刚乡十四保高屋基居住的想法。

妹夫在前方杀敌，妹妹一人在家，还拖着两个孩子，我们作为她娘家人，不能让她受苦。于是苏家决定：派出二哥苏福川长住妹妹家，帮助耕种八亩薄田，以此维持妹妹一家生计。苏祖明这拖儿带女的“寡妇”家，总算有了一个男人。

丈夫在前方第一年没消息，第二年传来消息说，他在战场上杀敌很英勇，牺牲了。但半年后又有人捎带口信回来，说聂春台没有牺牲，而且立了战功……

苏祖明在家苦等丈夫的音信。不久，又传来他丈夫聂春台立功的消息。但是，苏祖明并没有收到过丈夫聂春台半纸亲笔书信，聂春台是能写信的呀。不过，丈夫这些立功消息在全乡传开了。这也好，当地地痞恶霸和有钱有势人家因此而不敢欺侮这拖儿带女的苏祖明，他们怕抗战结束后，被回

家来的立过战功的聂春台收拾。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抗战胜利。这年冬天的一个下午，甲长来通知苏祖明，叫她后天去江津县开“抗属”——抗战军人家属的会。苏祖明从没到过江津，第二天晚上她作了一些简单的准备后就早早地上床，但她无法入睡。她在凌晨四点就起床，在哥哥苏福川的护送下打着火把来到了长江边的金刚沱码头乘坐下水小火轮。上午11点她就到了江津，下午开会，参加“抗属”会的人不多，只是三四十个，多是妇女和老太太，有几个还带着吸奶的孩子。会上，江津县长兼县优委会主任委员萧烈与苏祖明握手时说，你丈夫杀敌有功，了不起。萧烈还亲手将印有“杀敌光荣”四个红色大字和自己盖章的“光荣证”颁发给她，还奖励她20块大洋……

县长萧烈是苏祖明见过的最大的官，而且还与他握了手。苏祖明回到乡下，这事很快又在全乡传开：聂春台在抗日救国战场上立了大功，江津县长都接见了他老婆……

苏祖明将这“光荣证”用细丝布包了一层又一层，她先放在自己小房间的一个小箱里，但她又觉得这不安全，怕被别人偷走，于是又将此交给哥哥苏福川保管。她想：哥是一个虎臂猿腰的男人，别人不敢去偷。

这是一个天下极不太平的时代，乡霸村党、地痞流氓横行天下，加上国家的贫穷落后和动荡不安，苏祖明一家生活虽

有哥哥的照顾，但仍处于极度的困境之中。苏祖明特别思念在前方抗战的丈夫聂春台。只要她一空下，就给两个还不谙世事的孩子讲父亲在家时的故事，讲世人传说的父亲在外杀东洋强盗的故事。有时她还会在哥哥处要回“光荣证”看看，看后又包好送到哥哥处请他保管。

不久，金刚乡来了两个外地人，他们到处打听十四保二甲高屋基“聂苏氏”住处，他们自称是聂春台的部下。说聂春台现已经在湖南某处落户，他们是来接“聂苏氏”去的。聂家人和苏家人都懵了，两人的身份真假难辨。大伙就先叫“聂苏氏”躲起来，对来说：聂苏氏不在家，你们回去后叫聂春台回来吧……

打这以后，就很少有聂春台的消息。

4：“光荣证”引发的伤心事

1949年11月28日，江津解放。

苏福川从妹妹苏祖明家搬回老家板桥乡。他在离去时将《光荣证》小心翼翼地交给了妹妹。他交待说：这虽是薄薄一纸，但很重要，证明我们家抗日有功。但这是民国党政府发的。你一定要好好保管，不要轻意给人看……

解放时划分阶级成分，苏祖明家虽没有被划为地主富农，但因在外生死不明丈夫是“伪军人”，而处处受到歧视。哥又回到了板桥乡，苏祖明一家的生活又面临着困难。特别

是后来的一系列的政治运动，苏祖明一家几乎都处在这个小山村的风口浪尖上。她怕大队的民兵和造反派来“抄家”，于是先将这“光荣证”藏在柜底，一年后又藏在床下的小箱下。不久，她怕被老鼠咬坏，又取出用塑料薄膜包了一层又一层后，藏匿在墙缝里。

.....

新中国初期的《初小国语课本》第七册，有一篇课文叫《一个机智的水手》，写的是渡江战役中解放荻港时一个机智的解放军水手的故事，这名水手叫聂春台。文中描写的情形与苏祖明的丈夫聂春台很相近。于是家里人都认为此人便是家中出征抗日的聂春台，认为他在抗日胜利后加入了解放军。于是，1958年已在白沙镇溜马岗读初中的聂勋文将这篇课文和“光荣证”交给校长黎宗全和副校长罗昌一，并说出了他家的想法。学校立即给当时的国防部去了公函，请求查找小学课文中所写的“聂春台”的情况。三个月后国防部回信称“此人现无法查找，但有三处去的可能”等等，于是这事又陷入悬念之中。不久，又有人传出：聂春台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去了台湾。

因为聂家藏匿着国民党县长发给的《光荣证》，加上聂春台是伪军人，是敌台嫌疑分子等原因，1960年，22岁的聂勋文在技校毕业后的招工现场会上突然被请回。后来他争取到了教书的工作，还当上了学校的一个小领导，但不久他

又被放回乡下。其原因就是因他家藏匿着国民党县长发给的《光荣证》，父亲聂春台是伪军人，是敌台嫌疑分子。他还被叫到公社，接受“劳动改造”100天，驻了半年的学习班。他们一家在山村里就成了“异己分子”……

5: 后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苏祖明一家终于能抬起头来。乡镇的领导常探望苏祖明老人。这张抗日杀敌的“光荣证”也可公开露面了。苏家和聂家，又开始通过各种渠道寻找聂春台的消息。但是，一年，两年、三年……多年来都没有消息。

1993年刚过大年，84岁高龄的苏祖明害了一场大病，她知道自己不行了。于是就将这份抗日杀敌的《光荣证》交给已是55岁的儿子聂勋文。母亲用近乎于呆板的目光望着儿子，说：你父亲还在世的可能性极小，我们能见到他的希望几乎是零。你们不要记恨他，他多半是死在打东洋鬼子的战场上。其实这是一件很光彩的事……

就这年的农历2月初7，这位含辛茹苦的母亲，这位饱经苦难的“出征抗日军人家属”撒手人寰。

（原载《红岩春秋》杂志2015年二期）

寻找“江州天书”

王侃是清代有名的巴蜀才子，是清代成都府温江县的大文人。他生于乾隆六十年(1795)，卒于同治元年（1862），字迟士，人称王迟士。他祖父、曾祖父都是社会名流，曾为州县官吏，与张船山之父交往甚密，幼时也常与长 30 多岁张船山同堂。

王侃的家在江安河畔之杨湾。年轻时每日在江安河上乘着画满画、载着书籍和美酒的书舫，溯游上下十余里，时而畅饮，时而高歌，淡然自适，高旷有苏东坡之风，人称“花舫先生”。清光绪温江举人赵钟灵对此作《王迟士泛舟处》一诗赞叹：幕府羈縻冠盖藪，花舫先生笑且走。市朝奔赴名

利窟，花舫先生避不出。先生志趣张志和，先生襟抱陶靖节。
鱼蓑啸傲古乾坤，栗里消磨闲岁月。

王侃在嘉庆年间科举考试中，两次参加乡试，只考中副贡。作为准贡生，他没有得到进入国子监深造的机会，竟被委以“州判”之衔。在清代官制中，直隶州设有州判一职，为知州助手，衔阶七品，分掌粮务、水利、防海、管河诸职，大约相当于如今的一个副县长。王侃素来嗜学，心存慷慨大志，且有志于治理天下，州判是一个卑微的官职，不足以行其志，既然要当官，就必须当军机大臣一级，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舒展个人的抱负，实现远大的理想。时值江南动乱，因而王侃迟迟不赴任。对于一个有志作大官的王侃来说，血气方刚，于是他开始遍访巴蜀名胜，到处寻找意趣相投的人。他遨游四方，希望以定乱及治之道去感悟士大夫，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他很难找到一拍即合、志同道合的人。

王侃在外云游十年，广泛求索，日渐广博，记了许多笔记，写下许多诗文。他在仕途感到了无奈，看破红尘，但在文法也是日积月累。正当他一切了然于胸、蓄势待发之季，他云游到江津县城对岸的圣泉寺，他感觉这里真是一个风景绝佳之地，也许还有其他的原因，于是他决定不走了，隐居于此。整理诗文，著书立说。他再没有回到故乡温江，最后终老于他乡江津。

圣泉寺位于江津县城长江对岸的双龙场附近。圣泉寺具体始建于何年，今已难考，但在明清时代均改建和扩修。它是古时著名的“江津八景”之一。据《江津县志》记载，昔日圣泉寺规模很大，庙宇庄严，奇石嵯峨。寺院内古木蓊森，早晚间雾霭蒸腾，环境十分清幽。寺前有天生石门，寺后有聚仙台、凌云台、龙泉、听琴洞诸景，所以历代文人墨客游者络绎不绝，岩石上的题咏甚多，几乎是无石不镌刻诗文，堪称川东名胜佳景。寺内有有一书院，为明朝时期江津四大书院之一，是明朝太子少师、文渊阁大学士江渊少年读书之地。江渊后进京赴考，一举金榜题名，功成名就，十分感谢书院栽培，并有感寺内圣泉灵水保佑，捐资修建了“清栖书院”，王侃受其影响，自取号为“栖清山人”。

历十年云游，广泛求索，加上王侃饱览诗书，才识宏远，阴阳五行，无一不通，因而其著述多为阐述六合之内象纬。山川河海之变迁，人物之遭际，政教异同之原委，凡此种种，了然于胸，发为文章，多所卓见。王侃善诗文，不蹈袭前人模式。他著述颇丰，传说有二十多种，属清代巴蜀作家中的大宗，而最主要有《巴山七种》丛稿等。

在中国历史上，一些隐逸民间的文人，因种种原因，有的爱搞点“悬崖石壁藏书”的事来。也有一些很有名气的文人，写了批评文章，当时不能露出，就藏匿起来以期后世发现扬名。王侃是个儒者，求官未成，只得埋头著述，执着地

追求像司马迁一样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史记·报任少卿书》）王侃又是一个智者，深知宋代著名文学家欧阳修的人生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于功德方面已经尽量要求自己对国家、民族有所作为，但毕竟是一介书生，挥戈上阵，与敌人拼杀还尚缺勇气，那么立言以遗后世，著书立说便成为一种理性追求与具体实践，因此，王侃的后二十年就是激进以后的平静，在江津圣泉寺内的栖清书院全心身潜心著述。

王侃寓居江津时，其子女也来到江津。他将女儿嫁到了江津两岔笋河对岸的白岩，也常到女儿家短住。女儿早逝，葬于白岩，他写了许多以白岩为题材的诗词。

清同治元年（1862），67岁的王侃在江津圣泉寺病逝世。不久，王侃的第四子王誌（字吾高）欲送其父杖履还乡，在离津前他遵父遗嘱，选其几种父亲的著作《巴山七种》熔锡密封，藏于圣泉寺后的高崖石窟中，外镶嵌一小方诗文小石，仿佛如一方摩崖石壁，不易他人发现。

.....

百年已过，江津圣泉寺石壁藏书之事无人所知。

如果不是“文革”后期江津县德感区圣泉乡“农业学大寨”改田改土修水库需石料，派一石匠到圣泉寺石壁上采石，王侃古寺石壁藏书的秘密仍不被人所揭开。石匠在圣泉寺后面的高崖上打石时，发现一方诗文石刻，他将其打碎，只见

石壁里嵌着一大团黑黢黢的东西，撬出来一看，原来是个密闭的长方形锡匣，石匠还以为发现了金银财宝，得到飞来之财，急用铁鏊划开锡皮，原来里面是包扎整齐的一叠线装书。石匠不识字，他大失所望，不几天就被获悉此事的亲友分借 10 本。自家里留下的《皇朝冠服志》、《治官记异》两本送给了江津城里来的一个叫钟志海的人。

从 1985 年开始，江津县文化部门按照国家文物局的统一部署，开展过三次全区性的规模较大的文物普查。三次都将王侃的这些书作为追踪对象。但由于石匠及亲友包括钟志海等或作古或外迁，蚂迹难查。好不容易找到钟志海遗孀，答曰全将这些破玩友卖了。这些书的内容当时全然不知，传说名叫“江州天书”。文物普查组认为，这些“天书”多半被农家化为灰烬了。

2015 年 5 月的某天，江津区蔡家镇谷天仁先生发电子邮件与我，说他通过某种渠道得到了王侃在江津圣泉寺石壁上所藏《巴山七种》等 22 卷古书。真是梦里寻它千百回，得来全不费功夫。他将复印件发给了我。

《巴山七种》共分为《皇朝冠服志》、《治官记异》、《放言》、《衡言》、《江州笔谈》、《白岩诗存》等共 22 卷，《巴山七种》书前有作者的白描画像，有咸丰三年（1853 年）赵葆燧和咸丰六年（1856 年）王誌的序言。二序略述了作者生平与藏书圣泉寺的缘起。这是王侃晚年客居江津时，于咸丰三

年前后写成，脱稿后不久即病逝。《皇朝冠服志》主要是写各个朝代各官品穿戴的服饰，《治官记异》、《放言》、《衡言》作者记载的是一些奇异的故事和作者给朝廷的一些建言献策，《江州笔谈》、《白岩诗存》，则是一些作者一些文学作品。取《江州笔谈》名，是因江津古名江州。取《白岩诗存》名，是因王侃与女儿王文征（名容）曾住江津石柱槽白岩一段时间。此地在今李市镇原沙埂乡笋溪河大地坝对面。女儿死后与其丈夫也合葬于白岩。

《巴山七种》是非常重要的巴蜀地方文献。他对研究巴蜀清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都有很重要的参考意义。同时，他又是一部经典的清末文学作品集，诗文俱美。谷天仁将这些书捐款给了江津区图书馆，我制作了复印件。江津图书馆对他进行了奖励。

后来一查得知，王侃除著有此次藏匿的《巴山七种》22卷外，生前还著有《粤贼事务》、《绪余》、《拾得诗余》、《骈体韵选》、《老庄管韩精说》、《读书随录》、《妙喻集成》、《文章美备》、《历朝文论》、《峨眉山志》《私议》七卷等十部著作，《国朝全蜀诗钞》录其诗二十首，当时刊行于世。

王侃本温江人氏，在外云游十年后为何选择寓居江津，单是这里景色隽秀，只怕这过于简单。王侃家与张船山家是世交，王侃多次听张船山教诲，时江津学人李岑、江海清也是张船山的“粉丝”，二人正注释编刻《船山诗草》20卷，

王侃非常敬佩，他们算是挚友，这想必这与他寓居江津有一些关联。



(《巴山七种》书稿 庞国翔 拍摄)

(原载《红岩春秋》2016年第5期 总173期)

张家藏古匾

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江津县蔡家镇，起伏平缓的猫山四季长青，清澈蜿蜒的笋溪河长年流水淙淙。淳朴的村民在这里快乐自在的生活着。

在石佛村村民张贵元家里，悬挂着一块清代的寿匾，寿匾长约 2.5 米，宽约 1 米，柏木制作，为黑底金纹金字。匾正中书四个古朴的金色大字：“仁寿长风”。匾右侧书：“特授四川重庆府江津县儒学正堂岳为”。匾左侧题有：“道光六年孟春月张绍乾立谷旦”。“这块匾有 189 年的历史了，保存得这么好，真是很难得！”石佛村村长刘德礼说。



匾的褒奖主人名叫张绍乾，是张贵元的六世祖，清道光年间人。翻开《张氏族谱》，上面清楚的记载了张绍乾的情况。张绍乾出生于清乾隆十一年，寿终于道光九年，享年 83 岁。张氏祖先于明洪武十四年因避红巾军从麻城县孝感迁徙到江津，插占土地，繁衍生息，到嘉庆年间，已在这里居住四百余年。到张绍乾父亲这一代时，因为辛勤耕种，勤俭节约，家境逐渐殷实，在张家塆建成一座八字朝门、两重天井的四合院。

张家塆的房屋建成后，只见前面高耸一座山峰，山上树木葱茏，从远处看仿佛一支文笔。屋前远处的笋溪河拱曲有度。村民都说，张家以后一定会出个读书人。张绍乾自幼聪明好学，在考取贡生后就再无心于功名，便在家乡开设学堂，教书育人。由于精通医术，热心为周围的老百姓诊治疾病。他一生乐善好施，经常帮助家庭贫困的乡民，减免学费和药费，深得乡民的感激和爱戴。他成为远近闻名的“乡贤”。

在张绍乾 80 寿庆时，江津县儒学正堂岳为，即江津县

儒学教谕派人送来寿匾以示庆贺和褒奖。3年后，张绍乾以83高寿无疾而终。

此后，张氏子孙一直秉承“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等朴素的家训，在这里平静的生活着。如今张绍乾的后裔张贵元已经66岁，他的父亲张富贵88岁，母亲袁恒书已87岁，一家四世同堂。2014年江习高速公路开始建设，张贵云响应政府号召，搬离了祖辈生活的老屋，到了新村点购买了新房，享受着天伦之乐。

论语云：知者乐，仁者寿。人与自然和谐、内心快乐善良，生活在这里的人必然会健康长寿！而仁寿长风也将永远在这里传扬。

（原载《重庆日报》农村版2015年8月12日，合作者谷天仁）

过年，真好

除夕的山村，到处都是灯火。远处还传来噼噼啪啪的鞭炮声。渝黔公路旁排排农舍的窗口中，传出电视里春节联欢晚会的欢歌笑语，公路旁边的这个小山村被节日的气氛所笼罩着……

我感到有些无助。夜很深了，我孤独地站在公路旁，等待着夜间客车或熟人的货车。其实我心中明白，这山间公路上夜间客车少得可怜，更何况是除夕？于是我只好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熟人的货车上，我想搭熟人的便车回去我在这山间公路边的一小单位工作，认识一些私车主。等着，等着，我感到身上有了一些凉意。时针已经指向了 11 点，在公路

边踟蹰的我感到要在今晚与丈夫女儿团聚已是不可能了……

突然，一柱灯光晃过，一辆小车停住了。

“喂，上车吧。”

我一看，是辆奥拓出租车。红色的。忙问：“前面 20 公里，多少钱？”

司机探出头：“我们只打表，不讲价我又不会多收你一分。先上车吧。”

我没有半点的迟疑就打开门上了车，但我真的又后悔了，因我在车上发现司机是个满脸络腮胡、说话很粗的汉子。这条公路虽是城郊省道，很少有出租轿车。我在报上常读到许多出租车敲顾客竹杠对顾客进行讹诈的事……在这深夜，又是山野，我害怕了。我紧紧握住我的口袋……

这个络腮胡出租车司机开着车内的调频收音机，里面传出的也是春节联欢晚会的歌声。虽是这样，我还是非常警惕地悄悄注视着他。他和着收音机里的旋律哼着小曲……

约 20 公里，很快就到了，我终于松了一口气：“师傅，多少钱？”

司机看了看计程表：“照这价，你肯定会生气。这样吧，随你给，你给多少我收多少。今天过年嘛。”我下了车，正准备掏出 20 元钱给他。恰巧这时，驾驶台上的电子钟显示出了“00：00”的字样。零点了，车上收音机里也敲响了新

年的钟声“嘿！”他将胡子拉碴的脸伸出窗，大声武气地嚷嚷道：“不收钱了。你是我新年的第一个客人。有缘分有缘分。祝你发财……”他一踩油门，车子就很快消失在黑幕之中。

我拿着车钱，看着渐远的车影，真有些惊奇感觉。我虽然还没有见着家人的面，心里已经满是新年的愉悦了。我感觉到，过年，真好。

(原载天津《今晚报》2012年1月22日)

杀牛过年

俗话说：辛苦种田，杀猪过年。三十多年前我们生产队，却出现过两次杀牛过年的事。当时我虽才七八岁，但记忆犹新。

那时的生产队学大寨，是大集体，由队长安排每天的农活，社员一起出工、收工，实行工分制。社员家里不能饲养猪、牛、羊等家畜。每个生产队有一个饲养组，饲养一头生猪，最多的只能饲养两头。

社员凭工分分得口粮。口粮不够吃，大多社员都要吃半年以上的红苕、玉米等粗粮和蔬菜。公社食品站凭票供应猪

肉，每月每人一斤，肚子里没有一点油水，整天咕咕叫。那时要吃上一餐回锅肉，真是要高兴好些天。

生产队长叫幸禄，是一个没有文化但非常实干的“农头”。队里饲养的生猪，长了百多斤，过年前的几天，就将它杀了。全队300多人，围着屠场，等到半夜才将这半斤猪肉分回去。当时一家多为四五口人，大多连夜就或炖或炒，吃了大半。不到两天，连油渣都没有了。

令我们高兴的这年，是杀了一头大水牛。耕牛是生产队最重要的劳动工具。3000多亩水田全靠它犁耙。队里有9头牛，一头病了，腿残两年，无法犁田，关在牛栏里，养得肥壮。上级是不准杀牛的，幸队长向公社打了报告，要求将这头病牛处理掉。

这场面很热闹。幸队长安排10多个精明强干的社员，将残牛牵到小河边，全队人都到场了，站了半个小山坡，精壮的小伙子用绳子套住牛脚的四脚，用力一拉，牛就倒下。从外面请来的屠夫手起刀落，很快牛头落地。于是剥皮、划腹，十多个精壮男子要忙活一大天，这1000多斤重的带着血色的牛肉就摆上案子。社员每个能分上两斤以上，一个家庭一般能分得一大盆鲜嫩的牛肉。

第二天，幸队长开会，集中了社员家的10口大铁锅，将牛骨加水后用细火敷汤，敷一天一夜，汤色变色，就倒入木桶中，两天后全凝固成细腻嫩白的牛油。幸队长用竹片一划，

每家每户分二砣……这年的正月，过得真滋润。

这年过得很快，经过春种夏管秋收的季节，头年年底杀牛的事早已淡忘。

又要过年了，队里饲养的生猪突得瘟疫死去。公社畜牧站怕传染就对死猪进行了深埋。猪没了，300多社员怎个过年呢？

幸队长想了两天，终于作出一个决定：杀牛。

第二天，他组织社员和屠夫将一头既大又肥的水牛杀倒，安排好社员到小河边的屠场剥皮划腹分肉。自己亲自出马，到公社报告，说生产队有一头病牛应该处理。

这个春节，社员过得也很快活。

不想元宵节刚完，队上一个叫“汪秀才”的人就写信到公社，揭发幸队长组织社员杀了能耕田耙地的健壮水牛。这个“汪秀才”解放前读过几天塾馆，他说他对每头水牛都有感情，还说水牛耕地为民，杀它是造孽。据说他的揭发信写了整整5页。

第二天，公社民兵连、畜牧站的人就来到生产队，将幸队长带到公社。当时的政策，乱杀耕牛就是破坏生产，是要坐牢的。

但幸队长坚持说自己杀的是病牛。于是公社派人来队上调查。除“汪秀才”外，全队人都证明这头牛是病残牛。

但幸队长仍被关在公社，驻了15天的学习班，最后放回。

他背了一个处分，这处分有点奇怪：撤销队长职务，鉴于正处春耕季节，由他主持生产队工作，以观后效。

于是，我们这个生产队就被外面的人叫为病牛队。但队上从此就没有杀过牛，每年生产队过年时只杀一头猪，社员们过得很苦很苦，直到1979年……

(原载《重庆晚报》2015年2月16日)

和尚·秀才·樵夫

万里长江流过重庆市江津区。在江津城区长江下游一个叫顺江口的地方，又有一条叫綦江的河流汇入长江。这顺江口东岸有一座高山叫龙门槽山，古代的《江津县志》将此山列为江津名山。

在上龙门槽山的山路旁，有一座当地很出名的古庙叫来龙寺。这里前望顺江口渡口，后依大山悬崖。以前一些抬夫或赶马的“马帮”赶路，累了就在这庙门前的石凳上歇气。少数歇气人就在庙门前的小竹林里“解急”撒尿。久而久之，这小庙石凳处臭气难闻。

庙门乃圣洁之地，岂能容此污浊之气充弥庙宇。于是，

庙的一个和尚就在庙墙上写出了“禁解”打油诗。诗曰——

人到庙门口，
禁止解小手。
若有不信者，
牛马猪羊狗。

不久，巴县的一个姓钟的秀才上龙门槽山路过这来龙寺古庙，累了他就在庙前小歇。大概这书生也是一个不拘小节的人，见没有人就到庙角处撒了一泡尿。回头时，他突然看见了这首和尚写的打油诗。读诗后知道自己被和尚骂为“牛马猪羊狗”，于是，就想反击一下。秀才便在庙墙上写下了另外一首打油诗，对和尚进行“反骂”。诗曰——

走到庙门尿就胀，
水火难容不相让。
左手急忙解裤子，
右手牵出小和尚。

这秀才真会以牙还牙，终于反击了和尚，将和尚骂得更厉害。秀才毕竟多读过几天书，其骂法更是尘酸刻薄。

第二天，当地一名姓温的樵夫上龙门槽山打柴。路过此庙门，发现了这两首和尚与秀才对骂的“歪诗”，他连声叹气，连连说：“不象话，不象话——有辱庙堂，有辱诗文，民风不古呀——”他思索片刻，就在墙上写下了一首“批评诗”。其诗曰——

和尚书生出笔成脏，
以错骂错很不应当。
有辱圣贤孔老夫子，
枉读四书锦绣文章。

（原载《龙门阵》杂志 2003 年第一期，原名《庙门打油诗》）

打油诗差着惹大祸

江明是重庆市江津区杜市镇月坝村人氏，今年 85 岁。他社会阅历非常丰富。小时学过中药，当过皮鞋铺伙计；后来扛枪当兵，抗日打鬼子。解放后，在重庆一家建筑公司当石工，“文革”时期回到家乡江津农村务农。

江明是当地小有名气的读书人，又见多识广，常常帮助同村社员写写书信、契约什么的，因而有人称他“江老师”。他也常孤芳自赏，写点“张大妈、李大妈，人人抱个大南瓜”之类的打油诗，于是，有更多的人便称他为“江打油”。

“文革”期间，杜市人民公社月坝生产大队常召开批斗地主、富农的社员大会。江明家中的成分本不是很好，加上

又是一个“酸文人”，所以常常被拉去“陪斗”。一次，本队的一个姓刘的地主在批斗会上“顶嘴”，被当上了大队民兵连长的刘姓地主的亲侄儿打了一巴掌。“自己的亲侄儿也打我——”这刘姓地主在批斗会结束后的回家途中气恼不过，欲投骡子滩河自尽，被同行的江明死死拉住。江明劝他说：“在以后的批斗会上你千万不要再顶嘴了，好汉不吃眼前亏呀——”

这地主本来与江明是一个大院的邻居，同一个院门进入，他进出大院都能看到江明家的木门。第二天一天早，江明又在自家的大门上写出了一首打油诗，其意再次劝地主批斗会不要再“顶嘴”，要“盯遭头”（看风向）。其诗曰——

强忍怒中气，
少天顺口言。
莫饮过量酒，
爱惜一分钱。

不想这首打油诗被一个“革命群众”举报到了杜市人民公社武装部郑部长的耳中。郑部长是上个月坝大队的“掌握同志”（驻大队脱产干部）。他是个大嗓门，在大队的群众大会上批判“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时声若狮吼。他牛高马大，腰别手枪，威风凛凛。站在会场上的吼声都会令所有与会人员项背生寒。郑部长听了举报人背诵出的江明的打油诗后大发雷霆。他也不全是一个胸无点墨的人，他联系到当

时国际国内形势，上纲上线进行了一番分析，认为这打油诗的作者江明是和这姓刘的邻居地主在进行勾结，发泄对伟大的中国共产常领导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不满。他“深刻指出”：从这打油诗的内容可以看出，江明是在叫这地主分子暂时要忍气吞声，要潜伏更深，以便将来企图报复……郑部长决定马上派两名基干民兵到江明家大门处照像取证。

江明得到这个消息后非常的害怕，但他很快就镇定自若。他立即取出笔，在第一句诗的开头处加上了“夫妻”二字；第二句诗的前面加上“拌嘴”二字；第三句诗的前面加上“席前”二字；第四句诗的前面加上“赶场”二字，于是这打油诗的意思就全变了。诗曰——

夫妻强忍怒中气，
拌嘴少天顺口言。
席前莫饮过量酒，
赶场爱惜一分钱。

当天晚上，郑部长看到两名基干民兵带回的照片后，又进行了一番分析和研究。认为这打油诗反映的内容与先前来举报的“革命群众”所说的“发泄对伟大的中国共产常领导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不满”、“图谋报复”等政治目的有些不一致。若要“办一下”（开会批判）江明，理由还是有些不充分。只听他骂了一句：“根老子江明认得几个墨疙瘩、写得起两个墨砣砣，就整些酸不溜湫的文字。清官难断家务

事，算球了，算球了……”

（原载《中华传奇》20100年12期）

四面山的飞龙巨蛋



江津四面山不仅风光秀丽，景色迷人，而且它还是龙的故乡。这里有许多关于龙的故事和龙的传说，也有很多以龙命名的地名，如龙洞、龙潭湖、卧龙沟、飞龙庙等等。

在四面山景区进山大门前的广场上，耸立着一尊巨大的椭圆红色蛋形巨石。这就是传说中的四面山飞龙巨蛋。飞龙巨蛋被人们誉为四面山的灵性之物和镇山之宝。关于这个飞龙巨蛋，还有一个神秘的传说。

月份很久很久以前，四面山这地方全是一片茂密的原始森林。森林里生活着一只会飞的龙，人们叫它飞龙，飞龙在林中栖息，称霸于这深山老林中。

由于地壳的变迁，气候发生变化，开始越来越干燥。有一天，飞龙高兴地发现了一个夹在两山之间的小溪，溪水欢快地流淌。这虽然溪小水少，但水质清冽甘甜，飞龙很喜欢喝。于是，它总是隔三差五就暗中到这里卧饮甘泉。为了争水，也不知上演了多次龙虎之斗，但每次都是飞龙获胜。溪小较水，少怎么办？飞龙突发奇想，干脆就钻进这附近的一个岩洞。它一边在洞里修行炼道，一边在这里待水而饮，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岩洞后来就被人们称为龙洞，而这夹在两山之间的溪沟，就被人们叫为卧龙沟。

有一年，飞龙终于在卧龙沟左边的一个叫二登岩的岩边产下一巨大龙蛋，它想等到天气变好就孵化生龙，传宗接代。为了免遭人类和其它大型动物伤害，飞龙将自己所生的龙蛋用泥土严严实实掩盖起来。它认为这样就安全了。

几千年过去了，几万年过去了……有一天，当地一个樵夫在二登岩边打柴。无意中他将泥土掘开，发现了这个巨大的飞龙蛋。樵夫最初以为这是一尊椭圆型的巨石，石质光滑细腻。于是他就用铁锤和钎子准备进行开采。当他打下一个小口时，口子中顿时就流出汨汨“泪水”。他吓得全身哆嗦，但他很快镇静后放下铁锤回了家。不想不久他家里人就死三个，他成了孤家寡人（俗称独棒）。也许是这樵夫有点固执，也许是他真想探看这个椭圆形的巨大龙蛋里面到底为何物，20年后他又带着工具去开采这飞龙巨蛋，他刚又打开一小口，里面又流出了泪水，这泪水全是红色的，而且越流越多，越流越红。樵夫吓得撒手就跑。回家不久，他就暴死床上。山民们将他草草安葬在这二登岩附近的小坪里，这里就多了一个独棒坟。

说也奇怪，飞龙巨蛋的红泪流了七七四十九天才止住。至今我们还可以看到这飞龙巨蛋被开采过的两条“伤口”，这“伤口”上还有斑斑泪迹。飞龙巨蛋流出的红色泪水将四面山的泥土和石岩全都染成了红色——这就是四面山的泥石今天大多是红色的缘故。

飞龙孵蛋生子的希望破灭了，它非常的伤心和难过。他昏迷了七七四十九天后才苏醒回来。于是它只好就在龙洞里潜心修行炼道。

他修行练道四万多年，飞龙老了，就在他修道成仙的这天晚上，突然漆黑的天空闪电雷鸣，大雨倾盆，龙洞里的飞

龙这时用力猛振臂膊，刹那间，卧龙沟右边的大山石崩岩塌，很快就将这卧龙沟堵截断流，形成了一个堤坝坚固的堰塞潭，潭水高涨。一会儿，雨停雷歇，飞龙游出龙洞，在潭里嬉戏一会后，就化作一缕清烟飘飞而去，飞龙终于成仙升天。这堰塞就是后来的龙潭湖。

被破坏了的飞龙巨蛋最后化作一尊椭圆的巨石，它成为四面山山民心中的灵性之物。山民中有的生了病，就来这里跪拜祈求，以求神灵飞龙巨蛋的保佑。一些新婚夫妇或婚后久不生育的信男信女，也常来这里烧钱化纸，为求子求嗣而祷告。由于虔诚的原因，加上一些偶然现象的性，山民们都觉得很灵验。

如今这飞龙巨蛋还耸立在四面山龙潭湖左侧的二登坪进山大门的广场上，人们都认为它是四面山的镇山之宝。它的下面是碧波荡漾，波光粼粼，造福于四面山的百姓龙潭湖。人们为了纪念飞龙，又在龙潭湖上游大窝铺的一块风水宝地上建起了飞龙庙。

如今在四面山还流传着一首民谣——

四面山，有飞龙，
深山老林它称雄。
龙蛋破，流红泪，
山石泥土全染红。

（原载《重庆晚报》2012年6月16日）

巴渝姓氏中的隐语

在巴蜀地区，一些姓氏常有隐语，至今江津、綦江，永川等地上了年纪的人对这些姓氏仍直呼其隐语。外地人或年轻的本地人对这些隐语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这些隐语是非常的有趣，如他们称姓彭的男性中年人为“老圈”，称姜（江）姓男性中年人为“老辣”等等……

为什么在巴蜀地区姓氏会有隐语呢？这和当时清朝的社会环境有着很大的关系。

天地会是清朝民间的秘密组织之一。因“拜天为父，拜地为母”而得名，这个组织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天地会”在巴蜀地区有一个重要的支派叫哥老会，哥老会的参与者多

数是手工业者和农民，其成员可说是遍布城乡。特别是成都、重庆等城市和一些县城，哥老会成员较多，其成员之间又称为“袍哥”，加入哥老会就叫“嗨袍哥”。哥老会的地方首领称为老大哥或袍哥大爷，有些地方又叫袍哥舵爷。在巴蜀地区的各县各个码头，都设有哥老会的秘密联络茶馆和堂口，袍哥之间到各个码头走动办事，不论是公事还是私事，都要事先到这个码头的“堂口”进行联系，这种联系有的地方叫“拿言语”，就亮明自己也是袍哥的身份，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兄弟伙”的帮忙。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巴蜀地区的众多袍哥又参加了农民起义和反洋教斗争。辛亥革命时期，一些袍哥接受了革命党人的领导，参加了地方武装，但因为当时清朝政府派出军队并勾结洋人进行了非常残酷的镇压，使袍哥的反清活动和起义转入了“地下”秘密进行。为了保密，他们每到一个地方进行联络，都不能直呼对方的姓名，以免暴露自己的身份。于是他们就用隐语这种“黑话”呼叫对方。这种隐语是非常的有趣，多是对方真实姓氏的一种解释。例如——

称老朱为“老拱”，称老萧为“老吹”，

称老周为“老沙”，称老黄为“老耙”，

称老杨为“老咪”，称老谢为“老花”，

称老钟为“老撞”，称老侯为“老抓”，

称老郑为“老飞”，称老高为“老悬”，

称老余为“老摆”，称老胡为“老焦”，
称老罗为“老响”，称老刘为“老顺”，
称老汤为“老水”，称老吴为“老东”……

（原载《重庆日报》农村版 2011 年 1 月 20 日）

第二章：人物留声

黄庭坚作客江津品荔枝

早在初唐时期，与江津县上游毗邻的合江县盛产荔枝，百姓遍植，品质绝佳，被称为荔枝之乡。这里的荔枝成为上奉朝廷的贡品，也成为杨贵妃喜吃的荔枝，各地驿站便昼夜兼程、马不停蹄送往长安，以保持荔枝鲜味。《新唐书·杨贵妃传》载：“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骑传送，走数千里，味未变，已至京师。”时朝野上下，州府百官包括文人墨客，纷纷跟风仿效，以吃荔枝为荣，以品荔枝为雅，以尝荔枝为贵。

江津在合江下游，受其影响，老百姓开垦土地种植荔枝，收益很快见效，至今与合江交界的石蟆、塘河等地百姓仍有

种荔枝习惯。江津几江是一大片平坦半岛沙地，虽荒杂，人烟少，但肥沃。时县城不在此，有当地人在几江西段洪水淹没不到的高阔地带（今太子寺、津中一带）开辟一荔枝园，从合江引种，周围种上黄荆为屏障。因此处多为沙质土壤，雨水阳光充足，荔枝园年年丰产。

时过境迁，到北宋时期，虽然荔枝在宫中士大夫中受宠风头已过，但几江城里荔枝园仍风花正茂。其中，有一颗荔枝是唐开元（713年）时所植，是最老的荔枝树，果实味道异常鲜美，干壮冠阔，遮云蔽日，四季常青，名传巴蜀，被当时誉为“荔枝王”。

黄庭坚是北宋著名文学家，号山谷道人，洪州分宁人。他是江西诗派开山之祖。与杜甫、陈师道和陈与义一起被尊称为“一祖三宗”。为苏门四学士之一，生前与苏轼齐名，世称苏黄。他是治平四年（1067年）进士，任著作佐郎，因修《神州实录》获罪，贬为涪州别驾，因而他又自号“涪翁”。他被安置在今黔江地区。又因他表兄在夔州路作官，为避亲嫌，怕有包庇行为，朝上又把他推置到宜宾。

宋哲宗元祐三年（1088年），江津荔枝已经成熟，寓居江津的梓州文人李任道知道黄庭坚要由涪州乘船走长江过江津去宜宾，就邀他下船作客吃荔枝。李任道，号仔，当年与黄有很深的交往。黄庭坚在《与王观馥书》中曰：“有李仔任道者，梓州人，流寓江津二十余年，言行有物，参道得

要，老成人也。”

黄庭坚到江津后，李任道请知县冉木出面作陪。他们摘来味道鲜美的荔枝，在县衙后心舟亭（盐业公司后临江处）一边叙旧，一边品尝荔枝。李任道乘兴赋诗，黄庭坚当场步韵作《心舟亭次韵李任道食荔枝有感三绝》：

其一：

一钱不值陈卫尉，万事称好司马公。
白发永无怀橘日，六年惆怅荔枝红。

其二：

今年荔枝熟南风，莫愁留滞太史公。
五月临江鸭头绿，六月连山柘枝红。

其三：

舞女荔枝熟虽晚，临江照影自恼公。
天与蹙罗装宝髻，更授猩血染衣红。

黄庭坚在江津期间，李任道陪他谈诗说文，陪他到城南 20 里固城山看望通直郎冯寿，黄庭坚作《闲乐记》，并赠送一虎臂杖给李任道。以后黄庭坚多次来江津，其子黄相与江安知县石谅之女成亲，而石家此时就住在江津。此事一时传为佳话。

又过了 600 多年，到清代雍正五年（1727 年），荔科技园里这棵近千年的荔枝树竟至枯死，人们颇为痛惜，不忍砍伐。未曾想过了九年，这棵树竟又奇迹般复活，“枝叶茂盛如初”，

人们大为惊喜，视为祥瑞之兆。于是在乾隆至道光年间，荔枝园的西面建起川主庙、养济院，东面建起福圣宫，以发挥其地灵。据说此后江津科举，登科学子大出毗连州县。

就这一棵荔枝树王引出的故事，清代江津的一些文人墨客写诗作赋大书特书。清代著名文学学者、有“胸藏二酉、笔妙五花”之称的贡生周佑祚所作《荔枝园赋》影响颇大。文科进士王家驹所作《荔枝园》诗，一时被世人传诵。诗曰

——

津城遗植自开元，千载灵根岿独存。

腹豁那从兵燹蚀，叶稠惟觉露华繁。

凭将不老留仙种，长此轻红缀小园。

山谷旧题三绝句，蜀中风味正堪论。

这些诗文，许多被选入清代和民国时的地方志里。

（原载《晚霞》杂志 2014 年 17 期）



（江津荔枝 小奕儿 摄）

陈子昂过江津留五言诗

被誉为“诗骨”的陈子昂系梓州射洪人，是初唐诗文革新骨干之一，是著名的文学家。其诗风骨峥嵘，寓意深远，苍劲有力，有《陈伯玉集》传世。他青少年时家庭富裕，轻财好施，慷慨仁侠。成年后发愤攻读，擅长写作。同时关心国事，要求在政治上有所建树。24岁时举进士，后升右拾遗，直言敢谏。时武则天当政，信用酷吏，滥杀无辜。他不畏迫害，屡次上书谏诤。武则天计划开凿蜀山经雅州道攻击羌族，他上书反对，主张与民休息，被“逆党”反对武则天案株连下狱。垂拱二年（686），曾随左补阙乔知之军队到达西北居延海、张掖河一带。后随建安王武攸宜大军出征，对边塞形势和当地百姓生活有深刻认识。

圣历元年（698），陈子昂因父老解官回乡，在乘船回乡途中，路过巴蜀名邑江津，被这里的风光和险胜之景的感染，他在船上挥毫写下《龙门峡》一诗：

龙门非禹凿，诡怪乃天功。
西南出巴峡，不与众山同。
长窞画五里，宛转若嵌空。
伏湍煦前石，瀑水生轮风。
流动无昼夜，喷薄龙门中。
潭河势不测，藻葩垂彩虹。
我行当季月，烟景共春融。
江关勤亦甚，巘萼意无穷。
誓将息机事，炼药此山中。

此诗描写了江津龙门峡的诡怪险峻和气势磅礴奔腾的江水以及两岸秀丽的风光。最后两句似乎能读出他不公的遭遇和看破红尘的心境，此诗选入《全唐诗》中，应是《全唐诗》中唯一写江津的诗。

但是，陈子昂的这首《龙门峡》却有种误传：说此诗是曹学佺的作品。其实翻开《蜀中广记》一书便能解开此密，破解出此误传的原因。曹学佺系明代著名学者、藏书家和著名政治人物，他所编著《蜀中广记》一书，全面记述了四川的政治、文化、人物、风俗等，是一部研究四川历史的重要古籍。该书《名胜记卷·十七》云：“（江津）治西有石门，

号龙门滩即龙门峡也，按陈子昂《龙门峡》诗曰：龙门非禹凿诡怪乃天功西南出巴峡不与众山同……等文字。这就是说，这首《龙门峡》诗是曹学佺《蜀中广记》中引用的陈子昂的作品，而非曹学佺自己的作品。于是，这种误传终可得以正明。

（原载《重庆日报》农村版 2014 年 4 月 29 日）

范成大船过江津梦正酣

范成大是宋朝著名诗人，官至资政殿大学士。与陆游、杨万里、尤袤合称“南宋四大家”和“中兴四大诗人”。字致能，号称石湖居士，平江吴县人。在诗学上他从江西派入手，后学中晚唐诗，继承白居易、王建、张籍新乐府现实主义精神，终自成一家。其风格平易浅显、清新妩媚。题材广泛，以反映农村社会生活内容的作品成就最高。

淳熙元年(1174)范成大官至四川制置使。在短短两年之内，治蜀政绩有声，但因积劳成疾，且年届半百，就请求去职。得到恩准后，他东归苏州。范成大离成都时，自发送行者甚众，送行距离之远，实属罕见。有的一直从成都送到乐

山、宜宾、泸州等。更有的送到江津毗连的合江县才依依离去。

从合江离开后，范成大本想船到江津时再停舟系槽上岸，但由于近来疲惫，他在船中竟然酣然深睡，醒来时轻舟已过津城，达城南大沙坝，直逼近渔洞。范成大后悔莫及，在船上挥笔写下《过江津县睡熟不暇稍船》一首——

西风扶櫓似乘槎，
水阔滩沉浪不花；
梦里竹间喧急雪，
觉来船底滚鸣沙。

此诗赞美江津长江两岸风摇修竹的和谐夜景和月光下江宽水急、沙滩滚鸣的特色景观。

（原载《 》 年 月 日）

王士禛江津停船写诗寄友

公元 1672 年 6 月，满清朝廷颁旨命户部福建司郎中 39 岁的王士禛到四川主持乡试。

此时的王士禛虽在文坛也是大名鼎鼎，但并没有得到康熙帝的更大恩宠，这一年正是康熙十一年，是他的第一次入川。这年对于王士禛来说，可谓国难家难一齐袭来。清初统一，西南东南一带多有起事，反清复明烟火难熄，社会动荡不安。王士禛家中多人多人遭歿，丧事接连。王士禛带着沉沉心事和无限伤感率领同僚出征西蜀。

王士禛是我国文学史上著名诗人、文学家。生于 1634 年，卒于 1711 年。字子真，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世称王渔洋。山东新城（今桓台县）人。清顺治十四年（1657）进士。清初，王士禛继钱谦益之后主盟诗坛长达半个世纪之

久，与朱彝尊并称“南朱北王”，所创诗论“神韵”说，于后世影响深远。他从 26 岁开始为官，清正廉洁，高至刑部尚书。从政之余勤于著述，擅长各体，尤工七绝，好为笔记。著述有《蜀道驿程记》、《池北偶谈》等，多达 36 种 560 余卷，被誉为“一代诗宗”和“文坛领袖”。

王士禛 22 日陛辞，7 月初 1 日启程离开京师。便开始逐日记录其沿途所经州县、道里行程。9 月 25 日典试完毕，启程返京，由成都出发，经双流、新津、彭山、夹江至峨嵋县，又经犍为、宜宾、南溪、江安、纳溪、泸州、合江县，10 月初 7 日晚达江津县。王士禛日记《蜀道驿程记》记曰：“十月初七日，晡抵江津县。距县二里许，小山多桐子树，叶如渥丹，与夕霞相映可爱。”

江津知县沈维垣在这天下午直率县衙幕僚在城门外津口迎接钦差之臣王士禛一行。入府用膳后，垣维垣向王士禛一行禀报了江津县的情况。

江津知县沈维垣，辽东荫生，万历四年乡试考取举人。

康熙九年到江津任知县。他也是一个文人，喜诗爱文。他任江津知县时，江津才经过战乱和瘟疫，可谓哀鸿遍地，一片萧条，县城荒废，衙柱倾斜，老虎翻墙登梯。全县人口籍不到 800 户，不到满 2000 人。沈维垣到津后，重建县治，课士爱民，励精图治。此时一批批“湖广填四川”和客家人来到江津，耕作俱废的津地开始复苏，受吴三桂控制的云贵

两省伺机举旗反清，此波及津南与贵州相邻地段。

沈维垣向王士禛禀报津邑南部与黔省接壤之地因地处偏远、民风不化，匪棚林立，官衙鞭长莫及等（果然不久吴三桂之后在此设立与清廷对立的清溪县）。同时禀呈了江津的山川地理和人文，特别周详地禀古河樊溪的情况。王士禛对沈维垣进行了褒奖，两人又谈诗论文一番，非常融洽。

江津城南长江下游不远处正是樊溪汇入长江之口，俗称樊溪口，樊溪口长江下游约 30 里就进入巴县境。樊溪就是现在的綦江，因它通往贵州的郎夜（今贵州桐梓县等地）所以古名又叫郎夜溪。又因郎夜地古属牂牁国，樊溪又是通往牂牁国之水路，所以典籍上习惯称此为牂牁路。这里有一个绥阳县，知县李公凯是王士禛很好的朋友和文友，他们虽很少相见，但感情很深。李铠，字公凯，别字惺庵，江南山阳人，即今江苏淮安人，顺治十八年（1661 年）进士，1670 年始任绥阳知县，已有两年多时间。李铠任绥阳知县时，为绥阳也为黔北，留下了两大精神财富：孝行和诗歌。他偕母到任、遵从母训、延孝于教，行孝楷模昭后世。李铠还是大诗人、大学者，在绥阳任职期间，写下了大量与绥阳和黔北相关的诗歌，为绥阳，为黔北留下了宝贵的文学财富。

王士禛在离开京师赴西蜀时查阅了当时的地图典籍，了解到知县朋李公凯主政的绥阳离回京这地不远，这次不想就真的到了朋友的家门口。但返回京师命急，他与朋友只能擦

身而过。他不能沿着这（牂牁路）造访很近的朋友，顿生感慨和遗憾。当晚，王士禛写下了《江津县晚泊寄怀李绥阳公凯》一诗。

路入江州爱晚晴，青山红树眼中明。

斜阳潮送孤舟上，沙岸人牵百丈行。

故国至今悲蔓子，乘槎曾共访君平。

城南便是牂牁路，一夕相思白发生。

江津古属巴郡，又曰江州。青山、绿水、红叶非常漂亮。古巴国曾经出了一个在历史上非常有名“割头救城”的巴蔓子，被历代所赞誉。

王士禛在《江津县晚泊寄怀李绥阳公凯》一诗除了描写江津“青山红叶”、“斜阳孤舟”的景致外，还表达了对忠义的巴蔓子将军的赞赏，表达了对擦肩而过的挚友的无限怀念之情。从表面上看，这首诗是写给朋友李公凯的，实际上此诗有一半是写江津知县沈维垣的。用巴蔓子的悲情故事，隐喻作为朝廷命县的知县官应有为民作主、清正廉明、守疆护城的重责。主首诗的主调有些沉重，这和当进王士禛的心情有关。

次日一大早，沈维垣等送王士禛到了樊溪口，跪拜相送。王士禛在后来的日记中写道：“十月初八日抵重庆府巴县治”，后入三峡，进湖广界返京。他后来还在日记是记载了回忆了在江津境内看到的猎儿峡的景致：过猫儿峡，连峰叠

嶒，亏蔽云日，一山突起，石棱刻露，其色青碧，曰青石屋。长年云：夏秋水涨，石屋没，则舟不敢行。过龟亭子，小山卷石，孤立江中，沧波四匝，亦浮玉之云，仍小孤之婢媵也，抵重庆府巴县治。

不知后来李公凯收到《江津县晚泊寄怀李绥阳公凯》诗后有无回和。但他肯定是读懂此诗不是全写给他的，反正事隔一年，他就回到了朝廷。

王士禛从西蜀回到京师后不久，官运一路飙升，又有大量名篇问世，诗文为人世称道。康熙十七年（1678年），受到康熙帝召见，转侍读，入值南书房。升礼部主事、国子监祭酒、左都御史，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官至刑部尚书。康熙皇帝称其“诗文兼优”、“博学善诗文”。王士禛后升礼部主事、国子监祭酒、左都御史。官场文场可谓春风得意，名扬天下，凡诗坛新人到京城求师拜友，多是首拜王士禛。

李公凯也于康熙十八年（1679年），荐应博学鸿儒科试，授翰林院编修，此是康熙钦点的50名明史参修人员之一，官至太常寺卿、通政使司、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等。著有《读书杂述》十卷、《史断》、《玉河继马记》、《恪素堂集》等多部著作。

王士禛年长于李公凯。二人均在京师为官，同为一朝，互唱诗文，交往甚密，感情愈甚。王士禛称李公凯为“有本之学”，还为他的画册题写过三首诗，名曰《为李公凯学士

题谢西村杂画册》，可见二人情感之挚。

（原载《 》年 月 日）

张船山与江津“长江水文诗”

长江是中国第一大河，全长六千三百多公里。长江在江津境内由西向东穿流 127 公里，使江津形成了大水域、大码头、大滩涂的江河地理特色。江津人习惯将这 127 公里的长江，按流向分为上中下三段即上游、中游、下游。石门以上为长游，几江为中游，珞璜为下游。

大江大水书写了江津悠久的历史，蕴涵了江津厚重的文化。历史上许多著名诗人对长江江津段波宽浪急和磅礴气势的特殊水文都有所吟哦，比如晚唐陈子昂、北宋黄庭坚等，但他们都是单篇独章，仅只一首。只有清代大家张船山算是大手笔、大气派，他不仅写了四首江津的“长江诗”，而且按上游、中游、下游三段来写，可谓对江津情有独钟。

张船山，四川遂宁人，乾隆进士，官至山东莱州知府。他是清代乾嘉诗坛的射雕手，是实绩卓著、地位崇隆、影响

深远的一代诗宗，亦是元、明、清三代巴蜀地区最有成就、最有影响、最有名气的大家诗人、大书画家。他被誉为“青莲再世”、“太白少陵复出”、“东坡之后，一人而已”。

事实上，江津人民对张船山可说是一往情深，热爱有加。清代同治年间，江津县鹤山坪文人李岑、江海清二人，共同为《船山诗草》20卷作注，编成《船山诗注》20卷，刊行于世，可谓畅销一时，倍受江津当时文化名流如钟云舫等喜爱，这为推介和研究张船山做了基础工作，该版本在江津民间至今尚存。李岑、江海清两氏，为江津望族，耕读世家，诗书传家，两氏非常相好，为张船山诗歌的传播作出巨大贡献。光绪版《江津县志》记载：李岑少年进学，四十岁以后成恩贡生。他一生课徒为业，没有做官。

乾隆五十七年（1792）腊月，张船山由成都返回京师，腊月十二日，他乘船经长江上的合江县，过松溉码头后就进入长江江津境内。这是江津的长江上游，很快他就被长江北畔的石门大佛所吸引。石门大佛堪称“万里长江第一大佛”，石门又是著名的水驿，于是，他立即写下一首诗《石门驿》

残云漏出斜阳影，飞上僧楼第七层。

松溉山浓人入画，石门风乱水生稜。

十年作赋嫌乌有，千里浮家感最能。

恨少堆船三万卷，一冬闲煞读书灯。

官航继续沿长江下行，天已进入暮色，月光朦胧之际，官航终于到达江津长江中段。这里正是江津县城几江码头，江津知县涂长发率幕僚在此恭候。张船山上岸后，急约李岑、江海清二人“相晤于几城”，深夜长谈。酒足饭饱之后，张船山兴奋极致，提笔作《月夜泊江津与亥白兄夜话慨然有作》诗——

绕县水如几，停桡月在船。

暮山明寺火，冬郭聚人烟。

宦味三年熟，乡心五夜悬。

扁舟聊载酒，风利且随缘。

该诗描绘了江津几江码头月夜下船灯闪烁的繁华和畔边寺院通夜不灭的灯火，表达了他了对官场的厌恶和对故乡遂宁的思念，同时流露出对江津挚友李岑、江海清二人的真挚情感。

这是冬天，虽然天气寒冷，但张船山一行仍然起得很早。他在几水码头启船后，继续沿江下行，官船过贾坝沱、青草背、中坝等大渡口后，到达綦江交汇于长江的顺江口，也进入江津段下游。官船又过苦竹碛、进冬笋坝，出铜罐驿，这些都是重要码头，一路滩平水急。突然，只见长江南岸江边数里石梁横亘，石块片片斜立，叠次相倚，整齐有序，宛然书卷。这就是被过往舟人和江津百姓称为“万卷书”长江江段，“万卷书”维妙维肖，形象逼真。过万卷书后，猫儿峡

迎面而来。猫儿峡又名茅公峡，全长 15 里，夹岸笔削，静水深流，但波平如镜，岩体呈典型的喀斯特地貌。

万书卷与诗文从来就是联系在一起。张船山惊奇地看到这般景象时，不由得惊呼“石烂文章出，横空半壁蹲！”这里岸悬笔削，一线水路中开，不是夔门，胜似夔门。古峡荒江，人烟断续，悬崖天半，但有吠犬声声。正当他在惊疑之时，奇迹突然出现，峡内寺僧驾一叶之扁舟，划到他官船旁，一老僧手持盂钵，来化缘讨钱讨米了！这真个是“地贫天亦弃，山秽佛堪怜”。张船山即席吟咏两诗——

其一

石烂文章出，横空半壁蹲。

山容留禹凿，峡意仿夔门。

洞杂精灵守，林荒虎豹尊。

人烟何断续，一犬吠云根。

其二

小艇冲波出，残僧横索钱。

地贫天亦弃，山秽佛堪怜。

石气灰钉积，泉痕屋露悬。

祇疑幽谷底，爪发结枯禅。

吟完，张船山官船已驶入进重庆府巴县县境。

张船山是历代著名文人写江津“长江诗”最多的诗人，共写四首，且按上游、中游、下游三段来写。上游诗写了长

江“风乱水生稜”和石门大佛高耸的景致，中游诗写了江形如几的月光之下几城灯影以及和朋友的豪饮。下游诗写了万卷书和猫儿峡的险峡和幽谷以及荒疏之景。张船山的江津“长江诗”，不仅是江津重要的文化和文学遗产，而更是研究江津长江水文化的重要资料，他对江津可谓功大莫焉。

(原载《 》 年 月 日)

敢于捆绑巡抚使臣的江津知县余甸

余甸被《清史列传》列为“循吏”。对他评价是：“刚方清简，以儒术饰吏治，直声震天下。文章书法，亦冠一时。歿后，所历官地，父老闻之，皆群聚哭祭奠焉。”清光绪版《江津县志》卷十二“志存”篇中，记载了余甸在江津敢于为民而抗命的动人故事。余甸是封建社会江津的知县中，唯一敢于亲手捆绑上峰派来重使的官员。

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八月，重庆府江津县县衙门前聚集数千县民向知县大人请愿，请求知县余甸释放被扣押的朝廷重臣年羹尧派来催征钱粮的特使。这特使也算是“朝廷命官”，但七品县官余甸为了减轻百姓的负担，不惜官运前途和身家性命，扣押了横行不法的权臣年羹尧派来的爪牙，而县民们反而向父母官请求释放催征钱粮的恶吏。这是为何？事情的来龙去脉还得从余甸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怎样的官说起。

清光绪版《江津县志》卷三“职官场·知县”篇曰：“余甸，福建南平进士，康熙五十三任（江津知县），居官清廉，革除杂派，听断明决，公暇勤课士子。作歌劝农三载，擢史部稽勋司主事。”

余甸，原名余祖训，子仲敏，号田生，福建省福清县化北里人。康熙四十五年（1706）中进士。在等待吏部送派任职期间，应福建巡抚张伯行之聘，主持福州鳌峰书院。张伯行与余甸没有上下之分，关系非常友好。

康熙五十三年（1714），朝廷选调余甸为四川乡试主考官。他在主持考试中，拒绝请托，不受贿赂。发榜时，榜上有名的都是真才实学的名士。他因此深受四川各界士民称颂，也因此很快被朝廷实授为四川江津县知县。接到任命时，有好友却劝余甸不去受职，理由是，当年他主持鳌峰书院时，福州知府周某本有升迁机会，刚好逢遇父丧，按礼制应辞职回家守孝三年。但周某贪恋功名利禄，不愿离职，想请求巡

抚张伯行出面向朝廷建议让周某“夺情”（由皇帝下旨特准留任守孝，不用辞职回乡守制）。张伯行不准所请，周某怀疑是余甸在张伯行面前说坏话，因此怀恨在心。此时，周某守制三年期满，出任四川重庆知府，而江津县乃重庆府辖县，周某刚好是余甸的顶头上司。对此，余甸坦然面对，绝不畏惧。他只带一仆一马上任。他忠于职守，每天按时上堂理案，亲自接待和审理百姓投诉的各类案件。案情简单明了的，就当堂立决，从不拖拉。政务闲暇时，就召集当地读书人，和他们一起诵文说经，讲解性理，以孔孟之道教化当地士民。所征收的赋税，一一造册登记，直接纳入地方国库，丝毫不入私囊。他的勤政及廉明无私的作风，传颂四方，深受万民称颂，也感动了知府周某，从此他消除了因误解而积怨的心里，对余甸特别敬重，两人之间关系也自此融洽起来。

就在这时，担任四川巡抚之职的权臣年羹尧受命平定青海叛乱。他乘机以“平叛”之名对四川各州县加派正额以外的赋税，中饱私囊。四川各级官吏明知年羹尧以权谋私，但畏惧他的权势。年羹尧父亲年遐龄、长兄年希尧都是康熙皇帝倚重的宠臣。因此，各州县对年羹尧的加征加收，都惟命是从，只是苦了四川百姓。就在这风口浪尖上，余甸挺身而出，顶住年的非法征赋行为，于是就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此前，年羹尧已三次行文到江津县，要求按他的指令加征，都被余甸置之不理。这次年羹尧特派亲信吏员，持年的亲笔手令，以为这样可以加大力度以震慑余甸，哪知余甸依

然不为所动。年的特差到县衙，余甸闭门不见，从早晨等到中午，年的使者不耐烦了，大吵大闹。余甸一怒之下，传鼓升堂，下令衙役把年的公差押上堂来，可是衙役们面面相觑，不敢动手。余甸不得已亲自动手，把使者按到在地猛抽后进行捆绑。这时县丞和主簿等吏员出面劝阻，说大人为民不惜一官，自是我等楷模。只是年大人乃以平叛之名加征，拒不从命，已是违抗上司，若再惩办公差，事情闹大了，非但无济于事，连大人的前程和身家性命，也会有不测之祸。余甸正在气头上，根本听不进这些劝告，连发六签，下令衙役对年的差役动刑。围观的县民见势不妙，大呼“大人不可”。其中有年老的县民数十人上到公堂，蔽护使者，并哀告说：“大人，你不惜丢了一官，这不难，但我等百姓自今以后就失去一个好的父母官的庇护，赤子无依呀。”

余甸被众县民的求告所感动，最后放了年羹尧的使者。但年的使者不肯离去，气势汹汹地向余甸要回年羹尧的亲笔手令。余甸毫不客气地对使者说：“你可还报年大人，我余甸在此闭门等待年大人向朝廷报请对我的处罚，但大人的文书，我已托人送交我的好友收存。”言下之意，年羹尧违法额外加征的证据在我手里，看你敢把我怎么样？年的使者无可奈何，悻悻地离去。

江津事件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消息传到京城，震动朝廷。年羹尧听了使者的禀报后，无可奈何地说：“此民所戴也，斥之伤众心。不去，百城玩令。”意思是说，处分

他，犯了众怒，不处分他，其他各州县都向他学习，那么加征的命令就无法执行。最后只好想法把余甸调离四川。刚好此时吏部要选调京官，年羹尧就把余甸推荐上去。经吏部考核后，余甸被任命为负责考核官吏的吏部考功司主事。主要是负责考核各级官吏政绩的主官。

康熙五十五年，余甸升任吏部稽勋司主事，津邑“民遮道泣送”，并修立一座“去思碑”于义门之中。

不久，余甸被提升为山东济宁道道员，后被雍正皇帝钦命山东按察使。雍正召见余甸后，对执政大臣们说：“朕又得一直臣矣！”一年余甸调入京城。雍正五年（1727），七十二岁的余甸卒于家。江津百姓闻此噩讯，群聚江津东门外“去思碑”前哭祭余公。

（原载《重庆政协报》2016年4月15日“春秋”副刊）

抗灾堵变的江津知县周学铭

光绪十八年（1892）壬辰科会试，建德（今安徽东至县）耕读世家周学海、周学铭兄弟双双中进士。“一门双进士”这在当地引起轰动。此时33岁的周学铭更以复试、殿试、朝考的等第选翰林院庶吉士。这以前。他虽然举人考了多次，才在上年（1891）辛卯顺天乡试才中举人，一年后第一次参加会试就考上进士，而且点了翰林，这对于他来说，真是好

运连台。

周学铭生于 1859 年。作为庶吉士的周学铭还得入庶常馆学习一定年期。学习期满（散馆）举行甄别考试。考试优等，原二甲进士授编修，原三甲进士授检讨；次者改任各部主事或知县。

光绪二十年（1894）慈禧太后六十大寿，特举行甲午恩科会试。一般是三年的学习期，二年就结束了。散馆考试的时间在会试复试后、殿试前，壬辰科庶吉士散馆在甲午年四月十八日（5月22日），十九日（23日）出结果。会试复试成绩，决定这些庶吉士是留在京师做官还是分发外地。

考试结果令人失望，周学铭以知县即用，不仅没有留馆，也没有分部。傅增湘撰《皇清诰授资政大夫署理江西按察使前翰林院庶吉士建德周公墓志铭》：“甲午散馆试列二等，故事得授京职，有阴尼之者，竟改知县，铨授四川蓬溪。”周学渊《周学铭文后记》：“二兄能文而善书，当庶吉士朝考时，人皆谓必留馆。适阅卷大臣有与父亲有隙者，黜置二等，然犹在编修、部属之间，乃竟归知县班，签掣四川蓬溪县。二兄以京师不可久居，遂毅然赴任。”

这就是说：考试的成绩周学铭是很好的，但“阅卷大臣有与父亲有隙”，被人黑了，做了手脚。因而没有考上一等，没有留馆作编修。

周学铭散馆以知县即用经吏部掣签去了四川，先后在蓬

溪，后到江津任职。探讨周学铭的四川经历，以时间顺序本应先说蓬溪这段，因为还有点小问题没搞明白搁下了。那就说说他的江津岁月。

民国版《江津县志》“卷六·官师·十六”曰：周学铭，安徽建德进士，翰林院庶吉士，光绪二十四年任。存心忠厚，拆狱公平，政教兼施，勤于课士。是岁暴灾，白沙镇被难尤惨，学铭捐廉数百金，提倡赈济。时大足余栋因仇教作乱，令唐翠屏率党窜游溪，全城惊恐。学铭布置，静以待之，贼畏而去。未几，其党何师夷又窜入十都太平石蟆等场，学铭率民团追剿何被擒，事遂定。祀遗爱祠。

此话说周学铭 39 岁刚任江津知县就遭两事，一是大灾二是匪乱。但他能全能应对，并获得了成绩。

周学铭在江津是署理知县，署理是代理的意思。晚清“署理”现象计较普遍，各种情况之间差别也较大，大致与现今“代县长”相近，即不算实授，具有临时性，又不是“主持工作”，基本拥有县长的全部权力。

周学铭由蓬溪调署江津，调职不升官。属于由中、简缺之县对品调入要缺、最要缺之县，可以看作是督抚于已有一定任职年限、有一定行政经历、经验、阅历充任本省要缺，以利于地方治理的“调授缺”。

周学铭是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 年）冬调知江津的。之前是广西人周庆壬，光绪二十三年任。离开江津的时间在光

绪二十五年（1899年）己亥二月初六日。离任后是顺天大兴人缪延祺任知江津县。周学铭实际在江津任职时间一年多一点。

光绪二十四年进士，翰林院庶吉士傅增湘著《建德周公墓志铭》说“（周学铭）迨摄篆江津，政教设施一如蓬溪，而感人最深者为赈灾、定乱二事。丁酉戊戌白沙诸镇连被风雹，亲往履勘，割俸为倡急振，集金钜万，民获全济。余栋臣倡乱，川东震恐，邑中有阴助者，会唐翠屏率众扰游溪，督团往御，贼慑远遁。未几，其党何师夷再至，窜入太平场等处公亲率团众追剿，生擒师夷，乱遂定。是役，贼锋锐甚，微公赴机迅捷，势且不支。邑人德公，祀之遗爱祠。其他美绩尚多，兹举荦荦大者。”

周学铭“存心忠厚，折狱公平，政教兼施，勤于课士。”这是那个时代循吏的标准。周学铭任江津知县，主要有三大事迹：一是赈灾；二是保安；三是公允。

一是赈灾。《民国江津县志·历年内外赈荒款目表》记载：光绪二十三年綦河、白沙等处雹灾，邑令周学铭亲临勘验，捐金二百，拨款赈济。募集救灾款一万余金。同时他还办了一件“夔巫忠酉赈务一万两”，《江津县志》还说“邑令周学铭奉文饬办，分官捐、义捐、搭捐三项。”这笔捐款应该是省里摊派的。自己江津县也遭灾需，也要钱，但省里有灾也摊派。据说江津早为巴蜀历史上富庶的“三江”之地。“人

民蕃庶，物产丰饶，渝郡各属中，号为剧县。”

江津自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几乎每年都有一次较严重的雹灾，雹灾主要发生在四至九月。这次的綦河、白沙等特别严重。周学铭到任已是冬季，不是雹灾高发季节。但头年的雹灾不能不管，新官上任亲临灾区并带头捐款总是值得肯定的。次年又发生风灾，1898年6月7日起暴风，“白沙江面船只吹翻很多，曹四之房屋吹倒，全家死完。六尺过心的黄桷树被吹翻。”民国版《民国江津县志·祥异》有记载：“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四月十八日午后大风雹，城乡捐（损）坏民房无算，邑令周学铭筹款赈济。”

江津鹤山坪原麻柳乡有一个天然岩洞叫飞仙洞。里面有一个飞仙洞寺庙，是江津远近闻名的古寺，外面林木森森，里里洞深壁阔，传说有仙女居住，时飞时入，故名飞仙洞，庙因洞名，曰飞仙洞寺。洞壁上题有数碑诗文。其中一诗为“光绪戊戌十月皖南周学铭”之诗《为赈风灾两次宿此戏题俚句以志鸿泥》诗——

一年两宿飞仙洞，但见花生不见仙。

我欲学仙仙不得，飞来飞去有情天。

二是堵变。周学铭作为封建社会的父母官，堵变铲平，庇护百姓为之本职。《江津县志》中记载了一件事：“邑令周学铭禀准川东道将道署旧船一（艘）改为邑中救生船，择险驻泊。”此义举实为保障津邑百姓之水救护。另一桩事迹涉

及余栋臣起义。光绪二十四年（1898）是余栋臣第二次起义。民国版《江津县志》“余党滋事”篇说：余栋臣遣唐翠屏于八月犯江津至游溪”。《江津县志》“炮船篇云：“光绪二十三（四）年有大足县余栋臣仇教之变，四出滋扰，分遣唐翠屏率众来犯，窜至游溪，扼于江防，望洋而返。”是年八月唐翠屏部向江津发展，在游溪受到地方团练武装拦截，因武器装备较差，团练又有炮船，没能渡江而退回，这次没有发生战斗，使津城百姓少遭一次劫难。但发生战斗的是与何师夷部，《江津县志》“职官志”说：“学铭率民团追剿，何被擒，事遂定。”傅增湘《建德周公墓志铭》说“是役，贼锋锐甚，微公赴机迅捷，势且不支。”

三是公允。周学铭“存心忠厚，拆狱公平，政教兼施，勤于课士。”他不偏不枉，重于教化，深得民心。光绪二十五年，他主行修建了一座节孝总坊，以教化乡梓。他与钟云舫的故事更说明这一问题。

“联圣”钟云舫所著《振振堂》（光绪二十三年出版）是一面能让你洞悉晚清官吏之昏庸腐败、百姓生活之水深火热的镜子。书中许多作品特别是诗、文作品笔调辛辣，对封建统治者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对时弊进行了有力的抨击。然而，却有三首长诗，是歌颂县官周学铭的。

光绪九年，37岁的钟云舫从35里远的乡下“燕子坪”搬到江津县城开馆授徒，到他64岁辞世，在这27年间，江

津就换了 17 个县令。这是个“县官俱昏聩，小城故事多”的时代，廩生钟云舫却爱“为民代言”和“打抱不平”，与县衙作对。他常赋诗作文撰联对昏庸之官进行辛辣讽刺，因而被称为“江津三大怪人”之一。光绪二十年，钟云舫写诗嘲讽县令朱锡藩狎妓嫖娼，品行不端，被朱革去廩银，还关闭了他执教多年的塾馆。为了避祸他流落成都荒郊，有家难归。在这里他写出了名传千古的至今仍悬挂在成都锦江望江楼上的长联《锦城江楼联》。

这三首长诗是《为马季良送周味西大令》、《又》、《孤儿行送周大令》，是写给县令周学铭的。

其时，钟云舫遭迫害在成都躲祸已四年。江津来了新县官周学铭，他就开始暗中回家。虽然衙中官吏都说他是个专与衙门作对的“刁顽秀才”，但周学铭却私下认为这定有冤情，所以就对他的“返回”视若无睹，钟云舫终于过上了较为安稳的日子。

周学铭刚上任，县内就发生冰雹之灾，白沙镇及毗邻地区受灾最为惨重，灾民流离失所，外出乞讨。此时，股匪四起，霸山占道，伺机打场劫镇，掠夺百姓，周学铭抗灾削匪，社会得以稳定。他办案公允，重于教化，鼓励农桑，开辟商贸，扶植教育，百姓都说他是爱民如子的“父母官”。第二年即光绪二十五年，他就外调升为道员，并被授二品衔，署江苏按察使。

第一、二首诗虽是钟云舫应马季良之请而作，但诗中表达的却仍是作者的心声。马季良乃江津名流，是自贡大名鼎鼎的“万铨恒”盐锅商号驻江津经理人，他后为团总。为送别周县令他请钟云舫作此两诗。在第一首诗中，钟云舫把周学铭比作为“斩蛟杀虎”除害、刚直不阿的周处。“倾囊赈灾灾遂止”，“灾民旱民喜公喜”。歌颂他“公部民兵捐练费，提刀杀贼忘官贵，步行险阻不知劳，官鼓五更犹不寐……，”第二首即《又》诗中，则把周学铭比作慈母，化乳安抚受灾后流离失所的饥民。刚到任就突发灾害，“母闻此耗中心裂，搥胸一痛冰成血，急装千里散青钱，五百道乳供儿食。脑肠化尽母身膏，百万饥儿方起色……”。他即将升调他乡，“请公中渡一回首，饥儿两岸泪方挥”。第三首《孤儿行送周大令》则是作者个人对周学铭的赠别之作，仍将周学铭比作慈母，将自己比作孤儿，将原县令朱锡藩等比为“鸱鸺”、“盲蛇瞎虎”。先写自己所受的冤屈，字字血泪。“鸱鸺毁我室”，“盲蛇瞎虎气昏暴，腥风毒雾日阴霾……孤儿之冤成铁铸，冤愤敷天谁与雪？”周学铭就任是“突然慈母布阳春，九幽拔苦降神明”，“孤儿今日始为人”，但他就要离去，“母已去，儿何生？巴猿江鸟不胜情，抚循未久捐恩骤，不独童马泪暗倾……”依依惜别之情油然而生，一个鞠躬尽瘁“父母官”的形象跃然纸上。

“刚简则不能谀”的钟云舫写三首长诗褒扬一个封建没

落时期的七品县官，这在他一生中是仅此无二的。

.....

四年后钟云舫又遭“文祸”，他作文揭露县令武文源不顾三秋大旱之灾而黑心篡改粮章、加征租税之罪，武终被革职，但其党羽却罗织罪名，将钟云舫拘押于成都“待质所”三年。在此他含血写下了前无古人、被后人称之为“国宝”的“天下第一长联”《拟题江津临江城楼联》——这当然是后话。

周学铭江津任职期间的表现属于封建时代标准的循吏。赈灾、设救生船是亲民，镇压起义属于维稳，修建节孝坊是教化。他的思想、行为是传统的，虽没有表现出走在时代前列，但是具有爱民的思想，那个时代能走在时代前列的是少数，那个时代更多的贪官，能做一个循吏已经不容易了。他是江津明清 540 多年历史上四大循吏之一。

（原载《成都群文》2007 年第 2 期，引用了部分松来扶先生提供的资料）

在聂帅家做客

今年 12 月 29 日，是聂荣臻元帅诞辰 110 周年的日子。在这些日子里，早已是花甲老人的龙必涛时时记起 19 年前与另外 4 个聂帅的亲戚一起为 91 高寿的聂帅祝寿的情景，往事如昨天，永远难忘却……

1990 年 12 月 28 日下午 5 时，在北京铁道部干部管理学院学习的龙必涛同聂帅的外侄李继金等 4 位表哥，来到位于北京景山东街的聂帅家中，给聂帅祝寿。聂帅老人家在书

房接见了他们，还留他们一起在家吃饭。

这天聂帅很高兴，精神和气色都很好，脸色还有些红润，大家一致称赞他老人家身体康健，但聂帅却笑着回答说：“你们没见我才理了发、才修了面吗？看起来身体是要好些。但我老了，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特别是我的脚差得很呀，行动走路都要靠轮椅帮助……”聂帅停了停，接着又对他们说：“你们在工作之余要注意身体啊，有好的身体才能为国家多做贡献……”

大家点了点头后说：“谢谢老人家的关心。”聂帅又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几兄弟的工作，我没顾上关心，思想交流得也少，就连继家在北京工作，都很少见面，外地的你们几个就更不容易见了……这就是我工作的特殊性啊。但事业只有靠自己去奋斗、去拼搏，去创造自己的前程……”聂帅停了停，又说：“我听周秘书讲，你们几个在单位表现很不错，这就很好啊……你们以后出差到北京，或者到北京来学习，都顺道来看我，我非常高兴，但一定不要专程来……”

听了聂帅老人家的这番话，龙必涛非常激动。虽然与聂帅是亲戚，又是晚辈，但他还是第一次来拜望聂帅老人家。

聂帅又说：“我作为长辈对你们关心不够，是不称职的吧。”聂帅话锋一转，又说：“作为军队和党的领导人，我不能自评是称职的，只有等我走后让军队和人民来评价……”，这风趣、谦和的几句话把大家逗笑了。

聂帅又问及家乡江津县的情况，龙必涛他们将自己了解的一些事情向老人家作了汇报，聂帅听得非常认真。他深思了一会儿，说：“江津这些年的情况我不太了解，很想知道一些，江津县里的领导来京的时间较少，有时他们来京出差，又由于我身体的原因，医生不让见，所以我就更想家乡啊……”聂帅望着大家，深情地说：“你们几个这次回去，要到农村去走走，多了解一些农村的发展和城市的建设情况，收集民众在想什么？政府在做什么……”聂帅隔一会儿又说：“我们这里的警卫战士回家探亲，都要带着这个任务回去。我年岁大了，脚也不方便，想回去都不行，你们代我调研一些问题回来，就算帮忙了，可以吗？……”

聂帅老人家这一席话又一次把大家逗笑了。

正在这时，周秘书插话说：“明天就是首长的生日，你们几弟兄好多年都没有在北京聚会了，加上必涛也来了，一起在京都聚会不容易啊……”

龙必涛向周秘书提出想与聂帅老人家合影的事。周秘书说：“平时首长是不愿与亲友照相合影的。”不想这话被聂帅老人家听到了，老人家欣然同意一起合影。聂帅笑着说：“稍等一会，我的牙齿都老掉了，我安好牙（假牙）就照。”聂帅在秘书和医护人员的帮助下很快安好牙，并戴好眼镜，大家就站在他后面照了相。大概是因为龙必涛第一次上聂家做客的原因吧，聂帅还单独同龙必涛照了一张。

当晚，聂帅留大家一起吃晚饭。席间，厨师张师傅笑着对龙必涛说：“必涛，你在列车上工作期间，常给我们捎来四川的鲜蔬菜及水果。你工作变动又托人给我们捎，真是麻烦你们……你与首长虽是亲戚，但你还是第一次来首长家，今晚首长就让我多加几个菜招待你，你可要好好的吃哟……”龙必涛听了只是笑。因为龙必涛是第一次到聂帅家做客，周秘书就提示他，注意不要掉饭菜到桌上。他说：首长在艰苦的战争年代中，视粮食为生命……其实，早在这以前龙必涛就听几个表哥说过他们在聂帅家做客，因饭粒掉在桌上而被批评的事。吃饭时大家特别小心，聂帅老人家已是 91 高龄了，虽然用筷子的手有些颤抖，但非常有力，饭菜颗粒不掉。聂帅是从艰苦年代走过来的人，粒粒皆辛苦的道理比谁都理解得透彻。

龙必涛是第一次见到聂帅，是第一次到聂帅家做客，不想这第一次相见却成了他与聂帅的永别。两年后的 5 月 14 日，敬爱的聂帅走了，这对于国家和军队来说，失去了一位领袖和统帅，对龙必涛来说，是失去了一位亲人和长辈。19 年来，聂帅那和蔼可亲的面容，那风趣的乡音，时时在龙必涛的脑海中浮现……



（载《党史文汇》2011 年第 1 期。聂帅 91 岁生日时龙必涛在聂帅家）

江津地下党张西洛力挺王洛宾

当今在中国歌坛被尊称为“西北民歌之父”和“情歌王子”的王洛宾可谓家喻户晓的歌坛重量级人物。他虽然没有到过江津县，但他的出名和当时的江津县却有着一定的关系。准确地说，最早热捧和力挺王洛宾的，是江津地下党员

张西洛。

这事得从上世纪 40 年代初张西洛的经历说起。

张西洛有一段很不平凡的经历。他 1938 年秘密加入共产党后，在重庆以《新民报》记者职业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1939 年 9 月，他作为《新民报》记者，同中央社记者、《扫荡报》记者一起，冲破种种障碍，来到延安，采访了毛泽东，写出了影响很大的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重要文章。《毛泽东选集》中的一篇叫《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的文章，就是指的这次采访。当时，张西洛就是“陪都”和大后方的资深报人和记者。

1941 年，国民党制造了皖南事变，不久张西洛身份暴露，他和妻子为了躲避国民党特务的逮捕，在党组织的安排和当地开明人士的帮助下，疏散到“陪都”重庆近郊江津县城。他仍以报业为掩护，秘密宣传抗日救亡运动和革命的思想。他的公开身份是《江津日报》副社长兼经理。《江津日报》主笔是涂志印，总编辑王野芹。这份报纸由江津大西门外的黎金茂印刷局承印，营业部在通泰街，营业部的门面很宽大，有一半的剩余空间。张西洛就向地下党上级组织建议开办一家书店，上级很快就批准了他的建议。1942 年初，他利用营业部剩余空间开办起了“江津大公书店”。张西洛妻子何惠一和地下党员李思源任店员。书店暗中销售革命书刊，吸引了许多的读者，很快就成了江津县最大的书店。但这引起了

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特务怀疑，他们也成为书店的“常客”，常来书店转悠，进行监视。

为了麻痹特务，应付当时的政治环境，1943年张西洛与地下党员王野清、朱泽莹、李思源等商定，决定由江津大公书店出版新书。当时较大的书店经批准后是可以出版书报的，但出版什么书？张西洛想起了王洛宾。

1939年，张西洛在延安结束对毛泽东的采访后又到甘肃、青海等地采访。在青海的西宁市，他受到了当地各界的欢迎。在一次晚会上，他听到了一组优美动听的西北民歌。就在这个晚会上，他结识了这些歌曲的作者，当时还不出名的王洛宾。

经过几天交往，两人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他们无话不谈，相互信赖。当时由于青海的条件非常之差，加上其他原因，王洛宾的这些歌曲都不能出版。为了保存，他就自己进行油印，并简单地装订成一本《西部民歌选》。王洛宾与张西洛分手时，他拿出《西部民歌选》交给张西洛说：“请你带到重庆，帮忙找个书店正式出版。”张西洛接过书，答应了下来。但当时由于各种原因，这本书并未付印。

现在，这本书正好派上了用场。很快，江津大公书店将《西部民歌选》交江津县黎金茂印制局铅印成书，正式出版，印数2000册，这是王洛宾歌曲的首次正式出版。当时江津县城和附近的白沙镇迁建有许多大中学校和文化机构，广大

师生和文化人对此书很感兴趣，2000 册很快就销售一空。这本今天被誉为音乐经典的《西部民歌选》在当时江津的文化界、知识界特别是青年学生中刮起了一股大旋风，王洛宾的歌轰动了江津，轰动了陪都重庆……因为这些歌曲具有浓郁的民歌味，所以不论是江津县城初通文墨的街坊小市民，还是江津乡下的樵夫走卒，大多能哼唱几首。就连当时在巴县青木关的国立音乐院的一些师生也赶到江津购买《西部民歌选》。当时的《江津县政府公报》对此还作了专门的报道。

江津出版《西部民歌选》后，王洛宾的名字在“陪都”重庆得到了广泛传播，以后他的歌曲逐渐唱响全国，流传到五湖四海，获得全国人民的喜爱。

1979 年 10 月，王洛宾应兰州军区政委肖华将军邀请创作了歌剧《带血的项链》后，进京参加国庆 30 周年汇演，他千方百计打听到了第一次出版他歌曲集的张西洛此时在全国政协工作，于是亲自到张西洛家拜访，他对张西洛 36 年前在江津从事地下党革命工作时出版他的歌曲集表示谢意，两位老人激动得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王洛宾在开发西部少数民族民间音乐宝库中功勋卓著，而江津首次出版王洛宾的《西部民歌选》则是功不可没。

（载《党史纵横》2010 年 2 期）

用诗歌来抵制日货的诗坛奇人吴芳吉

现今大凡 70 岁以上的人，若他们当年上过小学或中学，那么只要一提起吴芳吉，他们就会情不自禁地背诵出这样的诗句：“天愁地暗，美洲在哪边？剩一身颠连，不如你守门的玉兔儿犬。残阳又晚，夫心不回转……”

1896年农历五月二十一日，吴芳吉就出生在重庆杨柳街碧柳院。8岁时芳吉只得随父迁回江津德感坝，10岁后再迁入白沙镇入聚奎小学。吴芳吉13岁时在2小时的作文课上写出以诗论文、豪放严谨、名噪全川的《读外交失败史书》后，被誉为神童。

吴芳吉少年生活的地方环境不好，盗娼赌博者多，父亲吴传姜就用石灰将墙门刷白并写“白屋吴宅”字牌，意为清白之家，吴芳吉就自取名“白屋吴生”。

1910年吴芳吉考入北京清华留美预科学校(清华大学前身)。该校初是美国退还的庚款所办，校中美国教员势力很大，这些教员中多是女性，来到中国后虽学识浅薄，但薪水、住房等待遇反比中国教员高，造成美中师生关系、美中教师关系异常复杂和紧张。

不久发生了四川籍学生何鲁、黄秉礼因同美籍教师冲突遭至开除事件，这事引发了清华史上的第一次学潮，吴芳吉被选推为川籍学生代表声援同学，他仿唐骆宾王《讨武曌檄》撰写《讨校长檄》书于横幅长条署名张贴在学校食堂……此事了息后，校方为取媚外人，逼他“签名悔过”。他坚决拒绝，最后被迫离校，流落北平，为人佣工，后又转去上海书局任校对。

次年在同学的资助下徒步启程回渝，走三峡，至湖北宜昌已身无分文，他只得乞食步行。恰逢战乱，到处民不聊生，

他风餐露宿，历尽辛苦，绕道 3000 多里，历时近半年才流浪回到重庆江津。

吴芳吉被迫离开清华之事，对他打击至大。回到江津白沙小镇后，引起了一股小旋风，一些家长把他作为教育小孩的反面“教材”，很多人都瞧不起他。早在他 18 岁时，由媒人介绍与附近蓑衣滩的一富裕中农之女何树坤订婚。他蒙曲回家后，何父翻脸悔婚，但何树坤非吴芳吉不嫁，跑到吴母面前放声大哭，泪流满面地痛诉父亲武断干涉女儿婚姻，何父见女儿去意已决，最后只得允许了这门婚事。

吴芳吉自失学后，由此四处飘零，他深陷社会底层，广泛接触了劳苦民众……

从 1914 年起到 1919 年止，吴芳吉先后到乐山嘉州中学、叙永永宁中学任教。在永宁中学教书时，他经常到附近的真武山上游玩。山上有一“婉容墓”，墓中葬有当地一吕姓典狱长 9 岁病亡的幼女。吴芳吉联想到当时留学欧美的中国学生在婚姻上“喜新厌旧”现象严重，于是就构思了《婉容词》并写成初稿。诗中女主人翁假借了真武山上墓中“婉容”之名。诗成后他没有立即发表，据说是因当时的教育总长的婚配与这个故事很相似，怕引起事端。

1919 年秋，23 岁的吴芳吉应挚友、国学大师吴宓(雨僧)之邀到上海任《新群》杂志诗歌编辑。

吴芳吉跨入诗界之时，正值“五四”文学革命的兴起。他

在诗歌创作中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论战“新旧文学观”。对诗界全部否定传统诗格的“突变论”、全盘欧化的“另植论”、死守陈规的“保守论”都进行了批判，倡导诗歌要有时代感和现实感，要有鲜明的现实主义……

不久，《新群》杂志发表了吴芳吉的《婉容词》。

全诗 90 余句，采用白描的手法，句式长短不拘，具有节奏美。语言上融入了大量的现代口语，雅俗共赏，读来令人荡气回肠，起伏跌宕，悲怨之气扑面而来，酸楚之泪盈满眼眶。此诗一发表就引起文学界的震动，全国广大读者争相传诵，终被选入大中小学教材。

1920 年 7 月，吴芳吉离开上海赴湖南长沙德明中学任教。其时，毛泽东的表弟文强正是该校学生。因文强自主在学校“楚辞亭”楹柱上划改名师吴芳吉的楹句，学校欲将其“挂牌除名”，吴力保文强后，二人成为忘年之交，常有诗联往来。毛泽东、何叔衡、谢觉哉等来访文强，文强谈笑此事后，毛泽东提笔在他的诗稿上写下了赞誉吴芳吉的话：“芳吉知春，芝兰其香。”

5 年后，吴宓任清华国学院主任，曾电邀吴芳吉去执教，但吴芳吉说，既然清华开除了我，我就决不回去。后来他受聘西北大学，适逢吴佩孚、刘镇华内战，西安遭兵困围城达 8 个月之久，城中粮水尽绝，死者上千，他多次被饿昏……这是吴芳吉一生中遭遇最艰危的时期，创作的作品也最多。

其间，吴芳吉相继发表了《护国岩》、《两父女》、《明月楼》等著名诗作。这些诗作当时虽有一定争议，“新派”责难其“旧”，“旧派”责难其“新”员长，两派虽水火不相容，诗作却迅速传诵到全国，历数十年不衰。当时的读书人只要一提到吴芳吉就会随口吟诵出《婉容词》、《两父女》等。

一次，吴芳吉到某女校演讲，他刚走上主席台，全体女生就站立起来高唱《婉容词》，场面十分动人。

吴芳吉写过一首抵制日货的诗《仇货买不得》，全诗六句：——

仇货买不得，
仇货买不得！
买了仇货，
卖了中国！
休将仇货污人格，
信誓勿逾越！

这首诗当时贴满了重庆的大街小巷，每个黄包车背后都贴有这首诗，几乎每个市民都能脱口背出来。

1931年7月，桑梓情重的吴芳吉离开重庆大学文科预科主任岗位回江津就任江津中学校长。“九·一八事变”后他创作了抗日诗作《巴人歌》并多次到重庆等地朗诵演讲。

1932年4月他应邀到重庆演讲和朗诵《巴人歌》，回江津中学后，当晚又召集全校师生集会，进行演讲和朗诵《巴

人歌》，他慷慨激昂、声泪俱下，终晕倒在讲台上，随即竟抢救无效，于 5 月 9 日在白屋与世长辞，年仅 36 岁。

噩耗传来，全国文化界十分悲恸。西安、成都、重庆、江津等各地文化界和吴的友人分别召开追悼会。江津当局对他的遗孀及子女都给予关照。冯玉祥、吴宓等知名人士多次对其家人探望帮助。江津县长谷醒华将社会各界人士捐赠的资金在德感坝为他遗孀何树坤购置了数亩田土，使她能靠收取微薄的田租度日，何因此在解放初及“文革”中，被诬为“小富农”受到批判，家产被封抄，就连吴芳吉生前与鲁迅、郭沫若等大家名流交往的书信等都不知所踪。

因吴芳吉自名“白屋吴生”，人们就叫他“白屋诗人”。其诗的风格也被称为“白屋体”。

吴芳吉一生留下了 600 多首优秀诗篇，他被称为诗词改革的先驱和开拓者，是第一位创作现代格律诗的诗人，被文学界称为“现代诗史上有建树的六位诗词名家”并排名第一位。他的人品文品都曾受到周恩来、郭沫若、梁启超等人的高度赞誉。周恩来曾对吴芳吉长子吴汉骧说：“你父亲的诗很好，我喜欢……”

（原载《文史博览》2008 年第 12 期）

苏校长与“津蓟边区特支”

本文主人翁虽然是一个党外人士，但他却与地下党的“中共津蓟边区特支”关联密切。他叫苏灿瑶，人们都称他为“党外布尔什维克”。苏灿瑶在国民党挑起内战，制造反共白色恐怖时期，千方百计支持和掩护地下党的活动。当时

的綦江和江津两县共产党组织领导机关“中共(江)津綦(江)边区特别支部”在他主持下的江津笋溪中学秘密成立。从此，这里的革命活动有声有色，党员队伍不断发展壮大……蔡家笋溪中学成为江津、綦江两县革命的摇篮，成为川黔边界上的一个红色据点。

1946年，37岁的苏灿瑶被国民党江津县政府“举贤”为笋溪中学校长。笋溪中学位于江津县南部山区蔡家岗笋溪河畔。一条美丽的笋溪河，从贵州省习水县大毛坡金顶山北麓一路欢歌而来，流经蔡家岗，学校因此得名。当时，这所学校面向江津南部山区和毗邻的綦江、合江以及贵州的习水、赤水等地收生。其实，当时这是一所“烂摊子”学校，曾发生过学生驱赶校长、学生殴打区长等事件。反动当局对此焦头烂额，认为山区的学生桀骜不驯，因而迫切想物色一个精明强干的校长。因抗日将领夏仲实推荐，曾任过他秘书的苏灿瑶出任第四任校长。面对这棘手的学校，苏灿瑶倾听合理化建议，选聘思想进步，有真才实学的教师，协调处理好地方各派的关系，使学校面貌迅速得以改观。

抗日战争刚一结束，国民党迫不及待掀起反共高潮。江津、綦江两县城里的地下党组织遭到特务的多次破坏，党员遵照指示全都外撤和疏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上级党组织于1945年秋，派向天培、但林文夫妇来川黔接壤处的江津、綦江两县边界地区开辟工作。向、但夫妇俩先在在

蔡家乡龚氏私立小学以教职作掩护，发展了这里第一个党员凌照远，不久凌又发展了聂荣贵……1946年秋，暗中了解到向天培、但林文真实身份的苏灿瑶，同意聘请二人来笋溪中学任教。

当时，向天培的秘密身份是地下党綦南工委副书记。来笋溪中学前，他按照党的工作纪律和原则通过各种渠道对这个校长进行调查，最后得出结论：“苏灿瑶了解党，支持革命。正因如此，向天培在这里才会有广阔的活动天地。

学校处于蔡家山区，国民党江津县政府第二区区署机关和二区区党部就在学校附近的蔡家街上，这里的反动势力盘根错节。在这种情况下，苏灿瑶明里暗里对地下党的活动进行保护。他与向天培配合默契，可说是心照不宣。

虽然这样，当时处于地下活动状态的党的政治工作和组织发展任务还是非常艰巨的。经中共綦南工委批准，向天培在这里秘密成立了中共津綦边区特支，向天培任书记，任务是统一领导当时江津、綦江两县党的工作。特支在教师、校工、青年学生中，特别是在当地农民中，进行思想启蒙教育，对发展对象进行党的基础知识教育，提高他们对党的认识和信念。在组织发展上，向天培严格要求同志们遵守秘密工作原则，成熟一个发展一个，严格标准，保持了党组织的纯洁性。入党的同志，都进行了秘密入党宣誓。党员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党员分布在江津、綦江、习水、赤水四县毗邻乡镇。

笋溪中学有一个叫王富学的老师非常反动，他明显感觉到学校有中共党组织在活动，而且苏灿瑶在暗中庇护着他们。有一天，这位王老师与国民党江津县参议员王钦青一起拦住苏校长对他说：“学校的向天培很有可能是共产党，他喜欢找学生谈话，客人又多，行踪可疑。你将他解聘算了……”

有趣的是向天培到笋溪中学也是由王钦青介绍的。苏校长听了这话赶忙打圆场说：“王兄介绍给我的人怎么可能是坏人哟？找学生谈话是老师的职责。对现实不满，有几个客人来往，怎么就能说成是共产党？老实说，现在是内战连连，民众困苦，还有几个人心里没牢骚？据我观察，向先生教书很负责，学生欢迎，解聘了恐怕学生和家不依哟……”一席话说得对方回答不出话来。事后，苏校长将这事告诉了向天培。他还说：“我虽不在党，但相信我，我要用自己的生命担保你的安全。”这话令向天培激动万分。

在残酷复杂的斗争环境中，党组织的斗争更讲策略和方法。特支坚持教育组织群众开展对敌秘密斗争，引导大家提高警惕，擦亮眼睛。他们办墙报，组织读书会、举办讲座以及其他一些活动等，这是一种比较公开的活动形式，在当时也是一种合法的斗争方式。学校青年学生和附近农民踊跃参加，他们的思想觉悟不断提高，积极靠近党组织。学校办起的《芙蓉》、《新笋》、《拓荒》等墙报，主编都是地下党员，

墙报定期出刊，连续刊出进步文章。刊登一些辛辣讽刺国民党政府的小品和漫画，使文化较低的当地农民也能看懂，起到了匕首和投枪的作用。

第二区区长邓荫黎是个国民党党员，他曾在夏仲实将军的部队里任过团长，当时苏灿瑶任夏部秘书，两人是熟人，但两人的政治观点不一致。一天，邓荫黎来到学校，对苏校长说：“我听说有人在你学校搞赤化宣传，学校有共产党？”苏校长连忙回答：“你莫要开这么大的玩笑哟！你是这里的区长，你都知道这学校里全是些不懂事的山区孩子，好些还是绅粮子弟，能搞什么赤化呀？”他接着拍了拍胸脯后又说：“要是真有什么共产党在活动，我还不知道吗？这些就请老兄放心是了……”

向天培常在党的秘密会上赞扬苏校长这样巧妙的应对方法。不过，有一次向天培也批评了一个同志。这位同志在苏校长家借了一本胡绳的《思想方法论》，这在当时是本禁书，他看后就顺便放到桌上。向天培知道了就严肃批评这位同志：“苏校长的书就更不能随便摆起，出了事怎么办？他是我们党的好朋友。他学识渊博，读的马列著作很多，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声望，对这样忠诚的好朋友我们更应该加以爱护……”

1948年4月，重庆地下党组织创办的《挺进报》被国民党特务破获，重庆及川东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为了保

存革命力量，党组织决定转移一批同志到江津偏远农村。6月，上级党组织负责人吴安启托人带来口信，希望笋溪中学设法接收从重庆疏散来的《挺进报》支部成员文履平等5名同志。苏校长接信后没有半点犹豫，立即做好准备以便安置新来的地下党员。很快，文履平带领一个小组分头秘密来到这里。苏校长非常支持这些新来的同志，分别安排担任国文、英语等学科的教员，使他们得以隐蔽下来，继续开展斗争。

这些新来的党员组织关系不在这里，但他们积极配合特支的工作，给这里党组织增添了新的力量，使这里的党组织更显生机。他们一来就投入到各种讲座会、报告会、读书会的活动中，深入到农村进行社会调查，教农民识字、写信、算数等等。文履平在一次学生集会上分析平津战役后的战争形势，大家听了这些报告后，心情振奋，充满希望，看到了全国解放的曙光。

不久，县城里的国民党特务逮捕了朱近之和刘永怀两同志。苏校长的爱人诸有常在白沙镇得到消息后，连夜送信到笋溪中学，苏校长接信后立即安排向天培等同志下乡暂避，自己则巧妙周旋，迷惑了前来查询的敌人。

1949年5月4日，在苏灿瑶校长的主持下，学校举行“五·四”运动纪念集会，操场讲台上，高挂鲁迅先生的画像，由特支的地下党员上台主讲鲁迅先生的战斗精神。为了进一步激发青年学生的热情和斗志，让他们认清形势，敢于

斗争，重庆疏散来的地下党员石大周给学生出了《给蒋介石先生一封公开信》的作文题，许多学生都写得真实切题，充满正气，表现出迎接黎明的决心和勇气。

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少将处长周开庆耳闻江津有共党分子活动便回江津侦缉共产党。在峡滩场遇到苏校长，周问：“听说你们学校有共党，有个叫石大周的还教老百姓和学生扭延安秧歌，教他们骂蒋总统……？”苏校长回答说：“这个人教书还很认真。只是人年轻，爱发点牢骚。他要真的是共产党，他肯定不会多说的……”周又说：“谨防共党在你校的活动，出了事你要负责。”苏校长回答说：“我绝对负责，一切唯我是问……”

上级党组织指示特支书记向天培到川黔边界处的川南古叙地区领导武装斗争。怎样才能以一合适的理由离开学校呢？向天培与苏校长进行了一次长谈。第二天，苏校长就对外宣称：“向老师家有财喜，因为有笔生意在贵州，所以他要去打理一下……”这样，向天培的突然离去也就没有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怀疑，直至向天培返回，许多人都还不知他外出的真正原因。

临解放时，津綦边区特支及其下属的蔡家地区的党组织秘密印制了《土地法大纲》、《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论联合政府》等文献，散发到各支部，组织大家阅读、开展宣传，大大地鼓舞了人们的斗志。而苏校长则是利

用自己的各种关系及威望，机警地掩护着党的活动，成为党的最可靠的朋友。伪区长常来学校旁敲侧击问情况，伪县长也来视察学校抖威风，特务也时不时来学校巡查。这些人来后既刺探、又威吓，既规劝、又警告，而苏校长总是佯装热乎，一是叫苦，一是保证；一是叙旧，一是称兄道弟……如此巧妙周旋，把他们一一打发走，保护了这里的党组织。

“津綦边区特支”在笋溪中学扎了根。1949年7月，临近解放，上级决定将这里的党员划归地下党江津县委领导，此时“津綦边区特支”也发展成8个支部，党员人数达到104人。党员除笋溪中学的教师、学生、校工外，更多的是江津蔡家地区几个乡镇的农民和毗邻綦江、合江，贵州习水、赤水县的农民。当时有一个支部就叫津綦习支部。

这些党员利用各种关系，深入到各自熟悉的乡镇，做地方武装人员的策反工作。有的在各自所处的岗位上，进行革命宣传，迎接解放。有一部分则是打入国民党的伪乡政权，任乡队副、保队副等等，控制了一定数量的地方武装，为江津的解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解放后，他们成为征粮和清匪反霸主要领导力量，全都参加了新政权的建设工作。

……

其实，早在青少年时代的苏灿瑶就追求革命，积极参与革命活动，1928年加入了共产党，1930年四川广汉兵变后因联系人失踪而脱党。1939年，30岁的苏灿瑶在成都与好

友投奔延安受阻后，毅然到抗日将领夏仲实部任秘书，他极力宣传共产党的抗战主张。苏灿瑶还是个作家，在《新蜀报》等刊物上发表了许多反映抗战和社会现实的文学作品。在筭溪中学时，苏向党组织提出了重新入党申请。1949年上半年，他到重庆找到党组织负责人吴安启，提出入党要求，吴请示上级党组织后回复他：“你是知名人士，若能留在党外，对革命起的作用会更大。筭溪中学党的活动就开展得很好嘛！”苏灿瑶听从了党的安排。

解放后，当年的“津綦边区特支”书记向天培先后任綦江县委书记、西南农学院党总支副书记、重庆市教师进修学院副院长等职。苏灿瑶先后任江津初一中和江津师范学校校长，解放后被推选参加“各代会”，是江津县一至六届人大代表。1979年3月16日，在江津专区体校的工作岗位上病逝。

（原载《重庆政协报》2010年7月5日）

钟云舫傲骨直肠为民呼

“联圣”钟云舫铁汉铮铮，傲骨直肠，用楹联这一特殊武器，同腐朽没落的封建制度及其统治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真乃文化斗士也。

钟云舫（1847—1911），四川东道重庆府江津县人，1867年考取秀才后“补廪”。他家境贫寒，怀才不遇，潦倒一生，蛰居县城设馆授徒。自编《振振堂集》八卷，一生创作楹联4000多幅，其中有《拟题江津县临江城楼联》等三副超长巨联。他被誉称为“长联圣手”和“联圣”。

钟云舫9岁时爆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接着是中法、中日战争和八国联军入侵，帝国主义用坚船利炮轰开了闭关自守的中国大门后，腐败的清政府向他们签订了一个个赔款等不平等条约，把中国人民进一步推向黑暗深渊，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更加尖锐，社会动荡剧烈。压迫和反压迫、变革和反变革、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异常激烈……

写尽民间疾苦声

春联是老百姓年年都要接触的一种最常见的楹联种类，不论是钟云舫在乡下耕读之时还是在城里设馆教书之季，每当岁尾他都会非常热心地帮助最基层的贫苦百姓写春联。每到年关，远乡近邑的百姓趋之若鹜前来求联。钟氏春联为何如此受百姓欢迎，原来他一反春联写作须得歌颂“太平盛世”的桎梏，打破传统，专写反映劳动人民疾苦，反映贫苦百姓心声的春联。

过苦年，苦过年，过年苦，苦年过，年去年来今变古；
读书好，好读书，书读好，好书读，书田书舍子而孙。

——该春联反映的是农村耕读世家清寒贫困的生活，反复换位，一咏三叹。采用了连珠，重言等手法，用“过年苦”和“读好书”三字组合与排列，更是构成“越递”的意味，表达农村读书人穷愁潦倒的心绪。

钟云舫最典型的描写最底层贫苦百姓生活的春联还有四副——

谋生梦好鸡常破；
索债人多犬不闲。

几根穷骨头，撑起气运；
两个大眼睛，看倒乾坤。

天外浮云看富贵；
眼前修竹长儿孙。

大大方方做事；
简简便便过年。

——一、二联乡土情调浓郁，感染力强。深刻揭露了统治者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反映了最底层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无数穷困瘦骨的“杨白劳”在死亡线上痛苦地挣扎。二、三联表现了劳动人民对吃的封建制度及其统治者的强烈不满，但在浪漫的笔调中略带超越的情趣，折射出光怪陆离

和一种飘逸潇洒的道家思想。这些春联大众开放，雅中含俗，俗中露雅，读来朗朗明了，既感淡逸深该，又不失厚怨沉情，韵味无限，个别甚至奇巧怪秘，荒异精妙，但每字每句都如一颗针砭时弊的风骨钢针。

清同治初年，江津县城有恶霸赃官刘、孟、陈、吴四家欲抢夺关庙公产，城邑上下大哗，年少气盛的钟云舫不胜其愤，研墨展纸，写下《题江津关庙联》——

荆州吾旧业，恨刘封孟达，协力匡吴，至今一局棋残，须还我汉家疆土；

陈寿尔何人，党司马夏侯，私心帝魏，谁知百年论定，要授它孔氏春秋。

此联看似写关庙，实为声讨恶霸。字字双关，不离《演义》，却能隐指深括现实，巧妙至极，很快就被城乡百姓所传诵。在强大的群众舆论压力下，县衙作主收回了公产。

泪洒青幢挽忠烈

“戊戌变法”失败，腐朽没落的清政府残酷地杀害了刘光第、杨锐、康广仁等四人。康友为，梁启超则逃亡日本。消息传来，钟云舫悲痛欲绝，愤笔为刘光第、杨锐二人疾书二副挽联《为邑中两公尽节赐祠作》——

其一：

英雄不烈无名，扫欃枪，为国除边患，摭斡略，为国

葆残黎，飞碧血于刀头，是当年地裂天崩，一阵慌忙劫运；

功德在民则祀，睹毛发，想公酣战情，拜冠裳，想公毕命状，附精灵於箕尾，问何日崧生岳降，再来涤荡河山。

其二：

男儿当马革裹尸，镕金石心，撑孝义胆，碎刚烈肠，碧淋淋血染刀头，是为全归。只浩劫难消，未免灵涛郁孤愤；

天子赉龙章立朝，披四品服，贲两颊须，严千秋貌，光拂拂身骑箕尾，斯为大勇。惜余生也晚，空将热泪洒英魂。

刘光第、杨锐都是四川人，刘系富顺县人，扬系绵竹人，他们同“披四品服”卿衔。“箕尾”指六颗箕宿星官，隐喻“戊戌六君子”。该联褒扬了他们力挺救亡图存、用生命和鲜血浸染中国改革之路的大义凛然、英勇就义的伟大精神。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先驱、四川第一张日报《重庆日报》创始人、江津人卞小吾被清政府逮捕后押解于成都科甲巷待质所。钟云舫也曾在此蒙冤受拘三年。1908年6月13日，卞小吾壮烈牺牲。噩耗传到江津，他悲愤填膺，力撰《挽狱友卞小吾（二）》，歌颂卞敢为革命事业献身的高尚精神——

其一

谁使君到此间，起兹平地风波，似这般铁血横飞，万点蜀山，胥化其宏之碧；

吾与子遭斯祸，已抱呼天冤愤，讵复料金銮颁赦，三声猿泪，竟残巴曼之尸。

其二

何事恼穹苍，竟碎荆山，黑暗而讵发文字光，这千年沉渊堕海之冤，化为白气冲霄汉；

同时遭叵测，幸逃军府，金石人熬尽风波狱，余一把呛地呼天之泪，洒向朱棺涌血河。

满清统治者对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进行大肆镇压。重庆是西南满清的统治中心之一，江津离重庆很近，能敢在他们的眼皮下挂出歌颂革命先驱的挽联，钟云舫精神可见一斑。

直言破立唱“红灯”

1900年开始，以义和拳、红灯照为代表的中国人民武装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民间组织在山东、河南等地揭竿而起并迅速扩展到全国。1901年四川白莲教、红灯照起义烈火遍烧，严重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清廷惊恐万分，接连派重兵镇压，残酷杀害了深得民心的四川红灯照领袖廖九妹。红灯照组织多数被迫转入地下。《江津县志》（民国版）记载：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津邑已出现“神拳”、“红灯照”等组织。

在这年江津县城“天上宫”里举办的“盂兰节”大会上，钟云舫挂出了一副对联——

海天圣灯，由南闽八千里来，光远自他而耀者；
天文地曜，裊西川亿万民福，帝力于我有何哉。

该联看似写福建客家移民“填川”，实是宣传以被清政府禁止的“红灯照”口号“手提圣灯有神明”。嵌入“光”、“帝”二字是闽省入川的客家人、“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谐音。意为“光第虽死犹生”、“圣灯永照”。

钟云舫当时就是闻名遐迩的联手，他给县城和附近镇乡会馆、宗庙的堂门题撰了诸多歌颂“红灯照”等农民起义的楹联——

九月清秋，是九转丹成之日；
一天恶风，想一镫红照之时。

群玉散春华，捧出天中白壁；
众星攒福国，依然海上红灯。

绝壁张灯，可谓明也已矣，可谓无也已矣；
寻春作伴，侔我于堂乎而，侔我于庭乎而。

大愿船，指向西方，有万盏明灯，挂在千千杨柳；
金光咒，现出南海，看一时春浪，飘来朵朵莲花。

自天降康，闪出光明世界；
惟后锡命，灿成星斗文章。

自天降康，红寸飞时乡酒熟；
非后何戴，黑洋深处圣灯高。

在这些并不隐晦曲折的联语中，能读出钟云舫讴歌“红灯照”等农民起义、讴歌改良维新、以唤起大众觉醒的隐喻。后两联还巧妙嵌入“戊戌六君子”中的“二康”和残酷执政的“太后”。

一生多舛写“离骚”

1894年，钟云舫因写诗讽喻昏聩无比的贪官知县朱锡藩，被恼羞成怒的朱革去廩银和关闭了塾馆，他被迫背井离乡，流落成都荒郊以教村学糊口。此间他创作了代表作之一的长联《锦城江楼联》，该联至今还悬挂在成都锦江城楼上，它见证了100多年的风雨。

1902年底，巴蜀大旱，钟云舫吮笔挥毫、具状揭露知县武文源横征暴敛，武终被削顶革职，但不久他被武的同党污构，被羁押于成都“待质所”三年。蒙冤受曲，黑夜漫漫，他在狱中以泪和墨，写下著名的《六十自筹联》后，又以血

染纸，写下了传世不朽的 1612 字的天下第一长联《拟题江津临江城楼联》。在这副荣耀古今的巨幅长联中，他向腐朽的封建社会宣战：“抡起斧头，将这黑暗、愚昧、混沌的世界砍除；将一个玲珑、崭新、清平的新天地开辟。”著名文化学者、中国楹联学会常务副会长常治国先生在谈到钟云舫及其长联时说：“钟夫子傲骨刚肠，直言破立，千载文人笔调，致此为雄。”

钟云舫终于走出牢笼回到江津，光绪三十二年（1906），在门人郑坝等的多番劝说下，将所撰诗联文编印成集，取名《振振堂》，有六卷。诗、联、文稿各二卷。此书一问世，就被江津学子一抢而空。毗邻州县前来索联者甚众，三年后，续编二卷联稿。《振振堂》共计八卷。其中联稿四卷，载联 1850 副，分为名胜、祝嘏、喜姻、庙宇、春联等 9 类。诗文稿各二卷，各载 105 首、30 篇作品。到民国十六年，即 1927 年，《振振堂》已由江津通泰门“翁和成”书店重版刊印五次。此外，在民间还有其他印本，此书在巴蜀引起轰动。

纵观钟云舫的楹联作品，在艺术上多采用逸情寓意的创作方法，即以逸情绝伦的情感，触景生情，寓意造型，使作品有一种万缕郁情、气荡乾坤的感染力。同时，对仗工整，平仄协调。一句子之内音步平仄交替使用，五言平起联和七言仄起联末二字同音，两句相对时音步平仄相反，上联仄声收，下联平声收，绝无例外。其联技法高超，不愧为联圣！

宣统三年（1911）正月三十，一代“联圣”钟云舫在贫病交加中溘然长逝，葬于与江津县现龙乡相邻的璧山县灯油坪。

（原载《对联学刊》2008年第一期总36期）

钟云舫游五福宫

五福宫建在重庆通远门旁的山峰顶端，海拔 280 公尺，是古代重庆全城最高处。从五福宫俯视，可看到全城，看到嘉陵江和长江两江交汇，看到对岸起伏的山峰。明代曹学佺《蜀中名胜记》载：“五福宫乃城中最高处，俯窥闾闾，坐带江流。”这里是古代渝城内的登高胜地，市民都爱到此处游览。

明朝天启元年，五福宫在战乱中毁塌，崇祯二年重修。殿的左右壁，有成化间清河文全题“云崖深处”四字，有“福地清都”石坊。坊联云：白云常驻东西岭；明月不分上下楼。清光绪十八年（1892 年）川东道黎庶昌在五福宫侧改建北楼，亲撰《改建五福宫北楼记》，将五福宫北楼称之为楼外楼。每年重阳节，很多人在此登高游览五福宫和楼外楼，眺望两江，吟诗作赋，抒发情感。

清光绪二十年，巴蜀有名的楹联圣手、江津县南安街塾馆著名塾师钟云舫因写诗讽刺江津县令朱锡藩狎妓嫖娼，被县衙革去廪银，朱锡藩还放出话要“办”钟云舫。钟云舫只得离开江津，先到重庆，后到成都避难。此时的钟云舫已 47 岁。他到重庆一是想探究一下风声，二是想会会早年在渝城游学时的一帮秀才朋友。

在渝城，正逢重阳节，在渝的李天章、刘孔修两秀才相邀携酒来到通远门处的五福宫游览。钟云舫想：这正可散心解愁。于是大家说说笑笑。他们约定游览后每人赋诗一首或

撰楹联一副，如果写不出诗联，此次游览的酒菜钱全由这人付。这样的建议，正投文人所好，自然无人异议。

大家各提一壶酒，一起来到通远门后，首先来到楼外楼，再登上楼顶。钟云舫叫来小二，在外阁摆开一小八仙桌，添上菜，置上酒，他们推杯把盏，谈笑风生，豪饮起来。钟云舫见两江汇流，奔腾不绝；远山巍巍，白云缈缈，不禁联想到自己的遭遇，于是他挥笔写下了《渝城楼外楼》一联——

此巴蜀钜观，只一层楼，通八方气，撑半壁天，巫峡十二峰，嘉陵三百里，好山好水，都从眼底逢迎，洵可乐也，洵可乐也；

当风日清美，携几壶酒，约数友人，论两间事，纵横廿四史，上下五千年，大嚼大啖，浇尽胸中垒块，岂不快哉，岂不快哉。

此联是钟云舫的代表作之一。他曾说此联是“生平得意之作，谓此为最得三昧之……”清末文人郑坝也说此联：“浩气流行，横戈直捣，中间疑有神助”。应说明的是，此联上联叠加句“洵可乐也，洵可乐也”语出《南史》，但此引用得恰如其分。

此时的李天章、刘孔修不胜酒力，很快就昏昏欲睡，哪里还有心思写诗作联。但刘孔修清醒一些，他对钟云舫说：我醉则神昏，就有劳钟秀才捉刀代笔写一副楹联罢了，下次的酒资算我刘某人头上……钟云舫见刘孔修这憨态，加上他

感到刚才写的第一副楹联言犹未尽，于是取笔又写下一联——

洪荒开辟数十万年而有此楼，按天文，批地脉，据佛图，敞仙阁，扇巍显翼，以成钜观，其惟大人乎，为能等量乾坤，荣镜宇宙；

长江逶迤七千余里而入于海，经字水，汇嘉陵，通巫峡，接瞿塘，烦灵载英，中结名汇，至如我辈者，政当吟弄风月，啸傲烟霞。

此联可谓气势磅礴，如大江奔涌而至。郑坝在评述此联时说：“凭空而来，一句十二字，一笔直至尾，亦拘折，亦挺峭，无一毫滞气。”其实此联并不逊色于第一联，钟云舫为了证实此联是自己所作，在后来将此联收入《振振堂联稿》中时，特注明“此联为某代作”。

李天章、刘孔修两秀才醉卧桌上，鼾声不断。钟云舫首先招呼小二，付了十文铜钱，然后嘱咐小二暂时照顾一下自己的两位朋友。他独自一人来到侧边的五福宫，这五福宫金碧辉煌，高峙崖沿，钟云舫联想到他喝醉了的两位朋友，很快又写出《五福宫联》——

俺游子遍落游踪，随地支筇，七尺躯卸却名缰，两只脚登开利锁，抛残热血，不离红豆坡前，嘻、嘻、嘻，某只想一年中三百六十日，都靠楼边水边，快乐哉，将甚么攀连我去；

这道人有些道气，凭高立庙，几声钟打出世界，半杖杖击破禅关，掀起枕头，已是黄粱熟后，哈、哈、哈，你看那满城内数千万众生，还是醉里梦里，天晓矣，可疾忙唤醒他来。

此联也是一副经典之作。作者的感喟之情，出以优游之笔，写景抒怀，已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而且对仗极为工整。

朋友醉卧，不敢久留，钟云舫急匆匆游完，返回楼外楼时，见两位朋友还在酣睡，只好等在侧边。到下午子时，两朋友酒意稍醒，钟云舫立即打点两副轿椅，分别将二人送回家中。自己则回到客栈。

这次钟云舫来渝与两秀才朋友相邀登楼外楼、游五福宫，他触景生情，有感而发，写出了三副长楹，这三副作品堪称精品，流传甚广。他有不虚此行之感，唯一遗憾是两位陪同的秀才醉了半天。

钟云舫对李天章、刘孔修的酒醉感到歉意。第二年正月，他专门给李天章送去题为《为渝城李天章财门作》的春联：系接陇西钟灵蔚起涂山秀；恩迎阙率翰墨流来字水香。此时正值梅花开放，他又作《折红梅寄刘孔修》一诗，以示回报。

（原载《重庆政协报》2014年2月28日）

曾国藩向朝廷举荐旌表江津妇

李默仙是江津进士李昉之女。李昉是江津县鹤山坪人，考中进士后被朝廷选授到北京完县作知县。完县就是后来的宛平县，京城之畿县，虽同属县，但官品比其他县令高半品，为附六品。

李昉到北京完县作官，就带着自己的女儿一同前往。在公署之余，常教女儿读书识字。女儿聪慧，喜读经书，可谓琴棋书画样样喜欢。而且还告别孝敬家人。以前的女人自己是没有名儿，长在后嫁人了，就随从夫家姓，夫姓什么，就叫什么什么氏，再加上自家的姓。不过，这李昉知县的女儿还没有嫁人，就偏偏自己给自己取了一个名，叫李默仙。

后来，李默仙跟随自己叔父李瀛。李瀛也是朝廷命官，出守衢州府。李默仙在学习针线、纺织、刺绣、缝纫之余，兼学诗书琴画，而且日益长进。她的楷法笔酣墨饱：笔墨运用得畅快。她成为远近闻名的才女。

李默仙成人后，嫁给四川省垫江县编修陈伯銮之长子陈甫。不想两年后，陈甫英年早逝，客逝湖北省当阳县。这时李默仙才 22 岁，她痛不欲生。因无子女，所以就抱着夫弟之子立嗣为后。李默仙含辛茹苦，矢志抚孤。成为远近闻名女宗之典范。

曾国藩奉旨任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他在楚南一带巡视。他听到了李默仙的事迹后非常的感慨，他亲自上书朝廷，请于旌表，朝廷颁旨旌表李默仙。

李默仙中年后迁回江津，依其母亲住江津鹤山坪。她在从事女红之闲，博览群书。琴棋书画样样皆习，特别吟诗作赋，自成风格。她常对周围人说：“古来女子以才称孝多矣。然才而以德济之，庶不为世诟病，可以想其为人综”

李默仙少女时代是才女，后来嫁人是淑媛，又继成为守节的寡妇。最后高寿，活 82 岁，成为寿母。才女、淑媛、贞嫠、寿母……一身兼之，难矣哉。

李默仙著有《昙花一现集》，音节凄婉。其侄孙李廷为她出版刊行。后附《写哀》诗。

一

感我怜君不尽悲，万般志愿此生违。同心昔日夸双好，比翼今朝怅独飞。一曲云歌人去也，数行风信事全非。形容莫道都消瘦，还有迷离两眼肥。

二

祖帐无端各一天，归期空自卜金钱。愿还白首歌黄鹄，书检青灯泣杜鹃。人返芝田音永断，鸾孤菱镜月空圆。三生赤系缘何浅？云散风流感变迁。

三

零落霜闺叶满堦，难胜肠断晚秋时。理妆不复重磨镜，剪烛何堪再读诗。地下修文缘底事，人间比翼是分离。孤幃寂寞潇潇雨，如梦如疑惑不支。

四

闺阁今生万事休，悲欢都付水东流。孤明心等天中

月，晚节人期雪上头。寂寞寒灯空旧梦，萧萧风雨落残秋。他年随驾青鸾去，捧砚从君赋玉楼。

(原载《垫江日报》2016年2月12“牡丹苑”副刊)

陈独秀与江津农民交往二三事

1938年8月至1942年5月，陈独秀在江津度过了人生最后四年时光。他先在江津县城、施家大院等地小住。1939年5月，与妻子潘兰珍蛰居江津县乡下偏僻的鹤山坪上的杨家石墙院，在这里他“谈笑少鸿儒，往来多草根”。笔者从事江津地方党史和文史工作多年，因工作原因采访过许多当年与陈独秀交往过的农民，收集整理了许多陈独秀与江津百姓交往的故事。

吃春酒

“春酒”是巴渝人家在春节期间的一种宴请习俗，指客人到亲戚朋友家吃“拜年酒”。

鹤山坪分为上中下三坪，是长江与筲溪河的分水岭，坪内原置五举沱乡（双石场）和麻柳场，有“天下第一坪”之称。鹤山坪上杨家是个大家族，有钱有地，比较开明，对百姓还不算坏，算是进步乡绅。

陈独秀来杨家石墙院，据说与杨家是有一笔“交易”的。一次，陈独秀偶然在县城街上的一小书肆里发现一本文学方面的书，叫《群经大义》，作者是江津县杨鲁丞，于是他就到处打听杨氏。杨家算耕读世家，杨鲁丞是清末廪生，有的说是拔贡，反正很有学问，算是个乡贤，但已作古。他的这部遗著有些散乱，陈独秀找到杨家后人杨学渊、杨庆馥，以帮他们整理这部文稿为条件，搬到石墙院居住。陈独秀曾花

了一年多时间阅读、整理杨鲁丞的遗稿，考订、整理出《皇清经解》一部、《杨鲁丞先生遗作六种》一套。

陈独秀晚年在江津，虽然自由，但经济很不宽裕，常常捉襟见肘，处于贫病交加、生活凄凉的境地。他住在农村，却不是农民，没有可以维持生计的田地；他虽是知识分子，因为身份特殊，不可能站到三尺讲台，以教书维持生活；他更不是地主，没有田产，没有租可收，不能坐享其成。在生活上，他主要依靠亲友的接济，以及“北大同学会”的定期资助。但是，陈独秀在困苦的生活之中，始终坚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做人原则，平时即使是收了朋友的钱物，他也总是以书法、金石篆刻或撰写碑文回报他人的馈赠，最大限度地确保人格的平等。

在江津，虽囊中羞涩，但作为知识分子的陈独秀还是显得与众不同。他个儿高，头发黑而长，剪得很整齐，反梳到后颈。当地农民时常见他一人在石墙院附近散步，有时由他夫人潘兰珍搀扶着，他们走路步很小，慢腾腾的。他们夫妇很少与周边的人说话，就是很近的邻居，碰面也只是打个招呼，没有长长的交谈。乡民一度以为他们是看不起这些山里人，后来才明白是因为语言不通，不便交流，陈独秀便主动减少交流。

李国普是鹤山坪人，家住在鹤山坪双石场附近，离杨家石墙院很近。当年陈独秀搬进杨家石墙院时他十四岁，在龙

门场上读高小，知道这个新搬来的人叫陈仲甫，是个大学问家，见过大世面，才从监狱里出来……

时间久了，陈独秀与当地人混熟了一些之后，开始与他们有了一些来往。当地人有红白喜事，都邀请他参加，有时他也主动帮主人写写对子什么的，但仍不主动说话……

1940年正月初八，李国普受同学杨继香的邀请，与他一起到杨继香的二爸（二叔）家吃春酒。杨继香的二爸叫杨国良，住在附近的小屋基（小屋基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院子，土墙瓦房，有朝门，里面有大院坝，两边是厢房，上面是正堂屋，小有些气势），是当地有名的“土老肥”，有一百石谷子田，收八十石租，还是“保民代表”。他人胖，大家当面叫他“杨二老爷”，背里叫他“二胖子”。他虽有些威势，但对当地人和佃户还不是很苛刻。李国普家与杨家也有一些来往，有点转角亲。

春酒中午开席，三桌都摆在堂屋内。当地农村的风俗是娃儿不准上席，就是上了席，也是不能占上方席位。但这次有些例外，李国普和杨继香上了席。席上的李国普看见邻桌上席坐了一个表情严肃、脸孔有些苍白的男人，穿的是青布长衫，大家叫他陈先生，而杨家人则叫他仲甫先生。李国普当即就明白这就是石墙院的陈独秀，因此就不时偷偷看他。

也许是因为陈先生在场的的原因，堂屋内没有高声的喧哗，大家和陈独秀说话都不多，但看得出大家都很敬重他。

和他打招呼，他多是笑一下点点头算是回应，保持着一种稳重的样子。宾客们知道他有学问，曾在大学当教授。李国普和杨继香当时是小学生，不敢靠近他，怕这位大学教授向他们提问题来考他们，他们答不上来会很没面子。之前陈独秀在石墙院就曾向来玩的小学生问过《师说》的第一句是什么等等，这些小学生都没答上来。

陈独秀吃得比其他人都慢些，夹菜也是一小箸一小箸地夹。其实鹤山坪办春酒是喜欢喝咂酒的，就是自家高粱酿的酒，在堂屋的上角小桌上放上一小缸，插入一支竹管，全屋客人转着去吮吸。因为请了陈独秀，他是文化人，讲卫生，主人家担心他不愿与大家同饮一管，于是就没上咂酒，而是上了烧酒。主桌席上的烧酒每人一小杯，大家边摆龙门阵边自喝，没有像其他大户人家办春酒那样划拳打码搞得很热闹。有人小声问陈独秀：陈先生，你太太怎么不一路来哟？他回答说：她挺忙！

吃完饭后大家又一起闲聊，李国普和杨继香还算是娃儿头，只听不插话。陈独秀看到堂屋的墙上是光墙，就说：杨二老爷，我给你写幅单条挂上吧。这时杨家人立即找来纸和笔，陈独秀就在桌上铺开，写下李白的《山中问答》——

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

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大家都夸耀说字写得好，但当时李国普和杨继香都觉得

他写得特别潦草，他俩都认不出几个。两个小孩子不知这就叫草书。

后来，杨家人将这幅字拿到裱行裱了挂在墙上。

陈独秀本不想来吃春酒的。先前杨家多次捎信请陈独秀来吃春酒，他推了，想必是他不愿与当地人多交往，或者是他知道杨家是收大租的，是剥削者，就不想与之往来。但石墙院的房主杨学渊、杨庆馥与小屋基的“杨二老爷”是亲房，由于这层关系，陈独秀才到了杨国良家。杨国良没多少文化，不像石墙院杨家是耕读之家。他请陈独秀这个大学教授来吃春酒，就是想给自家撑撑门面。

李国普老人向笔者回忆这些往事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来。我曾任江津区党史办主任五年，早年有一位鹤山坪的阙姓农民向江津县党史办捐赠过陈独秀当年书写的《山中问答》条幅，党史办对这个农民进行了奖励。后来据第三方说，这阙家捐赠的条幅是从杨家得来的……

闹洞房

1941年初冬，住在鹤山坪石墙院的陈独秀应邀去参加一个农家青年的结婚宴，这是他第一次应邀到当地农民家中“喝喜酒”。这农民姓张，住在鹤山坪上距石墙院很近的一个叫大屋基的地方，与陈独秀算是邻里。张家主人反复对他说：你来了就行，千万不可送礼。你是文化人，我们沾光，

我们还得靠你写两副对子呢……

到了新郎家，见到这场面好热闹、众乡亲好热情，陈独秀的心情也非常好。当地人大口大口地喝江津烧酒“老白干”，陈独秀也先品尝了一小点，这酒太醇香了，比他以前在北京喝过的“二锅头”爽得多，于是他喝了两大杯。

到了新郎家，见到这场面好热闹、众乡亲好热情，陈独秀的心情也非常好。当地人大口大口地喝江津烧酒“老白干”，陈独秀也先品尝了一小点，这酒太醇香了，比他以前在北京喝过的“二锅头”爽得多，于是他喝了两大杯。

晚上，他经不住诱惑又喝了两杯。饭后，张家众亲戚开始“闹洞房”，陈独秀是第一次看到巴渝地区“闹洞房”的婚俗场面，他感到很吃惊。在场的亲朋邻里不分男女老少，不分尊卑，全都对新娘乱说一通，有些还动手动脚“狂闹”。

见大家都在“胡闹”，陈独秀酒兴和诗兴大发，平时是“谦谦君子”的陈先生这时也激动起来，他先是摇头晃脑吟诵了一段“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后，大叫张家婚礼上的跑堂师拿来纸墨，当场写下了一首《江津乡间闹房酒》的诗来——

老少不分都一般，大家嬉笑赋关关。

花如解语应嗤我，人到白头转厚颜。

两天后，陈独秀在家中将这首诗抄在一张小黄纸上叫人带给了张家。张家老汉是读过几天“人之初”的人，知道这

诗将来会很值钱，就叫儿子将这黄纸片好好藏于柜底。

1994年，我到鹤山坪进行文物普查并对陈独秀旧居石墙院进行测量，千方百计打听到了当年陈独秀“闹新房”的张氏人家。当年的新郎早已作古，他儿子已经五十多岁。问起陈独秀为他父母新婚所作的“闹房诗”来，他说：他本来珍藏到了新中国成立后，但在“文革”中，大家都在批判陈独秀，村里的红卫兵四处抄家，他家怕极了，只好将诗塞进灶膛烧毁了。

坐茶馆

陈独秀夫妇寓居的石墙院，交通不便，消息闭塞，这对于陈独秀这样一个搞写作的人来说，犹如与世隔绝，外界的情况如何，他全然不知。伙夫老焦一周去一趟江津县城，将陈独秀所订的书报和信件取回。

好在石墙院下面有个双石场。名虽叫场，其实是一个只有两家草房店面的“么店子”，只卖煤油、火柴等小商品。这地方是上去麻柳、龙门二乡，下去五举、琅山二场及江津县城的必经之地，石墙院到这里只需走二十分钟。陈独秀在石墙院用心编纂文字音韵学著作《小学识字教本》，一有闲暇，他就散步到双石场，到这里可以听到往返江津县城的轿夫走卒讲外面发生的故事……

毗邻这里的龙门乡螺丝桥有个非常精明的农民叫陈相

国，当时有四十多岁。一天，他由县城回龙门乡时，在双石场歇脚，碰上正散步的陈独秀。他向陈先生讨教，自己打算在此开家茶馆，不知是否合适。这一想法得到陈独秀的赞同，陈独秀说：到时我也来你这里喝茶。

陈相国说干就干，经过三个月的准备，就在双石场西桥头修建起了两间草房，摆起六张小方桌，干起了卖“老荫茶”的行当。这茶馆只算是小本生意，只向过往行人卖杯热茶淡水什么的，开业一周，生意很清冷，陈相国后悔做了这一行当。不久，他又碰到了来此散步的陈独秀，希望“本家”陈先生给他再出个主意。

陈独秀建议他搞一个开业小典礼。于是，陈相国选了一个吉日，买了火炮，举行了简单的开馆仪式，邀请场上的人到茶馆免费喝茶一天。陈独秀专门书写了一幅单条书法作品送来。陈相国是读过几天私塾的人，他将单条挂在茶馆正堂上，图个吉利，也为的是显示一下自己与“大人物”陈独秀的关系。陈独秀书写的是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的一段——

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

这条幅用黄山谷字体竖书，笔画遒劲郁拔，神闲意浓，圆润流畅，凝练有力。陈相国将单条挂上不几天，就引来不

少山乡老学究前来观看，小茶馆着实热闹了一番，生意渐渐兴隆起来。

从此，由江津或重庆等地寄给陈独秀的信件书报，多投转到双石场陈相国的茶馆，陈独秀隔三岔五来茶馆，一是喝茶采撷乡风民俗，二是取回信件书报。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在石墙院因病逝世，陈相国以“本家”和“茶客”的名义，到丧家帮忙治丧。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和陈独秀的这一特殊关系，在“文革”中陈相国没少受批判。他后来忍不住这样的打击，先是暗中搬回龙门乡，后又离家出走……

开后门

陈独秀住在石墙院，虽然条件差，但他对向他提供住房的杨家是心存感激的。他十分关爱身边的少年儿童，常指导江津石墙院主人杨庆馥的儿子杨宏勋。杨宏勋小名杨火，生于1928年4月，当时只有十四岁。杨家三代人都称陈独秀为“陈先生”。

陈独秀夫妇常到杨宏勋家吃饭。杨宏勋的母亲善于做漂水咸菜和皮蛋，她所做的皮蛋晶莹透明，皮蛋上的小鱼、小虾和水草等栩栩如生，像一幅生动优美的图画，令陈独秀赞叹不已，常吃得津津有味。陈独秀经常指导杨宏勋读书，要他珍惜时光，发奋学习，要他多背诵古典诗词，熟读《唐诗

三百首》和《千家诗》。

在陈独秀的指导下，杨宏勋进步很快，考上了江津中学，杨家主人为了表示感谢，设家宴招待陈独秀。席间，主人家谈起正为儿子升江津中学而犹豫不决，因为江津中学当时在长江北岸三十里外的油溪场，路途遥远。这时，陈独秀说道：何不让孩子读此间有名的聚奎中学？该校位于著名风景区黑石山，环境清幽，名师很多，真是育人的好地方。杨家当然想让自己的儿子就读这所中学，可苦于找不到入学门径。于是，陈独秀写了一张条子，叫杨宏勋到白沙的聚奎中学找校长周光午。周光午是陈独秀很好的朋友，私交很深，见是陈独秀推荐来的学生，就破例开了后门，免试让杨宏勋在聚奎中学就读。

聚奎中学是远近闻名的学校，想往里“挤”的学生很多，其中不乏官宦子弟和乡绅后代，能让一个山区农家少年免试就读，这就很特殊了。陈独秀成了这“走后门”的“始作俑者”。

由于受陈独秀先生的影响，长大成人后的杨宏勋也非常爱好写作，创作了许多诗词歌赋，后成了一名教师。

杨宏勋给自己取笔名为杨眉。因为他爱好写作，我在文化部门工作，所以他生前与我交往甚密。2007年4月4日，已经七十九岁的杨宏勋先生送了一册他自印的小册子《杨眉吟草》给我这个作协主席。我翻开书，里面就有许多写陈独

秀或石墙院的诗文。不想这年年底，杨先生驾鹤西去。

(原载《名人传记》2014年5期)

丘巫师 PK 陈独秀

1938年，从国民党监狱中出不来久的陈独秀，随着一大批从日占区逃亡而来的“下江人”一起，来到国民政府“陪都”重庆近郊县江津县。不久，他住入离县城不远的鹤山坪石墙院。

与陈独秀一起入住鹤山坪石墙院的还有他的太太、小他二十多岁的女人潘兰珍。他们到石墙院后非常低调，不张扬。因为他深知：自己虽“自由”了，但这是一种表面现象，国民党特务还在暗中盯着他，他怕再惹麻烦来。同时，老夫少妻，同当时江津的婚配习俗很不相合，过分张扬就会引来世人目光，被人指手画脚。

陈独秀寓居鹤山坪石墙院内，埋头做学问，写他的文字语言音韵学专著《小学识字教本》。除了必要的买油买盐等事项，得去附近的双石场或麻柳场外，他很少走出石墙院。

但是，早前陈独秀的名气太大，他叱咤风云，政界军界谁人不知，他又是大名鼎鼎的文化人，所以要在那里真正的隐居下来还真是个难事。“追星族”是任何时代都有的。

陈独秀入住鹤山坪石墙院后不久，一批“追星族”就来了，有江津城里的，更多的是重庆城里的，他们多是骑马坐轿而来。这些人看起来都很有面子……

鹤山坪的人开眼界了，他们终于明白这个平时足不出户的陈先生，原来是中共大官，是个大文人。于是，大家都想见识见识这个神秘的大文人陈先生。

鹤山坪乡间有个土端公，名叫丘善章。他可也是鹤山坪的大名人，60多岁，穿长袍、蓄长发，看起来有些仙风道骨。鹤山坪上对他可说是妇孺皆知。据说鹤山坪上的甲长、保长、乡长都得有求于他，有事都得让他三分。

端公在江津这个地方又叫巫师，现在看起来这行当虽属下三流的阶层，但在当时这个年代，装神弄鬼的巫师也是很“吃皮”的。山乡里每个家庭逢年过节、婚丧嫁娶、开张奠基都会请他来写写画画，搞闹一番。人生病了也要请他搞点请神画符之类法事。他有一句口头禅：巫师也是师！

这丘善章是上过私学的，读过一些古文，因而他在帮助别人家请神画符或写袱子、写祭文时，常常卖弄高深。如将一些异体字、方言俗语、市井土话写入其中。比如帮人写婚嫁喜贴时，将“天长”和“地久”，故意写成“青乞”、“万丈”和“赤气”、“多年”等。对这的写法，他还会津津乐道，向山民进行解释。满口之乎者也的。

1949年9月，也有两个怪字却把丘善章这个“巫师”难住了。为搞清这两个字，他查过《康熙字典》和《辞源》之类工具书，但始终未得要领。后来有人提醒他说：听说在石墙院的陈先生是个很有学问的大人物，你何不去问问他？真是杵倒就是桃源洞，偏要到处去求仙！丘巫师一想：我在鹤山坪可算最有文化之人，虽是巫师，但也是沾了一个师字的，我都不认识的字，未必你陈先生认识。我何不将他考考。于

是，他来到了石墙院。

陈独秀每天黄昏时总要拄着手杖在小院内走走。这天晚饭后，丘巫师就来到了石墙院陈独秀居住的偏房。他见了陈独秀，开口就说：“陈先生，请个教！”见陈独秀欣然应允，丘巫师急从怀中取出一张纸条递上。陈独秀展开一看，其上写着两个字，一个是“𡵓”，另一个是“之歪”，陈独秀不加思索地说：“这两个字书上虽然少见，却并不难认！”陈独秀即侃侃而谈：“中国字的字形特点，以象形和会意者居多，这个‘𡵓’字，是个会意字，读作：‘áng’。从字形看，‘三’上有‘山’，意即三座山重叠矗立，必然极高，须昂首俯视方可及顶。故‘𡵓’即是‘昂’（读áng）……昔日周文王的乳名就用了这个字。”陈独秀接着慢慢说道：“至于这个‘之歪’字，乃‘歪’字旁边加‘走之’，应读作‘Zhǐ ai’。其本意是指人因下肢残废而走路不平稳，也有人引申来形容人行事乖张，目空一切……”

陈独秀来石墙院也有一段时间，他对丘巫师这样的鹤山坪上的名人也有所闻。他看了丘巫师一眼后又接着说：“在你们江津方言中，人们常用“踉起那个样子”或“踉得狠”来批评或讽刺某人自命不凡。如某些人认得两个‘墨疙瘩’（文字）就‘踉得狠’，就自命不凡，这个“之歪”与“踉”音与义均相同。”

丘巫师听出陈独秀先生话中有话，是在批评自己，所以

感到两耳发热，很不自在。他说了几句简单的客套话就告辞了。

丘巫师以“请教”为名，向陈独秀“发难”，不想没将对方难住，反而被陈独秀批评一番。不过，丘巫师也真正领会到陈独秀高深的学问。他逢人便说：这陈先生真了不起，什么字都考不了他，这么怪异的字他都能解释得清清楚楚！还能结合江津的方言进行解释。我这个请神画符的巫师，还真赶不上他这个做学问的大师……

（原载《重庆历史名人》2015年第四期，总第八期）

陈独秀与“江津老白干”

1938年，由于日本侵略者相继占领了南京、武汉等，走出国民党监狱不久的陈独秀流寓到了“大后方”重庆，住在重庆近郊的江津县（今重庆市江津区）鹤山坪石墙院。60多岁的陈独秀疾病缠身，显得非常苍老和憔悴。

年轻时的陈独秀却是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他风华正茂，豪情万丈，和大多数文人一样，也特别喜欢饮酒。后来他参加革命，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劫难，加上政治上的失意，他就很少沾酒了。陈独秀流寓到江津后，身体每况愈下，患多种疾病，更不能饮酒。江津是巴蜀有名的酒乡，当地人将这里的白酒称为“江津老白干”，石墙院附近的双石场、五举场、龙门场、白沙场以及江津县城，到处都有生产“老白干”的糟房。“江津老白干”清冽纯正，醇香柔和，馥郁净爽，全国有名。每当陈独秀漫步江津街头或乡场，时不时从糟房内或酒肆中飘出能使半街生香的酒味，他总要深深地呼吸几口空气……

1941年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从沦陷区流寓到江津的文化名流聚奎中学校长周光午，国立九中教师何之瑜，女子师范学院教授、国立编译馆编辑台静农、魏建功等人，为屈原祭日设酒聚欢。他们感叹世事沧桑，对酒当歌，大饮江津老白干，结果全都大醉。在石墙院闻知此事的陈独秀不由得发出一番感慨。这些人都是他很好的朋友或学生，他们以酒会友，以酒凭吊先人，怎么就不邀请我呢？他怀着一种伤感

和被人冷落、遗忘的复杂心绪写下《闻光午之瑜静农建功于屈原祭日聚饮大醉作此寄之》一诗——

除去文章无嗜好，世无朋友更凄凉。

诗人枉向汨罗去，不及刘伶老醉乡。

诗中所指刘伶，是魏晋竹林七贤之一，在七贤中，酒量最大，为人也最为超脱，号称自己“以天地为栋宇，屋为袿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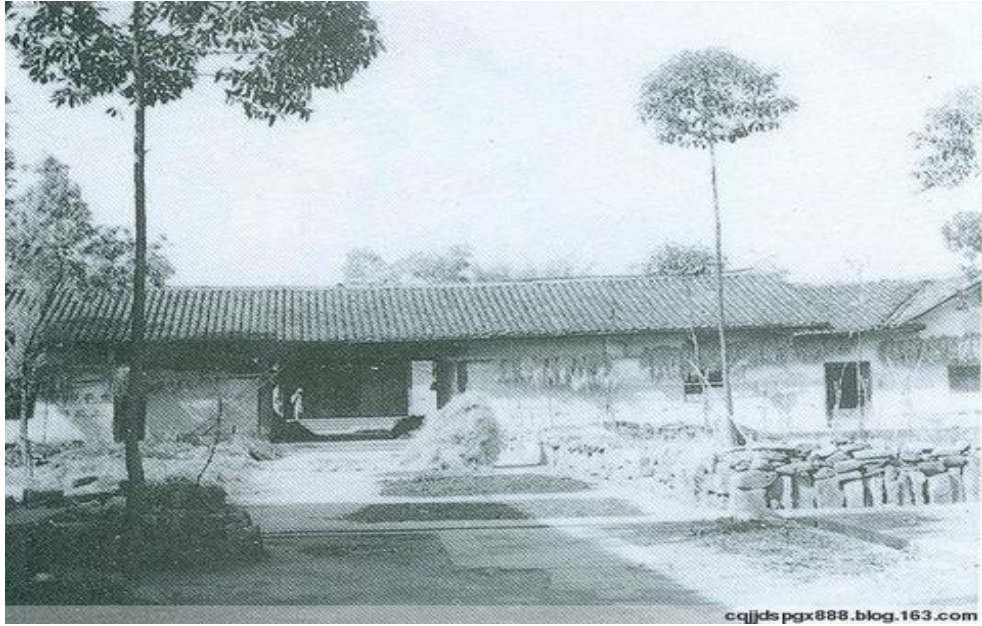
不久，周光干等人读到了这首诗，才知陈独秀也在江津，便相约专程带着一壶“江津老白干”、鸡鸭等礼物来到鹤山坪石墙院看望陈独秀。

1940年初冬，陈独秀应邀到鹤山坪参加一个农家青年的结婚宴，这是他第一次应邀到当地农民家中“喝喜酒”。见到新郎新娘如此热情，当地人大口大口地喝老白干，陈独秀也忍不住品蘸了一小点，这酒太香了，比他以前喝过的酒爽多了，于是又喝了两杯。“闹洞房”时，他第一次看到了不分尊卑，不分男女老少，全都对新娘乱说一通并动手动脚的“狂闹”民俗场面。他酒兴和诗兴大发，当场写下了一首《江津乡间闹房酒》的诗——

老少不分都一般，大家嬉笑赋关关。

花如解语应嗤我，人到白头转厚颜。

（原载《龙门阵》杂志 2009 年第四期）



（陈独秀江津寓居之地鹤山坪石墙院原貌）

陈独秀与鹤山坪邓家的故事

旧县志记载，鹤山坪是巴渝名山，离江津县城三十余里。

1938年8月，一位曾经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上大名鼎鼎的人物陈仲甫先生偕同夫人潘兰珍，随一大批家乡被日本鬼子占领了的难民由东向西后撤，来到陪都重庆近郊江津县城。他在先期到此的老乡或朋友所属的郭家公馆、延年医院、西门康庄等处蛰居。主人或热或冷，这对于性格独立的陈先生来说，深受寄人篱下之累。他想离开这里，远离县城的喧嚣，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去。

1. 初来乍到施家院

陈先生到鹤山坪，最初住在施家院，并非石墙院。

鹤山坪很大，山坪上麻柳和双石两乡。耸峙静寂，风景秀美。鹤山坪上的村院也很多，有名的有施家院、石墙院等。次年三月，陈先生经人介绍，搬出县城迁到鹤山坪属麻柳乡的施家大院。施家是鹤山坪有名大地主，田多土多山多林多，院落也大。施家当时就有国大代表、县中学堂教师等，特别是堪称乡贤的施泽民诗书传家，有女初成长，芳名施文心，她外出求学，后嫁葛存壮，生葛优。这施泽民就是今天影星葛优的外公。

鹤山坪上的施家大院里，又有一小地名叫新房子，这只是一个名儿而，实是土墙青瓦旧房子，大小两间，属施家的。陈先生和夫人搬来便居住在大间里，另一姓焦伙伙住小房。

新房子前面是一畦开阔地，前左侧约 200 米处则是一小坡，有四五株李子树，所以这小地名又叫李子塆。此处住的是土生土长的邓氏人家，男主人叫邓耀廷，女的叫夏正修。邓家租施家的田土耕种，租地面积有四五十石，农忙时得雇三四个长工。这里产水稻、玉米、红苕、高粱、芋头等，特别是水稻，品质特好，据说前几朝代，这里的大米是贡米。

陈家和邓家近在咫尺，算邻居。开门见人，鸡犬相闻。陈先生刚搬来时，施家就派人来“打招呼”：陈先生是下江人，外来户，但是教授，是学问家，有来头，水很深，背景复杂。你们不要欺负他。也不要和他交往太深……

施家人在鹤山坪一言九鼎。大家对新来的陈先生感到神秘，背里总偷着眼看他。

2. 常请一个小棒棒

从县城搬到这山里头两天，城里还留有一些书稿和小家具没运来，于是，陈先生就主动找到对门李子塆的邓耀廷，说希望能帮忙进城挑运东西，邓说这忙应该帮。于是，就叫虎背熊腰、满是蛮力、18 岁的二儿子邓志云干这事。邓家想：总不会白干？挣几块铜钱也值，还能到县城见见大世面。

开初几天邓志云进城挑东西，每次都是陈先生先开出单子，到县城黄荆街“延年医院”后，由人照单点给他就挑回。早上八点从家出发，下鹤山坪，在五举沱码头座下水船到江

津。返回家时也是下午三点左右。陈先生就给小伙子一天的工钱。邓志云干活细心认真，听话、乖巧，灵活。每次挑回的东西都摆放得整整齐齐，从没有破损和丢失，照现在的话说就是优质服务，陈先生感到很满意。有一天，陈先生事急，就叫邓志云往返走了两趟县城。这次，这 18 岁的小伙子才感到有些累。

于是，陈先生与邓耀廷一家就慢慢熟悉起来。以后基本上是每周，陈先生都要叫邓志云上一趟县城，任务是在“延年医院”领回外地给他寄来的信函什么的。有时是开单子给一个姓邓的医生，让他买好柴米油盐茶笔墨纸砚以及糖果糕点等，由邓志云挑回。邓志云称这医生为“家门”。

邓志云成了陈家常雇的“棒棒”，成为当时鹤山坪常进县城见过大场面的人。每当他挑着担子回鹤山坪时，总有人问：邓小伙，城里又发生什么事了？

3. 帮助邓家写神龛

巴渝人家有在清明节清扫神龛、祭奠祖先、上坟扫墓的习俗，有的还要开清明会。神龛又叫香盒，是一个家庭中正在正堂房上方或中央墙上挂的“天地君亲师”神牌位和本家族列祖列先灵牌位，是家人在清明节等重大节日进行祭拜而又非常神秘、神圣的地方。

这年清明前三四天，邓耀廷小心翼翼清扫神龛，他发现

神龛竖写的“天地君亲师”几个大字和两边的对联很陈旧，有的字都破落了，他捉摸着是找个先生来家重写还是修补一下凑合着用，这时他突然想到邻居陈先生，他可是大学问家呀！于是，他小心翼翼走进对面新房子陈家。陈的习惯是上午在家，下午四点过就出门散步。邓耀廷到陈家时，陈家夫妇正准备出门，见客人来就忙着让座倒茶。邓耀廷先谈了“邓家犬子”做事鲁莽等等，扯了很远才谈到写神龛的事。陈先生是个明白人，就爽快地答应帮忙。

这天晚上，陈家夫人带着笔墨纸砚来到邓家。他用皂楠水洗手后，很快就将“天地君亲师”五个大字写好，然后又写了邓氏家族中列祖列宗的牌位，最后还写了两边的对联。

邓家推豆花、煮腊肉、烫咂酒，请陈先生一家吃饭。这是陈先生第一次吮江津咂酒。邓陈两家坐了一大桌，陈家夫妇当然是席上贵客，坐上席。桌旁的小木椅上立着一坛冒着热气的老咂酒，坛颈上插着一根酒杆，坐席的人按老幼尊卑依次抱着小竹杆往上吮酒。这吃法陈氏夫妻初来江津时听说过，但没领用过。这次真吮很不习惯，他嘴衔竹杆往上猛吮一口，酒水烫得钻肚，不过他很快镇定下来。后来他几次上去吮酒时都是小心翼翼，他这才真正感受到咂酒酣畅淋漓的浓淳之味。

从这以后，陈家与邓家走得更近了。

4. 收了一个干儿子

一月后的一个赶场天的下午，“棒棒”邓志云象往常一样给陈先生从县城挑东西回来，这次挑的东西中有几块象巴渝人家蒸的“泡粩”一样的洋糕点，他挑回后就交给了陈家。

傍晚时分，潘兰珍在门外的小坝里吃着这洋糕点，陈先生坐在旁边喝茶，这时跑来一个三四岁的小家伙。这是邓耀廷的三儿子邓兴和，也就是邓志云的小弟娃。小家伙白白净净很可爱。他眼巴巴看着潘兰珍吃东西。陈氏夫妻在邓家吃过饭，也串过几次门，对这小家伙很喜爱。潘兰珍递了一块糕点给小家伙，他腼腆地接了。奇迹发生了，他并没有立即塞进嘴里，而是走到陈先生跟前，分了大块递给陈先生。陈先生吃惊了，小孩都是有好吃本性的呀？他立即想到“孔融让梨”的经典故事。陈氏夫妇更喜欢这懂事伶俐的孩子。

也许是陈氏夫妇深感远离家乡的寂寞，举目无亲，无以寄托。一个天真活泼、伶俐可爱的小孩子正可填补他们精神上的空白。当晚，陈氏夫妻就来到邓家，提出要将这小家伙收作义子的事。邓家夫妇先前还没有明白过来，顿了一会，才知“义父义子”就是巴渝方言“干爸干儿”的意思。于是，就同意了。

巴渝地区旧时盛行“拜干爸收干儿”，目的多种多样，有寻求庇护、加深关系的。迷信的说法还有多种：如孩子病多，拜了干爸好带；孩子五行缺一，拜了干爸好补；孩子多

劫难，拜了干爸好冲等等。所以，又将干爸叫保保或保爷，干妈叫保娘。其实，邓家早想找点理由与陈先生攀上关系，他们认准了陈先生是个大学问家，如儿子拜了“保保”，定能跟着长学问

第二天正是一个黄道吉日，邓陈两家请了鹤山坪上德高望重的施民瞻、请了甲长，还有同院一个姓朱的邻居等吃饭，并写了“抱约”。邓兴和跪下给干爸干妈磕了三个响头。

接收干儿的习俗，干爸要给干儿取名儿。陈先生问邓家取什么名好。邓家人说：取什么都可以。席上大家说收干儿，名要取得贱，猪儿狗儿猫儿牛儿最好，这样干老汉才好带。可是陈先生总觉得叫猪呀狗呀的不雅，就给干儿邓兴和取了个既俗又雅名的名儿“金犬”。大家都说陈先生不愧是读书人，这名取得好！

“金犬”这名很快就在当地喊开。陈氏夫妇与邓氏夫妇便成了“干亲家”。此后，“金犬”几乎每天都要跑到陈家几次，“保娘”、“保保”叫个不停，这给原本死一般沉静的陈家增添了许多生息和乐趣。

5. 抬高肩 葬亲家

陈独秀在施家院的新房子生活一段时间后，搬到了离此约1公里但仍属鹤山坪的石墙院居住。因离邓家稍远了些，干儿金犬来家就少些。但是，逢年过节两家仍有往来。

1942年5月27日晚，陈先生因病在石墙院逝世。邓家得到噩耗，立即带着金犬奔丧。作为陈的干儿，金犬理所当然要披麻戴孝跪灵堂。

在治丧活动中，一个非常忙碌的人很不起眼，他就是陈先生的干亲家邓耀廷。他是鹤山坪有名的“杠子头”，是个抬夫小头目，他手下有十多个抬夫，有差事就召集一起干抬工，闲时在家种地。江津人将帮人抬棺木入葬叫抬高肩，结婚抬嫁妆叫抬花肩（又叫抬花轿），抬条石叫抬联耳。陈先生的棺木和葬地是县城一个银行家捐的，棺木又大又重，葬地在县城西门外庄康，路远，既要下坡上坎，还要乘船。

江津丧俗中，抬死者棺木隆重的需16人。分左左右右、前前后后，左右前后分别为4人，4人中又分为主抬、副抬，还有领喊丧歌号子的杠子头。邓耀廷精选了15个抬夫，加上自己共16人。他对夹杠、横担、麻绳等工具反复检查，生怕出一点差错。他深知，抬去入土为安的不仅是一个很有学问的教授，而且还是他的干亲家，是他儿子邓兴和的“干老汉”。城里来了许多很有身份的骑马乘轿的人送葬，看来干亲家真是很有来头，他从没有抬过这样的人。

6月1日早上辰时，鹤山坪有名的邱端公（道士）宣布发丧起棺。邓耀廷先吼歌：“哎——前左后右——把路看到起哦——”这是抬丧起路曲，也就邓耀廷为干亲家灵魂开道。棺材上系着的驱鬼用的鸡公也是邓耀廷送来的。接着他又吼

喊抬丧歌。后面跟着长长的送葬队伍，披麻戴孝的干儿金犬只送到岩门口，因太小，就被家人带回。

10 时许，邓耀廷等人将陈先生灵柩抬到鹤山坪下五举沱码头，在此上船。12 时到达墓穴地，下午一点正式落圹。逝者入土为安。邓耀廷返回鹤山坪时，也是下午五点。

6. 后来的故事

1949 年 11 月，江津解放。邓家成份被评得高了一些，是富裕中农。在以后的年月里，因众所周知的原因邓家决不会说起与陈先生有干亲家的这层关系。如别人说起这事他家也总是回避或否定，其实村民们都知道这事。当他们看到一拔拔前来调查的公安人员个个板着面孔时，心里都堵得慌。陈先生是个大坏人可谓妇孺皆知，他并没有入土为安，全国都在批判他。当公社民兵将石墙院陈先生原住房里的东西当作“封资修”和“四旧”砸碎时，李子垆的邓家人噤若寒蝉。

邓家对“神龛”、“抱约”等先是藏匿，后来情况越来越复杂，风声鹤唳，干脆就烧了，毁了与陈先生是干亲的证据。他们还暗开家庭会，规定绝不能说出与陈先生有关系的事。邓家在“文革”中虽没受较大冲击，不过仍受一些牵连，比如“五好社员”不能评，公社干部来给社员发“红宝书”、“语录本”也没邓家的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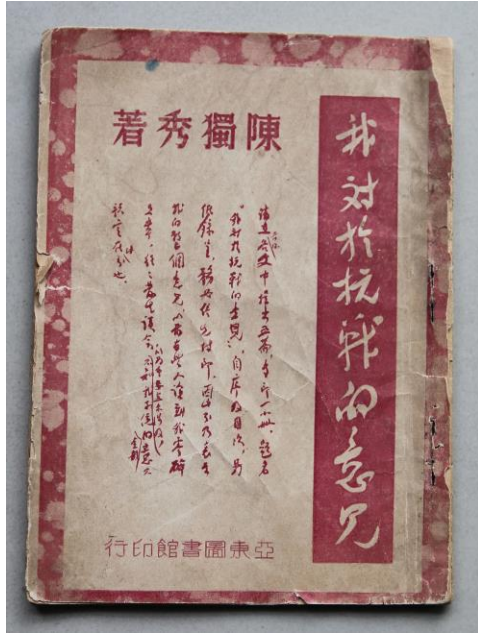
社员朱仕勋一不小心就揭了邓家的短，为此朱邓两家大

吵一场。现住在鹤山坪先锋镇麻柳村九社（虎头村一队）的朱仕勋比邓兴和大4岁，尚健在，而邓兴和在2011年就过世。其实邓朱两家关系挺好，现在邓家人都还叫他“朱么爷”

邓兴和、朱仕勋同队里的一群社员正在一垵田里翻土，当时“农业学大寨”，集体出工，大家说说笑笑的。突然，朱仕勋对着邓兴和连喊两声“金犬”，邓兴和既紧张又生气，他大声说：你的臭嘴可不能乱说呀！朱仕勋却说：怎是乱说？你不是拜给陈先生当过干儿嘛，金犬这名还是他取的呢。我当时是个赶路狗，随大人一起吃了你们家的“抱约席”……为这事，邓朱两家大吵一架。社员们都听着他们吵，犹如听着一个昨天发生的故事。

不过，山里人纯朴直率，吵嘴骂架从不记仇记恨，三四个多月后两家又和好如初。

朱仕勋现在回想起邓兴和时还说：那时农村拜干老汉、收干儿的很多。邓兴和是个老实巴交的人，很能干，小时拜陈先生为干老汉，当干儿，没得分文，只是想跟上一个有学问的人。哪个晓得这陈先生的事，死了都还啷么复杂……



(作者在鹤山坪收集到的 1938 年陈独秀出版的书籍)

(原载《党史纵横》2016 年第 5 期，总 361 期)

梁漱溟在江津种地

梁漱溟，字寿铭，1893 年生于北京，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他在中国首先发起乡村建设运动。1937 年 3 月，44 岁的梁漱溟出版了《乡村建设理论》一书，在国内引起很大反响。这年 10 月，他带着他的新作从“陪都”重庆来到江津县，进行乡村建设的社会调查。

梁漱溟来江津与他的同乡高显鉴有关。早在 1931 年，已是四川大学资深教授的高显鉴被任命为江津县长，高认为中国要富强必须先走乡村建设之道路，建设乡村又必须先搞乡村教育。于是，高显鉴在任内的 1933 年 8 月创办了“江津乡村简易师范学校”，成立“四川平民教育促进会江津试验区”。梁漱溟来江津，就是想看看他的同乡当年搞乡村建设的试验结果。

梁漱溟先住在聚奎中学内，他与这里的师生朝夕相处一个多月。聚奎中学专门开设了农作一课，一周组织学生进行一次半天的农作物实地种植。为了使学生参加好劳动，学校还备有 100 把锄头、100 副粪桶等农具。每次劳动，都由老师亲自带队并进行指导。

梁漱溟看到这里的师生如此清勤淬励，非常高兴。于是，每个班的农作课，他都抽时间参加。他自己准备了锄头、

水桶、镰刀、小钯等农具。每次参加劳动，都与师生们一起有说有笑，对劳动技能进行讲解，或者讲着相关的典故。说得最多还是抗战问题。他常说：现在是抗战时期，国家困难，学校师生参加劳动课，既能锻炼身体，学到农业种植技能，还能种出农作物，改善大家的伙食。很多时候，他还向学校划定自己的“农场”或“小园地”，与师生们开始劳动竞赛，看谁完成得早、完成得好。不知他是为了提高学生劳动的积极性而有意败阵，还是年龄大些，体力不支，多次劳动竞赛，他都落后于这些充满着青春活力的学生。但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又在自己的“农场”里“补课”，完成头天的“劳动任务”。而此时的学生，正在教室进行朝读……

梁漱溟在聚奎中学住了一段时间后，又来到驴溪半岛，与 23 名江津县乡建学友互助会成员一起考察四川平民教育促进会江津实验区。梁漱溟离开江津时，他将劳动用过的农具分别送给几名同学，还将携带来的书籍送给了学校。

(原载《团结报》2011 年 12 月 8 日)

江津青年的“法兰西岁月”

——追寻聂荣臻等赴法勤工俭学追求革命真理的历程

近日，一部荡气回肠的革命史诗剧《我们的法兰西岁月》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热播。该剧浓墨重彩地向人们讲述了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等革命先驱、政治伟人、科学泰斗赴法勤工俭学时，涌现出的一段波澜壮阔、鲜为人知的动人故事。随着剧情不断展开，愈加引发人们对它的热议……

俗话说，观看一部剧，品味一段史，回忆一些人。在那个内忧外患、风起云涌的年代，国内每一位爱国进步青年的心中都会点燃同样的信念——寻找救国之方、探求强国之策。千古风流、人文荟萃的江津，也有着这样一批热血青年，他们背井离乡，走出夔门，走向世界。

“五四”的一把火

点燃了江津青年的热血

1919年5月4日，初夏的北京炎热而烦躁。当地3所高校的3000余名学生代表组成游行队伍，手持“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等各式标语，喊着整齐的“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口号，浩浩

荡荡地向天安门进发。

意气风发、群情激奋，舞动的标语像一把把大刀，彰显愤怒；响亮的口号像狂风呼啸，震彻云霄。学生们冲破重重阻挠，云集天安门，他们或上台演说，或散发传单，向世人昭示政府的软弱无能。随后，游行队伍进入曹汝霖的宅院，痛打了“卖国贼”，并一把大火点燃了这座耻辱的宅院。

正是这一把火，掀起了一场青年学生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伟大爱国运动。运动从中国的心脏北京迅速席卷全国，江津也不例外。

“同学们，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祖国需要我们！人民需要我们！”在江津县城一间密室内，来自全县各校的学生代表正在谋划着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他们要响应“五四”运动的号召，走上街头示威游行，宣传演讲，为民争利，为国争权。这次事件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便是来自江津中学八班的学生聂荣臻。

宣传运动首先在县城举行。当天，来自江津中学、江津甲种农校和江津育才小学的数百名中、小学生手执小旗，呼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的口号，把这个小小的县城掀了个底儿朝天。运动中，学生们清查了大批日货，在逐一登记后，搬到文宫封存，准备烧毁。

1919年6月末，“凡尔赛和约”正式签字的消息传来，

江津青年学生们的愤怒情绪达到顶点。聂荣臻和傅汝霖带领江津中学 200 多名学生奋力冲破校方的阻拦，游行到文昌宫，将前时封存的日货搬至江边全部焚毁。

事态升级，触怒了县城的军政当局，学校在时任江津驻军团长王天培的授意下，首先开除了傅汝霖，对其余的学生代表，则准备在学期终时或开除或勒令退学。傅汝霖被校方开除后，旋即相约同学考入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就读。

“五四”前后，全国兴起留学救国的热潮。1919 年 8 月，汪云松和温少鹤发起开办了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受新思潮的洗礼，江津的进步青年也走上了远赴重洋留学寻找救国之方、探求强国之策的道路。

在重庆《商务日报》编辑刘颖滨的帮助下，入读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部分江津籍学生，顺利签领到赴法护照。当年 11 月，20 岁的聂荣臻和钟汝梅、刁泰乾等 10 人，告别家乡，乘舟东下，赴法勤工俭学，开始了一段波澜壮阔、荡气回肠的新征途。

法兰西的岁月

锻造了江津青年的理想

据史料载，1919 年至 1921 年，四川省内的青年学生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共有 492 人，为当时全国之最。而其中江津

县就有 40 余人，为四川省之最。

到达法国后，江津青年并没有迎来舒适而安逸的留学生活，面对的是异国他乡的冷漠，入不敷出的生活费和一次又一次的运动斗争。

为了解决在法国的生活费问题，聂荣臻、江克明、傅汝霖、戴坤忠等一大批江津青年开始了勤工俭学的生涯。

聂荣臻先后被分到蒙塔尔纪中学、德洛中学和胡乃尔中学补习法文。为了学好法语，他曾买下小镜子，随身携带，经常面对小镜，读法文、讲法语、观察自己的发音口形。在此期间，他认识了蔡和森、蔡畅、向警予、陈毅等人。

同时，聂荣臻先后在法国蒙塔尔纪橡胶厂、施耐得尔钢铁厂、雷诺汽车厂、巴黎西门子公司多米松分厂等工厂，当过汽车轮胎检验工、钳工、车工、炼焦工等。而傅汝霖、戴坤忠在巴黎诺尔航空发动机厂，钟汝梅在克鲁梭使米得公司钢铁厂，江克明在资本家施乃尔办的公私合营的机械厂当学徒工。

由于勤工俭学的工作不固定，他们时常换厂，换城市，忙碌奔波于各地工厂与学校之间。工作大多是粗活、重活，有时工时长达 16 个小时，但所得的报酬并不高。他们大多居住在条件简陋的棚户区或几人挤一间寝室。食物以土豆、洋葱、萝卜等素菜为主，十天半月才能开上一次荤。

尽管条件艰苦，但天资聪慧、奋发有为的江津籍留法勤

工俭学生凭借自身顽强的精神、果敢的毅力，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资料显示，聂荣臻、江克明、张熙和邓矩方分别考入沙洛瓦劳动大学化学工程系、机械系和建筑系，肖浮生考入巴黎大学航空系，颜实甫先后考入里昂中法大学、巴黎大学研究院学习文学、哲学、美学等。除此外，还有人在郎锡大学、蒙白里野大学、里耳工学院、圣西耳军事学院等院校学习。

不仅如此，他们还积极投身学生运动，学习进步思想，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当中，表现卓越为世人所铭记的人很多，有聂荣臻、江克明、钟汝梅、冉钧、戴坤忠等，他们在法国先后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回国后投身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洪流，走上了为社会主义奋斗终生的道路。

1921年1月，主管留法勤工俭学事务的华法教育会以经济拮据为由，宣布与勤工俭学生断绝经济关系。为争取“生存权”和“求学权”，聂荣臻和400多名学生涌向中国驻法公使馆请愿，最终获得部分救济金。同年6月，北洋军阀政府以“滇渝铁路修筑权”作抵押向法秘密购买军火，学生们举行了“拒款大会”进行示威抗议，迫使中国驻法公使不敢在借款文件上签字。1921年9月，在举行进占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中，聂荣臻凭借过人的胆识，成功营救出赵世炎等3人，同时，在他们的努力下，被囚的108名勤工俭学生也随

后被释放。

轰轰烈烈的法兰西岁月锻造了这群年轻人的灵魂与理想，未来中国的命运因他们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创建中国共产党和推动革命发展的斗争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聂荣臻曾在 1922 年 6 月 3 日的致双亲书中写道：“……况男远出留学，所学何为？绝非一衣一食之自为计，而在四万万同胞均有衣有食也。……此男素抱之志，亦即男视为终生之事业也……”

中华崛起的史册

铭刻着江津青年的功勋

祖国的召唤，人民的期盼。在外留学的游子，没有一天不思念他们的祖国，没有一天不神往他们的家乡，没有一天不清楚记得，当初远渡重洋、留学报国的信念。他们时刻准备着，准备着为中国建功立业，他们时刻准备着，准备着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

一批又一批的江津籍留法勤工俭学生学成归国。他们就像是一支支蘸满了各式色彩的画笔，正好绘就中国未来的蓝图。他们没有让中国人民失望，没有让家乡人民失望，他们以全新的姿态，投身到中华大地最需要他们的地方。

聂荣臻，成为杰出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人

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长期担任党、国家、军队重要职务的卓越领导人，为中国的革命建设和发展立下了不朽功勋。特别是为我国国防军事现代化做出了杰出贡献，被尊为“开国元勋，科技主帅”。

江克明，后改名江泽民，曾任东北军区军事工业部部长。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第一任商务参赞，第一机械工业部汽车工业局副局长，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副经理等。

钟汝梅，曾任中共江苏省委军委委员，在参加周恩来、罗亦农等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时被捕。1927年7月，被枪杀于上海枫林桥畔。

冉钧，曾任中共重庆地委组织工作的领导，创办国民党四川左派省党部机关刊物《四川国民》。1927年4月，被军阀刘湘杀害。

戴坤忠，历任湘鄂西红军大学分校教育长、大队长、红军教导团长、教导师副师长等职。1930年，在洪湖战役中壮烈牺牲。

.....

这就是走出夔门的江津青年，这就是他们的法兰西岁月。他们用自己的青春描绘了中国未来的精彩！他们用自己的热血铸就了中华民族的精魂！他们用自己的故事感召着中华儿女昂首前行！

可以说，走出夔门，走向世界的江津籍留法勤工俭学青

年，他们每一个名字都是一面旗帜，每一段故事都是一座丰碑。祖国不会忘记他们，人民不会忘记他们，家乡更不会忘记他们！

（原载《老同志生活》杂志 2013 年第四期）

钟云舫一副长联让“蒋介石”父子唏嘘不已

成都市郊锦江公园位于锦江河畔，始建于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公园内有一塔楼，叫崇丽阁，因在锦江边，又名叫望江楼。

望江楼是成都市的标志物之一。高39米，四重檐，下面两层四方飞檐，上面两层八角攒尖。登上望江楼，就可以看见蜿蜒的锦江。望江楼外观十分精美、壮观，突立于江边，望江水千古流逝，看西北雪山雄姿。楼阁与江水浑然一体，整幅图面刚柔相济，雄浑与灵性合二为一。

望江楼上有一副长联非常有名，堪称中国楹联的经典之作。此联长达212个字，以景达情，说古寓今。读后令人悲壮犹生，迟疑与彷徨、颓废与失落、悲怆与愤懑将会一起涌上心头，令人伤感无限，纠心痛结。这便是被今人称为联圣

的江津人钟云舫的代表作之一的《锦城江楼》联。江津人钟云舫的一副楹联，还有一段曲折的故事。

朱锡蕃是安徽省徽州府休宁县人，丁丑进士，翰林院庶吉士。光绪十八年（1892）他充任江津知县，任职长达五年，却没有一点政绩，他还胡作非为，狎妓嫖娼。与巴县知县张铎一起以送检“城勇”为名在渝城江北大喝花酒，将一歌妓带回衙内，为此老婆与他骂街三天，搞得满城风雨。这样一个昏庸无道的七品县官，居然还要在江津“遗爱祠”上留下“政绩”，欲让百姓“遗爱”千古，时为津城塾师的钟云舫愤愤不平，作《题莲塘》诗对昏官朱锡蕃进行讽刺：滔天功德祠遗爱？父老痴聋耳不闻？

朱恼羞成怒，利用职权革去钟云舫的廪银，关闭了他的塾馆，还欲革除他功名。朱知县还放出话来要拘押钟云舫。钟氏被迫流落成都，在成都荒郊以教村学和帮人写信糊口。一天，无聊的他在成都游览锦江公园，登上望江楼，鸟瞰远山近水，联想到自己飘零异乡，妻离子散、有家不能归的遭遇，他思绪万千，于是一气呵成，写下成为他主要代表作之一长联《锦城江楼》联——

几层楼，独撑东面峰，统近水遥山，供张画谱，聚葱岭雪，散白河烟，烘丹景霞，染青衣雾。时而诗人吊古，时而猛士筹边。最可怜花芯飘零，早埋了春闺宝镜，枇杷寂寞，空留着绿野香坟。对此茫茫，百感交集。笑憨蝴蝶，总贪送

醉梦乡中。试从绝顶高呼：问问问，这半江月谁家之物？

千年事，屡换西川局，尽鸿篇巨制，装演英雄，跃岗上龙，殉坡前凤，卧关下虎，鸣井底蛙。忽然铁马金戈，忽然银笙玉笛，倒不若长歌短赋，抛撒写绮恨闲愁；曲槛回廊，消受得好风好雨。嗟予蹙蹙，四海无归。跳死猢猻，终落在乾坤套里。且向危楼附首：看看看，那一块云是我的天？

钟氏在这副长联中，紧紧围绕望江楼来构想，每一转折都立足于望江楼这一特定位置。上联写他登楼望景，统览远近河山，江山如此多娇。他追溯历史：唐代的李德裕、宋代的范成大在茂州修建筹边楼，正可使骚人墨客登楼吊古。薛涛春闺苦短，负心的元稹只留下枇杷巷深，真寂寞难度，如今空留香坟一座。那些寻花问蝶之流，仍贪恋于醉生梦死之中。于是钟氏不得不痛楚地振臂高呼，在楼上问这半江明月，究竟是谁家所有？在下联中，钟氏更是无限感喟，千百年来蜀中局势风云变换，上演一幕幕人间悲剧，也呼唤出英雄不断。卧龙岗上的诸葛亮，殒没于落凤坡的庞士元，氏族难民英雄李雄，井底之蛙的公孙述等等，一时间铁马金戈驰骋疆场，一时间又银笙玉笛醉生梦死，都似过眼云烟。钟氏最后自认倒霉：倒不如自个长歌短赋，以消愁解恨，沐受这大好风光。想不到自己却怀才不遇，天地之大，竟无容身之地，孙悟空纵有天大的本事，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钟氏于是“向高楼俯首”而问：哪一块云，是属于我的天空？一

——钟氏在望江楼上说古道今，展开想象，直抒胸意。他放开手笔，嬉笑怒骂，尽情倾吐了一腔愤慨。

光绪二十三联，朱锡蕃终于滚蛋，钟云舫才回到江津。但他在成都撰写的《锦城江楼》长联不胫而走，广为传诵。有人将此长联挥书刻木，悬挂于锦江公园的望江楼上。

……

上月，我因工作原因细看电视连续剧《解放大西南》。该剧通过对川渝解放过程的重点描写，生动再现了解放战争时期国共双方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战线的殊死较量，全方位实时性地再现了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南的辉煌历程。第24集中，有这样一组戏：1949年12月上旬，在兵败如山倒的国民党政权即将分崩离析之际，成都的蒋介石第二天就要逃去台湾。当晚，他在儿子蒋经国的陪同下，打着手电，来到成都市郊的锦江公园，父子登上望江楼站在《锦城江楼》长联下，有这一段对话的台词——

蒋介石：经国，你知望江楼上有一副很有名的长联吗？

蒋经国：听说过。

蒋介石：打开电筒，让父亲看看这副清人钟云舫的长联——

蒋经国：恩（打开电筒，射向联匾）。

蒋介石：几层楼，独撑东面峰，统近水遥山，供张画谱，聚葱岭雪，散白河烟，烘丹景霞，染青衣雾。时而诗

人吊古，时而猛士筹边。最可怜花蕊飘零，早埋了春闺宝镜，枇杷寂寞，空留着绿野香坟。对此茫茫，百感交集。笑憨蝴蝶，总贪送醉梦乡中。试从绝顶高呼：问问问，这半江月谁家之物？

蒋经国：写得好，写得好啊。

蒋介石：好在那？告诉父亲——你喜欢长联的那句？

蒋经国：试从绝顶高呼：问问问，这半江月谁家之物？

蒋介石：来看看下联——千年事，屡换西川局，尽鸿篇巨制，装演英雄，跃岗上龙，殉坡前凤，卧关下虎，鸣井底蛙。忽然铁马金戈，忽然银笙玉笛，倒不若长歌短赋，抛撒写绮恨闲愁；曲槛回廊，消受得好风好雨。嗟予蹙蹙，四海无归。跳死猢猻，终落在乾坤套里。且向危楼附首：看看看，那一块云是我的天？——那一块云是我的天？

蒋经国：父亲，在这下联中，你喜欢那句？

蒋介石：嗟予蹙蹙，四海无归。跳死猢猻，终落在乾坤套里。

且向危楼附首：看看看，那一块云是我的天？

.....

无独有偶，大概是2008年的某个星期天下午，我在央视6频道（电影频道）中看到电影《黎明》，该片也是反映重庆、成都解的故事。电影中有一组很相似的镜头：国民党军队即将败退成都的头天晚上，“蒋介石”父子慢慢地来到锦江公

园望江楼，他们心事重重、无比悲怆地阅读钟云舫的这副长联。不同的是电影中阅读的句子少些，没全读。蒋氏父子没有打手电。“蒋介石”在向“儿子”介绍长联作者时说的是“清末江津才子钟云舫”而不是象电视连续剧《解放大西南》中说的是“清人钟云舫”。电影和电视连续剧中的这一组戏，大同小异。

.....

虽说这影视艺术作品有许多虚构成分，谁也不敢肯定1949年蒋介石在逃离成都前到望江楼读了这副长联，但作为清人钟云舫

所写的这副长联，却是百分之百的后来的蒋氏父子的心情的写照。一个清代潦倒失意、险遭迫害的秀才，用楹联记录了自己落魄与狼狈、失望与无奈的心境，正与50多年后一代君王蒋介石因自己的独裁统治等造成政权旁落和江山异主而产生的悲怆之感和歔嘘悲叹有着惊人的相似。

(原载《中华楹联报》2013年10月5日)

周氏兄弟与聚奎中学

周光午及堂弟周光召是湖南长沙人。两人都是学界鼎鼎有名的“大腕”级人物。周光午是早年就有名的教育家、著名教授和红学专家。周光召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中科大、中南大名誉校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科协主席等，是“两弹元勋”之一。这周氏兄弟与江津聚奎中学有一段渊源：周光午曾任校长，周光召却是这里的学生。

周光午任聚奎校长，与吴芳吉力荐有关。1930年，聚奎学校办起中学，时吴芳吉在成渝等地大学执教，闻讯后多次写信给母校聚奎中学物色教师。他极力推荐他挚友吴宓的门人周光午。早在1925年清华大学建国学研究院，吴宓是院主任，周光午被聘为助理员，所以周光午也算是吴宓的学生加同事。吴芳吉给来信不仅介绍周光午的简历及“诚信忠实，言行一致”的优点，还介绍他的缺点：一是粗野不文；二是语言过多，不能应酬处事；三是音调殊异，学生初听难知；四是不甚修饰边幅。吴芳吉在信中说：交友必先知其短而后能谅，相谅而后能安也。此时，重学、广益中学及北泉公园均争聘周光午，但因吴芳吉的争取，周光午就来聚奎任教。周光午曾是湖南明德中学教员，而吴芳吉早前也在此任教，所以吴周二人是了解和熟悉的。

1936年至1941年，周光午执掌聚奎中学。他除当校长外，还兼任《公民》课教员。他在聚奎期间，有两件事特别值得一记：一是与陈独秀先生交往并请他上聚奎讲堂，二是出版书籍推介吴芳吉先生。

周光午常在聚奎中学邀请寓居津沙的文人聚会。有一年端午节聚会因考虑到陈独秀年高体弱，周光午就没有通知他，住在鹤山坪的陈独秀得知后非常生气，写了《闻光午之瑜静农建功于屈原祭日聚饮大醉作此寄之》一诗以泄愤懑以表悲伤。诗曰——除却文章无嗜好，世无朋友更凄凉。诗人枉向汨罗去，不及刘伶老醉乡！

周光午的教育理念十分开明，喜欢邀请学养深厚的各界学人莅校演讲。1940年8月，他就邀请陈独秀来学校给学生作以《读书与抗战》为题的演讲。陈说话慢而有力，他主要讲“抗战时期学生的责任”，希望大家“抗战不忘读书”。他说：青年是国家民族的未来。固然国家兴亡人人有责，但前方要战，后方要干，学生还应好好求学，学到知识和本领。他大约讲了一个钟头，他离开时师生们站在两旁欢送。在当时的特殊政治环境下，周光午敢于邀请陈独秀到鹤年堂演讲，完成了这个著名的政治人物和学人人生最后一场演讲，其胆识和意义非同寻常。

周光午很早以前就读过吴芳吉的作品。早前即吴芳吉逝世后的三年，周光午就与吴宓商议，将吴芳吉1913年途经

三峡时所撰《蜀道日记》连载于《国风》上，周光午还写了校对笔记。到聚奎中学后，又在图书馆读到吴芳吉的大量作品，因而对吴芳吉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

周光午执掌聚奎中学时，正是抗战时期，民生凋敝，学校极端困难。但他还是还亲自主持编订了《吴白屋先生遗书》、《白屋嘉言》、《白屋家书》、《吴芳吉婉容词笺证》、《吴吉芳先生遗著续篇》等专著，有的还是他亲自刻印。

光午在教育界很有名气，他将聚奎中学搞得风生水起。这时他给家里建议把年少的堂弟周光召带到江津聚奎中学初中部，跟随自己就学。

不久，周光召转学来到江津聚奎中学初中二年级，插班进入中 14 班。在既是校长又是兄长的周光午严格引导下，他勤勉读书，成绩优秀。周光召特别喜欢数学、物理等自然学科，只要发现难题他一定会去认真做，一旦做出来了，就在同学中交流经验。一次物理考试，老师龚蔚如出了一道题，要求证明 $V=IR$ 。这本来是书上的例题，周光召可以照书作答，但他却运用别的方法求证出来。龚老师常把周光召的试卷拿到课堂上大加赞赏，从此周光召的名声在聚奎中学不胫而走。尽管周光召有一个当校长的兄长，但他从不以此为傲，对人仍然和蔼谦逊，课余时还很喜欢拉着同学下象棋、军棋，在学校里他人缘很好。1942年初，随着周光午的离开，周光召也转学到了重庆，后来毕业于南开中学。

解放后，周光召取得了无数骄人的成绩，但他对聚奎中学的感情却是一往情深的。1994年10月，他在北京专门为聚奎中学手书了“志不求易，事不避难”的校训。2001年11月18日，他冒雨回到聚奎中学，走遍校园，看着当年来这里求学时所熟悉的一切，他异常激动。2010年3月27日，时值聚奎中学举行140周年校庆，他特发来贺信，表达对母校的深情厚意。

（原载《重庆政协报》2014年1月13日，合作者任正铭）

同盟会元老凌昭在江津

一百多年前，安徽省定远县凌氏三兄弟凌毅、凌锐、凌昭，始终追随孙中山先生，在历史的风云际会中挺身而出，成为革命的先行者和中坚力量。他们被称为“安徽三凌”。

“一门三兄弟”，三人都是同盟会元老级会员。老大凌毅，生于 1883 年，字蕉庵。1906 年初加入中国同盟会，成为苏皖地区最早的同盟会会员之一。老二凌锐，生于 1886 年，字济庵。也是 1906 年加入同盟会。老三凌昭，是三兄弟中最小的一位，生于 1887 年，字铁庵。凌昭的革命生涯在三兄弟中最长。他自幼好学并习武，小时曾就读武备学堂，志在救国。因两位兄长在京求学，便去京就读江南陆师学堂。他曾东渡日本接受孙中山先生召见，听取孙中山对安徽革命的指示。回国后，他与两位哥哥一道将部分田产变卖，作为资助革命经费。凌氏三兄弟坚决拥护并积极投身孙中山先生领导的用武装起义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大潮中。他们在武昌起义前后，为武装起义做出了积极贡献。

凌昭在曾在安庆创办《民治报》。宣传新思想，抨击北洋军阀，宣传孙中山三大政策。揭露军阀马罪行，声援了学潮，宣传国共合作和建立统一战线，还转载中共《向导》周报的进步文章。在国共合作基础上，凌昭与管鹏等人发起组织了

国民党安徽省党部，他始终不忘孙中山先生教诲，积极维护国家主权，大胆揭露张作霖出卖东北主权的“四路密约”，从而遭到奉系军阀暗害，被特务炸瞎双眼。但他毫不退缩，宣传爱国思想，宣传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理想，并曾担任国民党中央党史编委。

抗日战争时期，凌昭入川到“陪都”重庆长江上游近郊江津县，一家人寓居在县城东门广场侧的一平房内，他任国民政府军委会中将参议，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创建难民工厂，筹组义民公墓，支持冯玉祥发起的献金运动。凌昭双目失明后还热心从事盲哑学校及残疾人事业，口授了 20 万字的《盲人之路》一书，主张为盲人打开一条出路，为残疾人谋福祉。

江津县此时是国民政府规划的“迁建区”，肩负着安置主要从沦陷区安徽等省迁来来的大批难民。江津百姓将这些人统称为“下江人”，凌昭在这些人群中德高望重，他们遇到一些困难或有争诉都来找凌昭。凌昭成为“下江人”的核心和精神领袖，就如是一个安徽江津同乡会会长一般。

1938 年，陈独秀从国民党南京监狱中被释放出来，他是安徽省安庆人，他随皖籍为主的大批沦陷区的难民流浪到江津县，在郭家公馆、康庄、施家大院等处作短暂居住后，最后寓居于县城南郊的鹤山坪石墙院。此时的他再没有当年叱咤风云的英雄气概。由于政治上的失意，他看破红尘，决意

不参与政治活动，“不公开发表言论，致引起喋喋不休之争”。在这山村里，他潜心进行学术研究，除了与追随他的老友高语罕合译了《大英百科全书》外，还继续编著在南京监狱里没有完成的音韵文字学专著《小学识字教本》。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对于这个已经淡出政治舞台偏居一隅的文化人仍不放心，暗中派出特务进行跟踪和监视。

陈独秀虽然不在党、不在派了，但他仍然是一个有思想的人，他仍是一个学人，重庆和江津的一些报刊都将他列为赠阅对象，他也给一些报刊写点专栏文章赚取点稿费补贴家用。伙夫焦大爷隔三差五就要进县城一趟，将各地寄到城里“延年医院”的报刊和信件取回石墙院。

日本于1941年12月7日偷袭美国珍珠港后，气焰更为嚣张，太平洋上的许多国家都被其占领。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世界局势变化直接影响到中国的抗日战争。不久，陈独秀就在石墙院潮湿低矮的寓室里，挑灯写下了姊妹篇政论文《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再论世界大势》。很快《大公报》发表了第一篇。据说第二篇即将刊发。

文章一发表，就引来了对陈独秀的一片责骂声。他又一次被推到风口浪尖上，处在乡下的陈独秀最初对此虽有所闻，但只认为这是点小麻烦，口舌将会一闪而过。

不过，事情绝非如此！

1942年3月29日，国民党江津县党部在县城东门外广场召开纪念黄花岗烈士牺牲31周年和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16周年的群众大会，县长罗宗文主持大会。在会议结束是，罗号召大家要继续继承总理遗志，发扬烈士精神和革命精神，抗日到底，最终打败法西斯。说完后，罗宗文礼节性地问主席台上座着的其他人还有话讲没有？但万万没有想到坐在台上的双目失明的老先生凌昭在他女儿的搀扶下竟然站起来，并走上前台激动而又大声地讲起来。凌昭声色俱厉，将话锋直指陈独秀，说陈独秀发表在3月21日《大公报》的文章《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散布的是悲观情绪，不利于抗战。他说，陈独秀先生不应该乱写文章在报上发表等等。这位老人对这篇文章进行了批驳和盘诘，用语严厉尖刻。此言一出，全场皆惊，大家议论纷纷，都责难和攻击陈独秀。大会在很是尴尬的氛围中结束。次日，《江津县政府公报》对此事进行报道。

住在鹤山坪乡下的陈独秀并没有参加这次大会，但他很快就知道了此事。他的许多学生、朋友和当年的同志、追随者都在江津。“当局居然组织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对他进行声讨和批判”——陈独秀感到无法接受，无地自容。他躺在床上，病情加重。恼怒的陈独秀还认为：在会上打出第一炮的老先生凌昭就则是当局专门请来骂我“仲甫是反革命”的，高语罕则是这事件幕后的策划者……于是，陈独秀

立即与高语罕断绝了关系，高语罕被迫离开陈独秀。

其实，陈独秀对凌昭是很了解的，他们不但是安徽老乡，而且还有一些交往。他知道凌昭是老牌的辛亥革命元老。在北伐战争中他战功卓著，他流亡到江津后，由他的女儿凌起凤（后来的著名作家王火的夫人）照顾，每天向他读报。陈独秀知道他是一个爱国者，关注抗战进程，主张抗战到底。陈独秀感到是有人有意向他发难。

陈独秀发表的《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上）认为：在这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和德国可能会胜利，中国抗战有可能失败，中国必然沦为殖民地；若美国胜利，中国也只能恢复为半殖民地等等……凌昭却认为：国难当头，战火正烈，虽是老乡的陈仲甫写这样的文章，散布了一种消极悲观的情绪，于中国人民团结抗日非常不利，是反革命，当然要受到国共两党和各方人士的抨击。

由于凌昭在大会上卷起了旋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检查局不得不指责陈独秀的文章“内容乖谬，违抗建国策”，并指令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查处检扣”，其续篇《再论世界大势》遭到封杀。

高语罕离开陈独秀时，陈独秀的身体已非常糟糕。他没有向陈独秀先生作过多解释，他深知陈独秀倔犟的性格……两个月后的5月27日，陈独秀在石墙院溘然长逝，高语罕立即又赶回奔丧，并送挽联：

喋喋毁誉难凭！大道莫容，论定尚需十世后；

哀哀蜀洛谁悟？彗星既陨，再生已是百年迟。

抗战结束了，迁来江津的安徽“下江人”纷纷迁回了老家，凌昭在家人的陪同下，也迁到了南京。但他在江津与同乡陈独秀因观点不同造成的裂痕却很难弥合。陈独秀在 1945 年 5 月 27 日在江津溘然逝世。

（原载《炎黄纵横》2010 年第 7 期，原标题《陈独秀江津写文章又惹祸》）

民革先贤夏仲实



夏仲实（1890—1969），名首勋，重庆市江津县（今江津区）白沙镇人。长期在川军任职，曾任川军第10师20旅旅长、第10师师长、国民革命军第24军第3路司令、第24军第3师师长；1933年随刘文辉参加四川军阀混战，失败后离职；1938年任第78军副军长，出川抗战；1939年升任第78军中将军长；1942年离职回到江津白沙，随后当选为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并在上海参加民革；1949年回川从事策反工作，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委员、民革重庆市委主委；1969年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1890年，夏仲实出生在江津白沙镇，幼年时他就被送进私塾读书识字，同时也切身感受到了清朝政府的腐败。由于聪明好学成绩优秀，1907年夏仲实考入了四川陆军小学，以

后又被选送到陕西陆军中学、保定陆军中学 就读。民国三年（1914 年）因为他成绩优异被时任校长的蒋百里 留下任秘书。在蒋百里那里工作还未满一年，夏仲实就回到了四川，就任川军刘湘部少尉候差员，三个月后任排长、连长等职。

不久，夏仲实奉命东渡日本，接在东京帝国大学上学的弟弟夏材勋回国治病。之前夏仲实就和回川宣传革命的刘伯承 有接触，在东京的时候他又结识了一些同盟会会员，并受托为同盟会携带过秘密文件回国。

1924 年，夏仲实任刘文辉部师长。1933 年，在“二刘之战”中刘文辉部失利，夏仲实卸甲归田。回到家乡后的夏仲实看见白沙南北交通都被长江阻断了，就号召白沙民众修建渡口，在当时夏仲实率先捐出了 100 石租集资，买来了 10 多艘船用于长江两岸过渡。这给当时白沙的交通带来了很大的便利，白沙及周边的民众都很感激夏仲实这一义举，于是就把这个渡口命名为“夏公义渡”。

1937 年卢沟桥事变后，夏仲实再也呆不住了，他整理好戎装，请缨杀敌。1927 年 5 月，夏仲实出任 30 集团军 78 军军长，他也是抗战时期重庆本土人中唯一一位出川抗日的军长。1941 年皖南事变后，时任 30 集团军司令的王陵基任命他出任江西绥靖主任，负责反共，夏仲实坚决不赴任，1942 年，夏仲实再次卸职回乡。

回乡后的夏仲实在白沙从事商业活动，加上地方上的人

对他非常敬重，所以时常请他去调解一些是非争端，夏仲实办事公允，得到了白沙百姓的好评。1942年，渝江师管区驻白沙某部的士兵6人，到白沙周围的一个寺庙中强摘琵琶、砍白菜并且还出言不逊，四周的农民忍无可忍就伙同了几十个村民声势浩荡地来捉这些士兵，士兵们不仅没有收敛反而仗着自己军人的身份变本加厉，一气之下村民们就把这6个士兵抓了起来，扔进了长江。第二天，师管区部队荷枪实弹的来到村子里，见人就捆，扬言要枪毙这些村民，一时间整个白沙轰动了。夏仲实知道这件事情后，急忙赶到事发地点，给师管区的官兵讲清了利害关系，最后师管区的官兵释放了被捆的农民，在夏仲实的调解下一场血腥的屠杀避免了。

当时的白沙是四川的四大经济文化重镇之一，经济和文化都比较繁荣，回乡后的夏仲实和白沙的有志之士一起发起了组建白沙水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的行动，并被股东们推选为董事长。在筹建白沙水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的时候，夏仲实还通过外侄女周德华请来了长寿龙溪河水力发电处的工程技术人员，修建水力发电厂。世事多变，开建后的白沙水力发电厂因物价飞涨，筹措的资金有限而几度停工。工程暂停后夏仲实经常在董事会上呼吁股东们多方面想办法，有时竟至痛心疾首、声泪俱下；他还在江津县甚至成都市活动，希望能得到政府和实业家的支持，在他的辛勤奔波下，白沙水力发电厂在1946年1月30日顺利竣工，当时的《新华日

报》还作了专门的报道。

1947年，夏仲实被选为国民党第一届立法委员，这对于当时的江津甚至整个重庆都是一件大事。1948年10月，夏仲实在上海参加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在重庆、上海等地进行反蒋及策反工作，同时还利用白沙水力发电股份公司掩护中共地下党员。

白沙解放前夕，夏仲实还组织地方人士维护白沙的社会秩序，听说解放军要来，他还立即派代表前来迎接。解放后他还协助政府剿匪，恢复生产等。

1950年后，夏仲实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南行政委员会委员、四川省人民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政协常委、重庆市政协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员、民革四川省委员会常委、民革重庆市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

1968年9月14日夏仲实被捕，被关进重庆市“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设立的管训队，也就是当年戴笠在重庆的公馆春森路19号。他被指控为“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反革命集团”的“副总司令兼参谋长”，此案被列为重庆的“一号专案”。79岁高龄的夏仲实被刑讯逼供两个多月，于1969年1月逝世于狱中。1978年11月予以平反。

（原载《重庆政协报》2012年4月17日，合作者兰定兴）

看破红尘三次“弃官”的刘丹五

刘丹五，又名刘莅冰，原江津县德感乡人。他幼年家贫，全家节衣缩食供他上江津中学。1912年7月考入蜀军将校，毕业后在川军中任职，后升任四川江防军旅长。

北伐战争时期，刘伯承受中共中央派遣，回川从事军运，利用军阀内部矛盾，策动起义，建立革命武装。四川军阀派系复杂，互相争夺霸权，各部动荡不安。共产党员邝继勋所属部队正是刘丹五族部的主力团，刘丹五支持邝继勋的革命活动，在全旅下级军官中开办政治和军事训练班。邝除讲授军事课外，还讲政治课，宣传革命道理，逐步建立了党的外围组织。刘丹五还以各种巧妙的说辞搪塞上峰对军中革命活动的盘查。

正因为如此，当局对刘丹五进行打压和排挤，他感到彷徨和失望，报国才能无法施展，他觉得在这旧军队里混没有希望。于是决定消极“罢官”，他命令邝继勋团长代理旅长，自己则称病住在成都。在他称病息影期间，去成都近郊新都县宝光寺游览，见江津前贤钟云舫在宝光寺说法堂前的弥勒笑佛像前题写有一副楹联——

你眉头着什么焦，但能守分安贫，便将得和气一团，常

向众人开口笑；

我肚皮这般样大，总不愁吃忧穿，只讲个包罗万象，自然百事放宽心。

对于清末钟云舫这位有名的巴蜀才子，刘丹五小时就耳有所闻。家乡有许多关于他“嬉笑怒骂皆成诗联”的传说和故事。果然，刘丹五感叹这楹联写得很好，文字虽长，但却紧紧围绕弥勒像大耳丰颐、口挂笑颜、袒胸开怀的造型特点而写。读后感到口吻亲切、通俗、诙谐、有趣，浅易感人，又无教义之说。更为重要的是该联有广博襟怀、四大皆空之流露，无佛家之肃严。好似散曲小令，让人深解其意：安分者得快乐，宽宏人少烦恼。

刘丹五猜想：钟秀才是不是想借称弥勒佛之口，劝诫我乐观豁达，不贪不占，远离红尘？教我信服佛家安贫乐道、守虚致静的养生哲学？刘丹五心有所动，红尘滚滚，风水轮回，名誉金钱地位等都是身外之物。他在宝光寺大门前徘徊了一阵，慢慢走到附近的明目堂，灵感一来，他马上写出联——

觉路满大千，众生共赴超尘界；

法门唯不二，奕世同游选佛场。

回到家，刘丹五交待邝继勋继续代理好旅长职务，自己却躲进深巷。邝继勋在刘部将党的工作搞得风生水起，中共四川省委也派出不少党员到该部工作，省委和川西特委的一

些重要会议，都在该旅驻地召开，该部成了党掌握的一支可靠武装。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到处搜捕、屠杀共产党人。邝继勋等共产党员在白色恐怖中和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当局对驻在省会附近的刘丹五部开始怀疑，多次催促刘丹五还任，并要他严厉治军，但他仍寻找借口不就，说“由旷继勋代理旅长尚好”。当局继续施压，刘丹五返任后支持正在蓬勃发展的川东农民运动，派邝继勋向中共四川省委作汇报，请示参加下川东之战。刘、邝遵照省委决定，率部下广安、合川，配合李家钰、罗泽洲部队进攻重庆。不久，刘丹五率部驻李、罗防地，他再次将旅长职务交邝继勋代理，自己又回到成都。他对当局称疾病复发，再不返任。

1932年12月底，红四方面军解放通江后成立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邝继勋任主席。为分化瓦解敌人，建立统战关系，邝写信给原在军阀部队里的老朋友和同事，开导他们拥护红军，争取起义，信被张国焘查获，张下令以“肃反”的名义将邝秘密处死。刘丹五闻讯，跌足长叹：邝继勋本可大有作为，谁知竟死于自己人之手！从此，刘丹五更是深居成都市井，息影两年不出，寻找他所撰楹联中所说“超红尘”的感觉。

命运又和刘丹五开了一个玩笑：1935年，刘丹五意外当选为成都市参议长。这事他都感到是鬼使神差和啼笑皆非，

四川省主席张群甚感诧异，询问成都市市长陈离：刘丹五何许人？答曰：江津人矣！

国民党为了笼络控制刘丹五，成都市党部多次劝诱请他加入国民党，他数度把登记表退回党部。刘丹五不想戴这“飞来的官帽”，提出辞呈，但上峰不批。在辞职未果的情况下，他托病居家，决意不做国民政府的“花瓶”。时成都《新新新闻》报惊呼成都议会已是“群龙无首”。

1947年夏天，刘丹五再一次到新都宝光寺说法堂后，次日，他带领全家老小离开成都回到了江津老家。

钟云舫楹联匾额因年深日久，时达百余年，早已腐蚀。而刘丹五的楹联至今还挂在宝光寺内。

（原载《武汉档案》2014年第一期）

抗日烽火中的江津老乡聂荣臻将军

2010年2月5日，台湾国民党中央党史馆馆长邵铭煌率“国民党中央党史馆抗战遗址大陆寻访团”来到重庆江津。他们参观“聂荣臻元帅陈列馆”后，邵铭煌提笔在“帅馆留言簿”上写下了七个大字——中华民族的伟人！

这不是简单的七个汉字，是与聂荣臻元帅不同政治党派、不同政治追求、不同政治信仰的国民党史专家的由衷敬佩（题字图片见前文《两岸共同的记忆》）。

慷慨悲歌上战场

1937年8月25日，为了抗日救国，中国工农红军以民族大义为重，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八路军下辖3个师，聂荣臻被任命为115师副师长，两个多月后，八路军恢复政治委员制度，聂荣臻又被中央军委任命为师政委。就在3天前，党中央在洛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了作战方针，聂荣臻作为军队主要负责人出席了这次会议。会上，他坚决支持毛泽东提出的“以游击战为主”的战略思想，并对此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会后，部队举行了庄严的抗日誓师大会，分两路渡过黄河，开赴山西前线开展对日作战。

整个华北战场当时已是一片失败景象。日军在占领平津之后气焰更加嚣张，调集了 30 万重兵沿交通要道长驱直下，妄图在 3 个月内灭亡中国。而此时的国民党军队已经锐气尽丧，将无斗志，兵无战心，一些部队甚至闻风而逃。在这样的形势下，八路军毅然开赴前线，让中国人民看到了挽救民族危亡的希望。

日本军队有飞机、坦克、大炮。炮弹比我军机关枪里的子弹还多，八路军这时候上前线能打胜仗吗？有人这样问。而八路军指战员则表示：即便与从未直接交过手的强大敌人展开血战，也要誓死保家卫国。

聂荣臻率领的队伍经过太原时，车站上挤满了前来送行的山西人民，车站里弥漫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气氛。许多东北流亡到此的学生，直到深夜依然不肯离去。

首战平型关

平型关位于山西省繁峙、灵立两县邻接处，是古长城的重要隘口，地势险要。

1937 年 9 月 23 日，聂荣臻率 115 师抵达位于晋东北战略要地平型关东南的上寨镇，准备在这里打响对日第一战。当时侵华日军正在华北展开全面进攻，其主力部队分兵两路左右夹击，企图突破平型关，与大同之敌会师雁门关。他们

妄图打开晋北通路，以大迂回的战术迫使国民党军撤退，达到不战而占领华北 5 省的目的。八路军如果取得平型关的胜利，不仅可以阻滞日军的战略计划，还可以借此打破日本人不可战胜的神话，鼓舞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于是，聂荣臻在战前动员会议上向全师干部讲解了我方取胜的条件和作战的注意事项，动员全师指导员齐心协力，打好出师以来的第一仗。

从平型关山口至灵丘县东河南镇之间，有一条长约 10 多里的险要沟段，非常适合作居高临下的伏击。24 日，115 师主力部队按计划在这个沟段的南北两岸山地布署就绪，同时派出一支部队占领镇北高地，以切断敌人后路。25 日早晨 7 点，日军阪垣师团第 21 旅团的辎重和后卫部队共 4000 多人进入伏击圈，一声令下，八路军指战员立即与敌人展开了浴血奋战。八路军乘势将日军压制于老爷庙至小寨村的峡谷之中，在飞机的掩护下，日军疯狂反扑，企图突围。八路军毫不退缩，立即与敌人展开白刃战。激战至 13 点，八路军全歼被围日军，战斗结束。

平型关战役，是全中国抗日军民在抗日战争中取得的第一一个大胜利。捷报传遍全国，万众欢腾。此次战斗不仅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而且极大地振奋了中国抗日军民的士气，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威。

1985 年，86 岁高龄的聂荣臻在回忆平型关大捷时挥笔写下了《忆平型关大捷》——

集思上寨运良筹，敢举烽烟解国忧。

潇潇夜雨洗兵马，殷殷热血固金瓯。

东渡黄河第一战，威扫敌倭青史流。

常抚皓首忆旧事，夜眺燕北几春秋。

创建根据地

平型关大捷结束之后，根据党中央的决定，115 师分出一部分人马，由聂荣臻率领，投入到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这支仅 3000 人左右的队伍，要在如此险恶的形势下建立根据地，力量是非常单薄的。为此，聂荣臻开始着手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反复向同志们宣传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必要性、可能性和艰巨性，鼓励大家建立必胜的决心；二是坚决执行党中央指示，放手发动群众，建立人民武装，按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办事，努力打好这场人民战争。

根据地的开创工作异常艰难，没有供给来源，兵力过于单薄。军区成立时，正值初冬季节，部队驻扎的五台山区已经开始飘雪，而我军很多指战员还赤脚穿草鞋，棉衣就更少了。山区的运输和物资调配难度很大，此前，一批又一批退败的国民党部队牵走了大批的驮骡、毛驴，当地的物资也被他们和日本军洗劫一空。

聂荣臻深知党中央派他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重大意义，他组织制定了贯彻统一战线、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等政策，最广泛地团结群众，只要赞同抗日、支持抗日，部队就欢迎。聂荣臻还首创了边区部队是“子弟兵”的提法，体现了军民的血肉关系。这一提法后来发展成为对整个人民军队的亲切称呼。1938年，晋察冀边区在筹备召开军政民代表大会时，曾对僧侣是否有资格参会产生过分歧。聂荣臻最后表态，僧侣也是中国人，他们出了家，但没有出国，在民族统一战线中，应该和各民族各阶层紧密携手，不分彼此，共同抗日。僧侣们很受感动，积极加入抗日队伍。就这样，人民群众被充分发动起来，不论部队走到哪里，都会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拥护和支持。

有了坚实的群众基础，聂荣臻带领部队在五台山区创建了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随着抗日队伍的不断壮大，他们不仅在山区站住了脚，在平原地区也扎下了根，先后开辟了冀中、冀东、平西、平北等根据地。到了1939年，晋察冀根据地已发展72个县1200多万人口，主力部队近10万人，被党中央誉为“模范抗日根据地和统一战线的模范区”。毛泽东曾赞誉：“五台山，前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聂荣臻就是新的鲁智深。”

有人曾疑惑：日军盘踞在晋察冀军区周围的大城市和铁路干线，后来又占据了全部的县城和较大的村镇，还经常调

集重兵“扫荡”，而聂荣臻的部队远离后方，枪支弹药和物资都得不到接济，他们是怎么坚持住，而且还不断巩固和扩大的呢？聂荣臻回答：“这没什么可奇怪的，关键的一条，就是发动群众，把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我们就有了赖以生存的基础，这就是我们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巩固的‘奥秘’所在。”

对于以聂荣臻为领导的边区军民的努力，党中央一直有着高度的评价。毛泽东还亲自把聂荣臻撰写的报告定名为《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代表党中央作出充分肯定。

发展游击战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掌握了山地游击战的规律，但对于在冀中地区这样的大平原上打游击战，边区抗日军民面临着一个新课题。聂荣臻坚定地认为，只要有人民群众的支持，我们就可以在战争中学会战斗，不论是山地还是平原，我们的根据地照样可以牢牢地站住脚跟。通过一次又一次反扫荡斗争的具体实践，边区军民在聂荣臻的领导下，不但掌握了开展平原游击战的基本规律，还先后创造出“地道战”、“地雷战”等多种特殊的作战方式，不仅丰富和发展了我军的战术思想，还树立了许多世界军事史上开展平原游击战的成功范例。

1937年11月，日军调集2万多人的兵力对冀西发动围攻，妄图将刚刚成立半个月的晋察冀军区扼杀在摇篮中。边区军民在聂荣臻的直接指挥下，依靠刚组建不久的游击武装，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接连打了几个胜仗，歼敌1000多名，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大扫荡。1938年7月上旬，冀东人民在边区部队的推动下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人民武装抗日大起义。这次起义的参加人数突破了20万，声势之大，震动全国。1938年9月，日军调集5万多人的兵力，对边区机关驻地发动多路围攻。我军经历48天、1000多次战斗，歼敌旅团长以下日军5200余名，彻底粉碎了敌人的“铁壁合围”。

与此同时，边区军民还打了一个大胜仗——黄土岭围攻战。1939年11月，日军“蒙疆驻屯军”最高司令阿部规秀中将亲率其兼任旅团长的第2混成旅团，孤军深入我腹地地带进行扫荡。在聂荣臻的直接指挥下，边区部队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先在雁宿崖打了一场伏击战，一举歼灭迁村大佐率领的600余名日军。随后又巧妙地将前来报复的阿部规秀诱入黄土岭一带绝境，调集重兵四面围攻。激战中，歼灭日军900多名，阿部规秀中迫击炮弹身亡。阿部规秀是日军的山地战专家，第2混成旅团在日军中号称“劲旅”。阿部规秀还是自“皇军”成立以来死在战场上的第一个中将级军官。事后，日本最大的报刊《朝日新闻》曾以“名将之花

凋谢在太行山上”为通栏标题，连续3天对他进行哀悼。

百团大战

1940年8月，晋察冀军区、晋冀鲁豫军区和晋绥军区部队为打破敌人的分割包围，在八路军总部的统一指挥下，以正太铁路为重点展开了大规模的交通破袭战。聂荣臻所属部队负责破袭正太铁路的石家庄至平定段。另外对军区所辖范围内的其他铁路和公路进行破袭，以阻止敌人向正太铁路增援。8月20日，我军在正太铁路全线准时发起攻击，整个正太铁路沿线和同蒲铁路的部分地段都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枪炮声中。这次战役中，我军动用了两大军区全部的机动力量，其规模之大，前所未有。

战役的第一阶段，晋察冀军区部队不但参加了破袭行动，还取得了攻占战略要地娘子关和歼灭井陘煤矿守敌等突出战果。娘子关地形险要，加上先后有国民党和日军连续多年构筑的工事，易守难攻。我军战士冒着敌人密集火网奋力仰攻，经过3个小时的反复冲击，终于把胜利的旗帜插上了娘子关山头，创造了我军攻击战史上的光辉战绩。在涞源城攻坚战中，我军以白刃战彻底消灭了驻守东团堡的敌井田部队。日军的这支部队全部由士官生组成，十分凶狠，他们在激战中曾不顾一切地连续施放毒气，其残部最后竟纵火集体自尽。后来日军为此作有《大日本皇军驻东团堡井田部队长

恨歌》，刻于石壁上。我边区军民以“游击战”和“运动战”击溃了敌人在华北的所有机动兵力组成的报复性扫荡，脍炙人口的“地雷战”，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由聂荣臻领导的平山下庄抗日军民创造出来的。

“百团大战”前后历时3个半月，整个华北各战区军民与敌人进行大小战斗1800多次，毙伤及生俘日伪军共43000余名，拔除敌军大小据点2900多个。边区军民破坏了敌军的900多里的铁路和3000多里的公路，摧毁了沿路敌军的大部分桥梁、车站等设施，使日军的正太铁路陷于全线瘫痪。这次战役打破了敌人的“囚笼政策”，有效地遏止了当时在国统区盛行的“投降论”。在1941年日本军部的军事报告中，东条英机曾这样说：“……敌人（指国民党）迄未进行主力的反攻，只有共产军于去年在华北举行大规模的出击。”

艰苦的反扫荡

聂荣臻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引起了日本侵略者的极大恐慌。1941年，日军调冈村宁次接任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刚一上任，冈村宁次就调集7万余人，对我军区驻地进行了一次规模空前的大扫荡，实行如“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治安强化运动”；对根据地“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以及“铁壁合围”“分区扫荡”“逐步蚕食”等。

边区首脑机关和普通军民一起，经历着有史以来最严峻

的考验。1941年8月底，聂荣臻带着军区机关转移到阜平一带时，曾连续数次遭到敌方的飞机轰炸和重兵围堵。恰逢此时，边区一些后方机关与他们偶然会合，一下子形成了近万人的队伍。聂荣臻冷静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动向，安排军区电台单独行动，以转移敌军的注意力。正是由于聂荣臻的正确决策，这支近万人的队伍连夜从另一个方向伺隙穿插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在党中央和以聂荣臻为首的军区党委的正确领导下，边区军民共同奋斗，逐步打破了敌人的封锁和蚕食，使晋察冀边区在反扫荡的斗争中坚持下来并重新恢复。1942年底，边区抗日武装力量已经达到50多万人，边区政府管辖98个县2000余万人。1943年9月，聂荣臻离开了自己一手创建并为之奋战6年的晋察冀边区，回到了党中央所在地陕北延安参加“七大”。待到他1945年9月9日重返晋察冀之时，抗日战争已于数周前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原载《党史纵横》2016年第1期，总357期，原名《抗日烽火中的聂荣臻将军》）



本文作者之一的杨辉宗（左）年轻时在表叔聂荣臻元帅（右）家作客

第四章：口述历史

回忆表叔聂荣臻

杨辉宗 口 述 庞国翔 记录

我外公唐庶咸和聂荣臻元帅的母亲是胞兄妹，因而我母亲唐廉珍就是聂帅的亲血表妹，聂帅是我的表叔。他的女儿聂力将军则是我的表姐。表叔长我母亲五岁，小兄妹俩小时常一起玩，感情很好。后来母亲常给我讲一些我表叔小时候的故事。

表叔小时候叫“双全”，从小就很尊敬老人、孝敬父母。亲戚邻居都称赞他很有孝心。家里有什么好吃的，双全总是要让父母和长辈先吃先尝。他爱用“鱼鳅毫”（一种农村用的捕鱼虾的竹器）捕鱼鳅，每次捉到鱼鳅，煮熟后都要让父母先吃，也要给舅舅们送去一些。桃子、李子等水果成熟了，也总要父母先“尝新”，双全爱劳动，担水、找柴，样样家务都能干。当时，他的个子还不很高，邻居们说“双全担水，‘三爷子’一样高……”。凡是有求于父母的事，他总是诚心请求。他要远离家乡赴法学习，开初，父母（我姑公姑婆）是不同意的，但经他多次恳求，全家人和亲戚邻居等都同意了，还欢天喜地为他送行。封建社会妇女是要缠足的，但他认为这

是对人体的摧残，不是男女平等。为了不让他妹妹聂荣昌(我的二 niang)受缠足的痛苦，多次向母亲请求，终于使妹妹保住了一双天足。

表叔从小就很有爱心，他心就善良、同情弱者。他外祖父家寄居一个孤寡老人叶三公，他常为叶三公请医治病，付钱买药，使叶三公病愈。他在寒风刺骨的路上遇到一个饥寒交迫、全身发抖的小叫花女，就将她带回家里，请母亲给她饭吃，后又请母亲拿衣服送给这个可怜的小女孩。江津中学八班桂万年同学，患肺结核，其他同学怕传染，不敢接近，桂非常痛苦和悲观，他却主动护理桂万年，为其取药煎汤，并劝说开导和辅导作业。同班同学聂鸿明因踩浪桥，损伤了右脚，他立即请同学协助自己，将聂鸿明送往“人道医院”治疗。因此，同学们都爱戴他，尊称他为“老大哥”。

表叔小时天赋就好，他读书勤奋，极具恒心。他读书从冲口开始，以后在吴滩、油溪和永川的陈食，无论路途多远，酷暑寒天，都坚持上学，做到不迟到、不早退。他肯动脑筋、善于思考，又能排除干扰，在闹中取静，有时面墙而读，有时独坐静思。对疑难问题，不轻易问人，自己反复思考，或查阅资料，力求搞清弄懂。他在江津中学第一学年时各科考试平均分数为 77.4 分，是八班学生中几个成绩的佼佼者之一。有趣的是有时还和他小表妹比赛背诵国文，他总是第一个熟背。在留法期间他写回的家书中就有“学不成，死不

归”的誓言。同学曹钟庆曾被传为过目能诵的“神童”。他想试一下这个同学的真本事，就在下课时指着一篇文章，对曹说：“听说你过目能诵，特向你请教。”曹见到他的诚恳，就拉着他的手说：“我只是记忆力强一点，并非过目能诵。”曹钟庆还还对他讲：“我国文底子薄，作文很差，诚望得到你的帮助……”从此，他给曹很多帮助，他们成为好学友。后来两人在路线上各走东西。在长征中，也是红军将领的表叔在一次紧张的战斗中，对手竟是时任川军刘文辉部中将军长曹钟庆，曹钟庆知道后就主动让道。解放后曹钟庆任重庆市政协委员，他回忆说：“当年在学校，聂荣臻对我像带小弟弟一样，总是循循善诱，不怕麻烦，使我的国文水准有所提高，作文有了进展……”

表叔是 1918 年离开家乡江津投入到火热的革命生涯的。此后，他只在 1956 年他因军工企事业建设回了一趟江津，住在江津地委招待所。在 1986 年以前，江津家乡的亲人及领导与聂帅的联系都是书信。其实，当时他的亲戚都有许多机会和见面，我母亲是聂帅的亲血表妹，她 1958 年至 1965 年 8 年间都住在北京，全面有机会去看望表兄，但她没去。当时大家都认为：他是开国元勋，身居高位，日理万机，肩上担子很重，工作繁忙，我们不应该去给他添麻烦，去探望他还容易被人误解为不廉洁等……

其实，表叔他是个性情中人。1958 年家乡的一个亲戚龙

庆云因事到北京，准备去探望他，最后考虑到他很忙，走到了总参管理局都没有进去。后来表叔知道这事，多次面露愠色地说：“龙庆云来北京，我的门砍都不跨，北京这么大，莫非我能找到你吗？”1961年，家乡江津和全国一样，遭受“大办钢铁”人祸和自然灾害，群众生活极端困难，表叔写信给家乡党委和政府：“乡亲们生活遇到暂时的困难，谨向公社的同志们及乡亲们表示慰问……我相信，大家齐心协力，一定能战胜暂时的困难。”

应该说，在聂帅家乡江津，我是较为幸运的一个，因为我多次聆听到了他老人家对我的谆谆教诲，感受到他老人家对家乡亲人的关爱，对家乡发展的关心。

1986年7月1日，是我党成立65周年的日本，也是我和江津县的领导第一次见表叔的日子。这天，我和江津县委书记辜文兴等一行去看望我表叔，向他汇报家乡的建设情况，大家是既高兴，又激动，更紧张，高兴的是要看到这位开国元勋了，紧张的是怕汇报不好家乡的情况而影响他的健康。但我们一见到他老人家，他那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神态，就使我们紧张的心情终于放松下来。表叔坐在轮椅上，很高兴地举动双手，表示对我们一行的欢迎。当聂办的周秘书向他介绍了我们，并听了我们带来的家乡人民对他的问候和祝福后，表叔深情地说：“我也想念家乡呀！转瞬又是几十年了，但不得回去，人愈老愈思乡呀，现在年纪大了，也不

能动了，想念也是空话了，也不能回去，唉！托你们向乡亲们问好……现在这个情况，动都动不得，老了，88岁了，二十多岁离开家乡，六十八年没有回到家乡了。”

表叔给我们讲起 1956 年他因军工企业回了一趟江津的事：“那年回到县城，看了一眼，当时地委在江津，住在地委。去时，我提出要到江津中学去看一看，我原在那个中学读书。他们把教员、学生通通都赶跑了，我去看个空房子，我说，我来看什么？——怪得很，地委书记是山东老乡，把师生们通通都赶跑了，莫明其妙……”当听到我们解释是“为了安全，地委按照保卫工作的要求这样办的”时，老人家说：“那时都解放了，又不是白区，解放以后了嘛，去看一看同学嘛，我也是那所学校的嘛。结果，看的是空房子，真是大失所望。”

在会见中，表叔多次问：“老家还有哪些亲人？”我给他汇报了许多人的名字和出身。他又问：“我外祖父住在桂花屋基，恐怕都没有什么人了？”这是我第一次见表叔，以前虽通过信，但他对我映像还不很深，这时，辜书记对老人家说：“聂帅呀，这位就是你舅舅的外孙，叫杨辉宗”。我接过话茬向他说：“我外公叫唐庶咸，母亲是唐廉珍。”老人家一听马上就说：“唐庶咸是我的大舅父，他下还有唐海潭（我三外公）、唐富华（我么外公）、唐廉珍……”表叔兴奋起起说：“对啦，对啦！——有亲戚来了，真有意思……”当我转达我妈妈对他的问候时，老人家说：“我大她五岁，还记得，小时候我们常

玩。她先住在桂花屋基，后搬家到柏杨屋基，那时经常来往嘛……谢谢她，谢谢她，我也向她问好，希望她好。这些老亲戚没有什么人啦，能活到现在也不容易呀，活着也不得见啊！”

这次拜见表叔，他问得很多很细，听得也很认真，还反复提问。家乡的生产、建设、人民生活好不好？碑槽的树子长得如何？县城里的遗爱池现在作什么用？县里有没有公路，城里头是不是还那样坑坑洼洼的？……我一一回答。表叔最后说：“都靠你们的努力啊，要把家乡建设好，江津是个大县啦，建设四个现代化，起码应该建设公路，各种建设都应该搞一搞，不要太落后了。”

时间已经超过医生的规定，表叔高兴地和我们一起照相，见我们并排站在他的后面，他抱歉地说：“我有病起不来。”照了一张后，他又说：“再来一张吧……总而言之，请你们回去代我向乡亲们问好。”当我们依依不舍地道别时，表叔说道：“但愿再次见到你们，欢迎你们来……”

老人家很舍不得我们离去，我贴在他耳边说：“望您老多加保重，祝您健康长寿。我出差北京又来看您。”表叔点了点头后说：“欢迎你们来——”他的声音是颤抖的，眼眶是湿润的……

我回家后，我将看望老表叔的情况给母亲细说了，母亲后悔在北京那么多年都未去拜望他：“当时怕打扰他啊……”

1988年11月26日，是我第二次拜见到表叔的日子。这次我到北京是为了协调救灾汽油的运输问题，同我一道进京的还有镇人武部部长古再双和铜锣乡党委副书记李碧清。聂帅办公室秘书来总参四所，了解我办事的情况，他知道我想见到表叔。但根据当时情况，周秘书担心表叔见到家乡来的亲人，会增加心脏负担，影响健康，就劝我待明年春暖花开时再看望他。我不免有些失望，于是，我给他写了简短的问候信请周秘书带回——

敬爱的表叔：我出差北京，很想也应该来看望老人家，但听说您老身体欠佳，这就只好等待明年春暖花开时了。敬望老人家好好保重，祝老人家健康长寿。晚辈杨辉宗。1988年11月25日下午于总参四所。

真是太幸运了，表叔见信后却要见我，得知这个喜讯后我是非常兴奋。我庚即于11月26日下午赶到表叔家中，一见面，老人家就亲切地拉起了家常。表叔笑着对秘书说：“今天你们不用记录，我们是拉家常。”他问老家聂家还有哪些亲人？唐家的亲人还好不好？问我认不认识他的二叔聂奎录？他问壁上挂灯那座聂家的老坟有人过问（上坟）没有？问我读了多少书？问我具体工作是什么……表叔还给我讲了聂家和唐家过去的情况。他说：“过去，聂家和唐家都是比较有声望的大家族，不过败也败得早啊！你外公唐庶咸是我的大舅，他是个本份人，不抽大烟。唐海潭、唐富华都抽大烟，

这个家败得很早……”表叔又问起家乡今年的干旱和冰雹灾情。我说，虽然今年灾害严重，但全县上下都采取了补救措施，估计今年不会有多大的减产。表叔听了语重心长地说：“江津的江河多嘛，发挥不到作用吗？还是要兴修水利啊……水利要发挥作用嘛，不然是经受不住的啊……”

表叔突然问我认识夏祖辉吗？这个人我听说过但没有见过，是江津老家的，表叔问我是不是土改时镇压的？我说他是土改时被吓倒的，自杀了。表叔说：“土改时一些地方从肉体上消灭地主是不对的，人都被吓死了，可见其声势啊……那不是我们党的政策。要知道，有很多都是有文化、有知识的人才呀！对有各种专长的人，都要注意爱护他们，发挥他们的作用。夏祖辉留过日，对柑桶很有研究，又热心，又在行……那时中央要我代理北京市长，我就没有提倡在肉体上消灭地主。”听了表叔这席话，我心里很沉重。

表叔四顾了一下房间后又说：“我这里就象一个医院，就是吃药、打针，全靠他们护理……我打了几十年仗，未打伤，也未打死，你说笑人不笑人？”在场的护士说：“这是您老福大命大呀！”

表叔将我介绍给他夫人张瑞华和女儿聂力。他指着我对聂力说：“这是我舅舅女儿的儿子。”我第一次见到了表叔娘张瑞华老人和表姐聂力将军。这次表叔说了很多很多，我都一一作了回答。最后表叔留我在他家吃饭，要我坐在他身边。

他一边吃饭一边又重新问起家乡的建设、财政收入、群众生活、亲人的健康等等……表叔要我把帽子揭了，说：“外边的气温低，不注意会感冒的”他还对我说：“你回去给你妈说，望她好好保重。不容易呀，她只小我四五岁。告诉你妈——”他用手指着的头和胸继续说：“我都好，就是腿不行了。”最后表叔和我照像，知道这是专门照来送给我母亲看的，他就认真，坐得很端正。几十年不见，一定要让表妹看个真切，照了几次都不满意，最后表叔决定戴上眼镜与我从照。

表叔是个艰苦朴素、严于律己的人。作为开国元勋，他对旧居江津吴滩石院子的修复是并不同意的，他多次说：“中央有规定，我们要严格按照规定办事。”家乡党政为了保护文物，开展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经过上级相关部门批准，要对他旧居进行修复，他这才原则同意。但他多次强调：“要少花点钱，多栽点松柏。”对于家乡报请他帮助解决的困难，他既表示深切的关心，又嘱咐秘书联系“有关部门关心一下”，但又严格要求我们“要自力更生、顾全大局、走正渠道。”

1989年4月26日，我陪同唐昌放同志去北京看望表叔。在周秘书引领下走进了表叔的会客室，瑞华老人家也在座。此时的表叔已经是90高龄了，身体很弱。唐昌放说：“我们受江津县委、县府委托，来看望两位老人家，祝老人家健康长寿。”瑞华老人家高兴地说：“谢谢，谢谢。”

表叔和蔼可亲，他说：“家乡的情况周秘书已经告诉过我

了。我只想问一件事，就是庄稼长得好不好？”昌放同志汇报后，老人家非常关心地告诫我们：“我们江津是个大县呀，我们国家人口多，吃饭这件大事疏忽不得呀，要毫不放松地把农业抓好才行啊！”我接着向老人家说了一句话：“感谢老人家关心，我们一定努力，也请老人家放心。”表叔听后面对我问：“你母亲现在好不好？”我说：“我妈现在在成都我姐姐家。她很好。”表叔又问：“你姐姐的家景好不好？”我一一回答了表叔。

这时，唐昌放恳求老人家对家乡送去的广柑别再给钱了。原来，江津县每年在柑橘成熟的季节都要给老人家送去一些柑橘，表叔总是及时将柑橘分发给周边的工作人员，还要给小平、叶帅等战友送些去，他高兴地说：“来来来，大家都来尝尝我老家江津的特产……”不过，表叔很快就会给江津寄来钱。老人家听了唐昌放这话后说：“感谢你们，但是广柑是农民辛苦种出来的，我不能白吃……”同时，他又指着我说：“他带来的可以不给钱，是亲戚嘛……”

见面快结束时，老人家又说：“粮食生产松不得啊，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吃饭这件事，千万不能疏忽。”会见结束，老人家高兴地和我们照了相，临别时，表叔和瑞华老人家将早准备好的阿胶、高丽参和果脯拿出，要我给我母亲带回去。这时，作为一个晚辈，我深深体验到血浓于水的人间亲情。

1989年9月，北京举办亚运会。我受委托，代表江津

人民前往北京向亚运会捐赠礼品，病中的表叔在电视中看到捐赠仪式的新闻报导后，高兴地说：“家乡人民爱国之心，要不断发扬。”亚运会开幕时到京的有江津、璧山两县的领导侯大川、郑洪等人，都想前往表叔家拜望他，周秘书报告后获得了同意，因为表叔病情的原因，周秘书作了精心安排：见面时不握手、不讲话，只招招手、照个相……后因徐帅逝世，表叔非常悲痛，医生就不同意会客了。对此，表叔深感不安。他说：“那样简单的安排都通不过，要给他们讲清楚，不是我不想见他们，实在是医生不让见呀！”

1990年3月中旬，我又一次到北京出差，我请周秘书向老人家转报，我母亲想来北京看望他。27日上午，周告诉我说：“首长说能见见当然好。”周秘书又说，时间要定在气温回升以后。三天后，周秘书又在电话上告诉我：“你母亲来北京一事，我又一次给老人家说了，第一次，他老人家说：亲戚就那么一位了，能见见，当然好。所以，那天我说你母亲来的时间要和龙必涛、聂荣祥他们来的时间分开，好让两位老人见面时叙叙，昨天我汇报这事时首长又说：提到这件事，我真思绪万千，非常矛盾啊，没有什么亲戚了，几十年不见，见一见，当然好，但她也八十几岁了，长途劳累，能吃得销吗？万一……。是不是劝她不来算了，把我的和全家照的像给她带去，像前次，医生不让见，我还是只能想了嘛！”周秘书又说：“根据首长说的，你多给你母亲作些劝慰，要理解首

长的想法是周全的……”听了这话我非常感动，表叔考虑很周全，最后还写了封给我母亲进行劝慰和说明情况。

次年江津县荣获全国首届“双双拥模范县”称号，县长康纲有于元月份前往北京参加表彰大会，我陪同他到北京看看望表叔。27日，周秘书带我们到会客室，向老人家作了介绍。我们说：我们是来向您老人家报喜，你的家乡荣获解放军总政治部和国家民政部命名的“双拥模范县”称号。表叔听了挥动着双手，非常高兴地说：“江津被评为全国双拥模范县，这很好，我很高兴，拥军优属，这不只是江津一个县的事情，这是四川的大事，是全国的大事。拥军优属工作非常重要，全国都要搞好。”他接着又说：“掌握政权，武装很重要，党要抓军队建设，全国都要抓军队建设。军队的工作一定要做好，地方要做好拥军优属工作，对人民在进行文化政治教育的同时进行国防教育，不要等战争来了才抓拥军优属工作。在和平时期就要好好抓。现在没有打仗，但要看到有的羽毛未丰，就野心勃勃，要有战争的准备……要建设就要稳定，要世界和平，要和平就得有强大的国防军，这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大事啊”

接着表叔回过头来又对我说：“去年，你妈想来看我，我写信劝她不要来，不是我不想见她，她八十八岁了，长途劳累，北京的气候又不好，要给她说清楚。”老人家的心的细致，听了这席话，一股热流顿时涌上我的心头。

表叔这次关于“拥军优属”的重要谈话，引起四川省委领导重视，时任四川省委书记的杨汝岱同志还来重庆，约康纲有和我到渝州宾馆，听取我们的汇报。

表叔是个办事周全、办事严谨的人。因为是亲戚的原因，在家乡江津我是与表叔联系最多的人。我多次求他老人家为家乡题词写字，年寿已高之时的表叔基本上是谢绝题词写字的请求的，但对于故乡的请求，他基本上是有求必应，不过也有另当别论的时候。对“X X 烟草”单位请求他题写“X X 烟草大厦”，表叔则认为这个意义不大，还会误导群众，于是就婉言谢绝了。他说：“我与烟草无缘啊”。对于题写什么内容，他也是要经过缜密的思考的，不是请写什么内容就写什么内容。某支部队请表叔题词，本来表叔就是带兵之人，是元帅，对军营对战士的感情比谁都深，但表叔就是经过三次请求才题写了。第一次是他觉得握笔不稳就推辞了；第二次请求时，他觉得自己对这支部队的军史还不很了解，又婉言谢绝了；第三找到他时，他问：“为什么老是要我为这支部队写字？”当他听了详细的汇报后，才同意题写。但对于对方草拟的“南疆铁军”、“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之师”和“将军摇篮”这三个内容，他是一个也未用，他经过缜密思考后，题写“珍惜部队的历史荣誉，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做新一代最可爱的人”的文字。

1992年5月，我和辜文兴同志到北京筹办“在京江津籍

人士座谈会”，我们希望能顺程看望老人家，我们向周秘书说了此事。他很理解我们，但他很担心地说：“这次看望恐怕有困难，最近首长一直不很好，不知道闯不闯得过这一关？你们先办应该办的事……”果不其然，当我们筹办完会后的第二天，5月15日清晨，我还在熟睡中，表姐聂力就给我打来电话。她泣不成声地告诉我：“老爷子昨晚去世了……”我听后真是惊呆了。尽管我知道迟早会有这一天，但没想到会这么突然，这样的快，我简直不敢相信我听的是事实……我迟疑了很久，未向辜书记说这事，我怕误报。我随即给聂办打电话，冯秘书问我：“有什么事，这么早就来电话？”当我问及表叔他老人家时，冯秘书迟疑了一会才伤心地说出了三个字：“不行了”。我追问了一句：“怎么个不行？”——我多么希望冯秘书说出另外一个结果来，冯秘书轻轻地说：“已去世了。”我怀着万分悲痛的心情，向辜文兴作了报告，辜文兴也深感悲痛。于是，我不顾一切地赶了过去。在场的人很多，还有中央领导。聂力表姐对我说：“你知道老爷子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是啥？——他说我的根在江津……”

我急速又赶回驻地，向辜文兴报告了这事，随后我们一起代表江津的父老乡亲，向我们敬爱的聂帅敬献了一个花篮，以表达家乡百万人民的哀思。表姐聂力和表姐夫丁衡高将军在极其沉重的悲痛中，对我们前往悼念表示感谢。我们劝慰他们节哀保重，我们表示要把家乡的各项工作做得更

好，让远行西去的老人家含笑九泉。

5月28日，表叔遗体火化。我们来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在宽敞明亮而又哀乐低回的吊唁大厅，和党和国家领导人宋平、杨白冰、温家宝、迟浩田、赵南起等一起向老人家作最后告别。

……

表叔是建党初期的老党员，是经历了开国、建国、治国、强国的老一辈革命家，是亲身参与和支持三代领导核心的唯一元帅。党的第一代领袖毛泽东称赞他“是个厚道人”，第二代领袖邓小平非常敬重聂帅的“长者风范”，江泽民同志到任后就和国务院总理李鹏一起去看望聂帅。当表叔去世后，江泽民同志迅即题写了“聂荣臻同志永远和我们在一起”。这充分表达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对老人家的无限崇敬。

表叔离开我们已经17年了，适逢今年又是他老人家诞辰110周年，我们更加思念他老人家。他老人家的革命精神、崇高品质和人格风范，永远鼓舞着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他永远和家乡人民在一起，他的音容笑貌永远在我们心里。

我永远怀念聂帅！永远怀念我的表叔！

（原载《炎黄纵横》2009年12期）

回忆大哥王利器

合川：王利泽 80岁 口述

江津：庞国翔 记录整理

王利器是我国著名的国学大师。他是我四伯父王沛高的长子，我父亲王慎于是他六叔，也就是说王利器是我堂兄，我叫他大哥。当年我们是没分家的大家庭，同吃一甑饭。后来他走出江津，在外工作，我们一大家子也常聚在一起。

一：小小读书郎

1911年大哥出生在江津县先锋乡永丰场笋溪河畔的塘湾。这个农家小院系土木结构，有三个天井，大小房屋40余间。我们王家于清初“湖广填四川”时从湖广省北麻城县孝感乡迁来此“插占为业”，这已是十世。

我们的祖父叫王章可，早前是地主的长工。地主家办有家庭私塾，祖父就在这里读书。后来祖父步行千里，沿途乞讨到成都省考，中举回江津后任育才书院院长，后来慢慢成为地主，在江津城买了街房，分住在城乡。

祖父四代同堂，家训是“诗礼传家”。老屋下厅悬匾额黑底金字“俭朴千秋”。书房悬横幅“高风亮节”，书房藏书

字画甚多，其中有吴道子、张大千真迹。

大哥是王章可的长孙，是家里的掌上明珠，他四岁受家教，七岁在家里开办的庭训学校读书。老师是前清秀才，先教读《百家姓》、《三字经》、《四言杂志》、《增广贤文》之类的“当家书”，后教读《学而》、《四书》、《五经》。老师要求很严，每天教生书，第二天就要背诵、默写，如果未完成，就重读重背、重写。再不行就要加以体罚，轻则打手板，重则罚跪。大哥常说：《告子》一本，板子一捆。他记性好，很少受体罚。读完《四书》、《五经》之后，老师加授《古文观止》、《古文辞类纂》、《千家诗》、《唐诗三百首》、《白香词谱》、《赋学正鹄》之类。老师认为他读书上了路，就教他作对作文。有一次，老师想表现自己是识时务的俊杰，就出了一个诗题《春归》，大哥写出的诗最后两句是“满地落花红不扫，尚留春色在人间”——老师看了，高兴地圈了圈，还批道：有俞荫甫‘花落春犹在’之意。

大哥到 13 岁时，我们家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首先是祖父王章可去逝，家中失去主心骨；其次是八叔父王香本本在北大预科读书，还没毕业就自费去德国留学 13 年，家人称之“读大书”，获得德国柏林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仅在黄埔军校任教，没有捞到一官半职，用了不少白花花的银子，家里人开始有意见；第三是表兄许锡钧，考上了黄埔军校，后来参加北伐，在汀泗桥之役中牺牲，一大家子人又非常震

惊。

大哥发现祖父书房中有大量藏书。其中有《天演论》、《饮冰室文集》、《白芙草堂算学丛书》等，取来阅读，获益匪浅。那些书比“子曰”、“诗云”之类的书新鲜，颇能引人入胜。有勾股弦、英文字母之类，这在旧书中是没有的。大哥有摸门不入一窍不通之感。于是他决定要走进更广阔的天地。

二：风华正茂读书时

我们有一个堂兄叫王海霖，是青泊滩义字号二杆旗的舵把子，一副满天星斗的尊容，人称之为王二麻子，我们都称麻哥。麻哥有一次郑重其事地跟大哥说：老弟，你该嗨了，我来抬举你，嗨一个一步登天的大爷。大哥说：我是天生的大爷，不用去吵袍哥！从此以后，麻哥就不再提及此事了。

大哥在 20 这年去考江津中学，三场考试，只有头场轻而易举地交了头卷，其余算术和常识两场，他简直莫名其妙，不知所答，结果交了白卷出场。三天后他去看榜：学校收两个班，正取 100 名，备取 20 名。大哥排在备取中的 16 名，真危险！

开学时伯父吩咐大哥：你进城去上学要好好用功，学期考试要是不及格，就不要想再读书了。大哥上学后，因他只读过古诗文，三年级的“老爷”们就嘲弄他，叫他“老夫子”。不久一位同学病死，追悼会上挂满了挽联，大哥是新生，就

代表三十班撰写了一副挽联——

逢君却又别君，叹砥砺无缘，红树青山人已去；

见你为何哭你，恨文章憎命，素车白马我方来。

参加追悼会的人都说：这副挽联，是追悼会首屈一指之作——从此大哥令同学们刮目相看。

江津中学比较自由，同学们都办社团，出刊物。大哥和同学们一起成立了一个“朝曦社”，他们订阅《创造》周报、举行讨论会，油印出版《朝曦》报等活动，阅读本县人漆南薰的《帝国主义铁蹄下的中国》一书和郭沫若、蒋光慈的作品。在哥《朝曦》小报上揭露当时四川军阀的丑闻，刊登讽刺县长的民谣：一日挪百文（局长名罗博文），留以度终身（县长名刘中生）。

通过一年的努力大哥成为全班第一名，领到了正式录取通知书，一大家人都很高兴。在第二学年开学时他就得到一个惊人的消息：“朝曦社”的同学刁福初被驻军逮捕后枪毙了。我们的一个叔父叫王竹村，是县警察局长，因为这个原因军阀才没对大哥下手。叔父将大哥叫到警察局呵斥：你好危险，以后要好好读书，不要乱搞了！

江津中学的设备和教师在四川都是第一流的。代数、几何教材是采用温德华氏的，练习题多且难，比如几何把“九点共圆”列为习题。大哥做这样的难题非常容易，几何老师龚琢章表扬他：真了不起，等于多发现一个尤拉圈。

大哥在江津初中毕业后，考上了重庆大学高中部。这个学校真牛，教师全是教授，是北大、清华的摇篮。有向宗鲁先生讲授章氏《国故论衡》，陈季皋先生讲授《文选》，陈伟谟先生讲授英文，郭坚白先生讲授代数，向鲁先生讲授几何，段调元先生讲授三角，李乃尧先生讲授化学。大哥想考名牌大学，就非常用功学习。自修《圣经》、《茵梦湖》和钱基博先生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他发现《现代中国文学史》有错误，就大胆给钱先生写一封信。不想钱先生回了信，钱十分虚心，对大哥给予肯定。后来此书再版时，还将大哥和一些知名人士写进序言里——这时他还是一个高中生。

大哥高中毕业后，由于大家庭房份多，负担大，就没有马上考大学。他去达材学校教书，那里高材生多。后来的天津人民出版社的资深编辑王沛霖就是大哥的学生——这当然是后话了。

大哥最终还是要去考大学。北大、清华没有在四川招生，他只考川大中文系。这个大学的校长是任鸿隽先生，文学院院长是张颐先生。系里教授全是学富五车和善为师者。有龚向农、林山腴、周癸叔、向仙樵、祝岷怀、李培甫、李炳英、赵少咸、彭云生、庞石帚、萧仲伦、曾宇康、刘大杰等，分别讲授《三礼》《史记》《楚辞》《资治通鉴》《说文》《庄子》《广韵》《杜诗》《文心雕龙》《诗经》《文选》《中国文学发展史》，后来又聘请向宗鲁先生讲《校讐学》、《管子》、《淮

南子》，陈季皋先生讲《汉书》，川大一时蔚为蜀学中心。大哥都挤时间去听他们的课。一年后任鸿隽先生离开川大，由张颐先生继任校长，朱光潜先生任文学院院长。

“九·八”事变之后，日寇入侵华北，平津名教授多来川大任教。川大被公认为是四川的北京大学。大哥在教授们的指导下，专攻《吕氏春秋》、《风俗通义》。张颐先生任院长两年，川大是理想的读书地方，校风颇为自由，谁知国民党四川党部主任程天放是 cc 的四大金刚之一，他想打入四川大学，就买通少数学生，借用学生名义登报欢迎他来四川大学。这引起了学潮。学校绝大多数师生坚决反对，不想让一个党棍来破坏学校的大好形势。于是就推举大哥写文章揭露程天放盗名欺世。大哥还去找到成都的报纸，但报馆里人说党部有通知，不能刊登此类文章，被拒绝了。

有一天，有人找大哥参加“三青团”成立大会，被他骂后拒绝。后来军训，党棍黄杰在台上又宣传“三青团”，这时冯玉祥赶来讲：希望大家以后到前线，要英勇杀敌，舍身成仁，不要像有些将军那样，日寇来了，把军令丢了就跑——他边讲边把目光注视着在主席台上的黄杰，黄杰的脸色变白了。从那天起，大哥和同学们常去场镇宣传抗日。

在第四学年时，学校为了避免被轰炸，迁到了峨眉山。这里很静，大哥就专心写毕业论文《风俗通义校注》，这毕业论文真了不得，30 余万字，厚厚的一本书。学校推荐该论

文去参加重庆举办的第一届大学生毕业会评，竟然得了满分，大哥得了一大笔奖金。

川大毕业后北大文科研究所招生，大哥以《风俗通义校注》作者身份去报名后就回到江津，后来接到去重庆中英庚款管委会参加考试的通知时考期已过。大哥难过极了，但他不甘心仍想去看看。到了重庆考场，他对里面的人说：我是《风俗通义校注》作者——里面的人说：试卷都交走了，你去中央研究院找傅斯年先生看看。大哥找到了傅斯年，傅对他开恩，让他考英文。这考法有些怪，就是摘录英文杂志上的一段文章，以第一句为题目做英文作文。大哥的作文还未做完防空警报就拉响了。傅叫他进入防空洞继续做题，但很快就到吃饭时间。傅对大哥说：你回江津去吧，敌机轰炸重庆，很危险——不考了。你早就被录取了。我们还准备给你中英庚款的奖学金。你去昆明，还是去李庄？昆明有老师，李庄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有书，由你选。大哥听了激动无比，他想去历史语言研究所，就选了李庄。

大哥回到江津后天天与我们在一起，不久一大家子人就分了家，但大家仍常在一起。这时大哥得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入学通知书。研究所由邓广铭先生负责，那里的同学都很有功底，大哥与他们朝夕相处，左右采获，获益良多。他选定写《吕氏春秋比义》论文，半天写论文，半天读书。研究所藏书甚多，他选读了《大藏》和《道藏》。研

究所定期举行学术报告会，争就在会上宣读论文《家人对文解》——这篇论文后来收入《辽海引年集》。

大哥是一个敬重师长的人。1941年他老师、四川大学中文系主任向宗鲁先生在峨眉病故，操办丧事人少，他就由李庄当夜奔赴峨眉，在山下报国寺灵堂前行拜谒礼，然后护柩回巴县。船很小，棺材很大，遗物又有14挑，棺材放在船里，14挑书箱放在上面，大哥只好睡在棺材边，船夫是老手，熟练地驾船渡过一个一个险滩暗礁，每过险滩暗礁前都请大哥下船上岸。大哥说：船在人在，我上了岸，万一出了事，我怎样向师母交代。经过两天多时间顺利到了江津。然后又包轮船到巴县，安置好灵柩。向先生的老友陈季皋先生在致词中称誉大哥“此行为行芳而名高”。

三：在北大讲台上

大哥的毕业论文是《吕氏春秋比义》，全书共计24册，约200余万字。毕业后他回母校四川大学任教，兼任成华大学教授。他在川大购置图书，开设讲座，延聘陈寅恪、李方桂先来校开讲座，听讲者不只研究生，还扩大了本科生。

日本投降后北大要迁回北平，大哥应邀到北大任教，他在中文系讲校勘学、讲《史记》、《庄子》、《文心雕龙》等，法国巴黎大学汉学研究所来北大约稿，学校就将他的《文心雕龙新书》推荐给他们。后来该书收入中法汉学研究所《通

检丛刊》。由于该书在国内很少，后改名为《文心雕龙校证》，1980年国内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北大复员后，这里仍然是民主运动的战场之一。大哥等进步学生常在民主墙、民主广场活动。地下党组织还在红楼办了一个孑民图书室，销售进步书刊。图书室负责人是农学院学生江津人王藩，凭着是本同乡家，大哥与他就常串门，有时干脆就住在一起。图书馆后来又来一个姓梁的小职员，衣着阔气，也经常到寝室问这问那，大哥先初还以为他是好学之士，不介意，后在解放北平前夕，他坐飞机跑了，大哥这才明白这人是来监视他与王藩的。当时，即将失去政权的国民党要强送北平文化教育界的重要人士 300 余人去台湾，大哥也在名单内。他们来通知他说，明后天有人来请你上飞机，你要立刻就走。大哥将把此事告诉了王藩，王藩说：你不要走，北平很快就解放——与此同时，大哥的三舅刁泰贞——我当然也跟着他叫三舅，是考上南京政府第一届公费留美学航空的学生，学成回国后任国民党空军北平后勤处处长。他向大哥说：现在时局不好，你赶快离开北平，要去南京或回四川，坐我的飞机都行。可大哥却说：我要和北大一起行动，不能独行其事。有一个教授，暗中看出了大哥不想去台湾，就将一幅画与他换黄金，教授说画是珍贵的祖传。大哥拿着画看了看，是张石竹图，署名不知是什么人，就谢绝了。他回家查资料，才知道这是曹雪芹的笔名，再去找那

位教授，但画已经被外国人买走。大哥曾说过，这是我一生的最大的遗憾。

国民党作垂死挣扎，对北平的高等学校进行残酷镇压。朝阳大学学生会主席、学运领袖毛之范被特务追捕，就跑在大哥那里，躲了几天，才安全度过。不想这时朝阳大学读书的另一堂弟王利民和同学薛绍源等五位闹学潮的党员和外围被特务追捕，大哥想法将他们送回江津老家永丰场塘湾躲避。因我们王氏家族在当地有一些势力，又有人作过原来的警察局长和县参议员，所以这几个党员和外围能安全着落。他们还与大哥一起在院里办起了学校。王家在外读中学的子女全部回塘湾读书，还招收了其他学生，学校为分中学班和小学班，经常办讲座，讲授《新民主主义论》，宣传革命，请另一堂哥德国博士王香本回家讲授哲学、德文、英文。解放后中学班全部转到了军大。

北平解放后改名北京，大哥仍在北大任教。文化部艺术局组织整理中国古籍丛书，邀他参加《杜甫集》和《水浒传》的整理工作。他于 1953 年写成《水浒与农民革命》一文，在《光明日报》连载，得到党组织和学界的重视。那年，党组织给大哥很大的荣誉，邀他参加了天安门的观礼。随后由何其芳、陈翔鸿推荐他参加中国作协，后被调到古籍刊行社工作，他与全国高等学校部分教师、文史馆馆员等一起，开始整理中国文化遗产。此间他出了很多书。

四：被“安排”当右派

1957年开始整风反右运动，当时很可笑，上级下达了单位的“右派”指标，单位为了完成任务，就将把指标分配给大哥，大哥一贯听党的话，表示服从“分配”，哪知这一服从，给大哥的家庭，尤其是给他的学术生涯带多大的灾难。

大哥充当“指标”成为右派分子后，就株连到直系亲属和族人，连我们这些堂兄堂弟中也有一些跟着被划为右派或中右。一个侄儿是重庆勘探设计院的总工，到北京开会专程去北大看他。门卫说：“你不知道他是右派吗，他在农场劳教。”后来门卫记上侄儿姓名函告了重庆设计院，侄儿回设计院就被开批判会。

1957年，已经46岁的大哥除每天八小时完成打扫厕所等任务外，其于时间都属他的，他落得清闲，就他专心一志，锲而不舍，整理文化文学遗产。这期间，有人背地说他是白专道路和反动学术权威，他诺诺连声，唯唯听命，不与他人争执，以此幸免于难。后来他又被叫去陪斗“受教育”，去“过堂”，直至被关进了牛棚，他都泰然处之，随遇而安。每当造反派要他交代问题时，他都煞有介事地写一长篇之乎者也之类的文言文，这些造反派一知半解，也不好意思去请教他，就让其过关。其实大哥的心思这时也去悬想他在学术上没有解决的问题。

后来大哥被赶出北大，暂住在北新桥一处 6 平方米的小屋。小小的杂院，住有八家人。人们在屋檐下生火煮饭，院门外人声、车马声不息。一小屋，一小床，一书桌，连生存的空间都很困难，哪里有著书立说的环境？但他安之若泰，闹中取静，仍坚持早晨四时起床，伏案工作。在一个冬天的早晨，大哥的小女儿王贞白很早回家，见房门紧闭，屋里没有灯光，就感到奇怪：要是在平时，父亲早就起床在灯下工作了，今天怎么啦？她撞开门，惊异地发现老人中煤气昏迷在地。王贞白赶快将父亲送到医院抢救。原来是屋子太小，又不通风，差点酿成大祸。

说来也怪，一些造反派对大哥这样的“死老虎”逐渐失去了兴趣，还慢慢地有些来往。见“造反派”松懈，大哥就开始“里通外国”，他居然与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的浦安迪教授、威斯康辛大学的倪豪士教授、加拿大哥比伦亚大学的叶嘉莹教授以及日本的波多野太郎、中村璋八教授等开始书信往来。这些“洋学者”希望与大哥在汉学研究上相互交流。日本的波多野太郎还寄给大哥日本影印的明万历本《金瓶梅词话》，但后来这宝贵的资料被“革委会”没收。他在“五七”干校时，悄悄读中华书局印本《二十四史》，发现《三国志》整理工作做很差，有很多错误，他拿练习本写了六十多页意见，寄给中华书局了。

五：梅开二度写华章

粉碎“四人帮”后，党组织给大哥落实政策，人民文学出版社开“摘帽”平反会，会上党委书记严文井说：当年划右派时党委意见也不一致，我说王利器不像右派。立即有人说他不像，你还像呢——这样谁还敢说话呢？今天，经党委研究，认为划错了，现在正式平反——大哥听了，服从组织的安排、服从组织安排！

接下来，在一次全国的大学校长会上，原中宣部副部长、中国文联主席、党组书记周扬宣布大哥为国学大师，当时人民日报海外版、文汇报、光明日报等各大媒体都给予报道，称大哥“著作逾两千万言，号称两千万富翁”。大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没有什么成就，只不过数十年如一日地读书，辛勤地劳动而已，如果有点成绩，那也是导师和文友指导帮助支持的结果，不要过誉了！

大哥再次焕发出青春，他更加勤奋地读书和写作，接连交出 10 多部书稿：《盐铁论校注增订本》、《风俗通义校注》、《颜氏家训集解》、《文心雕龙校证》、《文镜秘府论校注》、《郑康成年谱》、《李士桢李煦父子年谱》、《宋会要辑补》、《历代笑话集续编》、《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增订本》、《九籀集》校点本、《警世通言》校点本、《越缦堂读书简端记》等约 700 万字。他还不断发表单篇论文，差不多每月都有，这颇引起学界朋友们的注意。他们说：老王这两年大丰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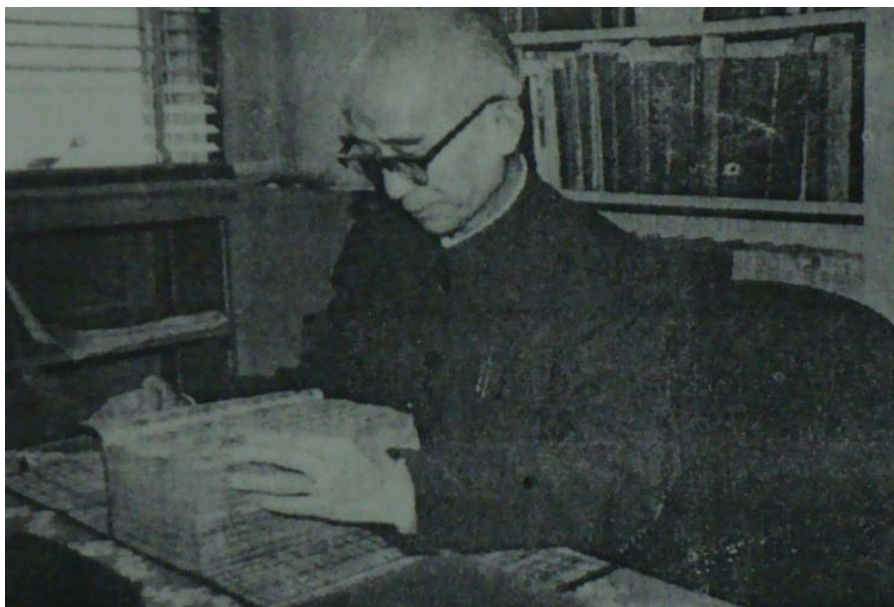
创奇迹了。问他奥妙何在？大哥却回答四个字：锲而不舍。大哥治学严谨。每本书稿他都要叫子女认真校对两遍后才交出版社。他的《水浒全注》是女儿王贞琼校的。王贞琼说：校后发现书中有的章回，注文达 300 多条。大多数条目，都不只一例引证，有的多达七八例。读到那些翔实的注条，真有不可思议之感。真不知查父亲阅了多少书籍，搜求到多少出处，又做了多少认真的比较，最后，才写出自认为难以推翻的结论。对出版的书，如果读者发现错误给他指出，他会表示十分感谢，并登报更正。

大哥是一个嗜书如命的人，1979 年他生病住院，也把书带到病房，精神稍好时就读起来，医生、护士都很惊讶。出院后，他的健康不如以前，家里人劝他休息，但他积习难改。床上、桌上、椅上，甚至地上到处都是书，他总是不停地阅读。1985 年他去日本京都大学、九州大学、神户大学、关西大学等讲学，各校都有赠书，大多为影印善本，既精且多，他视为至宝，因为太多无法随身带回。最后他只得通过轮船公司全部托运回北京。

大哥曾给我介绍过他的读书经验，他说：读书要靠记忆，但读那么多书，那里记得那么多？除了发蒙读私学时死读硬背的那些书外，现在读书全靠写卡片来辅助记忆。卡片可记录读书的心得和不同见解，也便于查找。几十年来，大哥积

累了数以万计的读书卡片。在十年动乱中，红卫兵收走了他四万多册书和最宝贵的数以万计的读书卡片。平反落实政策后，只退还了一小部分书籍，大哥问他们要那些读书卡片，原“革委会”的一名成员“理直气壮”地说：你平反了不去要求补发工资而在这追要你的卡片？这些卡片我们一张也没占为已有，而是全烧了。大哥一听，泪水不禁夺眶而出。

有一次，我与大哥一起登北京的八大岭，大家都大汗淋漓。他对我说：读书和学习就如登山，就要锲而不舍，天天生活于此，实践于此，乐而忘返，痴若着迷。一旦把未知的变为已知，那种境界，多像今天我们爬八达岭，登上高峰才算好汉，才能把长城内外一览无遗。登上了排云楼，才能把颐和园的湖光山色收来眼底。



1998年7月24日，大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大哥的女儿、我的侄女王贞琼曾给我讲：父亲没有留下任何遗嘱，也没有留下金银财宝，只留下了一些书籍，

但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父亲在祖国文化遗产这片沃土上辛勤耕，在几十年的逆境中，仍不颓丧，在长期寂寞中不坠青云之志的风节，我们永志不忘。

（原载季刊《当代史资料》2013年第4期）

我的村庄我的家

——一位抗日儿童团团员、八路军战士的回忆

前 言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在今年上半年的 3 月—4 月间，我两次在办公室、一次在他家采访了这耄耋之年的离休干部田勇，后来又多次电话采访。田老精神矍铄，很健谈。少年时他亲眼看见日本鬼子占了他的村庄、烧了他的家园、杀了他的亲人，他也差点死在鬼子寒光闪闪的刺刀下。回想往事，田老民心情沉重，几度哽咽……

在整理采访记录时，我采用第一人称的方法写成此稿。谨以此文献给今年这个不平凡而又有着特殊意义的年度。

一 我的村是个古老的村

我老家在河北省饶阳县大城北村，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村庄。这所谓的城，原指的是鲁口城，就在今县城西南的 20 多里。这里原有个城堡，我们的村庄就在城堡的北面，所以叫大城北村。

鲁口城建于汉代。当年王莽、刘秀曾在这里征战，你争我夺。到北齐天保五年，即 554 年时，饶县移治于此。隋唐时鲁口又置深州，唐代天保元年即 742 年，深州改为郡，后又改州。直到唐至德二年，深州州治才由鲁口迁到陆泽。鲁口就成为

一座空城，加上这里屡经战乱，这里就成了一座废墟。

我于 1929 年腊月初 7 生于大城北村家中。家人说这天很冷，地上全结了霜冰，门外吹打着寒风，夹飘着雪花。从我记事起，大城北村就是我儿童的乐园。古城堡遗址隔家很近，我小时常在这里玩，还和伙伴们一起挖出过许多铜钱。

其实，我家在当地不算穷，算是中等人家。这里是平原，地势平坦、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是冀中平原“粮仓”。一个家庭只要勤勉节约，勤耕苦耙，如不遇天灾人祸，吃饭是没问题的。我家住在村庄东头街正面的一个小院里，父亲叫田辅国，他读过书，有文化，在县城教书。我曾祖父也在城里，也教书，同时也给人看病。那时，除教书的人被叫作先生外，看病的医生，也被称为大先生。我家算耕读世家，乡下有薄田，家里又有读书人。清末时，我曾祖父是个秀才，全村有名。三曾祖是举人，全县有名。

大城北村住着近 300 户人家，人口两千。村里有三大姓，首姓是郭家，住在村南头。这家族很大，人口多，势力旺，出过县长，祖上是武举子，全家练武，算是拳武世家。院里设有演武厅，插立排排关公刀、鬼头刀、红缨枪等刀枪棍棒。村庄西头是刘家，也算大姓，多出文人，读书人也多。村东头就是田家，也算出文人吧。出过举人、秀才。出过悬壶济世的大先生和教书先生。

这是一个抗日老根据地，属聂荣臻将军领导的晋察冀边

区统管，由冀中区直管。

二 日本鬼子进村了

九岁那年，日本鬼子第一次进大城北村烧杀掠抢。

1938年年底，大约是11月份。一天早上，天还没全亮，飘飞着的大雪将村庄的道路都铺得满满的。突然“呼、呼、呼”的三声枪响，惊醒了还在熟睡的村民。不用多想，是日本鬼子真的进村了。于是，全村闹嘛了，人们都慌乱地拼命往外逃。但是日本鬼子包围了村庄，逃出是很难的。大家就在村里的街巷或家里东藏西躲。

第一个遭日本鬼子枪弹的是一个姓田，是我同学的哥，住在村东街口。这天天还没亮，雪花飞舞。他得早起，发要去村外挑水。大城北缺水，百姓用的都是地下水。院内浅泥层的地下水苦涩，不能饮用，村外沙泥深层地下水清冽甘甜，才能饮用。他担着桶刚走出村北口，就被包围村子的日本鬼子发现，日军以为他要出村，就向他开枪，一枪正打中他的右腿。枪声惊醒了全村人，狼真的来了……

天也大亮，我跟着大人一块跑。200多名日本鬼子端着步枪搜村，个个穷凶极恶。大家就分散躲藏，我和很多人都跑散了。我先躲在街后的一条小巷，后来听到追来的脚步声，我又赶快躲进户外的一个厕所。北方的厕所无盖顶，四面的墙垛有一人多高。里面虽脏，但结了干冰，很干燥。这厕所

平时很少有人进，我躲在里面，不敢出来。

鬼子在搜查时把全村掀得鸡飞狗跳的。许多躲藏在地窖下和炕下以及枯井里的人都被搜查出来。其实，每个家，都有一个较为安全的藏身的地方，这多让给老人或孩子。

早几天，村公所派人来宣传，说日本鬼子要进村了。这下村里就外跑了一些人。狼真的来了，村民听到早晨的枪声，又跑脱一些。日本鬼子搜村时捉住了 200 多村民，鬼子持枪将大家赶往村东头的一个大坑里。这坑不深，但底宽，冬天是干的，只在夏天才会积水。

日本鬼子叫出翻译，说你们村有土八路。他叫大家指认出“土八路”。翻译还说：“皇军也在村里几处空置的房屋里挖掘出了‘土八路’的枪支。如果那个指认出‘土八路’，就放他回家。”但没有一个人回答他们。

相持了半天，日本鬼子恼羞成怒，下令将村东头的几间房屋点了火。火势很快迎风大燃，发出噼噼叭叭的响声。人群中有人抽泣起来，但仍没人站出。鬼子无法，下令拉出了三十多个青壮年，这是他们怀疑的对象。三十多人被押到较远的一个叫屋底村地方。

日本鬼子人对村里有“土八路”是确信无疑的，因为已搜查出了枪支。鬼子计划将这三十多个怀疑对象押到屋底村后，再进行拷打审查，以期查出“土八路”。

日本鬼子所说的“土八路”，就是后来许多抗日书籍上

所说的“游击队”。但在大城北村这地方，叫游击队的不多。除八路军正规军外，村里驻的叫区小队，县里驻的叫县大队。大城北村驻有区小队 20 多人，个个是精壮汉子。他们在村里，组织练兵，宣传抗日，制造地雷。被押到屋底村的三十多个村民中，大多数是区小队的战士。他们没有暴露身份。

日本鬼子是个窝囊废。鬼子押着这三十多人到了屋底村后，将他们全关在一间大屋子里。晚上，雪很大，风很烈，天很冷，守门的日本哨兵到外面去生火后取暖。到了半夜，这三十多人悄悄拨开门栓跑了。他们都回了村，回到区小队。

买盐的哑巴货郎会说话，这是个怪事。

日本鬼子为什么知道大城北村有“土八路”？为何轻易搜查出区小队的武器？正当全村人疑惑不解时，买盐巴的哑巴货郎突然开口说话，真相终于大白。

在鬼子第一次进村后的五天，村东头又来了卖盐的货郎，他戴着礼帽，看起文绉绉的。村里人对他并不陌生，他是哑巴，在日本鬼子第一次进村前四五天，他也来村里卖盐。这次又来，所以大家都熟了。大家仍到他货担处买盐。下午，他不经意间突然开口向一村民打听情况。“哑巴”会开口说话？这肯定有鬼。于是村民将他捉住，区小队的战士赶来一审查，原来哑巴是装的。他是一个汉奸，前次就以卖盐为名到村里打探到区小队的情况，然后向鬼子告密。这次他又来，不小心开口说话，露了馅。村公所和区小队报经县大队后，

在一个晚上，公开镇压了汉奸。

大奶奶为了救我，自己挨鬼子一枪。

1939年的3月，日本鬼子第二次进大城北村。这次鬼子进村，给我印象最深，因为我为直接面对鬼子。要不是大奶奶急中生智救我，我早就被鬼子步枪上的刺刀戮穿肚皮，早就死在鬼子的枪刀之下。

这天很冷，北风飕飕地吹，春寒料峭。因为头天有人用自制的地雷炸死了两名鬼子，所以在这天上午九时许，200多日本鬼子就闯进村来。他们先仍在各家各户搜查。鬼子在搜查时，见好的大家具就砸，见好的东西就抢。将一个本来很宁静的村庄，弄得乌烟障气。

全村人又开始外逃，没逃出村的就往地窖、草垛、夹墙、炕底等地方躲。我们全家又逃散了，我只身一人跑到我家后面一户躲起来。这户也姓田，但不是我们一大家的，隔得远，与我家只是同姓而已。这家有一个老太婆，人很好，心善良，她有两个儿子，名怪怪的：大儿子叫田栓庄；二儿子叫田栓马。此时都外逃了。因为是本姓，我管老太婆叫大奶奶。

我跑进大奶奶里屋的时候，日本鬼子已经进了后街。他们“哑西、哑西”地嚎叫着。

大奶奶见我跑进来，又听到外面有追赶声，立即将我藏在她家的炕壁后，并立上一张竹席将我遮挡住。我藏在竹席后屏住呼吸，听到了鬼子进门的响声。只听大奶奶说：“没

人、没人”。鬼子不信，嚎叫一番后，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猛地向竹席刺来。说时快，那时快，大奶奶冲上前，用左手臂将日本鬼子的枪把挡了一下。好险！鬼子的刺刀刺进竹席时，向左侧偏移动了一下。正好刺在墙上。我躲过一劫。

竹席倒下，我站在这里全身发抖。大奶奶见状，忙笑着对鬼子说：“皇军，他是个孩子，不知什么土八路。皇军来了，他怕就躲在这里。”不知鬼子听懂没有，只见鬼子发疯似的回过头，举枪就给大奶奶一枪，这枪正打中大奶奶的右臂。很快，鲜血染红了她的袖衣。鬼子这才“哑西、哑西”地叫着离开。

大奶奶是救命恩人。她是大城北村最穷的一户。虽穷，但很能干。那时，她天天外出逃荒要饭吃，家里还喂了猪。为救我，她右臂被日本鬼子打了一枪，子弹穿臂而过。事后我家去看她，向她表示感谢。她说：“没关系，我命贱，死不了，伤口会好起来的。”她的伤口化了浓，但不久，真慢慢好起来了。

后来，大奶奶的大儿子田栓庄参加了八路军。二儿子田栓马在家干活。1946年我参加八路军后离开家乡。1955年我回家，准备去探望大奶奶，不想她老人家早已去世。

后来的日子越来越不太平。日本鬼子总是隔三差五进村烧杀掠抢。1942年5月，日本鬼子开展了所谓的“五一大扫荡”，对大城北村的侵害就更大了。

三 日军残暴的“大扫荡”

1940年8月，八路军开展的“百团大战”给日本侵略者沉重打击。日本鬼子为了报复，于1942年5月1日开展了所谓的“五一大扫荡”。鬼子“扫荡”的重点，就是晋察冀边区的深县、武强、安平和我们饶阳等地。

如说在日军“大扫荡”前，八路军和县大队、区小队在大城北村的活动是公开或半公开的话，那么“大扫荡”后八路军和县大队、区小队在大城北村的活动就转入了地下或半公开半隐蔽的状态了。

大城北村是鬼子“扫荡”的重灾区。日本鬼子实行的是“三光”和“焦土”政策，其实。当时大城北村人都不多了，有的是外逃了，更多的青壮年是参加了八路军或县大队、区小队，打游击去了。留在家的多是年老人、妇女和小孩。但县大队或区小队经常深夜摸回村里，半夜里袭击鬼子的炮楼。

鬼子的“扫荡”是无人性的。先是飞机“人”字型飞在天空，俯冲下面，对下面进行狂轰滥炸，然后炮兵集中火力炮击，最后步兵带状入村。这时，村庄往往就是一片火海。

一天晚上，县大队、区小队的战士还在大城北村里活动，大家都没发现什么异常。到了深夜，部队突然命令撤离了村庄。天刚亮，飞机就飞来轰炸，然后是大炮攻击，最后进入

步兵。人们一听到飞机的声音，就跑出屋外，进入战壕或地道躲避。早前，县大队和区小队组织百姓挖了许多地道，村与村相连，户与户相接，纵横交错，可叫“村村通”、“户户通”。这些地道可以有效躲避日本飞机轰炸。

一颗炸弹突然落在我家处，炸断了我家一头黄牛的腿。这黄牛不会躲飞机，但它仍飞快地乱跑。一个农村家庭，一头黄牛可是宝贝啊？鬼子走后，断了腿的黄牛居然跑回家，家里人看着这黄牛，听着它哞哞的叫声，伤心透了。这黄牛在家里奄奄一息地躺了几天，大家都认为医不好了，就将它送到了牛场。

在“大扫荡”中，日本鬼子到处修碉楼。这又叫它炮楼，圆型的，有现在的三层楼这么高，四面都有射击孔。他们还设置有壕沟、吊桥、电网、探照灯等。每次扫荡，他们都要抓一些无辜的百姓，关进炮楼，进行拷打审问。我家姑姑就是“五一大扫荡”时被鬼子进村抓去的。我大哥田绍典，本是附近宋家庄的教书先生，离大城北城二里多，但仍被抓去，受尽严刑拷打和折磨，两个多月后才放回。

我大爷、二爷、五爷和三爷的儿子田锡奎，还有一个叔父、一个舅父都是“大扫荡”中被鬼子杀害的。大爷、二爷、五爷和三爷的儿子，他们在日本鬼子进村“扫荡”时往村南逃跑，狡黠的日本鬼子在村南设了卡，将他们拦截。他们就活活惨死在鬼子的刺刀之下。

这天晚上，我与父亲一起往西跑，日本鬼子在西面没设卡。我们逃到了一片树林里，突然遇到一支军队，原来是八路军，他问我们是干吗的，我们说是躲鬼子的。见我是小孩，他们就指了一条安全的道，让我们往前走。

有一次，我与我爷爷一起去柳远村赶集。刚到集边，就发现日本鬼子包围了集。我与爷爷一起连忙钻进壕沟，这壕沟也是村村相连的。我们飞快地跑，终于跑离了鬼子的视线。

四 不屈不挠的我的村庄我的家

虽然从抗战一开始，大城北村就遭到日本鬼子的烧杀掠抢，在“扫荡”中，又成为日本鬼子“三光”重灾区，但是，我的村庄我的家，从来没有屈服过。大家和日本鬼子斗智斗勇，进行反抗。

早前，祖父还在城里教书，日本鬼子来了，只好回村上教。当时，县大队的同志开会给大家讲，说日本鬼子要烧我们村、亡我们国、灭我们的种，要大家拿起武器抗日。当时我祖父就在城里买了两支枪，带回村里。准备组织自卫队进行反抗。后来这两支枪交给了村里成立的救国会，救国会又交给区小队的战士。

每次鬼子进村，村民都是先隐藏在村内的区小队里负了伤的战士。帮助寻找出村的地道口或壕沟出口。日本鬼子每次抓了许多人，押着到一个地方集中进行拷问，这中间当然也有区小队的战士。每次都没有村里的群众出来指认。他们

宁愿自己面对血淋淋的刺刀，自己承受皮鞭的抽打，不会出卖抗日战士。

1943年的冬天，大城北村的卢老师，带着我们10多名高小同学，到小堤东南面的一个叫周村地方开会。这天风大、雪大，大家自带了烧饼，你拉着我，我拉着你，赶到这里。这里聚集了許多人，有穿正规军装的八路军，也有县大队、各区小队的战士，还有群众和学生。这里要召开一个群众大会。一会儿，新搭的台上站出了一个人，穿着灰布军装，腰扎皮带，非常威武。大家说这就是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他开始讲话，先讲我们当前遇到的困难，再讲我们这些年来抗战的战果，他号召老百姓与八路军、游击队之间要团结。最后讲了大家要树立抗战胜利的决心和信心……

这次会议结束后我回到大城北村，就加入了村里组织的抗日儿童团。儿童团员们从村南头的拳武世家郭家中，拿来大刀、长矛、红缨枪，开展了站岗、放哨、贴标语、查路条的活动。写标语是年龄大点的儿童团员的事，我们稍小就贴。儿童团团长是村西头的一个姓刘的。他个特高，很勇敢，是我父亲的学生，后来他参加了八路军。后一个儿童团团长叫郭文袖，个也特高，也很机灵。

一次我在村头站岗查路条，一个探头探脑的人要进村，被我拦住，我要看路条，他没有，强行要进村，我只好硬将他带到村公所。还好，在这里他的亲戚出来保了他。

我的叔叔田辅唐早在“大扫荡”前就参加了八路军。另外有一名叔父田亮京，当时 30 多岁，他长期在村里为八路军筹集军粮，他实际上是八路军的粮募员。一次，他与另外一个本家田锡超一起被日军抓走，在严刑拷打中他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八路军的募粮员。不久，他就被残暴的日军乱棍打死。家人将他抬回时，看见尸体上血斑淋淋，令人惨不忍睹。

我两次为八路军送过军粮。小堤原来是区政府机关，日本鬼子“大扫荡”后被占领。于是，给八路军送军粮的地方要远一些。我 13 岁这年，我与伯父田辅功一起用黄牛拉马车，给八路军送粮。这车粮是小米，有 400 多斤，装了四大袋。我们经过县城北面的滹沱河时，牛不走了。原来河上结冰很薄，牛都怕陷下去，想了许多办法，找了别人帮忙，才过了河。这时天都黑了，将军粮送到目的地后，我们就往家赶，途中在一农户家住了一晚。第二天才回家。第二次送军粮的情形也基本一样，往返走了两天，只是过滹沱河容易些。

大城北村妇女救国会会有一个主任很出名，这人很能干，很朴辣，干事风风火火，工作样样走在前。她组织妇女开展培训班，开展巡逻、挖地道、制地雷、筹军粮等等。大家都称他为女英雄、花木兰。不想她母亲被日本鬼子杀害，她很悲愤，痛哭两天后，逃出了大城北村，参加了八路军……

日本鬼子占领大城北村后，成立了“维持会”。维持会里大多是我们的人。他们表面在“维持”秩序，实际上给八

路军、县大队、区小队通风报信，有时还参加区小队端鬼子岗楼的活动，但这是非常神秘的。有个维持会长，叫郭大毛，长期白毛巾包头，他就是我们自己的人。他千方百计搪塞日军和伪军，暗中给县大队、区小队通风报信。有一天他骑自行车去五公路上，被日军残杀。

另有一个人称郭老久的，他还有一个名好象叫郭久安。他可是个抗日积极分子，威望很高。他就是前面提到的村南头的拳武世家郭家的人。他将家中的枪支弹药、梭标长矛、红缨枪等全部捐献出来抗日，被曾选为抗日民主村长。在小堤区没被日军占领时，他当过保卫团团总，这是一个抗日性质的基层群众自卫组织。后来他被推选为饶阳县第一任抗日民主县长。这是当时大城北村出的最大的官。据说，他常与吕正操司令员来往，不想在抗战胜利前夕病故，可惜！

1945年8月，日本鬼子投降，抗日战争终于胜利。次年即1946年11月，我在村里报名参加了八路军，成为一名光荣的八路军战士。

结束语

这篇文章写得有些拉杂，赶快结尾！但在结束前总得交待一下田老的简历——

田勇，男，汉族，1929年生，初中文化，中共党员。原河北省饶县大城北村人。抗战时参加儿童团团员，1946年

11 月参加八路军，1947 年 3 月改称解放军。先后在饶阳县大队、晋察冀军区教导旅、晋绥军区后勤卫生部工作。1949 年 11 月，随贺龙部队到西安。解放大南西南时又随贺龙部队到成都。1956 年转业到四川省江津县，任国营企业党政主要领导。1986 年离休。



本文作者采访老八路男勇（右一）同志 漆勇 摄影

（原载《重庆纪实》2016 年第 3 期 总 11 期）

后记是写在书后的哆嗦话

《江津往事》第二卷终于完成，我可算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这算是这些年来我在地方人文、历史、风物、民俗写作的一个小结，算是集成吧。

2009年《江津往事》第一卷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后，以为完成了任务，心愿了啦，不想后来又在全国各地的报刊上发表了一些类似的作品，越发越多，于是到了2014年又有辑集出版的想法。这事我也很矛盾，这样的文章写多了，别人就认为你是专家，自己已会骄傲起来，有时用词用句或校对也欠准确，认为别人的看法是吹毛求疵。其实这类的文章在引用是很难做到百分之百的准确的，因为这类文章古为刻版，几个版本在一些字句上都是不一样的，但也讲得通，不能说谁对谁错，因为这不是标准的中学语文课本。比如苏轼的名篇《赤壁怀古》中的“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句就有课本都写作“乱石崩云，惊涛裂岸”的，联圣钟云舫在自己的刊行的《振振堂卷稿》中多次将自己名钟云舫写成钟云纺或钟耘舫或钟云，你能说他是错的吗。其实，若我当作协主席，别人的作品比我发得多，质量好，我心里肯定有酸意。既然是文友就可提出或进行商榷，不必以大师的心态提出

“正本清源”或鞭挞对方。若是我，醋酸之后就追一下。况且许多问题都是有二个正确答案的。

于是我决定还是将此书出版，一半也是虚荣心，一半是零星发表的作品好上柜。我将此书分山水旧影、故事留痕、人物古踪三部分，严格说起来有些篇章是不恰当的，但是作一个大致的划分。其实，我写这类文章我是占有一定的优势的，因为江津的古县志我都有，自认为在这方面的藏书就个人而言在江津比任何人都多，这也许是事实，因我在江津地方史志的藏书还提花给了区图书馆我党史室等史志部门，我有的江津地方史志方面的书他们都还没有。但这是只是一个方面，读史志是不够的，还有下去看，到实地进行采访的座谈，谓的读书和行路就是这个道理。可以这样不谦虚地说吧：我的节假日时间多是用在下镇街采访收集材料的。这就是为写作作第一手的资料性的准备。

这本书的编印得到许多老前辈的老领导以及朋友的关心与支持。全国著名作家、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黄济人先生题写了书名，再现出了对我的极大关心。区文化委员会主任胡林、副主任郭晓红、纪检组长杨灿忠，区文联副主席邹军等在会上专题讨论了这部书提纲和篇目，对我帮助很大。区图书馆馆长张宏、区文化馆馆长温玉梅……等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冉小梅、漆勇等给予我帮助，此深表感谢。

如有机会，我将会出版《江津往事》第三卷、第四卷及

至第五卷——这也算是一个承诺式的表态

2016年5月13日于江津